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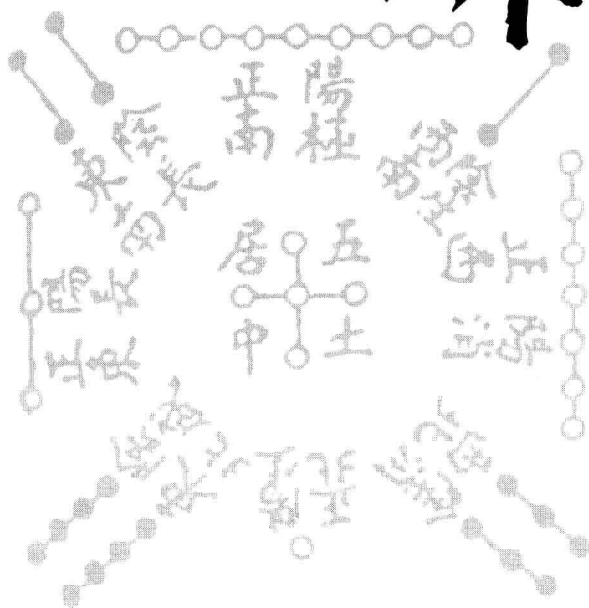
長江學術

文獻大系

哲學卷

刘大钧 著

# 邵易集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刘大钧教授简介

刘大钧（1943-），山东邹平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著名易学家，现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周易研究》学刊创办人、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经学——易学的研究，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倡导并开展了传统象数易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易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传统易学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治《易》路数上，主张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超越传统的象数义理两派之争，坚持象数义理兼顾，探寻易学的整体学术特色和内涵。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史哲》《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周易概论》《纳甲筮法》《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学术著作多部。二十多年来，筹备召开了十余届国际易学与海峡两岸易学及儒学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易学与两岸易学及儒学的交流与发展，并以“大易”系列的形式，主编了历届易学儒学研讨会论文集十余部以及跨越百年的大型文献《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精装30册），这些论文集被很多学者参考引用，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泰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在给汤一介先生的信中称赞刘大钧先生：“其沉潜易学之深辟，诚当代巨儒。”

# 前言

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一门学术的推展主要有四种手段:开课授徒、著书释义、召开专业学术会议和编辑发行专业学术刊物。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于此四方面齐头并进:1981 年开设《周易》选修课,1986 年出版讲《易》专著《周易概论》,1987 年召开“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1988 年创办《周易研究》学刊。《弘易集》就是对过去三十多年来这四个方面工作有关文字的集结。

一、开课授徒。1981 年,我们在山东大学开设了全国高校最早的《周易》研究课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七七届的学生们踊跃选修此课。这些青年学生在渡尽劫波后,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可,如饥似渴地学习《周易》的数理知识,使《周易》选修课成为山大哲学系最为热门的课程之一。那时晚自习的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人们在告别愚昧后,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本人与同学们一样,每晚都备课到深夜,并抓紧时间编写课程讲义。

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流毒未清,人心仍晦盲否塞,此时讲《易》惟重《易》理大义,方可使学生自拔于流俗,从而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为此,我们甄选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讲授底本,因《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评介此书曰:“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周易》乃专门之学,为了使学明白书中汉魏三十余家治《易》者在解《易》时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故专门写了《周易概论》来疏解书中注文,引导学生做向内的功夫,使他们体悟到非深通天人之故者不能与《易》相应,惟穷神知化,方显天道之长。从 1981 年开始至今授课三十三年,以《周易概论》和《周易集解》为课程的主要内容,授业对象主要是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最近二十年,讲授《周易集解》时改用潘雨廷先生校点的清人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

在所谓的“国学热”中,我们谢绝了社会上每人收费数万乃至十余万的“国

学班”高薪授课邀请,秉持“卑以自牧”的教诲,从不到公共传媒上“推销”自己。经历了三十余年“我注六经”的教学实践,因“常德行,习教事”,故从一代代毕业生的反馈中,我们深深领会孟子所言之确:“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二、著书释义。我们的所有著述多为授课而写,并针对教学中学生的提问和疑难而不断补充其内容。拙作《周易概论》写成于1983年,1986年在齐鲁书社正式出版,其后多次予以补充修订,不断再版,先后印行十余万册;《纳甲筮法》亦是为讲解易学“象”“数”“理”“占”之“占”而写;《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付梓问世,亦是多年研读讲授帛《易》和竹书《易》的结集。其他,如我中心林忠军教授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王新春教授的《周易虞氏学》、李尚信教授的《卦序与解卦理路》,亦多是由给学生授课的讲义汇集而成。他们的这些书,在学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年来,除了写书和写论文,我还为友人和弟子的易学著作或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写了一些序言跋语,今亦一并收录于本书。在本人作序的著作中,在学界与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刘长允研究老子的著作《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最令我动容的则是王兴业先生的《三坟易探微》和王讚源先生主编的《墨经正读》,二人皆是文稿写成后,尚未见书即因长期伏案写作终至积劳成疾而辞世。至今令我思之泪下的是,当王兴业先生挣扎着病体对《三坟易探微》校完最后一稿后,知道自己恐不能见到该书正式出版了,嘱其家属转告我,希望在书稿正式出版后,由我持其书带弟子到坟上一页页焚之,使他地下一读。我在该书“补记”中言及此情此景时说:“书稿之飞灰,当是先生之妙句,其余烬,正可化作先生长眠的梦床。”今因此书之“序”而言及这些往事,又令我久久无法平复。

三、召开学术会议。学术会议可以为学者们提供一个短期聚会研讨学问的平台,能很好地推动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发展。在研讨会上,学者们相聚在一起,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商榷一个学术专题或学术的不同领域,人们在热烈的争鸣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1987年召开“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召开“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至今,我们作为主办单位或协办单位先后又召开了七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五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还召开了百年易学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重大学术会议。

在上个世纪教育经费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全国各地举办学术会议的并不多,因而每次开会,学者们都认真撰写参会论文,全力以赴地准备会议发言,把



能收到一次学术会议的邀请视为一种荣耀。在每次会议结束后,我们都会想办法克服经费上的重重困难,将优秀参会论文编成论文集,找一个好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以益学林。因而,我们的每次学术会议都落地有声。当我今天反观这些会议的“开幕词”“闭幕词”及“论文集前言”时,不禁心潮澎湃。《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问之蕴蓄,在体察感悟前贤之言行,并因察言而求其心志德行,进而养我心性。故能志于远者必能返志于近。“前言往行”者,古贤心术之彰也,能将其蓄于我心,再发之于文字以济世人,方可当此拨乱反正之后,得辨章学术、匡正人心之效也。此亦我们经济上无论如何困难,都要将会议论文集出版行世之故。

四、编辑发行专业学术刊物。近代以来,学术刊物在传播学术上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然而四书之中至今并无一本专门的学术研究刊物,五经中亦只有《周易研究》一本专经研究学刊。这本刊物当时在一无任何经费、二无办公地点、三无专职编辑人员、四无正式刊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省里发的内部刊号),苦苦挣扎着。可能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山东大学老校长吴富恒教授曾用孔子此语评价我们这种办刊精神)感动了上苍,《周易研究》终于因其在海外的影响力而于199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刊号,随之在邮局正式征订发行。

首次邮局征订,订数突破三万份,知此消息之后,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数年不计功利后果的奋斗终于有了回报。确如马一浮先生所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无为者,无所为而为,非不为也,为之而无私,斯曰无为也。”可能上苍一直在默默注视着:我们经历的那些苦难,正是天地与先贤们对我们的磨练与考验,使我们体悟到:德化之成,非可坐致,须经历“劳民劝相”(《周易·象传》井卦)乃可获致也。亦如范曾先生当时对我所言:“你这种高雅刊物,订数在三万份上下还是成功的,如若是三十万份,你就彻底失败了。”果然,因我刊坚持以阐发《易》理与象数为主要内容,而未像一些民间人士所希冀的以讲占筮和卦例为主,使得刊物订数不断收缩,但至今仍保持在一万两千份的数量上。

二十五年来,我刊在海外与国内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声誉与影响,台湾学者将我刊誉为“二严之刊”(指办刊严肃严谨)。2012年,我刊又当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多年来,我们能够不断组织召开国际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我们周易研究中心能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十三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之一,我们能

与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及著名学者保持着密切往来关系,这些都与《周易研究》的影响及其声誉有着极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自2005年起,我们以《周易研究》历来所发文章为基础,又请台湾学界同仁协助,对近百余年来海内外易学研究论著进行了搜集整理,2010年出版了30册2000余万字的《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随后“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续编”又获准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编纂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除此以外,林忠军教授的“象数易学发展史”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可以说,正是以《周易研究》为阵地,我中心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中英文网站,在网站上我们既发布易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还将多年整理的古今易学研究资料目录公诸其上。目前,我们中心主持的囊括古今论著的“易学研究数据库”也正在建设之中。可以说,现在我们已是从五个方面齐头并进,弘扬易学了。

除以上方面外,我们始终注意将易学与当今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受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邀请,先后为青岛崂山巨峰景区、新疆特克斯“八卦城”,构思设计了以大易文化为主题的人文景观。我们知道,自汉代起,历代王朝都有将诸经经文刻石立碑予以弘扬的传统,故由我制序并负责校对,特克斯县建设局靳文涛局长具体规划设计,特将《周易》今本经文及帛书本经文、竹书本经文皆刻石立碑于“八卦城”之“大易碑廊”。此为我共和国时代唯一刻石颂扬世传本及最新出土之马王堆帛书本、战国楚竹书本《周易》的石经巨制,因而引起海外学人的关注,并有人专程前往参观。

总之,“积德累仁,世积其美”是我们这些年来的弘易宗旨,而“絮静精微”的境界则是我本人及“中心”全体同仁一生的追求。今后,我们将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精神在《易》学园地上继续耕耘,正如我过去所言:“既默默耕耘着过去,更默默耕耘着未来。”

刘大钧

2013年8月16日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周易是古代行家經典之一，  
為研究文化史者不能忽視  
之書。《周易研究》月刊的發行，  
對考古文獻在祖國文化史上  
的地位及價值，當能大有開發  
揮或闡明，令人興奮。

一九八五年冬周谷城題。





無聲焉嗅獨  
知時此是乾  
坤策有基

王陽明先生詠良  
知詩

大鈞尊兄存念

一九八七年

梁漱溟書



《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  
文化典籍，不仅在哲学史  
上有卓越地位，而且在  
科学史上亦有广泛影响，  
《周易研究》创刊，必能  
解惑阐微，对易学作  
出新的贡献。 敬祝

《周易研究》创刊

張岱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

絜  
靜  
精  
微

孔  
德  
成  
題





周易中華民族對人  
類的杰出貢獻。

雷洁琼



一九九三年七月

觀國之光賓于王

一九九六年元月蔣緯國





研  
精  
乃  
通

易學研究創刊十周年

傅立人題祝

時年九月





周易研究學刊探討古代  
哲理發揚中國文化對學  
術貢獻甚大松值創刊五周  
年敬申賀意

吳大猷



一九九三年八月

開

物

成

務

饒宗頤題



窮神知化  
存乎其人

任繼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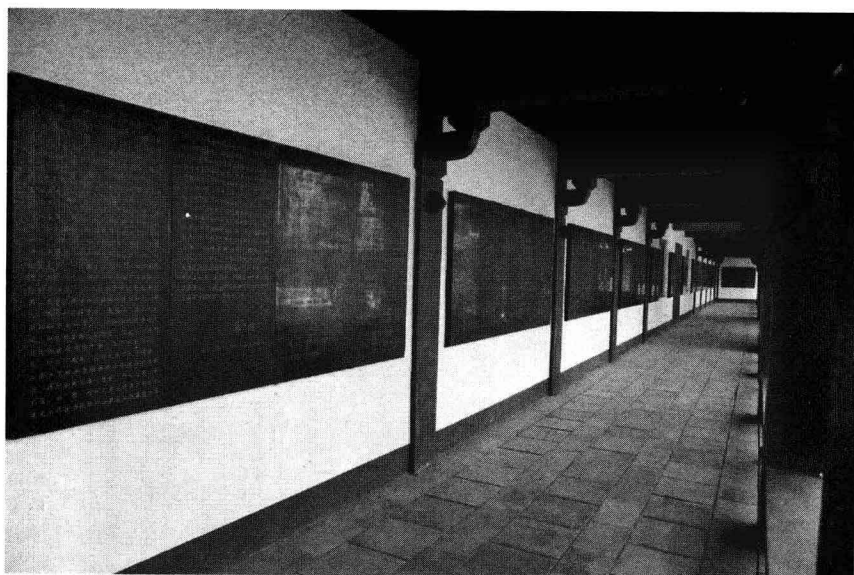




刘大钧先生为崂山巨峰景区正门撰书楹联：鳌崂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



刘大钧先生为特克斯县“大易碑廊”题名



由刘大钧先生制序并校对的《周易》三本石经(局部)



刘大钧先生为崂山巨峰景区正门巨石题写“嘉会”

# 目 录

## 知 至 篇

《周易研究》发刊词 .....	1
告读者(三年回顾) .....	3
告读者(五年回顾) .....	5
《周易研究》合订本(1—10)前言 .....	8
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成立暨《周易研究》创刊十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	10
言几存义  开物成务 ——纪念《周易研究》创刊暨山东大学易学与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 .....	14
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辞 .....	20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23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25
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26
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31
从此东流应到海,寻源只有客乘槎 ——历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回顾与总结 .....	33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	40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开幕辞 .....	44
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开幕辞 .....	47

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学术总结 .....	50
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	60
欧盟“中华文化高峰会议”开幕辞 .....	65

## 时 舍 篇

《周易概论》齐鲁书社版后记 .....	69
《周易概论》齐鲁书社版再版后记 .....	71
《大易探微》序言 .....	72
《大易论集摘要》序言 .....	75
《大易集成》前言 .....	77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序言 .....	84
《梅花易数白话解》序言 .....	86
《大易集要》前言 .....	88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序言 .....	92
《周易古筮考通解》序言 .....	95
《周易图释大典》序言 .....	97
《纳甲筮法》齐鲁书社版前言 .....	100
《纳甲筮法》齐鲁书社版后记 .....	102
《象数易学研究》(第一辑)前言 .....	105
《泰山画册》前言 .....	108
《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序言 .....	110
《周易经传白话解》台湾版前言 .....	112
《周易折中》前言 .....	115
旧学邃密 新知深沉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序言 .....	128
《大易集述》前言 .....	132
融旧铸新的诠释与研究	
——《周易虞氏学》序言 .....	136
《〈三坟易〉探微》序言 .....	140
《〈三坟易〉探微》补记 .....	143



《周易概论》巴蜀版前言 .....	144
《孟津龙马负图寺碑文》前言 .....	146
《易传全译》前言 .....	147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大易集义》序言 .....	149
可喜的收获 宝贵的启示	
——《大易集说》序言 .....	156
《易学要籍丛书》总序 .....	159
《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前言 .....	161
《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版前言 .....	168
《〈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序言 .....	172
《大易集释》序言 .....	176
《周易概论》巴蜀版增补本前言 .....	180
《卦序与解卦理路》序言 .....	182
《天不变道亦不变——老子纵横谈》序言 .....	186
《大易碑林三本石经》前言 .....	187
《〈易经〉与现代生活》序言 .....	190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	
——《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	193
显晦宁殊奥 卓识发覆艰	
——《墨经正读》序言 .....	208
《汉代易学通论》序言 .....	211
《周易纳甲筮法》学林版前言 .....	226
《大易集读》前言 .....	232
《郑学丛论》前言 .....	235
《大易集思》前言 .....	239

## 生生篇

青岛巨峰开发区整体设计规划 .....	245
在巨峰游览区开放仪式上的致辞 .....	252

谈《易》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	254
本刊主编答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先生问 .....	257
科学理解易学 拓展研究视野 .....	267
由精而博 以精通博	
——读书漫笔 .....	269
含弘广大 品物咸亨	
——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专家论证会上的报告 .....	271

# 《周易研究》发刊词\*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周易》,被视为“大道之源”,成为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数千年来,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文学、伦理、艺术、宗教以及自然科学一直持续不断地产生着重大影响,并且自十七世纪以来,更被译成多种文字而走向世界。于是,西方利用东方古老的《周易》启迪出许多新学科、新技术与新理论,并进而将《周易》变成一种方法学,当成决策科学与管理科学加以崇拜,从而使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其应有的重要地位。但是,这部“致广大而尽精微”、闪烁着我民族智慧之光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受极“左”思潮影响被视为迷信而被打入冷宫,研《易》者多受迫害,易学成为“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学问。“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易穷则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禁区,带来科学的春天,易学在学术界重新确立了地位,并初步取得可喜的成果:易学机构相继诞生,易学同仁心情舒畅,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易学研究又“热”起来了。面对“剥极必复”的大好形势,为了巩固易学研究的新成果,加强日益增长的中外易学的交流,更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我研究中心克服重重困难,创办我国大陆第一份易学学术期刊——《周易研究》,并真挚地希望它成为国内外易学同仁研究学术、交流成果的园地。

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在易学研究的方法上,我们主张《周易》与易学史的研究应坚持易理与象数兼顾的原则,并提倡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综合交叉研究。传统易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它的合理“内核”,应在更高层次上展开,但是更应该把现代知识体系作为我们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

今天易学研究的重要武器,以现代文化学、人类学、释义学等为背景的新的易学研究方法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探讨与开拓,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在易学研究的内容上,我们主张除注重《周易》经传的研究,易学史的研究及易学文献资料科学的研究外,更提倡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重视易学与现代管理科学及现代预测学等诸多方面的交叉研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易学研究只有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这门“寂寞之学”才能顺应时代脉搏而取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正如朱熹《泛舟》诗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我们愿借戊辰年改革开放的“春水”,使《周易研究》之舟“中流自在”地驰向未来,驰向世界。

# 告 读 者<sup>\*</sup>

## (三年回顾)

《周易研究》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份易学研究专刊,自1988年初创刊以来,迄今已走过三年的历程,出到了第六期。

三年来,我刊自筹经费,克服种种困难,在学术界友人与广大读者的爱护匡扶下,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在海内外争得了自己应有的声望与影响。

正如三年前我们在本刊发刊辞中所指出的,对于易学的研究,我们主张,传统的易学研究方法,当然应该保留、并在更高层次上展开,而在当代,还应着眼于时代需求而对易学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的全新探讨与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们在刊物上开设了不同栏目,像“经传研究”“易学史”“易学与考古”“《易》与文化思想”“大众易学”“《易》与自然科学”“信息与资料”等等,特别是“《易》与自然科学”栏目,收到了大量来稿,极受读者欢迎。通过这些不同角度的讨论,我们试图不断开拓易学探索的新领域,全面探讨《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阐发易学在我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科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些初步尝试已在海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台湾孔孟学会基金会董事长陈立夫先生曾三次给我刊主编发来信函,对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大陆易学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表达了“至为钦佩”的心情。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教授来信称“《周易研究》学刊的创办,是推动易学研究迈出的又一个里程碑”。美国《周易网络》学刊刊载了我刊自创刊号至第四期的全部目录,主编Smith教授在信中称:“这是一份极有学术价值的刊物,它的创办,意义重大。”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匈牙利著名物理学家、匈中友协创始人之一的 Lovas Bela 教授,他几经曲折方由我国驻匈大使馆经钱学森同志将大作《易经中的控制论》转给我刊负责人,得以在我刊发表。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0年第2期。

现在,本刊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巴黎大学图书馆等海外大图书馆列为必藏之刊。

本着“韧”的精神,在不尚虚华、持续不断的努力中,三个寒暑就这么逝去了。而今,这份默默耕耘的刊物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吸收国外易学研究成果及扩大国内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方面,已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可以预言:今后,它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年来,由于广大读者的协助与护爱,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扪心自问,我们对前贤、对子孙,总算是做了一点实事,尽了一点心意,未使时光虚度。

然而,使我们惭愧的是,《易》道广大,作为编者,我们实在才疏学浅,知识领域太窄。在此情况下,编这样一份刊物,未免力不从心,以致在很多方面有负于读者的企盼,有负于学界的厚望,有负于海内外友人的信任与鼓励。我们唯有努力学习,“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在进德修业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以便把刊物办得更好。

“三”是涵“天”“地”“人”的数字,又是化生万物之数,而“六”乃“兼三才而两之”。我们已在三年中出完了六期,为了易学事业的春华与秋实,今后,这份默默耕耘着的刊物当然还要默默耕耘下去,既默默耕耘着现在,更默默耕耘着未来……

1990年10月

# 告 读 者<sup>\*</sup>

## (五年回顾)

《周易研究》作为海内外易学同仁的共同学术园地,自1988年创办以来,已走过了五年的历程,至去年底出满整十期,依先儒之言,“十”乃成数之极,故借此机会作一简单小结。

1984年夏,在武汉市举行了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与武汉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经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在济南市举行了由山东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当时风气尚正,这两次会议都经过严肃认真的充分准备,每次会议都有自己明确的讨论主题,只收极低的会务费,与会代表都有两年以上准备论文的充分时间,会议组织者也皆为纯学术研究而发。所以在那两次会议上,特别由济南会议每天的简报中,我们洞察到当代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方向,并进而认识到它的方法学意义,预见到必须针对当代易学研究的新特点,对其加以妥善引导与弘扬,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我们决心创办《周易研究》学刊,并在济南会议上作了宣布。接下来便是艰苦的筹备工作和更为艰苦的筹款工作。正如我们在《周易研究》发刊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周易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切不可割断历史的咽喉,特别是对经文的研究,一定要易理象数兼顾。但作为现代人,我们更要注意到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综合交叉研究。传统的易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它合理内核,但我们更应借用诸如现代文化学、人类学、释义学、考古学等现代知识体系,来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并依衬着当代文化科学的广阔背景与高大天幕,以自己海阔天空的新视角,重新瞻视易学的伟大境界。凭着对真知的强烈感受,领悟其每一寸泥土和它云层中的每一道罅隙!只有这样,才可以发现并纠正先儒的某些偏颇与谬误,进而解开易学研究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上的一些千古之谜,使易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与新的阶段。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们理应在不断地探讨与开拓中,扎扎实实甘于寂寞地完成它。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五年来,我们不仅重视《周易》的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易学文献资料学的研究,更提倡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特别注意以《周易》解决当代社会重大课题,如《周易》与现代管理学、现代预测学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周易》数术学的研究,也是易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重视其确有新义的研究,但可惜的是,有关这方面确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文章,实在是太少了。

总之,如同我们在五年前所指出的:在当代,易学研究只有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这门“寂寞之学”才能顺应时代脉搏的节律而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

正是鉴于以上认识,五年来,敝刊克服巨大的经济障碍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始终坚持如上学术研究的大方向,绝不受物质功利的诱惑而迎合时尚,保持了一个学人的学术气节。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五年来,无论对前贤,对子孙,我们总算做了一点实事,而未使时光虚度。对于目前所谓的“周易热”,本人在《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答中新社记者问”中,已宣示了我们的明确态度。总之:

众热众冷,此际宜存主宰。

独行独立,其间都见精神。

这就是我刊的态度。

我们经过五年不尚虚华的持续努力,所坚持的办刊原则与方向已取得海内外学人的响应与共识。因而海内外高质量的稿子纷纷寄达,并被台湾学者过誉为“二严之刊”(指办刊严肃、严谨)。成中英教授更明确指出了:“《周易研究》的诞生,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诞生。”(《周易研究》1991年第3期)由于我们每期都发表海外学者高质量的论文,故海外学人认为,“从《周易研究》中,我们看到一种中外易学研究的交流与促进”,“打破了大陆易学研究过去闭关自守的研究状况,标志着易学研究已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周易研究》其前三年(1988年至1990年)系半年刊,共出六期,去年我刊取得向海内外发行的正式刊号,改为季刊,出四期,共为十期。十期共发表易学论文143篇,计156万字,其中《周易》“经传研究”论文20篇,“易学史”论文22



篇,“易与哲学文化”论文 29 篇,“易学与自然科学”论文 29 篇,“易学与考古”论文 4 篇,“易学文献资料学”论文 18 篇,另外还有“大众易学”10 篇,国内外易学信息资料共 37 篇。

然而,使我们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知识领域太窄,不具备全面的知识,故而在很多方面有负于读者与作者的企盼,有负于海内外学人的厚望,特别对于“易与自然科学”栏目,很多稿子我们求助于有关方面的专家审稿,但有时审稿意见不同,因而使我们很难定夺。同时,由于人手出奇地短缺,故而校对时有疏漏,文字错误时有发生。但我们全体编辑人员坚信:只要有一颗弘扬易学的真心、传《易》的诚心、进德修业的决心及完成历史使命的苦心,我们就一定会与诸位前辈及好友心心相印,凭借《周易》“有孚惠心”的感召,克服种种困难,把本刊办得更好。

再次谢谢诸位读者几年来对我们的爱护匡扶与指教!

1992 年 3 月 1 日于运乾书斋

## 《周易研究》合订本(1—10)前言<sup>\*</sup>

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周易研究》创刊号至第十期合订本已正式重印完毕,值此之际,我思绪万千:六年前,我们在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上,向全体代表宣布,决心创办《周易研究》学刊,以作为海内外易学同仁的共同学术园地。此举赢得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从此,带着国内外易学同仁的期望与信任,我与林忠军、毕群圣同志最初开始了刊物的筹建工作。几经奔波,终于申请到了内部刊号;在此草创困顿中,刘玉建同志亦来到编辑部。

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济南轻骑摩托车厂率先拿出三万元钱,作为刊物创刊号及第二期之用,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们企业亦处于极困难的境况中,随后又赞助了第三期。接着,济南东港公司总经理刘大庆先生、邹平范公酒厂厂长宋守阳先生、长清东方家具厂厂长汪宏先生、黄河汽修厂厂长韩兆泰先生等皆毫无保留地对刊物进行了赞助、支持。这些在企业经营上有卓识、对学术研究有远见的企业家,深深明白易学研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看到了弘扬易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甘愿为刊物出资出力,绝不附加任何条件。因而使我刊得以绝处逢生,有了今天的发展。我们能回报对方的,只有一纸“鸣谢”,或我拙笔写成的“简介”“小记”之类,绝无广告入刊面。

尽管刊物处于草创阶段,又是自办发行,但读者很快增至四千多人,每期我们都连夜自抄信封,自己蹬三轮车向邮局送刊,迎着那黄尘仆仆的大路,我想过很多。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到处堆满刊物,但每个人的情绪却是高昂的。当时,我曾写这样一幅联语形容之:

性可参天朴存真,

情化丹灶气济世。

熬过了初创阶段的艰难,这时已拥有了一大批热情爱护、支持我们的读者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合订本(1—10)。

与作者,他们写来一封封感人肺腑的信函,寄来一篇篇高水准的稿件,很多读者倡议为刊物捐款,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作者则要求不付稿酬,以减少刊物开支。看到读者与作者们跃于信函上的一颗颗丹心痴情,我们除深深感动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这使命的巨大意义。

经过三年多的持续努力,鉴于我刊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在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的支持下,1991年五月我刊终于获得正式刊号,第二年通过邮局向全国征订发行。首次征订,海内外订户即突破两万五千份大关(今年再次征订,仍居此高数不下),当我接到这一订数的消息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四年多默默无闻的持续努力,终于在海内外有了回报!随后,广大订户纷纷来函索订所缺之本刊,于是才有此合订本之问世。今借“前言”述其始末如上,以向那些为敝刊作出过贡献的企业家及热情的读者、作者们致谢,示不忘也。

此合订本共收录十期之易学论文125篇,共计150余万字。其中“经传研究”20篇,“周易与文化哲学”32篇,“易学史”21篇,“易与自然科学”29篇,“笔谈与书评”23篇,另外,还有“大众易学”10篇,“信息与资料”28篇。

林忠军、刘玉建同志为合订本问世做了大量编排校阅工作,春节期间,亦不停止。毕群圣同志在安排印刷制作方面日夜操劳。另外颜炳罡、王新春、刘光本等同志亦参加了清样校读工作,在此一并示谢。

1993年3月26日

于山大运乾书斋

## 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成立 暨《周易研究》创刊十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创办于1988年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与同年创刊的《周易研究》学刊，至今已走过了她值得骄傲的头十个年头。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庆祝她的十周年生日。我谨以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和《周易研究》学刊的名义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光临指导！

十年来，本“中心”与本学刊在推动海内外的易学研究与交流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上，本“中心”先后承担了省部级科研项目两项（国家教委“易学史”、省古籍办“郑玄易考”），撰写出版了《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经传白话解》《周易古经白话解》（英）、《易经全译》（法）、《中国古代龟卜文化》《纳甲筮法》《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下册）、《象数易学发展史》（一、二卷）、《易经全译》《易传全译》《大易集成》《大易集要》《大易集述》和《象数易学研究》（一、二辑）等近二十部易学著作及音像作品《周易讲座》，校点出版了85万字的易学巨著《周易折中》，并在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易学论文100余篇。藉此学术实力，在推动国内外易学研究的发展与交流方面，我们先后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我们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规模盛大，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与关注，7个国家的200余位学者参加了大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海内外主要媒体，对大会纷纷报道。香港《晶报》专为此会发表

---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4期。

社论：“国际易经大会的启迪。”称赞此会为近代史上有关易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此次国际学术大会亦引起了国人对易学研究的关注与重视，拉开了大陆周易热的帷幕。鉴于敝刊《周易研究》在台湾学术界有一个较大的读者群，本“中心”遂于1993年夏主持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此会得到台湾学者的热烈响应，共有两岸学者103人参会，以台湾大学哲学系为主的台湾各大学共有38位学者参会。学者们于此次大会上呼吁两岸要加强文化学术上的互相交流，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更倡议今后每两年一次在海峡两岸交互举行此会，此倡议赢得两岸学人的热烈掌声与赞成。自此，由本“中心”谋划倡导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变成两岸学者共同谋划倡导进行双向学术交流的一块重要园地。1995年夏在宝岛台湾如期举行了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与中华易经学会主办、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此会有100余位学者参会，经原国家教委批准，鄙人作为协办单位负责人率大陆易学代表团一行10人参加此次盛会，并在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代表大陆学者发表讲话，此次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两年之后，由本“中心”与中国周易学会联合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协办，于1997年夏又在首都北京梅地亚新闻发布中心召开“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台湾学者32人参加此会。此次会议在“大易文化”的主题下，本着“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易学精神，学者们畅谈了“易学与现代及后现代”“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大会在天地淳和、大道归一的亲切融洽氛围下圆满结束。台湾媒体对本次两岸学术会议给予高度重视，并派员现场报道了大会盛况。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四台及山东电视台对大会作了报道，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大众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报刊为大会作了重要报道和宣传。山东电视台并为此次大会专门摄制了“大道合和”的专题片，完整记录了大会实况。

为了翔实反映这三次大型学术会议的学术成果与学术影响，我们先后出版了大型论文集《大易集成》（“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66万字）、《大易集要》（“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齐鲁书社出版，53万字）、《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巴蜀书社出版，62万字）。这些汇集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论文，以其较高的学术水准，既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易学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更指明了当代易学研究的新内容与新方向。

由本“中心”主办的《周易研究》学刊自十年前自筹经费创办以来,至今已经出版了38期。十年来,我们恢复了对传统易学的研究与发掘,坚持象数易与义理易并重的学术研究方向,倡导易与自然科学及环境保护科学相结合的全新研究方向,因而逐步形成了本刊一大批长期稳定的读者群。为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器重,刊物草创之际,我们虽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为保持刊物的学术纯洁性,仍然婉绝在刊物上做广告以增加经济收入的建议。坚持以最纯正的学术风貌,将刊物呈现于读者面前。因此,被海外学者誉为“二严之刊”(指办刊严肃、严谨)。故敝刊自公开发行以来,影响迅速扩大,很快发行至28个国家和地区,订户长期稳定在两万份上下。

1996年,由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本部即设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同年,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中国周易学会与周易研究中心合办《周易研究》学刊,该刊遂成为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会刊。

十年来,敝刊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易学专刊,秉持进德修业的精神,从不去迎合那些不良的时尚,更不去凑一时的热闹。我们曾撰这样一幅联语,表达自己的学术态度:

众热众冷,此际宜存主宰;

独行独立,其间都见精神。

我们忆青灯滋味,存丹心赤情,甘于寂寞,甘于奉献,默默耕耘着这份将来必定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自己地位与影响的刊物。以《易》之“洁静精微”精神,从点点滴滴做起,涵养我们的德性,变化自己的气质,将当代易学研究的成果,慢慢积累起来。截至目前,我刊38期共发表易学论文近500篇,总计520余万字。其中,经传研究75篇,周易与哲学文化138篇,易学史77篇,周易与自然科学88篇,帛易研究10篇,象数易学研究73篇,其他29篇。可谓蔚为大观。当然,我们的刊物亦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天敬请诸位师友到此,就是为了请大家在下午的讨论中向我们赐教,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以便今后改进。

最近,本“中心”又与山大哲学系联合申请中国哲学博士点喜获成功,充分显示了学术界诸友人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从此,本“中心”将以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为海内外易学研究事业不断贡献新的人才!

本“中心”与本学刊走过的十年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微小进步,都是学界师长友人爱护匡扶的结果,都是各界朋友无私相助的结果。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鄙人感慨万千、无比激动!遂不揣鄙陋,草成拙诗一首,以述斯情斯境:

同是天涯翰墨人,  
相谭文字俱相亲。  
交如烁水休嫌澹,  
面对庐山最喜真。  
竹节清高名士品,  
梅花劲瘦苦吟身。  
何时高聚石渠阁,  
再结经坛未了因。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光临今天的会议!  
谢谢大家!

1998年10月21日

## 言几存义 开物成务\*

### ——纪念《周易研究》创刊暨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

200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恰巧又是《周易研究》学刊创办 20 周年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现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

1987 年 12 月 5 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当时的山东大学哲学系周易研究室以山东省政府划拨的 3 万元经费,在当时山东省接兵站召开了建国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共有 7 个国家的 200 余名代表参加。大会受到社会各界与舆论媒体的高度重视,山东省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先生,原山东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谭启龙同志等皆发来贺信,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山东省副省长张敬焄同志代表省政府参加了大会开幕式。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以要闻节目,在开幕式当天对大会作了报道。《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周刊(海外版)、《大众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晶报》和美国《华声报》《北美日报》、旧金山《中报》、加拿大《加华日报》等 30 余家报刊对大会作了报道。其中,香港《晶报》于 12 月 11 日为大会发表社论《国际易经大会的启迪》。海外报章为国内的一个学术会议专门发表社论,恐怕这是首次。

当时经过十年动乱的恐怖和阴暗,人们心中尚有浩劫后的余寒和余悸,可以想象在当时组织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周易》研讨会所要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为此本人四上北京,向国家教委的有关同志阐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经典的《周易》的学术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经过反复努力,会议终获批准,并得到了山东省领导的支持。大会胜利召开了,参会代表如久旱逢雨,心情特别激动,人人都有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8 年第 6 期。



着一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劲头。当时代表们的那种兴奋、那种由衷的激动,那种度尽劫波后的庆幸感,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很难体会和理解了。这就是在大会开幕式上,国外代表钟启禄教授发言时,首先提议与会代表起立“向为大会召开做出贡献的刘大钧先生致意”的缘故。

当此纪念《周易研究》创刊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际,我们为什么要满怀深情地再一次回忆起 21 年前召开的那次“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呢?因为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一致提出了两个有关今后易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议题:一是筹备创办全国易学同仁的研究学刊《周易研究》,以此刊作为海内外易学同仁的共同阵地,引领今后易学研究的方向、推动易学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筹备成立全国易学同仁的学术团体“中国周易研究会”。在萧蓬父先生指导下,我们曾草拟了一份“中国周易研究会筹备组”名单,在会议上供学者讨论、补充。参会的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石峻先生对我们成立学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中国周易研究会’一定要由一位真正从事《周易》研究的内行学者担任会长,不然名不副实,难以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二是建议不必聘一群名人担任顾问、名誉顾问等,一般不干实事的研究会喜欢扎这些花架子,借以吓人,建议你们不要这样搞。反正我不会担任你们的顾问。”在第三天的大会上,全体海内外代表以热烈的掌声倡议由大会主办单位山东大学周易研究室负责筹备创办《周易研究》之事,同时亦由山东大学周易研究室负责筹备成立“中国周易研究会”。带着海内外学人的嘱托与信任,会后本人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并于第二年,即 1988 年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并主编了国内学术界第一份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随后,在“中国周易研究会筹备组”的基础上,于 1989 年在济南唐王鱼场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周易研究会”,作为二级学会挂靠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名下。后因民政部取消二级学会,遂经民政部批准,于 1996 年正式成立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也正是那次大会淳正热烈的学术气氛和代表们厚德流光的风范,深深感染了随会采访的诸位媒体记者,他们对大会从开幕到闭幕都作了详尽的追踪报道,尤其是中新社山东记者站站长袁崇和先生,几乎每天都向海外发出有关大会的最新消息,使会议产生了广泛影响。大会也深深感染了参加开幕式及闭幕式的学校领导,会后山东大学校领导决定将当时的“周易研究室”升格为隶属学校的独立研究机构,并于 1988 年 3 月正式下文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可以说,没有那次大会,就没有《周易研究》学刊的及时创办,就没有“山东大学周易研究

中心”与“中国周易研究会”的及时成立,也就没有随后出现的《周易》研究热潮,故而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将“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学刊的创办及“中国周易研究会”的成立,称之为“推动当代易学研究发展的三个重大里程碑”。

《周易研究》创刊,让我们和支持我们的海内外同仁都很激动和振奋。十年浩劫之后,终于在大陆出现了一份属于易学同仁自己的研究期刊,国内外学者纷纷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支持。梁漱溟先生欣然为本刊题写刊名并题辞,海内外著名学者周谷城、金景芳、张岱年、邱汉生、任继愈、黄寿祺、石峻、萧蓬父、冯契、蒋纬国、孔德成、陈立夫、吴大猷、严灵峰、饶宗颐、成中英等先生先后发来贺辞,或专为本刊撰文,令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在《周易研究》创刊2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忘不了老一辈学者和广大易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于本刊的厚爱 and 关心。

刊物初创,在倍感兴奋之余,却是筚路蓝缕,诸种困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面对:

问题之一,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资金。为了筹集办刊资金,作为主编的我只好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奔波周旋于社会各个阶层,个中苦辣酸甜,难以言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种为易学事业献身的执著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企业家,他们纷纷解囊资助,使《周易研究》得以度过重重难关,一直办下去。在此要特别感谢那些在本刊初创之时曾经伸出援手以解燃眉之急的企业家们。

问题之二,办公条件简陋、人员奇缺。刚开始时,无编辑部,只能借助于哲学系资料室中毕群圣同志的办公桌作为临时编辑部。抄写信封、登记信件、讨论稿件、校对样稿等都是在那张办公桌完成的。编辑部成立之初,人手特别少,由三个兼职人员构成:一人分管发行,一人分管编务,一人分管筹措资金。三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当时编辑部处于“四无”状态:无办公地点、无资金、无编辑、无发行渠道,所面对的压力非常大。一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令人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平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期刊筹款到处奔波的那些岁月,也永远不能忘记在那张三人共用的办公桌上的忙碌和拉着地板车迎着黄尘仆仆的大路向邮局运送刊物的情景。

《周易研究》自创刊以来,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出发,并广泛考虑到易学对于古今各门学术的重大影响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周易》与易学史的研究,应坚持义理与象数兼顾的原则,故在来稿的取舍上,摒弃所谓“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学术偏见,对来稿择优取用,但因当时研究象数

的人较少,故刊发的文章以阐发义理者居多。我刊历来提倡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综合交叉研究,除了注重易学自身的研究,还大力提倡易学与哲学、易学与文史、易学与医学(特别是中医)、易学与自然科学、易学与现代管理科学、易学与环保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学术品位颇高的刊物,在学界赢得了办刊严肃、学术严谨的“二严”之刊的声誉。《周易研究》创刊之时为山东省内部刊物,出刊周期为半年。由于我刊长期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内外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反响,由此,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重视与好评,在此基础上,《周易研究》于1991年获正式刊号,由半年刊改为季刊,向海内外正式出版发行,并很快发行到2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长期稳定在一万两千份左右,为弘扬易学、培植易学研究的力量、把握易学研究的导向、推动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998年以来多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01年被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0年以来,一直被教育部委托机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评为CSSCI来源期刊,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2000年,我刊最早实行了标准化编排,2002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又于2006年改为大十六开本。在编刊宗旨上也实行重点转移,由原来象数义理兼顾和多学科交叉下的易学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和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转移到在延续以往办刊思路基础上立足学术前沿,重点以新出土易学文献研究和新哲学话语下的易学研究为办刊导向。围绕帛书《周易》经传和上博楚简《周易》等出土文献研究,先后发表了李学勤、刘大钧、廖名春等名家名作。借鉴西方哲学诠释学方法,开展易学诠释研究,先后发表了汤一介、成中英等诠释学视域下的易学研究论文,从而使我刊在秉承传统经学研究理路的同时又具有了现代意义。

从《周易研究》创刊到现在经历了二十个春秋,在办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我们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凭着一颗中国学者所应有的学术良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力图实现易学古老话语之现代转换,参与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易学和以易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有鉴于此,我们自2003年又创办了英文版《周易研究》(内部期刊),每年出版一期,现已先后出版五期,得到海内外同仁的认可与好评。

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专门的易学研究机构,长期坚持易学研究

研究与期刊编辑相结合,编研一体,相互促进,营造了一个难得的易学研究氛围,

造就了一支充满活力的易学编辑和研究梯队,从而在 1998 年,与哲学系联合申请以易学为特色的中国哲学博士点并获得批准。2000 年,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经过拓展研究方向,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并更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本中心被国家教育部正式确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时,正是本单位科研、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科研条件全面提升和发展之始。到目前为止,中心已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 15 项,一般项目 10 多项。在简帛易学研究、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和易学哲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30 余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建立了以易学为特色的中国哲学资料图书室和反映易学研究动态的网站,培养了 20 余名以易学哲学和易学史为主要方向的博士。举办国际国内重大学术会议 8 次。2003 年以本中心所在中国哲学博士点为龙头,山东大学哲学学科获准成立博士后流动站。2004 年,又以本中心为龙头,联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研究院等相关学科学术力量,组合为“985 工程”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获教育部批准。2005 年,本中心与哲学系所在哲学学科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本中心所属中国哲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正是在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的基础上,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以易学为特色的学科优势。

《周易》是寂寞之学,只有甘于寂寞,板凳宁坐十年冷,才能慢慢进入易境,得览易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巨大经济成就的取得,目前学界又掀起了一轮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都是体用结合的学问,故欲阐发五经之旨、成仁成德,其要乃在自身的圆融。《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又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我们若能以此“直内”“方外”“学聚”“问辨”“宽居”“仁行”之精神涵养自己的道德,坚持切己体究、默识心融,则气质境界必会慢慢产生变化,从而自拔于流俗,臻至体信达顺、自然明觉之境。诸位学人诚能如此,则目前充斥于学界的包装浮夸、虚躁不实之风,自会慢慢收敛消逝。

当此《周易研究》学刊创办暨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际,我们决定一切从俭从简,不召开纪念会与座谈会,只借刊物一角,

向海内外学界的旧友新知发一封信函,忆旧谈新,迎接即将到来的 2009 年。

忆青灯滋味,承继先贤弘易业;

存丹心痴情,追怀圣哲育德风。

本人为纪念《周易研究》创办 5 周年所撰的这副联语,既表达了我们过去办刊弘《易》的宗旨,也是我们今后长期坚持的方向。20 年来,我们以此与海内外学界诸友共勉,今后亦必定以此旨与诸友“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从而共达“言几存义”“开物成务”之畛域!

## 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辞<sup>\*</sup>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由山东大学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在多方友人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今天正式开幕了！

本届《周易》学术讨论会，在“《周易》与哲学文化”的主题下，将对《周易》的经与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易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及经济建设、易学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整合、融通，以及易学研究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新老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周易》号称传统儒学最高的哲学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它对绵延达数千年之久的伟大中华文化慧命的生衍，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化学、人类学认为，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每个民族的生命，往往是与该民族的文化慧命一体合流、息息相关的，后者的盛衰，关涉着前者的存亡。《周易》及由它所引发的易学活水长流，作为中华文化慧命的体现者和重要创造者之一，自然也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立下过不朽功勋。因此，易学研究的深入，亦即对伟大中华民族研究与认识的深入。这对于疏通、转化和光畅盎然正大的中华文化慧命，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分布于世界各地，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而不同民族的文化，亦可相互交流、融通、对话、整合，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坦途。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深入，这种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整合、融通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在这一格局下，正如世界文化走向中华，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接受那异质的欧美风雨的挑激，并逐渐确立起它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西方人也缓缓而又艰难地从“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中摆脱出来，校正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尺度，正视十分陌生而又颇带神秘色

---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3年第3期。

彩的中华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其丰厚的滋养。其间,作为中华文化极好象征的《周易》及易学,即所谓“宇宙代数学”,首当其冲地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引起世界上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借此而逐渐开显出其未曾有过的重大价值和影响,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知识体系、现代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极为活跃的因子和重要“催化剂”与“促生剂”,寻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随着易学研究的深入,必将培植出更多的类似理论“生长点”,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知识体系,及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提升,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易》所显发的以“三才之道”为中心的总体宇宙论架构,以及在这一总体宇宙论架构下所高扬的人文价值理想,尤其是崇高的“人文化成”理念,值得我们重新诠释,深入契会,不断开掘,一则鉴于西方因“工具理性”过分膨胀,只顾单向度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以致造成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能源的严重危机,在此情势下,《周易》关于三才合一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的重大意义,凸显了出来。一则鉴于当今世界,瞬息多变,旧的世界格局业已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在多极互动的态势下,尚未形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在由衷地祈盼建立一种理性、公正、和平、进步的世界新秩序,而《周易》的人文价值学说,人文价值理想,尤其是其卓异的“人文化成”理念,对此必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易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十翼”问世之后,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成了《周易》及易学的独特理论模式。象数与义理(易理)之间,确立起“互诠互释”的密切关系,象数为基础,义理(易理)为旨归,因乎象数,方发得义理(易理),无象数所发之义理(易理),将成无根之谈。而易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两个基本派别,亦即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也不过是对象数与义理各有所侧重,然统摄其各自不同易学体系的,仍是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有鉴乎此,我们的易学研究,仍然必须坚持象数与义理(易理)兼顾的原则。

“十翼”问世之后,自两汉时代起,通过历代学者的赓续努力,一股易学的活水长流开始涌现,就在这股易学活水长流开始涌现的同时,它的内部,也出现了“学”与“术”的划分。“学”与“术”,作为两条彰然可鉴的不同治《易》路数,同时并行,贯穿了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始终,而从《汉书·艺文志》始,历朝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直至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及其后单独成书行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曾对易学中的“学”类著作及“术”类著作,作过极有分寸的严格划分。这应引起我们在易学研究中的充分注意。

易学研究中,传统易学方法的合理内容,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使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展开,同时,以现代知识体系为背景的新的易学研究方法,也有待于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探索、拓展。我们这一代人,应无愧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科学昌明、理性张扬、文明进步的伟大时代,应透过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将易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创造出一批新的丰硕研究成果!

我们两岸易学同仁,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同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同得泽于我们伟大祖先所留传下来的伟大中华文化。此前,大家在各自的教学、科研环境下,对易学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精到研究,并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今天,大家又怀着一颗传《易》的真心,学《易》的苦心,进德修业的决心及弘扬易学的赤心,在《周易》古经“有孚惠心”的感召下,汇聚到了一起。这就是“缘”!有此难得之“缘”,我们才可以坐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切磋,互益互补,“朋友讲习”!在“进德修业”中重展中华德业雄姿风采的神圣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两岸同胞的肩上,愿我们两岸易学界的同仁,以本次学术讨论会为契机,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同心同德,心心相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以圆满地完成这一使命!

我坚信:易学这门“寂寞之学”,必将脱去其层层历史积尘,在今天放射出更加灿烂耀人的异彩,无论是在中国,在东方,还是在整个世界!正如元代王冕在其《白梅》诗中所云:

冰雪林中著此身,  
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  
散作乾坤万里春。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仁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谢谢大家!



##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sup>\*</sup>

陈维昭校长、焦仁和副秘书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同仁们、朋友们：

你们好！承蒙林火旺教授及邵崇龄理事长的盛情邀请，今天我有幸参加在台湾大学思亮馆举行的“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感到无比高兴！山东大学作为此次盛会的协办单位，我受山东大学潘承洞校长的委托，谨代表山东大学及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周易研究》学刊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对这次盛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也代表中国周易学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表示最诚挚的问候！乔幼梅副校长因故未能前来参会，她委托我代她向全体代表问好！并祝大会成功！余敦康研究员、徐志锐研究员皆因病无法前来参会，亦委托我代表他们向全体与会学人问好，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1993年八月，我们在济南山东大学，也召开了这样一次学术盛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作为东道主结识了今天在座的很多台湾学界友人，特别是台大哲学系、中文系的很多朋友，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邵崇龄理事长倡议海峡两岸学人今后建立起《易经》研究的双向交流关系与交流渠道，此倡议赢得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掌声。而今天，这一倡议在台湾学术界友人，特别是台湾大学与易经学会全体同仁的一致努力之下，终于化为现实！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让我高兴、激动！

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在海峡两岸确实形成共同的研究热潮，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正如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一样，我们的大易文化亦正在以更大的广度与深度走向世界！特别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时，我们的生态环境却因之而受到了破坏，这一矛盾现象正困扰着世人，我们的《易经》，这门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3期。

涵盖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大学问,它所提供给人们的“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的天人合一宏观协调思想,在解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这一共同难题时,在处理“坤厚载物”所引发的诸多生态问题时,它那体现阴阳平衡,“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思想,将为人们开创一个“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的新境界,建成一个生生不息保合太和的良性循环的新空间。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被迫学习更好更全面地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互益互利、和谐相处的世纪,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世纪。在这方面《易经》中“以体天地之撰”的阴阳平衡和谐思想,将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与地域的领导人起到越来越大的启迪指导作用,提供越来越多的思想营养,从而为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作出新的巨大的贡献,这也将是当代易学研究的新课题、新方向。

同时,它那交易变易与不易的哲学思想,“体仁”“嘉会”“利物”“贞固”的处世态度,对于一个现代人以自己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观念去解决当代问题,确定宏观决策上,亦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的“刚”“柔”“进”“退”“时”“中”“度”等等,闪烁着我民族智慧之光,因而在正确把握人生,化解人们所遇到的各类烦恼与阻隔上,亦必将产生“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的作用。我相信:下一个世纪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说,将是一个富强、团结、理性、和平的新世纪。

我们这次易学盛会,为今后两岸双向的文化交流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是一次“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大会,为此,我以拙诗四句,以表达对大会的祝贺之情:

两岸学子夙有缘,  
后天兄弟演先天。  
保合为筵太和酒,  
化作灵气入诗篇。

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合家康乐!谢谢大会主席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敬爱的东道主,谢谢诸位代表。

1995年5月25日

## 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sup>\*</sup>

经过几天严肃认真的讨论,今天大会就要圆满结束了!在此分别之际,我的心被一股股亲情激荡着,那会上辩驳会下交谈的情景,那“朋友讲习”的热烈场面,那一桌桌丰盛的晚宴及紧张充实的四天五夜,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为美好的回忆而成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现在,趁这些场面还在眼前,趁它还滴答着美好感觉的露珠,我草书拙联一幅,以抒斯情:

两岸学人同聚宝岛,讲经阐大道,论纬见天心;

四方诸子咸临台大,演象敷奥旨,释彖至中和。

是的,这是一次高水准高规格的学术大会,是一次两岸学人彼此沟通、加深友谊、加深了解的大会,是一次充满手足亲情的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大会!借此机会,我再次向林火旺主任、邵崇龄理事长表达大陆全体参会学人的感谢之情!愿1993年从山大开始,1995年在台大继续的这一两岸易学交流的盛会,今后能够每两年举行一次,并长期保持下去,相信我们两年之后能够在大陆再次相聚,相信两年之后我们在大陆必定会再次相聚!

再次谢谢主席,谢谢大家!

1995年5月28日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3期。

## 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开幕辞<sup>\*</sup>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经国家教委批准，由中国周易学会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与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协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承蒙各方大力协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庆香港回归祖国、雪中华百年国耻的大喜日子里，于今天在梅地亚中心国际会议厅正式开幕了！

本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是前两届研讨会的继续。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欣喜地追忆起前两届研讨会的情形。1993年8月，我们两岸学界的同仁，首次相聚于济南山东大学的邵逸夫科学馆，举行了第一届由山东大学主办的研讨会。在那届会议上，当时的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发出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今后每两年一次，在两岸交互举行《周易》学术研讨会，以建立两岸易学界同仁双向交流机制的热情倡议，该倡议博得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于是，两年后的1995年5月，我们又相聚于台北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举行了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与中华易经学会联合主办、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两岸易学界正式确立起了双向交流的机制。1995年的台北盛会适过两年，我们即又顺利迎来了这届在北京举行的会议！眼见这经过两岸同仁同心同德、艰辛努力所确立起的双向学术交流机制，一步步化作现实，结出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学术硕果与友好情谊，怎不令人心潮澎湃、深感“黄中通理”而“美之至也”！

本届《周易》学术研讨会，在“大易文化”的主题下，将着重围绕“《周易》经传”“象数易与义理易”“易学发展的独特路数与易学研究的方法论”“易学与中

---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

国文化及文化中国”“易学与现代及后现代”以及“易学与自然科学”等几个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周易》经传是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原典,是引发我中华蔚为大观的易学活水长流的总源头。两千余年来,它一直是历代学人契会、解读和阐扬的重要经典。自本世纪初叶始,老一辈易学研究者,逐步冲破传统经学的樊篱,以新的研究视野,剥去蒙在《周易》经传之上的层层历史积尘,为揭示《周易》经传的异同与关联,还《周易》经传各自的“本来面目”,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幸赖千载难逢的可贵考古发掘,尤其是帛书《易经》、帛书《系辞》、《帛书》其他释《易》论《易》之文的出土,以及大量数字卦符和类似通行易卦卦符的出土,使人们对“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起源与演变”“三《易》之说”“《周易》古经的成书年代”“卦序”“《易传》的成书年代及今本《易传》的形成过程”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全新的认识,解决了许多长期萦绕人们心怀的聚讼不休的公案。在刷新对于上述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周易》经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反思,从而深化、更新和完善了对于学理层面上“《周易》经传的思想内涵”,“由经至传学术思想的迁变”,“《易传》的思想成因及其学术思想的归属”以及“《周易》独特理论模式的形成”等诸多问题的看法。这种反思还在继续,并将在今后长期继续下去。相信本届讨论会上,一定会在《周易》经传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可喜成果。

《易传》的问世,标志着《周易》独特理论模式和完整思想体系的正式诞生,易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也由此登上了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舞台。凭借作为原典的《周易》经传自身所涵具的巨大学术文化发展潜力,仰仗十分有利的学术发展机遇和环境,得益于中华文化发展长河中相关文化因子的丰厚滋养,易学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易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分化出了两个基本派别,即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西汉后半叶,象数易学异军突起,一举成为两汉易学的主流,因而象数学派正式形成。入魏,作为对两汉象数易学的一种反动,王弼义理易学出现,义理学派宣告诞生。从此之后,这两个基本的易学派别,以其各自所持有的不同治《易》路数和治《易》理念,相互对峙,相互攻讦,独自理解、诠释和阐发着《周易》,分别形成了悠久的象数《易》传统和义理《易》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闪耀着诸多智慧之光的象数《易》思想和义理《易》思想。在两派相互对峙、相互攻讦的同时,彼此又程度不同地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确立起了相反相成式的对峙互补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易学的繁荣与发展。以今观之,象数学派持象数优先的理念,偏重于象数学的建构或《易》之象数学内涵的诠

释,义理学派则持义理优先的理念,偏重于《易》的义理学内涵的诠释与阐扬。对于这两个基本易学派别,对于与这两个基本易学派别相关的象数《易》传统与义理《易》传统,及象数《易》思想财富与义理《易》思想财富,近年来两岸学界都展开了研究,有的在象数《易》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的则在义理《易》的研究方面收获甚丰,希望在本届研讨会上,各位研有所得的同仁,相互交流,平心辩难,以期在象数《易》与义理《易》的研究方面,获得新的更大的突破。我坚信,在这种商讨中,只要有激荡的学思与灵感,便会有智识慧见的彩蝶突飞出来!

易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有其独特的发展路数。在《周易》古经原有学说框架的基础上,《易传》最终建立起了《周易》的独特理论模式,即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在此模式中,象数为根基,义理(易理)为归宿。本乎象数而引发义理(易理),着眼义理(易理)而解读、阐衍象数之所蕴。象数充任义理(易理)载体的角色,成为通向义理(易理)的有效“工具”或“手段”,义理(易理)则是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此一理论模式为历代易学家奉为圭臬,成为易学的基本理论模式。历代易学家,即是本着象数、义理(易理)合一的理路,来解读、阐发《周易》经传,以建构自己的易学体系,并以此而促成易学的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皆未背离这一解读、阐发《周易》经传的理路,他们只是在此理路的规范下,或侧重于象数,或偏向于义理而已。尤有进者,易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先秦时期,即开始孕育其独特的学术进路。孔子有句表白自己学术心迹的名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则“述”即其“作”也。或曰“作”即寓于其“述”之中。孔子正是在“好古”的形式下,创其学术之新的,所谓“旧瓶装新酒”。自先秦时期孕育而渐次成熟起来的中华独特的学术进路,即是一种“以述为作”、融旧铸新的经典注疏、阐衍进路。就易学而言,从《易传》之对《周易》古经的诠释以至其后历代易学的发展,其间所接续传承的,就是这种“以述为作”,融旧铸新的经典注疏、阐衍进路。历代易学家,正是置身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融原典《周易》经传之旧,而铸其所处时代的易学之新的。易学的发展,既然有着上述象数、义理(易理)合一的理路,和“以述为作”、融旧铸新的经典注疏、阐衍进路,那就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与此相应的研究方法。所采方法,必须基于对此理路与此进路的足够认识,否则,方法的有效性就颇值怀疑了。近年来,学界对易学发展的独特路数及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多,成果也较为可观。希望在本届会议上,就此

问题能够有新视野下的新成果出现。

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它在与传统文化中其他文化因子互动的过程中,一则汲取了丰厚的滋养,一则又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品格,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可以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史。因此,欲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精通易学;同样,唯有依衬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大天幕与宏大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易学。开展易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深化易学研究和深化中国文化研究的必然要求。我们两岸同仁及所有两岸同胞,都深受我们祖先所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伟大中国文化的滋养,我们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这不息的伟大中国文化。是这伟大的中国文化,紧紧地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是这伟大的中国文化,成为我们归一的大道。故鄙人为此次大会所呈献辞为:“天地淳和,大道归一。”我们皆担荷着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使命,开创中国文化新运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下,确立起坚定的“文化中国”之共识,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尽上一份应有的责任。而在“文化中国”的共识下,易学如何回应现在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课题,自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易学在过去,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是与它能够范导、影响中国过去时代的进步分不开的。易学在现代及未来,如欲仍然保持其生命力,就必须对现代及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做出很好的回应,并持续不断地从现实中汲取其营养。就目前而言,易学应当做出很好回应的突出课题,就是现代与后现代问题。西方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念下,为征服、主宰自然,片面地发展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然而却忽视了“价值理性”。“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恶性膨胀,支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造成了现代化之后的一系列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危机表现在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严重匮乏。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危机表现在价值的迷失和人的精神家园的千疮百孔。如何进入后现代社会?如何建立后现代社会?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可持续性发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问题,易学都应做出回应。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易》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易》的和合精神,将在这些问题上给人以深刻启示。相信在本届研讨会上,一定会有新的建树问世。

易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新的课题,就此课题的深入研究,一

则必定会加深对易学与中国传统科技的认识,一则必定会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正确研究态度和采取怎样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相信两岸同仁一定会珍惜这次相聚的大好时机,围绕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以“学聚”“问辨”“宽居”“仁行”的精神,圆满完成我们这届讨论会的使命。

最后,我谨赋拙诗“咏黄河”一首,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龙门凿后判津涯,  
雪浪银涛取次加。  
从此东流应到海,  
寻源只有客乘槎。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前辈,各位来宾、同仁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谢谢大家!

1997年7月19日于北京



## 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开幕辞<sup>\*</sup>

主席、各位学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好！

我以非常激动兴奋的心情，再次来台北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我很清楚地记得，正是六年前的这样一个夏天，我们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现在的荣誉理事长邵崇龄先生，首先提出了今后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应该在两岸间每两年一次双向举行的提议，此提议赢得了全体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两年之后，也就是四年前的五月，我有幸参加了如期于1995年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会见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友，同时也有幸结识了很多学界新友，在宝岛台湾度过了一段极为美好、充满幸福回忆的时光。当时，我以这一副联语呈献大会：

两岸学人同聚宝岛，讲经阐大道，论纬见天心；

四方诸子咸集台大，演象数奥旨，释彖至中和。

那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如约于1997年又按时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与台湾学界友人再一次在北京相聚。正是在那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倪淑娟理事长宣布：让我们两年后在台北再次相聚。今天，倪理事长的这一宣布变成了现实——时隔两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又一次在台北隆重召开了！鄙人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鄙人为此次大会所呈献辞为：

元气大化

与1995年在台大召开的那次会议一样，此次“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

<sup>\*</sup> 本文原载《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华易经学会1999年出版。

讨会”又是得益于邵崇龄先生与台湾其他诸友人的筹划、资助与支持,使我们这次的会议得以如期召开。为此,我谨代表中国周易学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邵崇龄先生及其他一切为此次大会召开做出贡献的女士们、先生们,表达我们深深的敬谢之意!

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代表健康愉快,研讨有成!

# 从此东流应到海，寻源只有客乘槎<sup>\*</sup>

## ——历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 研讨会回顾与总结

### 一、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缘起和经过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它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近百年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周易》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关注。而在今天，《周易》中的辩证法思想，《周易》的和合思想，《周易》的阴阳平衡互补思想，《周易》的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以及《周易》的管理思想等等，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或借鉴意义。因此，自 80 年代初，我校在全国高校最早开设了《周易》选修课，并开始着手恢复中断近三十年的对传统易学的研究。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自筹经费，于 1987 年冬召开了建国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借此会议东风，我们又于 1988 年创办了国内唯一的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这份刊物在传播易学研究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将全国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逐步形成了象数义理兼顾的易学研究路数，在易学研究领域自成一派。与此同时，我校一批青年学者开始成长起来，形成了一支精干的易学研究梯队，这支研究梯队的学术成果，引起了海外的广泛注意与重视，特别是台湾学者的重视。因此，易学研究已成为我校文科研究的一大特色，它极大地提升了山东大学在海内外的学术地位与学术知名度。

鉴于本“中心”易学研究及刊物在台湾有着较大的影响，我们自然把与台湾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学者的交流放在了重要地位。而且,海峡两岸同根共祖,有着同一的文化传统,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两岸人民对于两岸的前景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怀,都希望两岸加强交流,加深了解,早日统一。作为学者,我们更期望通过共同切磋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加强两岸的了解与感情,共同提高易学研究的水平。为此,我们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克服重重困难,自筹经费,于1993年筹划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并且,经过两岸易学同仁共同的努力,我们终于将这一活动连续性地开展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成果实在来之不易。

首届会议于1993年8月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举行。两岸学者在会上抱着极大的热情,既深入热烈地交流了学术,又交流了情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正是在这届会议上,两岸学者一致认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应该连续性地在两岸交互举办下去。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则更具体地表达了两岸学者共同的心愿,他倡议,以本届会议为契机,今后每两年一次,在两岸交互举行《周易》学术研讨会,以建立两岸易学同仁双向交流的机制。他的倡议博得了与会学者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由此,两岸易学界每两年一次在两岸交互举行周易学术研讨会的双向交流的模式正式形成。

于是,两年后的1995年5月,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由鄙人率领的大陆易学代表团一行10人,又与宝岛台湾的易学界朋友相聚于台北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举行了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与台湾中华易经学会主办,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鄙人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代表大陆学者发表了讲话。该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两岸易学界双向交流的模式正式启动。

1995年的台北盛会适过两年,我们又如约于1997年按时在北京梅地亚新闻发布中心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与台湾友人再一次在北京相聚。这届会议由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周易学会联合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协办。这届会议标志着两岸易学学术交流正一步步走向深入。

北京会议两年以后的1999年7月,由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台湾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再次在台北召开,经教育部批准,鄙人又一次率大陆易学代表团一行19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在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

“第五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又将于明年回到大陆召开,并再次由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主办,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将这次会议安排在九朝古都洛阳召开,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相信这次会议同样会取得圆满成功。

## 二、会议层次高,成果显著,意义重大

1. 从历届海峡会到会代表看,两岸易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些会议。

首届海峡会到会学者 103 人,其中以台湾大学哲学系为主的台湾代表 38 人,香港代表 2 人,韩国代表 1 人,大陆代表 62 人。他们大都是两岸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包括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易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而且许多是两岸易学界最知名的学者。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占 55 人。大会收到论文 68 篇,专著 10 部。会后由齐鲁书社出版了约 53 万字的大型论文集《大易集要》,在学界产生极大影响。

在台湾举行的第二届海峡会共有 100 余位学者参会,由于名额的限制,鄙人率领了一支能充分反映大陆易学水平的由 10 位著名学者组成的精干的易学代表团参加会议。此代表团成员全部是正教授,其中六位是博士生导师。

第三届海峡会在北京梅地亚新闻发布中心召开,到会正式代表 106 人,代表成员中有高级职称者占 76 人,许多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收到论文 67 篇,专著 30 部。会后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 45 万字的大型论文集《大易集述》。

第四届海峡会再次在台北召开,鄙人此次率 19 人组成的大陆易学代表团参加会议,许多著名学者如汤一介、陈来、蒙培元、吕绍纲、萧汉明等,皆参加了会议,可以说是一支阵容相当强大的大陆易学代表团。这届会议的部分论文在《周易研究》1999 年第 4 期至 2000 年第 2 期连续刊载。

2. 历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可以说这几次会议几乎涉及到了易学领域所有的重大课题,而且在这些课题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重新恢复并牢固确立起了传统易学研究方法——象数易学研究方法的地位。近半个世纪以来,象数易学被等同于术数占筮,遭到误解。其实,《周易》是象数与义理(易理)合一的模式,《周易》的义理

(易理)离不开象数,义理(易理)必须通过象数来表达,而象数之中蕴涵着深刻的义理(易理)思想,这是《周易》的独特思维路数。传统的象数易学研究方法不可抛弃。自鄙人来到山东大学任教起即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包括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创办《周易研究》、召开易学会议等方式进行大力倡导。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历届海峡会议都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对此展开探讨,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而重新确立起了象数易学研究的地位。第二,历届海峡会也对易学的研究方法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除进一步继承与弘扬传统的易学研究方法外,对在当今社会新的条件下,如何确立新的多元的易学研究方法以适应现代多元的社会生活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出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第三,开展易学与管理学、易学与环境保护科学、易学与现代社会问题、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从而使易学紧密地与当代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也是历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所作的新的探索。这方面的成果有的已经对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在尝试之中,还需要广大易学研究人员与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携手合作,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相信我们的研究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3. 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召开,而且每次都开得相当成功,这说明它确实反映了两岸学术界的共同愿望,说明两岸学界需要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以共同提高我们易学研究的水平,更好地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会议,通过交流,通过研讨,深化了对易学的认识,深化了我们两岸学术界的感情与友谊,增进了两岸学人的相互了解,并使两岸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加入到易学研究中来,使易学研究后继有人,使传统易学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这确实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情。

### 三、会议反响强烈

对于历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各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并从各个角度对会议作了大量报道,对海峡会的意义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它们包括中央电视台一、二、四台、日本 NHK 电视台、台湾各电视台、香港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济南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大众日报、济南日报、香港大公报、天天日报、文汇报、镜报、明报等。有关学术期刊如《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周易研究》《中国哲学史》等也对大会情况作了报道。还有,美国之音、美国侨报也曾对首届海峡会给予关注与报导,并作出了很高评价。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社会反响相当强烈,这一方面说明,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一直对辉煌的中华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周易》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有着很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是具有很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

## 四、各级领导和两岸学界同仁 对海峡会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各级领导以及两岸学界同仁对“海峡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是海峡会成功举办的重要保证。

1993年首届海峡会议时,国家教委有关领导多次来电话,关心、指导会议筹备情况;我校领导及山东省政府张瑞凤副省长、山东省政协翟永淳副主席亲临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济南市市长谢玉堂先生到会看望并宴请全体与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教授雷洁琼女士,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峻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先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徐才先生,台湾老一辈政要如孔德成先生、陈立夫先生、蒋纬国先生等及著名学者、辅仁大学名誉教授严灵峰先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陈启云先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倪策先生,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等众多学者、著名人士、学术机构和新闻单位都发来贺电、贺信或题词。

1997年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同样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女士给大会写来贺信并光临大会,亲切会见大会全体代表,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

铁映同志委托秘书到会表示支持;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罗国杰先生、方克立先生、蒙登进先生、李存山先生等参加了大会;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先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全国政协常委孔德懋女士,海协会秘书长张金成先生,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先生等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台湾著名学者陈立夫先生以98岁高龄为大会写来两幅题词。台湾和部分华侨著名学者如严灵峰先生、胡自逢先生、张廷荣先生、成中英先生、程石泉先生、陈启云先生、高怀民先生等也向大会发来贺电、贺信或题词。日本易学界还组成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开幕式。

各级领导和著名学者在讲话和贺电、贺信中,都对传统易学文化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对召开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如,雷洁琼副委员长给“首届海峡会”的题词:“周易,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张岱年先生贺信指出:“《周易》经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典,两千年来曾经启迪了许多学者、思想家的智慧,成为历代学术发展的源泉。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举办海峡两岸易学讨论会,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冯契先生贺电说:“周易为民族文化总源头,影响极为深远。弘扬易学自强不息精神,为炎黄子孙共同心愿。”环境科学专家曲格平先生贺辞:“天人合一说乃人类认识自然保护环境之精髓。”张岱年先生给第三届海峡会题词:“阐发易学精蕴,贯通三才之道。”任继愈先生题词:“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前景光明。”成中英先生贺信说:“本次会议更富有时代性,涉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重要课题,可说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他们对海峡会的指导、关心与支持,无疑对会议的圆满组织和会议研讨的深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我们的鼎力合作,更是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得以连续性成功开展的组织保证。他们为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连续召开付出了辛勤努力,没有台湾友人的鼎力合作,就不会有两岸易学深入持久的交流,就不会有两岸易学发展的大好局面。借此机会,我对我们的台湾合作者们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的努力,再次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

龙门凿后判津涯,  
雪浪银涛取次加。  
从此东流应到海,  
寻源只有客乘槎。



这是鄙人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幕式上所吟拙诗《咏黄河》。我以此诗后两句作为此回顾文字的题目,是因为通过在七年中举办的四届会议,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多方面意义,我们一定要本着“学聚、问辨、宽居、仁行”的精神,同台湾友人一道,将这一有意义的活动继续开展下去。

##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 研讨会闭幕辞<sup>\*</sup>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及山东大学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术界前辈的亲切关怀下，在与会海内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经顺利完成了大会预期的各项议题，获得了圆满成功！

来自美国、挪威、韩国、香港、台湾的 76 位正式代表参加了本次盛会。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正、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即占 56 人，因此是一次水平相当高的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 52 篇，专著 5 部。

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陈启云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萧蓬父先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方克立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方立天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张立文先生，武汉大学教授唐明邦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刘大椿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陈来先生，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先生，清华大学教授、画家李燕先生，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先生，日本筑波大学副教授佐藤贡悦先生，分别给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与祝贺电话。吉林艺术学院教授、画家李巍先生向大会赠画，台湾中华易经学会荣誉理事长邵崇龄先生、理事长倪淑娟小姐，山东中医药大学，分别向大会赠送了很有意义的礼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台湾老一辈资深学者、东海大

---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1 年第 1 期。

学教授程石泉先生,以九十余岁的高龄亲临大会,并作了精彩的发言。

在此,我代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给予本次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各单位,各位来宾,以及学术界的前辈们、同仁们,向积极协助我们共同开好本次大会的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次大会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了“20 世纪易学研究的特征”等十个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加本次大会的各位代表,无论是在大会发言、分组讨论,还是在其他形式的交谈、争论中,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切磋,相互启发,显示出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相当活跃和热烈。尤其是本次盛会适逢世纪之交,在跨世纪、跨千年的重大历史时刻,易学研究也处在了一个新的关口,理性地反思和审视百年来易学研究的历程,审慎地规划易学研究的未来,作为一个严肃的焦点课题,历史地摆在了学者们面前,值此之际,又喜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韩喜凯先生与山东省委常委、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先生亲自主持的基地揭牌仪式也在会议开幕式上隆重举行,而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发言中又断言,博士点的设立、基地的建立,将是继 1987 年岁末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办发行之后,大陆易学研究的第四、第五个重要里程碑,这就使得会议探讨的话题相对集中,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

本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 世纪易学研究的回顾。除本人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述拙见外,有的学者指出,20 世纪的中国易学,发展极不平衡,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0 世纪初,为易学转轨之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易学转轨之初步;20 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20 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有的学者则认为,相对于以前而言,整个 20 世纪易学研究的成果不容乐观,这是每个易学研究者所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有的学者集中论述了本世纪学术前辈于省吾先生、熊十力先生、金景芳先生等在易学的象数之学或义理之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

(2)出土资料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根据出土资料,数字卦的假说是否能够成立,现在还十分令人怀疑。卜不同于筮。包山楚简中,数字符号明显与卜有关。当时占卜的记录格式是某年月日用某龟卜,最后就是数字符号。卦与筮

相联,何以与卜相联?假如卦与卜相连,那么卜与筮的关系也将成为我们所当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有的学者认为,今本《周易》卦画,并非由所谓数字卦演变而来,阜阳简卦画、帛《易》卦画中的阴爻表示符,不应读作数字六或八。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有类似于传本《归藏郑母经》的资料,且除去重复外,六十四卦全然具备,说明传本《归藏》不为伪书。有的学者呼吁,为实质性地推进帛《易》的研究,除重视义理的剖析之外,必须加大其中的象数学研究的力度,是因义理是根乎象数的,如无对象数的把握,义理的研究也难得深入。有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帛书《易传》所反映的儒家道德观,认为帛书《易传》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反映了孔子说《易》多就政治德性而发。

(3)《周易》经传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数学的角度,探讨了今本卦序排列的规律。有的学者指出,《杂卦》卦序图,乃是一“昼夜变化图”。有的学者论列了《周易》的“十玄门”:乾坤成列、生生谓易、新新不停、旁通时行、二五得中、三才之道、成性存仁、化成天下、穷变通久、保合太和,指出,这“十玄门”,集中反映了大《易》精妙的形而上的哲学智慧。有的学者认为,《周易》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其深远的历史忧患意识,明确的历史变通理论,以及彰往察来的历史作用,颇值我们借鉴。有的学者主张,乾坤阴阳奠定了《周易》的哲学基础,天尊地卑的义理弘深广博。有的学者指出,《易传》“利物足以和义”的论断,包含有可贵的生态思维,这对于解决今日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问题,极富启迪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生存智慧,时至今日,仍有重要价值。有的学者特别指出,《易传》绝非道家作品,要分清成为各家公认学术常识的学理与各家实质性学理精神的不同。有的学者则专对《周易》思维的特色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还专就《系辞传》爻例的“拟议化”结构进行了探析。

(4)易学史的研究。有的学者对秦汉易学作了探讨,认为易学家之外的易学思想,也应进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有的学者探究了西汉孟喜易学,认为孟喜建立了一种以卦气说为核心的新易学。有的学者探讨了汉末郑玄易学,揭示了郑氏易学天道观的内涵。有的学者论述了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虞翻旁通说的哲理内蕴,认为旁通说涵具着隐显涵摄与流变互通之妙义。有的学者探讨了唐代孔颖达的易学,指出,孔氏易学具有兼综象数与义理的兼收并蓄品格。有的学者对宋代古易五家进行了考述,认为宋人恢复古易的工作,不仅是文献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易学哲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创获,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有的学者探究了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的易学,指出,熊氏易学包含

体用不二的宇宙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乾坤成变的辩证法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5)未来易学的前瞻。许多学者呼吁,今后必须加大出土文献及易学史上专人专题研究的力度,力戒浮躁之风,树立严谨笃实的良好风气。有的学者指出,今后一定要端正易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可只重义理而排斥象数,也不可只重象数而忽视义理,要超越汉易宋易的樊篱,要开展多角度、多视角的易学研究。

学者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海内外同仁齐心协力,并切实有效地发挥易学基地的作用,未来的易学研究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

现在我宣布:“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

2000年11月2日

##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 开幕辞<sup>\*</sup>

4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

在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的亲切关怀下，在山东大学主管领导的直接支持下，在海峡两岸学界同仁的积极配合下，在两岸易学界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在读的易学与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及他们的指导老师的热情参与下，在各方的大力协助下，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协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今天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富有青春朝气和学术发展潜力的两岸同学们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问候！

本次会议是在人类跨入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后所召开的首次两岸青年易学会议，又是在大陆和宝岛台湾相继加入 WTO 的喜讯传出之后不久所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到来，既给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华传统哲学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哲学文化的中国化的问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入世，首要地意味着在经济贸易领域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但是，国家经济贸易的世界化，必然要求文化学术的走向及发展与之相适应，必然要求本土文化学术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相关学术文化实现其良性之互动。因为众所周知，人类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文化体现了人类之为人类、不同民族之属不同民族的内在本体精神。唯有深入到学术文化这一层面，人类的交流才算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两岸青年，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未来，肩负着光大中华文化之慧命、开创中华文化之新运的历史重任。因此，在这喜庆、

---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2 年第 1 期。

挑战、机遇并存的历史性时刻,召开这样一次以两岸青年唱主角的会议,自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次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将在“易学与哲学文化”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易学的困境与出路;(2)传统易学方法与新易学方法的重建;(3)《周易》经传解读;(4)象数易学哲学思维;(5)易学人文精神;(6)象数与义理;(7)简帛易学研究;(8)易学史问题;(9)易学与儒道释;(10)易学与管理;(11)易学与古今科技;(12)其他易学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大致涵盖了易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各位与会的青年学人、学生和相关讲评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在上述问题的探讨上,取得实质性的良好成果。

千禧之年的10月末和11月初,我们同是在此处,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收效颇丰的“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一次在人类即将跨世纪和跨千年的重大历史时刻,适逢本中心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大喜日子里,所召开的会议。时间刚过一周年,在我们豪迈而顺利地跨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后,又召开了这次会议。上次会议所关注的问题,对于本次会议依然有效。在上次会议上,展望新世纪和新千年,我曾指出,在新世纪和新千年里,易学界的同仁们,至少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坚实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成绩:其一,易学是一门之学,而且是一门难度颇大的专门之学。我们必须力戒浮躁之风,笃实为学,正确而深入地理解这一专门之学,澄清各种不必要的误见,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误见,建立新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的具有公认学术水准的全新易学,使易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令易学这一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奇葩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其二,《周易》是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传统哲学文化反过来又滋养升华了易学。当今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症结之一,就是缺乏对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深入了解。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易学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研究之有机互动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以期有力带动各相关学科的合理建设与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世界化及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步伐。其三,确立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相吻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其四,加强专人专题的研究,注意由点及面,由面及点。在本次会议上,我将重申这一切,也热切希望透过这次会议,能够在以上四点上,取得一定突破。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同学,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是由热心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中华易经学会荣誉理事长邵崇龄先生及理事长倪淑

娟女士发起的。2000年6月,在发起人的促成下,台湾中华易经学会联合台湾师范大学、华梵大学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于台湾成功地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当年12月,又由武汉大学萧汉明教授竭诚努力,促成了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在武大的召开。由此,在海峡两岸初步建立起了第一个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易学学术双向互动交流的机制。本次会议,即是为了回应和延续台湾中华易经学会所倡导的两岸青年易学互动之良好机制,并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培养一流学术带头人和高级专门人才、使青年易学研究者能够脱颖而出、尽快成为易学界的骨干的精神而召开的。我们深信,本次会议的召开,必将令上述两岸青年易学双向互动交流之机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必将给本基地在培养一流学术带头人和高级专门人才、使青年易学研究者能够脱颖而出、尽快成为易学界的骨干方面带来新的契机,必将使我们的易学事业迈向新的美好发展前景!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让我们两岸的学人、同学携起手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吧!

观化乘易道,

登高望九州。

当此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再次召开之际,鄙人特制此联语一幅,以舒欣悦期盼之情!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同学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001年11月21日



# 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 开幕辞<sup>\*</sup>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在国家教育部和青岛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山东大学主管领导的直接支持下，在海峡两岸学界同仁的积极配合下，在各方人士的大力协助下，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及中国周易学会协办的“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今天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与最诚挚的问候！

本次会议是在我们跨入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后不久召开的首次“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在此，我们不禁欣喜地回忆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于1993年夏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技馆会议厅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环境科学家曲格平、著名学者张岱年、石峻、任继愈、金景芳等以及台湾著名学者陈立夫、严灵峰、罗光等皆为大会发来贺辞。两岸专家教授共100余人齐集泉城，其中以台湾大学为主的学者近30人，大家畅所欲言，就易学研究的方向与易学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此时起，大家在山东大学结下了易学研究的不解之缘，就是在这种深厚情谊的氛围下，当时的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倡议今后每两年一次在两岸交互举行这种易学研讨会议，直至没有“两岸”的说法为止。此一倡议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时过两年，我于1995年如期率大陆易学代表团一行10人参加了在宝岛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举行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与中华易经学会主办，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与中国周易学会协办的大会，开得十分圆满成功，那种血浓于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水的亲情自始至终洋溢于会场,使每位代表感动。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先生亲临大会与全体代表合影。1997年我们又在北京梅地亚新闻发布中心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台湾著名学者陈立夫当时以98岁高龄为大会题写了贺辞,台湾著名学者严灵峰、陈启云、胡自逢、程石泉等先生皆为大会发来贺函,美国学者成中英先生亦写来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再次发来贺信并光临大会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著名学者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等先生题写了贺辞。当时共有100多位学者参加了大会,其中台湾学者过30人,与会代表在“大易文化”的主题下,研讨了有关易学研究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大会论文集《大易集要》之后,这次大会又出版了论文集《大易集述》,对学者们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时过两年,我们如期于1999年再次飞赴台北,在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了“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倪淑娟女士、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赖明德先生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会议召开得极为成功。台湾政要连战、萧万长、马英九、焦仁和等先生皆为大会题写了贺辞。至此,海峡两岸的易学研讨会经过四次的交互召开,已经进入了稳定成熟的阶段。正如倪淑娟理事长在当时的大会开幕辞中所说,这些会议“除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外,更有其历史存在的价值”。为此,中华易经学会名誉理事长邵崇岭理事长发出倡议,希望在这些会议成功举办的基础上,进一步召开“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以便使青年学者参加到这一确“有其历史存在的价值”的学术活动中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大陆学者的热烈响应。“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易学研究的未来,是属于青年学者的!我们理应给青年学者创造条件,提供舞台,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经过双方约定,“首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于2000年夏在台湾师范大学如期召开。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三所高校为主的大陆30余名青年学者及讲评专家参加了这次盛会,真可谓:

已栽茂竹三百本,

再培稚松一千根。

两岸青年学者欢聚一堂,以火一样的热情,商榷道德文章,谈论理想抱负,短短几天,结下了深情厚谊,大家都想尽快再相聚。带着这种依依惜别之情,同年冬,武汉大学萧汉明教授克服种种经济上的困难,在武大召开了“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这次由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大会亦取得巨大成

功,并出版了大会论文集,在这种学术气氛推动下,第二年冬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在短短两年间我们举行了三次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加深了两岸青年学者之间的互动之情与商榷之风,《周易研究》学刊亦不断刊登台湾青年学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此次召开的“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已是我们两岸学者有关易学交流的第八次聚会,自1993年至今,9年中8次相聚,这种海峡两岸学人持之以恒的良性互动,是两岸其他任何学术活动和经贸活动所没有的。这全赖于易学“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的化育精神,全赖于两岸学人“高以下基,洪由纤起”的努力。为了培养这一良性互动,我们一直默默地耕耘着,既默默耕耘着现在,更默默耕耘着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数次会议作了如上回顾,因为唯有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规划未来,开拓未来!为此,鄙人撰拙联一副以表达我们的殷殷期盼之情:

知至至之,六合同风乾坤衍。

知终终之,九州共贯大道行。

此次大会我们以“易学、哲学文化整合与重建”为主题,着重讨论两大方面的问题:

易学研究:1)易学研究方法的整合与重建;2)《周易》经传解读;3)简帛易学研究;4)易学史问题研究;5)易学思维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1)经学诠释研究;2)经学与中国文化;3)儒家哲学研究;4)道家哲学研究;5)佛家哲学研究;6)中国哲学其他学派研究;7)中外哲学的融合与贯通。

这次在风光秀丽的海滨避暑胜地青岛举行的会议,由于得到仙山崂山气场之庇佑,两岸200余名著名学者齐集青岛,其中台湾同仁已超过50人,这是我们历次会议之最。我相信,大家就易学与中国哲学方方面面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必将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青岛会议将伴着崂山的秀丽风光,给每位代表留下美好的回忆与遐想,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代表身体健康、道履贞吉!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 研讨会学术总结<sup>\*</sup>

在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的大力关怀、支持下,在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及中国周易学会协办的本次“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已顺利完成了大会预定的各项研讨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参加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 203 人,其中,台湾代表 56 人,另有来自香港地区及美国、韩国、日本的特邀代表 12 人。就职称而言,教授、副教授一级的代表,即占 138 人,因此是一次规模较大、水平颇高的成功学术会议。

几天来,代表们围绕“周易、易学与中国哲学的整合与重建”这一主题,就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多个分题,展开了“横四维而含阴阳,统宇宙而章三光”的广泛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一、就易学问题的讨论而言, 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

#### (1) 简帛易研究

近年来,相关简帛资料的出土,一系列石破天惊之事接续发生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学术世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学术研究新机缘。因此,简帛资料的研究,成为近年来两岸学界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汉学界的一大显学。本次会议上,简帛易的研究,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重要热点。有的学者探讨了江陵

---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2 年第 5 期。

王家台秦墓出土《归藏》与《穆天子传》之关系,指出,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它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有的学者析论了《郭店楚简·语丛》的重要学术价值,指出,《语丛》中“《诗》,所以会古今之诗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一段文字,不仅表明战国中期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而且对每经的主旨都有说明,其中,言《易》乃讲会通天道、人道的所以然的道理的书,大概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和最明确表达“天人合一”理念的论断。有的学者以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方法,仔细考辨了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认为《衷》篇多言阴阳和谐、乾坤相济,此种易学思想,显然是一种中和思想,帛书以“衷”名篇,当与此有关。该篇文字,当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论《易》言论的汇编。

### (2) 易学源头问题研究

易学文化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蔚为大观。易学源头问题的研究,再次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探讨了炎黄时代的易学,指出,从八千年前伏羲时代创造八卦易,经炎帝连山易,到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历时达二三千年之久,这从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说明。由阴阳概念到八卦的形成,由八卦推衍到六十四卦,早在五千年前,即可寻找到这一易学发展演变之轨迹。有的学者借助大量文献的、考古的资料,探讨了周易文化来源的问题,认为,作为易经基础的阴阳八卦源于山东,伏羲画八卦,有东夷文化背景,易的发明权属山东人;《易传》源于山东,《易传》的著作权属孔子,有邹鲁文化背景;易学源于山东,易学的创立权,属于以田何为为首的山东学者,有齐学与鲁学的文化背景。由此不难得出如下之结论,即周易文化源于山东。有的学者考索了《周易》的古义与今义,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今义成为官学正统,古义则渐次衰微。《易》之古义由来已久,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今义突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

### (3) 《周易》经传研究

作为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原典基石的《周易》经传,历来是学者研究的基础和关注的焦点。本次会上,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两个首卦的乾坤两卦之意蕴,认为,乾为天,为自然创生之始,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时间概念;坤为地,万物赖以以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这种《易经》中的时空概念,重视具体、创生、更新、有机圆融,正合乎西方最新科学与哲学发展之趋势,因而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有的学者从《周易》的《中孚》一卦切入,揭示了中国古人覆卦观象之方法。有的学者以大量原典资料为基础,详细解析了《易传》

中的神秘数字,指出,这些数字,可以分成三个体系:一是以太极数字及大衍之数为主的数字宇宙论;二是以天地之数构成的图式宇宙论;三是以乾坤策数所形成的策数字宇宙论。它们使原本的算术数字,提升至模式数字,兼具神秘数字的内涵,这就使得《易传》的宇宙论,表现出抽象化、无限化、类推化、逻辑化及指数化等性质。有的学者着力探析了20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形成的过程,指出,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周易》研究者一直不甚区分经传,俨然将经传视为一个整体,直至20世纪初,疑古风潮骤兴,主流思潮一变,研究者始一意将经传关系切断,认定经传有别,不能用传解经,经是占卜迷信的工具,传才是易学义理之学的源头。

#### (4) 易学人物的研究

易学人物的研究,意味着易学史的研究。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以个案分析或相互对比的方式,分别探讨了汉代焦贛、虞翻,唐代孔颖达,宋代苏轼、程颐、张行成、朱熹、吕祖谦,明清之际王夫之,清代焦循,现代熊十力、马一浮,当代杨向奎等人的易学思想或易学观点,充分展示了易学生生不息的旺盛学术生命力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的学者研究了西汉焦贛的易学,认为,《焦氏易林》一书不伪,就易学言之,该书以阴阳为纲,透显了《周易》的二进制思想,突出了相反相成、阴阳和合、相济为用的哲学思想,表达了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就易术言之,该书实现了对《周易》筮法的改革,是西汉象数派孟焦京一系不可或缺的环节。有的学者探讨了汉末虞翻的易学,指出,虞氏创造性地建构了一整套象数易学解释学原则,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即是其“震巽特变”“权变”二原则。有的学者通过对《周易正义》一书的研究,重新审视了孔颖达在易学由占筮之工具性东西转变为具备相应义理的一门学问之后,在关乎此门学问的几个基本问题上的理论观点,认为,在“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周易》上下经分篇之根据”四个易学基本问题上,孔氏综合前人之见,给予了系统的“解决”,他的此方面的识见一直为后人所转述,只要涉及易学史,就不能越过他。有的学者分析了《东坡易传》一书,指出,此书反映了苏轼易学如下之鲜明特色:蜀学传统,家学渊源;兼容并包,自成体系;善谈名理,切近人事。由此,苏轼令易学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有的学者将北宋程颐之易学与南宋朱熹之易学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伊川与朱子解《易》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对解《易》系统的认识上,一方面表现在对康节易学的态度上。伊川的《周易程氏传》直承孔子的解《易》传统,乃以理学解《易》的代表作;

立志本诸《易经》的原始卜筮功能,重新生发义理,与对康节易学的偏好,二者互为因果,造就了朱子解《易》的风格。有的学者则认为,程朱易学之差异,是与二人所处时代之不同密切相关的。程子易学重义理,朱子易学象数、义理兼顾。程子易学属于理性主义的新儒家哲学易学,朱子易学属于在前者基础上加上了宗教性的理性宗教式的新儒教哲学易学。有的学者探讨了南宋易学象数派大家张行成的先天数学思想,认为哲学本体论上的数学派出现于宋代,以邵雍、张行成、蔡氏父子为代表,而张行成,乃是上承邵雍,下启二蔡的数本论的重要人物,由象而推及数,由数而推及理,由理数而说明天道规律和宇宙本体,是其象数哲学的最大特色。有的学者专论了南宋浙东思想家吕祖谦的易学思想,指出,吕氏易学富于辩证精神,其最大的学术关怀,乃是追求成就“与天同德”“通天下之声为一声”“通天下之气为一气”的圣人人格。有的学者探讨了王夫之的易学,认为,这一易学彰显了一种独特的《周易》与中国天人之学的模式,即不是导向一个世界之外、之旁或之上的天道,而是导向对世界的承付,是作为生存维度的世界视域的开启。有的学者探析了焦循《孟子正义》中的易学思想,指出,焦循援《易》释《孟》的基本理念是,证之以实,运之于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通变神化,道本一贯。而他于释《孟》中所体现的易学与孟学之融摄与会通则表现在,以“旁通”说“性灵”,以“变通”说“性善”,以“时行”说“性命”。有的学者探寻了焦循《易图略》的哲学方法论意义,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从而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确立了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有的学者在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易学与哲学后指出,创造性的诠释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部分归因于他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有的学者从诠释三《易》之义、揭显死生之正、开示观象之要、阐发学《易》之道四个方面,析论了现代大儒马一浮的易学,断言马氏乃百年易学第一家,千古易学一大家。有的学者分析了当代学者杨向奎的易学观,指出,杨氏将易学研究建立在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展示了易学演变的脉络和规律。

#### (5) 易学哲学及其与中华人文精神的研究

易学是一高度哲学性的专门之学,它与源远流长、意蕴深湛的中华人文精

神的形成与发展,又存在着密切关联。有的学者指出,易道是先民智慧之结晶,《易》蕴藏了人对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无边智慧,具有丰富深厚的生命哲学与生存发展论方面的内蕴,这与西方知识形上学强分心物,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探索与人相对峙的“自然”或“存有”的普遍规律,所存在的严重偏差,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有的学者分析了《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认为,《周易》经传建立了德性意志的思考模式,将整体存在界的所有事务,收摄在德性意志的运作原理中,整套经传中,真正有知识意义的,唯有六十四卦人事情境的处世智慧,这套智慧,即便在现代社会的阶层组织中,依然具有其经验实用性。有的学者指出,《周易》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这与其有别于“概念思维”的“象思维”,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周易》所内涵的圜道观,属于一种中和而行圜,循环而出新的圜道观。有的学者探讨了《易传》中的语言哲学,主张这种哲学更能体现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其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并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有的学者指出,《易传》所包蕴的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文精神,主要有如下数端:体仁利物,崇德广业,刚健自强,人际太和,劳谦不伐,变通尽利。有的学者则认为,《易传》的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两点:以追求人的善良完美为理想,坚信人道正义之价值的精神;强烈的变易求通、去故取新的进取发展精神。有的学者揭示,《周易》具有真善美的价值学统合意义上的深刻创造的美学思想,颇值我们开掘。有的学者认为,《周易》具有丰富深湛的和合学思想,这一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现代价值与未来意义。

#### (6) 易学符号学研究

易学有两大系统:一是其文字系统;一是其符号系统。易学的符号系统别具特色,成为易学之为易学的根基和基本表征之一。有的学者以历史发展的纵向视野,系统考察了卦爻符号系统的演变及其意义。有的学者则析论了《周易》研究的符号学转向,皆富有新意,给人以有益之启迪。

#### (7) 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易学研究,应具备适切的方法论。多年来,受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两岸学人对中国传统经学的诠释学问题,进行了多方有益的探讨,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成果。近来,汤一介先生大力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诠释学体系,以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视野研究易学。本次会上,有的学者着力以《易经》研究为例,论述了经典诠释与文献整理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并从“研究资料之汇集”“语文工具之运用”“经典文本之厘正”“经典义例之掌握”几个方面,展开了详切之析



论。有的学者探讨了《周易》诠释中的若干问题,强调了对于语境辨析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就《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其实质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的思想。有的学者则阐发了易学与本体诠释学问题,认为,易学的原始经验性、系统性与应用性极为重要,不可忽视易学表达及指谓此一经验与体验世界的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同一与二分的本体理解,此一理解,导向了《周易》的卦象系统,也导向了一个特殊的诠释系统、理解系统与应用系统。

#### (8) 易学与儒释道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由它所引发的易学,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皆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次会上,学者们探讨了易学与儒释道三家之关系,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进一步确证了易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显赫地位。有的学者探讨了《周易》与儒道两家的“静”论,指出,“生生”是《周易》的精神,“守静”是《老子》的宗旨,二者概念上有别,但又存在内在联系,联系者即人的生命。有的学者析论了《周易》古经中,包含明显的儒家思想渊源。有的学者指出,《易纬》的宇宙观,深刻反映了汉代儒道合流之趋向,认为《易纬》援道入儒,是儒道融合的重要一环。有的学者探讨了道教符咒法术与易学的关系,指出,易学中“观物取象”的符号化思路,深深影响过道教,以图书为基本解读方式的易学象数符号学说,尤为道门中人所重。有的学者探析了清代粘本盛《道养全书》中的易道融通特色,指出,这种融通,深刻反映了易学的象数、义理之学在道教内炼养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学者剖析了易图与宋明理学之关系,认为,易图在理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开掘其学术意蕴,将有力推进理学的研究。有的学者探讨了禅宗与易学的关系,认为,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象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也极大地丰富了易学之宝库。有的学者论述了近现代著名佛教革新者太虚法师对于易理与佛法的会通,指出,历来认为,儒学重入世,佛教重出世,如何将二者打通,是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太虚法师建立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的关键问题,太虚法师借助易理与佛法的会通,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 (9) 易学与自然科学研究

易学与古今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科学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次会上也有新见出现。有的学者探讨了《周髀算经》与《系辞传》的关系,认为,《周髀》中“周公与商高对话篇”,约成于春秋末、战国初,《系辞传》有取于该篇的天圆地

方说与七七四十九之数;“荣方与陈子对话篇”约成于战国中期,《系辞传》有取于该篇的春分秋分昼夜之象与径一周三等说。有的学者指出,易学的象数之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深远,有此影响,是因易学将数与万物联系起来,数形结合。有的学者以现代数学的视野,证明了先天卦序即自然数序列。有的学者则对产业与企业的经营变数,作了别具特色的卦象诠释。

#### (10) 易学与术数

《周易》本系卜筮之书,《易传》将其提升为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典籍后,卜筮功能仍被保留了下来,易学与古代包括卜筮在内的术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次会上,有的学者借助出土简帛资料,指出,孔子眼中的卜筮,可扼要概括为重德轻筮四个字。有的学者则认为,孔门也具有宽泛意义上的预测学。有的学者通过探讨南宋理学巨擘朱熹对各类术数的态度,指出,理学与术数存有极为密切之关联,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理学之真面目。

## 二、就中国哲学问题的讨论而言, 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

### (1) 中国哲学与诠释学问题

以诠释学的视野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哲学,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的学者探讨了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指出,近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中国传统经学重新回到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中,许多学者开始把中西两种不同的诠释传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有的学者尝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经典诠释实践和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有的学者甚而进一步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方法的设想。无疑,经典诠释学研究,目前正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方向,这必将带来哲学观念的反省,哲学主题的拓展,哲学方法的更新。

### (2) 经学研究

传统经学的研究,重新成为时下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有的学者分析了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问题,指出,此一编联问题,至少应考虑如下四点:

缺简;竹简的形制;《诗说》简与《鲁邦大旱》《子恙》三篇同卷的关系;《诗说》简内部行文体例与结构的分析。有的学者探讨了春秋公羊学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公羊学说的形成和丰富,自战国起至东汉末,经历了五六百年。由《公羊传》奠基,胡毋生《条例》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发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总结,终于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这一学说体系的特征是: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有的学者探寻了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指出,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唐宋的四书之学、义理之学、北宋以来的理学、汉唐训诂之学等,是朱熹经学的主要思想渊源,朱熹在吸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创造性的理论改造与创新,从而推出了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

### (3) 儒家思想研究

儒家思想,是传统学术的主流。有的学者论述了孔子的“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认为,孔子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现了他的一种文化关怀,其视野在整个文化,体现着一种文化阐释的意义,它既表现了孔子强调文化之历史继承性的文化意识,也表达了他对文化阐释的一种原则性要求。有的学者著论,辨析了“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认为此论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政治追求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有的学者考辨了子思与孟子之关系,认为,孟子虽深受子思及其门人思想之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并未受业于子思或其门人,《子思子》《孔丛子》所记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非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的学者从孟子“仁民爱物说”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儒家的生态观,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伦理观,它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同情之心对待动物和一切生命,以尽人类之职责,从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出发,关心他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伦理关系,即所谓生态伦理。有的学者分析了荀子“群”的理念与国家理论,指出,从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封建世袭制度的全面反对,但他所论述的个人,不是站在水平境地来看的,而是以垂直性角度来定位的“臣民”。有的学者辨析了儒家中庸范畴所包蕴的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认为,对于中庸观念,既可以作哲学的诠释,也可以作伦理学的诠释。在哲学的视域中,既可对其作本体论的诠释,也可对其作方法论的诠释。在伦理学的视域中,既可对其从道德层面上进行诠释,也可从伦理层面上进行诠释。由此即可发现中庸的丰富意蕴。有的学者从北宋张载关学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宋明理学的原型及其真精神,指出,张载关学所透出的是学政不二的帝王之道,欲复三代的超唐史观,以礼立教的现

实关怀,这一切,表现了宋明理学之原型及其真精神,也正是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生生不息、焕发青春的根本所在。有的学者以戴震的思想为切入点,析论了18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认为,戴震建构义理之学体系时,遵循了由训诂而推求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两条重要原则。有的学者从后现代的视域,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学,指出,现代新儒学的有关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各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它反对相对主义,力图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确立一个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利用厚生,从而足以安顿人的全幅生命的价值之源。有的学者论述了儒家传统在现代面临五个挑战:科学、民主、女性主义、环境主义以及儒家自身如何生存下去。

#### (4) 道家思想研究

道家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通过对老子的道与西方神哲学的比较,指出,由老子的道,可以推论出宇宙间应有一最高的精神实有存在,其特性是永远的、唯一的、无限的、不变的、最高的生命体;其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乃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保存者、辅助者与眷顾者。有的学者著论认为,老子“无为而治”的治道,主要来源于历史记忆中的上古“垂拱之治”。有的学者考察了全球化历史新境遇下的老子思想的价值,认为,老子强调顺万物之自然,对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仍有其积极作用。有的学者分析了庄子哲学中的本体论思想,指出,“蔽于天而不知人”实为侧重于“天”的庄子对于绝对真理的一种往而不返的追求。有的学者论述了道家哲学智慧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超越性,玄思性,否定性。有的学者着力探讨了道家的超越智慧,指出,这种智慧,具体展现为对礼乐文化异化的超越,对物役、物累的超越,对有为政治的超越。有的学者分析了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如下几个问题:道家地位之问题;新道家、新道学之问题;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之问题;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之问题;道学史研究之问题;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之问题。有的学者立足于现代和未来,指出,新道学文化有如下八大支柱:人行道哲学,政治管理学,文艺审美学,医药养生学,宗教伦理学,自然生态学,丹道性命学,方技术数学。

#### (5) 佛教研究

佛教东传之后,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了长期的历史冲撞与融合。有的学者剖析了禅宗,指出,禅宗受中国哲学的陶冶,受中国文化的孕育,他们证心是证

中国心,尤其和庄子的心遥遥相印,他们也在这个婆娑世界中作逍遥之游,他们把庄子的真心变为自性,把庄子的真人变为无位真人,把庄子的“是非两忘而化其道”改为“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把庄子的“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改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有的学者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中。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有的学者专论了唯识的认识哲学,认为,唯识哲学体系博大精密,绝非唯心论、唯物论、经验论、现象学等可类比而推之。

#### (6) 墨家思想研究

墨家思想曾经是春秋末、战国时期的显学,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有的学者分析了墨家的进步社会政治观及其哲学基础,指出,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绝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

#### (7) 其他

此外,有的学者还论述了中国文化名人中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清初反清志士屈大均、清代著名诗人吴渔山与澳门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的关系,皆富新意。

总之,本次会议是一次收获颇丰的会议,尤其是它开创了易学研究者与中国哲学研究者全面交流的先河,为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加强,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我们坚信,本次会议以其扎实的学术内容和学术思想的探讨必将在易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留下它应有的地位与评价。我们坚信,此次会议所开创的易学与中国哲学融会交流的方向,必定像一片光溢四射的朝霞,为后人照亮一条学术研究的新坦途!

## 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sup>\*</sup>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各界朋友的大力协助下，在学界前辈的亲切关怀下，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到今天下午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大会预期的各项讨论议题，取得了圆满成功！

参加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共计 150 多人，其中，台湾代表 42 人，韩国代表 10 人，香港代表 3 人，美国代表 3 人，巴西代表 2 人，澳大利亚代表 2 人，大陆代表 80 多人。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占 100 多人。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提要 100 余篇。可以说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先生，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敦康先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郭文夫先生，世界太极科学协会、比利时国际理学研究所胡扬先生等，分别向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著名国画家范曾先生、李巍先生、李燕先生，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分别向大会发来贺画贺词。台湾海基会前秘书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焦仁和先生，台湾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先生，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名誉理事长邵崇龄先生，台湾周易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刘君祖先生，分别向大会赠送了题词和精美的纪念品。中国政法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分别向大会赠送了花篮。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潘富恩先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黄庆萱先生等海内外老专家、老学者专程

---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5 年第 5 期。

赶到大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为大会增色不少。在此我代表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给予本次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各位领导、各界朋友、各位来宾,以及学术界的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四天来,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本次大会在“易学与儒学”的主题下,着力就“《周易》经传解读”“简帛易学研究”“易学史研究”“易学哲学研究”“易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价值”“经学诠释研究”“儒家哲学研究”“儒学史研究”“儒家经世思想研究”“儒学的现代转型与现代价值研究”“易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等十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们,无论是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还是在其他形式的交流中,大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启发,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极为活跃、热烈、祥和。

本次会议在易学与儒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易学方面

(1)对简帛易学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有的学者在对今、帛、竹本《周易》进行比较后,认为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古文易本,今本与竹本(有些文字)大体相似,此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而帛本《周易》应为今文易本。有的学者比较了帛本与今本《周易》中的乾坤两卦,认为三才分位说不适用于乾卦,今本申明坤须从阳,与帛书《衷》所言阳之得阴,男下女不同,今本中的“用”与帛本中的“迥”是先贤将《易》从神权通向人文的结果。有的学者探讨了楚竹书《周易》卦爻辞文字的隶定、断句和文义释读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2)对《周易》经传及其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有的学者研究了《周易》的方位观,指出经和传分别呈现的是“四方”方位观和“八方”方位观。有的学者认为,《周易》爻辞少部分有韵,古音韵学家认为的大部分韵语,其实并不全然可信。有的学者提出了不易、变易、简易、交易、和易的易之五项含义,并从整体上探讨了易之五义的本体结构。有的学者分析指出,《易传》中的形是天象地形的总体概括省称,形而上指在天象地形上存在的抽象原理,形而下指天地变化所生的具体事物。有的学者指出易学的时间观显示出时位相关性、适时性、同时性、可逆性、同一性、实践性、人文性等基本特质。

(3)对易学发展史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分析了孔子对《易经》的创

造性解读及其从《易经》到《易传》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有的学者指出易学史上的史事宗的特点在于:变卜筮预设为史证预设、注重道之体用的贯通、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的学者从阴阳二气消长、天人感应和五行生克三个方面探讨了汉易卦气说的理论原理。在易学人物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子夏、郑玄、李觏、程颐、朱熹、朱震、吴澄、钱大昕、陈澧等人的易学思想,拓展了易学研究领域,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白。

(4)对易学与儒释道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分析了《周易》与道家隐逸思想的关系。有些学者对明末援佛解易的智旭和引易说佛的紫柏尊者的佛易互通思想进行了研究,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学者们还从易学与理学相融合的角度对程颐、朱熹、吴澄等人的思想作了一番探讨。有的学者从宇宙本体论的提升和价值世界的重估的角度对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作了整体分析。

(5)对易学现代价值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指出《易传》的企业管理论包含人本意识、特色管理和思维论三个层面。学者们还具体地分别就乾、蒙、需、师、兑等卦从管理思想、教育精神、战略思想、和谐思想及人生启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体现了易学现代价值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

(6)对易学与自然科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今本《周易》的序卦和杂卦都是数学杰作,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坐标几何。有的学者论述了十二辟卦与《伤寒论》六经欲解时与时间医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周易》经传发轫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理论,名辩学的推类理论则是对此推类逻辑的总结和提高。

## 二、儒学方面

(1)对简帛儒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比较了“仁”字与郭店竹简的“𢇛”字,指出“从人从二”的“仁”字主要反映了人我关系的一面,“从身从心”的“𢇛”字则更多反映了心身内在的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仁”的完整内涵。有的学者认为郭店竹简将“命”具体化为“时、世、遇”,要经过知天、知人、知道的过程才能“知命”。有的学者分析了《穷达以时》中孔子的“时遇”思想。

(2)对先秦儒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将孟子的主要思想归纳为“四善”即善性、善养、善政、善教。有的学者分析了孟子“可欲之谓善”的命题,认为



其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学者们还对儒墨关系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孟子对杨、墨之学的批判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简单地以禽兽喻杨墨。有的学者认为,战国前期的儒墨之争主要是墨子与曾子、子夏等人关于礼乐、非攻、兼爱、天志等方面的争论,墨家在争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思维一体的早期学说。而有的学者则指出儒墨相攻讦的背后隐伏着共时性文化背景下的相通与相融。

(3)对经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考证指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则不会早于汉初,是汉初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将《白虎通》视为东汉白虎观会议之产物,进而将其视为东汉章帝时代之经学共识,则存在着文本与会议间名实不相应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焦循确认《伪尚书孔传》蕴含着“二帝三王之道”的真谛,体现了经典的古代意义与传注的现代诠释的统一。

(4)对宋明理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例分析了儒家对“仁”的诠释,突现了核心价值、大公全德、道德主体境界等几项意义。学者们还分析了宋明理学与道家的关系,指出道家思想在朱熹哲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陆九渊思想创新的源泉。另外,在清代儒学研究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意识,构成了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

(5)对现代新儒家与儒学现代价值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指出,牟宗三划分宋明学术三系论的两个标准(形著说和自律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如何克服王学之流弊和如何克服理学内在之缺陷两个方面。有的学者指出,由熊十力开创、唐君毅、牟宗三等光大的以思想观念的发挥为中心的哲学路向,开拓了儒家思想现代化转化的空间,为儒学的主体性重建、叙述方式的更新以及融会西学和重新进入到主流的学术话语圈打下了一定基础。有的学者则从生命价值、人生价值和实践精神等方面论述了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

(6)对儒家哲学做了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哲学是建立在“道、理、用”相互转化的整体架构中的整体生命哲学。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有一个生态哲学的资源系统,它以“祖述尧舜”为标帜,主要通过《易经》意蕴的阐发,并由一系列经典构建起来、传承下去。有的学者分析了儒学中的求真求善的思想,指出它在思维意向、价值取向上与科学技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二者在道的追求上有着共通性。

以上是对本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的简要综述,当然限于时间和文字的篇幅难免挂一漏百,还有很多精彩的学见没有在文中总结,今后这些将在论文集中体现出来。我们相信,本次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会推动海内外易学和儒学研究的发展,推动易学与儒学间的交流和融合,进而推动整个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一定的贡献。

祝各位来宾、各位代表身体健康、旅途愉快!祝易学与儒学大业蓬勃发展,“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谢谢大家!

2005年8月18日

## 欧盟“中华文化高峰论坛”开幕辞<sup>\*</sup>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与会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 30 周年，从中国历史文献所载的“大西国”起，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超过了两千年。1975 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交流进入新的阶段。30 年来，中欧关系双方坚持以互惠双赢原则处理外交关系，支撑这一原则的基石，在于双方均具有深厚的文明积淀。双方的思维和利益诉求更易沟通，对于不同的立场差异更易理解，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会议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着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越来越强调彼此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独立的追求。事实上，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西方文化体系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一个“他者”，以使用一种“非我的”“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也急需在新的基础上，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自己的文化现代转型。因此，中欧文化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要求。

中欧之间的文化对话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光明的前景。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今正处于自身发展的最好时机，经济文化正在逐步崛起，向世界经济文化大国迈进，欧盟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区域性联合体，中欧已经结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发展需要欧洲，欧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同时，就文化合作而言，中欧也有着坚实的基础，共同的愿望。近年来，中国与欧盟 15 个成员国分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5 年第 6 期。

别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或年度文化交流计划,欧盟十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欧盟委员会文化和教育委员相继访华。这一切都说明中欧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中欧文化的接触最便捷的方式是直接对话,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找到一个中介,而由欧盟促成并主办的本次中华文化高峰论坛就是为建立这样的中介机制而做出的努力,这个中介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的独创和特色,并足以突破双方的旧体系,为双方提供新的立足点来重新观察自己,为“更新”和“重建”构成前提和可能。本次“中华文化高峰会议”的召开,正是在于讨论文化多样性,使得“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着眼全球化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影响,致力于为促进中国与欧盟间的关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建议。

“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文化建设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優勢,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文化创新;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宣传,努力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积极开拓文化产业。

在全球化浪潮推进下,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欧洲文化伴随商品把西方文化所宣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输入中国。《易传》指出:“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我们积极引进欧洲的优秀文化,取其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为我所用。同时,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当仁不让”地传播到海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二者的融合日渐明显。欧洲的西方文化走在世界前列,占有主导世界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文化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为新的热点。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文化形势似乎渐露端倪,中欧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努力进行文化创新。创新乃中国文化前进之道,生存之本。不能“与时偕行”进行创新,将丧失民族文化的固有优势,也就会失去全球价值。文化创新就是对传统文化实行批判继承,对外来文化择优汲取,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新整合,完成自我超越。《易传》所高扬“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思想,正是世界文化建设走向现代化、面向全球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亦即当前我们大力宣扬“与时俱进”精神的深刻意义所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今日的文化交流,当以“自强

不息”的进取精神,建设新文化,以“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吞吐百家,日新又新,以崭新的文化风貌,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为建立新的世界文化而努力。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多次面临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多次接受选择,它的适应性就表现为它以宽阔的胸襟、包容的精神,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亦表现为它自身经过改造和整合,融入其他主流文化之中。今天中华文化的重新兴起,当然也不只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对它的需求,而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融合趋势对它的选择。世界越来越小,变成了地球村,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交往交流中渴望了解对方的文化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力日益强大又为中国人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人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感到中华文化面临走向世界的机遇。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性格气质,而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命息息相关。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有待于发扬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来求得共同解决,而中华文化作为有源远流长历史的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有责任利用自身的优势,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中华文化过去的辉煌,后来的衰微,现在的复苏,都表明它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是包含着中国人生命气质的一种世界性文化资源,它像一座富矿,蕴藏着对现代人的精神生命、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的恒常价值。因此,我们对它的责任不是褒贬和摒弃,而是开采和提炼,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资源的实质,是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所以中华文化研究也应该走出中国,走出东方,走到世界的大文化圈中。

我相信,本次高峰会议,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欧洲文化相互交融等诸方面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我更相信,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日子已经到来!

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05年9月6日



# 《周易概论》齐鲁书社版后记<sup>\*</sup>

《周易》作为一部古代筮书,虽未摆脱神学体系,但其内容却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历代研《易》者颇不乏人,特别是建国以来,有很多学者著文从理论上作过分析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向读者介绍一点历代《周易》研究概况、前人研究《周易》的传统方法及本人对这些问题的浅见。

这本小册子,原为教学而写,是针对初学者读汉、宋《易》注,往往被其中象数术语所阻这一实际困难而发的。而象数学又是前人治《易》最重要的内容,故本书对汉、宋《易》学中的象数之说,如《易》象、卦变、著法、占法、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图”“书”、先天八卦方位等,进行了粗浅地探讨和简要地介绍。当然,还有些内容没有谈到。同时,卦变也不是按传统方法介绍的,且极简略。而其中有些问题,历代研《易》者多有争论。本人虽阐述已见,然因才疏学浅,加之手头资料有限,所见甚偏,疏漏、谬误之处一定不少。切望学界前辈及广大读者多予批评指教,以便今后修改、订正。

拙稿草成之际,尚未见到关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系统材料,故本书未曾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书稿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辛冠洁先生的热情指导和鼓励,张岱年先生并为之制序,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sup>\*</sup> 齐鲁书社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李苦禅先生以耄耋之年亲为本书题名,稿成,未及付梓,先生竟溘然辞世,抚稿思昔,实有愧于先生之厚爱焉!

刘大钧

1984年8月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周易概论》齐鲁书社版再版后记<sup>\*</sup>

承蒙广大读者错爱,拙著得以再版。

根据读者的意见,借再版机会,补入了《疑难卦爻辞辨析》(上下经)一文。它是本着以训诂为主,亦应兼顾取象的宗旨,在前人训释的基础上,参考帛书《易经》(依据《文物》1984年第3期文本),试着对一些疑难卦爻辞进行的辨析。同时,本书初版时,笔者尚未见到马王堆帛书《易经》的材料,是以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次再版,补入了《帛〈易〉初探》一文,以阐述对帛本《易》的一管之见。

帛书《易经》作为西汉初年的本子,向我们展示了很多极为重要的资料,从而改变了笔者对今本某些卦爻辞的理解。因此,本书初版所附六十四卦某些卦爻辞的断句,与《疑难卦爻辞辨析》中不尽相同,当以后者为是。

刘大钧

1987年4月1日

于运乾书斋

<sup>\*</sup> 齐鲁书社1988年1月第2版。

## 《大易探微》序言<sup>\*</sup>

依传统说法,“图”“书”之学出于道家。据说始传于陈抟,盛于宋仁宗年间。由于朱熹将“河图”“洛书”等九图列于《本义》卷首,故宋元以来,学《易》者多研《易》图而繁衍其说,至使《易》图竟不下数千种之多,形成了《易》学研究史上独树一帜的“图”“书”之学。

然“图”“书”始出,即生歧见。如当时人们多以“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而刘牧却以“十”数为“洛书”,“九”数为“河图”。宋人俞琰在《周易集说》中更引《尚书·顾命篇》:“天球河图在东序”为证,对“河图”提出质疑,认为“河图”既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当是玉名。元、明之际,“图”“书”最盛,然元人陈应润《爻变义蕴》,也指出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接着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抨击。至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很多著名学者,皆对“河图”“洛书”的可信性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周易》未遭秦火,不应独失其图,而由道家藏匿,至宋方由陈抟传出。清儒胡渭进而著《易图明辨》,专门对“图”“书”的来历作了翔实考辨,指出“洛书”实由《乾凿度》中郑玄注文而来,而“河图”,亦为发挥《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出。至于先天诸图,唐以前的书籍绝无一字提及,故他们认为“图”“书”之说,虽执之成理,言之有故,但终为宋人所造,乃《易》学一支流,绝非作《易》之根本。

后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十卷,又对“图”“书”多有批评贬斥,至此,“图”“书”之学转衰。清末,研究者已经不多,至民国,专研此学者更少,建国之后,几乎无人问津矣!

那么,“河图”“洛书”及先天诸图,究竟是确有渊源呢,还是如清人所考,乃宋人据《系辞》《乾凿度》等书自己臆造?

<sup>\*</sup> 青岛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我们认为,“图”“书”之说,乃确有传授,且源远流长。清儒所谓“不该独失”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等,其实西汉初年即已有之。

一、1977年春,在阜阳市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阴侯墓,在出土文物中,有一面“太乙九宫占盘”,《文物》1978年第8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画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按:实与《本义》之“洛书”相符)这是早在汉初或先秦,即已有了“洛书”图形的铁证。

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出土的帛书《易经》,依据《文物》1984年第三期文本,其六十四卦排列顺序与今本《周易》很不相同,它是按八组卦排列的,这八组卦由一种固定格式得出,每组卦八个卦体,共为八八六十四卦。帛本这种以八组卦相重,共八八而得六十四卦的方法,显然出自另一系统。因为今本六子是按长、中、少的顺序排列,其与帛本六子按少、中、长顺序排列全然不同。帛本六子的这种排列顺序,却与北周人卫元嵩《元包》中的六子次序相同,清儒黄宗羲认为《元包》体现了“《归藏》之旨”(《易学象数论》卷四“元包篇”)。帛本与《元包》六子排列顺序相同,再加帛本六十四卦的卦名,又有两个与《归藏》有关(今本《咸》卦,帛本称《钦》,《归藏》亦称《钦》卦,今本《临》卦,帛本称《林》卦,《归藏》称《林祸》),因此,帛本《易经》亦应有“《归藏》之旨”。《归藏》成书时代,虽无确证,但前人以为是殷人之《易》,再加它以《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尚残存着母权制社会的特征,因而很可能是一种较古的本子。

然而,若考之被称作“先天图”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以下简称“方图”),我们惊奇地发现:它也以《坤》卦居首,且六十四卦方阵中竖向的八组卦,其每组卦的八个卦体竟与帛本《易经》每组卦的八个卦体完全相同!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更使人惊奇的是:位于中分六十四卦方阵两条对角线上的十六卦(每条对角线八卦),它们在帛本卦序中,皆与相对应的另一卦差三十二卦,即差六十四卦之半,如在《乾》《坤》两卦形成的这条对角线上,《乾》卦在帛本卦序中为第一卦,《坤》卦即为三十三卦;同样,《艮》卦第九卦,《兑》卦即为第四十一卦;《坎》卦为第十七卦,《离》卦即为第四十九卦;《震》卦为第二十五卦,《巽》卦即为第五十七卦。而在《泰》与《否》形成的另一条对角线上亦同。

更为有趣的是:在“方图”《泰》《否》对角线上互相对应的八个卦体,《否》《泰》皆居《乾》《坤》两组卦的第二卦,就是说,《乾》居帛本第一卦,《否》即第二

卦,《坤》居帛本第三十三卦,《泰》就居第三十四卦。而《损》与《咸》皆居《艮》《兑》两组卦的第四卦,如《艮》居帛本第九卦,《损》即为第十二卦,《兑》居帛本第四十一卦,《咸》即为第四十四卦。同样,《既济》与《未济》皆居《坎》《离》两组卦的第六卦;《恒》与《益》居《震》《巽》两组卦的第八卦。很显然,在这条对角线上,对应的每对卦,随着它们排列顺序的由外向内移动,它们在帛本每组卦中的位置呈二——四——六——八之递增。

“方图”与帛书《易经》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这些妙合,无可辩驳地提示了它们乃同出一源。据此所考,“河图”“洛书”及先天图等,汉初乃至战国时代早已有之。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因此,我们作为今人,理应责无旁贷地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对这些古老的《易》图及数字,重新作深入的研究发掘与整理。

金文杰先生,积四十年之功力,誓而不辍,以惊人毅力撰成《大易探微》,承蒙吕慧鹃先生最早将此稿给我,初读之后,感到确有师传,再读方知“理玄”篇之精,三读而将“管窥”“灵犀”诸篇互证始渐入佳境。然亦仅可窥其全豹于一斑!

我以为“理玄”篇应是全书的精华与根本,它寓意于数,运用“河图”“洛书”之数以推演《易》理。金先生以“一”为本,认为理源于一,象基于一,欲探《易》之真谛,必从一始。而寓意于数,始自大易,故《易》之所指者为数。此论正与《系辞》“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合,故这些见解,可谓精审。同时,他认为无文字之《易》——图象乃大易之根本,不仅为有文字之《易》——本经与十翼写作的依据,更是后世许多学术流派取法之源泉,这种观点本为清儒主汉《易》者所不屑,但今天看来,确应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

惟断十翼之文为五篇:“分别为《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及《杂卦传》”,而舍掉《彖》《象》二篇,似有不妥。

然统而观之,在出土史料证明了“图”“书”在中国《易》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今天,《大易探微》以图象求数理的研究方法,无疑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填补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项空白,因此应该予以肯定。

我于“图”“书”之学所知甚少,而金文杰先生一再命我谈点意见,盛意难却,故略涂数语如上,聊以为序。

刘大钧

1987年10月14日

写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大易论集摘要》序言<sup>\*</sup>

1987年12月5日至9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泉城济南召开了“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这次由山东大学主办的易学大会得到了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关怀。这次会议,从参会学者的人数到提交论文的篇数,都是建国以来最为宏大的一次易学盛会,因此,海外学者代表称此会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海内外对这次大会极为重视,香港《晶报》还专为此会发表了题为“国际易经大会的启迪”的社论。

《周易》这部书的一系列精妙思想,始终吸引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阵又一阵浪花。对它的研究,尽管随着时代与社会的演进,其内容不断有所发展与变化,但这部书的传播,在约三千年的漫漫岁月里,却一直绵延不绝,不但没有随着历代王朝的更换而中断,而且它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石峻先生所指出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实为罕见,确属一大奇迹。

为此,今天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周易》这部奇书,为什么能代代相传而不衰?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产生了什么影响?基于此,本次大会就是以“《周易》与中国文化”为主题召开的。

《大易论集摘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了这次大会的论文摘要及其他有关的资料与报道,使当时其情、其景、其人、其言带着自己时代的印记而有所留存。为此,毕群圣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除对资料作认真负责的辑集外,又一一进行核对校正。作为国内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大会,可以预见:这些可贵资料肯定有极重要的价值。

此书问世,得到友谊书社的大力支持。社长赵耀堂先生明察其价值所在,不计一时之功利,毅然决定付梓。美国康奈尔大学倪策教授闻知会议的所有资

<sup>\*</sup> 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12月第1版。

料将汇编成册,由友谊书社出版的消息,来函称赞:“真乃盛事也。”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参加大会的所有中外学者,对友谊书社诸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年12月20日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大易集成》前言<sup>\*</sup>

经过三年艰难筹备,《周易》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5日至9日在济南隆重举行。

这次在孔子故乡召开的大会,举世瞩目,产生了重大影响,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余名学者专家及部分民间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一百二十九篇,专著八部,国外及中国港台的十几家大报均以显著版面对此会作了报道。香港《晶报》并专门为大会召开发表了“国际易经大会的启迪”的社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周刊海外版及《大众日报》等十余家大报及《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史哲》《周易研究》《中国哲学年鉴》等许多学刊亦皆以重要位置对此会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新闻联播”中以重大新闻播发了大会的实况,从而使会议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从大会和分组发言及参会论文专著的内容看,近几年《易》学研究有了明显进展与深入,有的虽然还是传统的研究课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突破——尽管这些突破仍然是有争议的。如关于易卦起源及《周易》形成过程的探讨。在这个传统题目上,此次会议基本有四种观点:

(1)易卦源于筮数。前几年,有人曾提出甲骨文与金文的奇字是筮数,并认为六个数目字一组是重卦,三个数字一组是单卦。这一假说虽然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但人们很快发现:它只能解决六位与三位奇偶数图形的问题,而那些商周甲骨和青铜器及周秦器物上出现的四位(包括五位)线段所组成的图形就无法解释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沿着原来的假说继续前进,为了解释这些图形也是卦的问题,他将这些图形与汉代人扬雄的《太玄经》作了对比,指出这些甲骨器皿上的四位图形与《太玄经》四爻组成的“玄卦”相类。它们与六位奇偶

<sup>\*</sup>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数排列组成的《易》卦同源而不同支:“玄卦”非扬雄所创,殷周时代四位奇偶数排列组成的“玄卦”早已产生,因而四位“玄卦”可能始于周初。

当然,对于这种大胆的假设,我们还需要更小心的求证:因为若卜骨上的数字或线段既非四位或五位,而是十位以上,如扶风齐家村西周遗址采集到的一零八号卜骨,乃由十三位与十二位数字组成,这又是何卦呢?《系辞》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八卦源于筮数,这是可信的,但若认为这些商周器皿卜骨上的数字或线段一律都是卦,我以为尚需作进一步慎重的考证与研究。

(2)易卦起源与半坡鱼纹有密切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河图”源于半坡文化后期,八卦起源与半坡鱼纹有关。

(3)易卦起源与天文观测有关。承袭测候派的传统观点,有人提出,“太极”标志阴阳消息的一个大周期。“两仪”表示年内阴阳消长的两个重要标志,即“二至”。“四象”则是“二至”加上春分、秋分。“八卦”是再加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有人发挥前人“卦气”说,认为《易》是古人研究日月运行、寒暑递变等一类问题的古代“时序学”,故离不开天文学与历法,也离不开与之相当的数理问题。在汉人“爻辰说”基础上,有人指出,易卦是以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星象为基础拟出来的。所有这些说法,虽沿袭传统立论的故道,却也印下了自己时代的辙痕。

(4)六十四卦先于八卦而产生。有人在武汉会议上提出过这一观点,依据数字卦的假说,本次会议又有进一步论述:六十四卦早于八卦,甲骨文所刻卦画符号为六个数一组,以后由数字卦演变为符号卦。这说明事物及人们的认识也有由繁而简的发展方式,而不只是由简而繁一种方式——当然,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但数字卦目前只是假说,以尚未得到确证的假说作立论依据,似乎稍欠力量。

学者们除以上四说外,对《易》之三要素“象”“数”“理”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周易》的卦爻图象由殷商龟卜之兆(象)发展而来,因象而有数,因数而有理,象中有数,数中有理,象而数,数而象,象而理。有人指出《易》的卦爻象并非出于玩蓍草,可能产生于甲骨上占卜兆纹的走向——显然这是对先儒及冯友兰、屈万里先生源于龟卜之兆说的发挥。更有人说,愈是古老的文字,就与它表示的事物愈相似,卦象的产生经历了“象(自然之象)——数——象(卦象)”的逻辑过程。另外还有多种说法,虽无法一一介绍,但亦多具慧眼之识。



会上对三《易》及不同《易》本的关系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连山》《归藏》与《周易》关系问题,自古至今无定论。这一问题亦是本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指出,史实说明,三代时卜筮并用,筮法非周人发明。殷墟出土的卜骨上有“曰魁”“曰隗”字样,“魁”“隗”皆指土山雄伟而言,恐怕此是有《连山》筮书的实证,这种见解发人深思。而有人对《说卦》进行了探讨,指出《说卦》“帝出乎震”一段文字所叙述的卦序是移动了艮卦位置的《连山》卦序,这种卦序配成的六十四卦与帛《易》相类,都是八组连体卦序。八组连体卦序依据一定的八卦次序相配,是早期的初级卦序形态,而今本《周易》的对偶卦序,摆脱八卦次序的束缚,按照一定的哲学思想排列,是晚出的较高级的卦序形态。《说卦》是古本《易》而非今本《周易》的传注。这一论述告诉人们,历史上曾有不同的易本存在过,而且它们之间经历了一个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迁衍流变过程。当然,有人还是持传统观点,即《连山》产生于夏,《归藏》与《连山》只不过是同一卦系的两种形式,《连山》就包含在《归藏》之中。《归藏》即伏羲《易》的篡改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商至周差不多六百多年的历史。

《易传》在《周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这一传统研究课题仍然在会上引起热烈争论,虽然时值隆冬,会场门窗紧闭,但缕缕新鲜思维空气不断吹来,见解精辟。大多数学者认为,《易传》的产生,标志着它将一整套深邃的阴阳哲理与伦理学说注入了《周易》,对以占筮迷信为基本特征的《周易》起了“脱胎换骨”的功效,《周易》由此成为以原占筮框架为形式,以深层阴阳哲理思辨和社会伦理学说为内容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是的,无论孔子与“十翼”的写作有无直接关系,但他对今本《周易》的最后形成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有的学者指出,孔子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堪称是使《周易》从占筮之书向哲理之书转变的第一人。

此外,有人指出,在《易传》产生过程中,《老子》的思想曾对它发生过重大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

“图”“书”之学自宋明以来盛极一时,并开始形成易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流派。关于“图”“书”之学与《周易》关系,本次会议亦有涉及。有人不同意传统“图乾(天)”“书坤(地)”的看法,指出,“河图”是地之五行的数字表示,“洛书”则是天圆的数学表示。“河图”数阵与《易传》的“天地之数”五十五并无直接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图”“书”之说确有传授,且源远流长。“河”“洛”及“先天图”西汉初年即已有之。1977年春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

中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是汉初或先秦即已有了“洛书”图形的铁证。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卦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相较，二者在六十四卦的排列上有惊人的妙合之处，因而无可辩驳地提示了它们应是同出一源，据此，“河”“洛”及“先天图”等汉初至战国时代应早已有之。有人指出，《易》图代表着道家易，侧重于自然奥秘之源。

本次会议在《周易》经传考释方面也有进展。小到字词的训诂、卦爻辞的阐释，大到《周易》全书的通解，诸种形式在参会著述中都有。如《周易新解》《周易确释》《周易通读手稿》《周易考注新解》及《周易疑难卦爻辞辨析》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新作。这些新作既对传统易学研究作了继承，又补充了新出土的帛书《易经》，同时，亦有以现代知识体系来开拓自己思路者，因此多有创获。

在易学史研究方面，《中国易学史》已被国家教委纳入“七·五”规划文科重点项目，其先秦部分四十万字已写出，并带来部分章节参会。另外，魏晋王弼、两宋欧阳修、张载、程颐与朱熹及明末清初方以智、清末民初杭辛斋等思想家的《易》学思想，都有专门探讨，成果可观。

有人指出，《周易》所阐释的宇宙变化理论和象数思维模式，数千年来对锻炼古代思想家、科学家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起过重要作用。《易》学象数作为一种逻辑思维工具，不妨称为“易学逻辑”。1)天文学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周期，地理学借象数标志分野座标系统。2)历法、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3)针灸、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4)古代乐律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

《周易》与医学方面。有人指出，《周易》本身即有医学萌芽。另有人指出，中医产生于古代，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易》学的哲理及象数思维模式为中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框架，使中医真正成为具有独特而完整理论体系的一门科学。这就是医易相通的实质。还有人指出，医易相通，源远流长。上溯至《左传》所载春秋时秦国医和，已将易理用于医学之中，而最早博取易理以形成医学理论的，当推春秋战国至秦末时期的《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两经对人体、药物的朴素唯物辩证观、整体观等，大多源于《易》。有的学者还就十二经络结构及中医药学中的阴阳学说和临床实验阐述了医易关系，而就“医易相通”“八卦与医学”“八卦与信息”“八卦、太极、河洛与化学元素周期”等问题阐发了个人的见解，立论平实，多有可取。

围绕着对《周易参同契》的讨论，展开了《易》与气功、养身健体（既属体育，又关乎医学）关系的探讨并有极精彩的辩论，吴漱泉先生并作了轻功表演，使与

会者大开眼界。

《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有的学者就《易》与中国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我国近代著名绘画大师李苦禅和黄宾虹,晚年都强调绘画必须学《易》,他认为,中国绘画艺术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绘画艺术,其根源在于《周易》,他从线、面、笔、墨、章法、立意、取象等绘画技法入手,剖析了黄宾虹先生为什么说“太极图乃书画秘诀”。另有人说,中国艺术的特性不在于“反映”“再现”,而在于“写意”。“意”从何来,正来自于《易》,故中国艺术的美学原理导源于《易》。另外,有人对《周易》与陆机《文赋》的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还有人就《周易》与舞蹈艺术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论述,论据翔实,多有新意。

《周易》与现代预测、科学管理的关系。不少学者提出,《周易》是一种预测学。有人指出易学的本质就是一种预测学,这也是为什么它成为一门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学问的根本原因。另有人认为,《周易》可称为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未来学教科书,它是预测未来的方法论。有的国外学者指出,占筮不能仅从浅层迷信方面去理解,卜筮现象背后有其一套合理的逻辑与理论;占卜既是预测又是决策,是预测与决策的统一;它着力的是由现在透视未来,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这样,《易经》就与决策科学存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应将《易经》的这套理论运用到管理决策之中,应提倡中国式的管理,即运用《易经》原理的管理。有的学者则论述了《周易》中的宏观管理思想。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周易》无所不包,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易》乃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活水”的观点,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多数学者认为:《周易》作为“五经之首”“三玄”之一,乃是传统儒学最高深的哲理思辨所在,《周易》所包含的一整套整体观念、系统思想、序列思想、模糊原理、互补学说、均衡原理以及社会伦常观念等,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我们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都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在大会上指出的,《易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是中国文化综合而成的结晶。

在此次会议的讨论中,还有一些观点值得在此一提。如《易传》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周易》重“开物成务”的物质文明建设,《易传》的“盛德”“大业”之论即是“内圣外王”之论。有人考察了《易传》的理想人格论,指出“道”“神”(“阴阳不测之谓神”)“德”“行”在《易传》中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合在一起,从整体上构成了《易传》理想人格的框架。也有人认为:《易

传》开始吸取、融汇阴阳诸学说,一改孔孟等早期儒学多讲社会人生论而少有宇宙观的局面,儒学开始形成一套贯统天人的系统理论。儒家整体宇宙哲学是由《易传》至董仲舒神化儒学这一时期形成的,其奠基者应归属于《易传》。《易传》的《说卦》《系辞》首次明确提出“三才”之说与“三才之道”,它们承前儒之说,于深层哲理的高度上进一步申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儒学的主体人学构架于此大明。另,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易传》与颜氏之儒的关系,本人曾据《易传》的“诚”与“中”观念,提出过《易传》与思孟学派的关联。而有的青年学者更认为,《易传》强调“时中”“得中”等观念,虽然反映了它与思孟学派的联系,然而它又力主“财(裁)成”之旨,因而又表明了它与主张“戡天”“制天命而用之”的荀氏之儒的相关性。可以说《易传》是介乎“内求(省)型”的思孟与“外进取型”的荀子之间的派别。因此,他认为,单就思想本身而论,《易传》可以说是上述两个学派观点的折中与融通。

《周易》思维模式。不少同志指出,哲学思维不仅可以借助于语言、范畴进行,而且可以通过图象法,通过象数模式进行,《周易》是很好的一例。在此问题上,本次会议所展示的主要成果是“智能逻辑”学说。该同志指出,《周易》提供了多层次思维模式,“智能逻辑”就是根据《周易》思维形式结构而提出的多层次思维的理论。《周易》能够直接体现:形象(经验)思维、抽象(形式)思维、符号(数理)思维、辩证思维和多层次思维。它是各种思维形式、结构、规律及其层次性的综合体现。“智能逻辑”即是据此而提出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科学通往哲学的“立体交叉”桥梁。

代表们就《周易》及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并着重探讨了《周易》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有的海外学者认为,《周易》及中国文化影响而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为中心的多层复杂因素的层层考虑法,而不同于西方究归因果的科学方式。有的学者说,与《周易》的思想传统有关,中国人是包容思想,求得稳定,虽有新的突破,最终还是复归到包容。西方人的思想则是超越、代替、取消的,就是说,假若有了新思想,就把原来的东西取消掉了。有人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观念与《易传》的数的观念进行了对比,在比较了它们的共同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人类思维的发展是同步的;数学与哲学的发展也是同步的。

关于《周易》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问题。除上述有关《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的探讨外,代表们还有总体性的进一步论述。有人认为,《易经》是一种

创造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学说,它所追求的是既是整体又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既是发展又是平衡的人类社会。《易经》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未来性,因而才有其世界意义。它们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再起飞和再发展。因此,我愿着重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易经》与现代知识体系相结合,而不是牵强附会地用《易经》来解说所有现代知识体系,是以《易经》来作为开拓出新的知识体系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使所有新知识体系都归宿于《易经》。

多数代表认为,《周易》与《易》学史的研究应坚持易理与象数兼顾的原则,并实行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综合交叉研究。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合理内容应予以肯定,并且能够使之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同时,现代知识体系亦应当成为易学研究的重要武器,以现代文化学、人类学、释义学等为背景的新的易学研究方法有待于我们去摸索、开拓。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本次会议已取得了初步进展。有人提出《周易》研究的学风与态度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有的台湾学者在阐释了孔子与“十翼”的关系之后强调指出,他之所以重视孔子思想对《易经》的贡献,就是希望能阐明孔子学《易》的真心,传《易》的苦心,使得讲《易》者以义理为先,以德性为重,从而建立一套生生不已的天道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精神上站得住,不为迷信所夺。

以上介绍了部分发言及参会论文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参会论文有的已辑入此论文集,有的限于篇幅尚未辑入,有的发言与文章准备今后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总之,本次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展示了近年来《易》学研究的雄厚实力和一些重要突破,加强了国内外《易》学同仁的联系与友谊,正如成中英教授指出的那样,本次大会“必将成为《周易》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先儒王夫之云:“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我坚信,通过脚踏实地、不尚虚华的持续努力,易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进步,它的一整套精妙深邃的理论必将在新时代大放光彩,易学及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整个世界及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步伐,亦必将加快!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对远见卓识赞助本论文集付梓的北京西城赛普科技开发公司屈宏总经理谨表示由衷的感谢。另外,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诸同仁亦皆参加了本书的校阅,在此一并示谢。

1989年4月26日  
于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

##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序言<sup>\*</sup>

84

龟卜乃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化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周易》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龟卜之学则是这源头的源头。因为《易》卦显然由龟卜演化而来。冯友兰先生指出:八卦就是模仿兆的,八卦与六十四卦就是标准化了的兆。屈万里先生更认定:《周易》卦画乃是参照甲骨刻辞自下而上的顺序,卦象的“覆”“变”和甲骨刻辞的左右对贞、易卦爻位的阳奇阴偶与甲骨刻辞的相间为文等等,有力地证明了《易》卦是对龟卜的因袭。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龟及龟卜的研究,著述甚丰。三代之际,便有专门指导龟卜的“三兆”之学:《玉兆》《瓦兆》《原兆》,类似于三《易》。以至到今天,人们的口语中仍然流传着诸如“不是好兆头”“这是吉兆”之类的说法。不幸的是,龟卜的资料当时可能太多,无缘得到孔夫子的删削整理,于是,它与《连山》《归藏》的命运一样,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因为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且又无法与读书人所求取的功名挂钩,故其学虽在民间流传,但残喘至东汉,其息已甚微弱,至唐,则彻底亡佚。宋元以来,虽时有著述,但无非对前人之说的考辨而已。

本世纪初,随着殷墟甲骨的发掘,很多有关龟卜的第一手资料问世。这些铁证资料撞开了时间的漫长隧道,使龟卜学研究进入全新天地。罗振玉、董作宾等一代大家相继而出,极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建国之后,由于《周易》研究一度处在低潮,故龟卜之研究亦使人望而生畏。进入8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但因龟卜在甲骨学研究中只占一个方面,且是一个较小的方面,所以甲骨学家在其著述中对龟卜只是简单一提,从无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行世。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龟卜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文

<sup>\*</sup>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化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今天随着人们对《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也对龟卜——这种较之《易》学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文化现象,开始渴望有所了解,有所研究。鉴于此,我们“周易研究中心”在制定研究规划时,分工刘玉建同志专门从事龟卜方面的研究,于是有此书的问世。《中国古代龟卜文化》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龟卜文化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系统的龟卜发展史。全书七章,在资料收集上较为广泛,基本已将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有关龟卜的记载全部收录与整理,并作了分析。在检讨史前龟卜发展状况时,刘玉建同志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很可贵的。同时,此书文字通俗易懂,这样,它既可作专业研究者的参考之书,亦可作一般读者的入门之书。因此,我看完这部龟卜新著非常高兴,特作简介如上,聊为此书之序。

1991年7月16日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梅花易数白话解》序言<sup>\*</sup>

《梅花易数》虽托名邵雍所著,实非邵氏之作。案《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术数存目”二,录有宋人所著的《邵子加一倍法》一卷,“天一阁”本:“不著撰人名氏,考二程遗书载邵子与程子言数,程子称只是加一倍法。盖指算数言之,非占验禄命之谓也。此书以六十甲子积数以卜贵贱吉凶,亦以加一倍法托之邵子,殊相矛盾。杨慎《丹铅录》曰:‘张横渠喜论命,因问康节疾,曰:先生推命否?康节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康节之言如此,今世游食术人,妄造大定数、蠡子术,托名康节,岂不厚诬前贤?则妄相假借,其来已久矣。”

由此介绍可见假托邵雍之名而出书,“其来已久矣”,宋时已有之。而《梅花易数》一书,考之朱彝尊《经义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皆未见著录此书,故此书或为明人所写,甚至可能为清朝康、乾以后之人托名写成。

此书虽为后人托名邵雍写成,但在民间流传甚广。因为它将《周易》八卦取象随历史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作出了新的归整与推广,从而使《周易》卦象说更趋具体而完备。正因为它在《说卦》之卦象说的基础上,补入了符合当时时代需求的新内容,因而该书才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应予以研究的价值所在。

其次,该书作为易占的一种,它独特完备的易占思想,处处展示出《周易》象数思维的智慧,有的内容确有研究价值。因此,该书虽不见于正史,且为士大夫所不屑,但它那丰富的内容与独特的易占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探索民俗文化,促进易学研究的发展,无疑仍具有很大的价值。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刘光本和荣益同志对《梅花易数》进行了严肃的校释和评析,并参照尽可能多的版本对长期流传和传抄过程中的错论和谬误作了订

<sup>\*</sup>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正,尽量做到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确详尽的版本;在评析部分,还介绍了个人多年学习梅花易的体会,介绍了该书较难、也是其最精到的部分——“外应”的有关知识,以便于读者参考。

易占,作为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化现象,确有重新认识与研究之必要。我看了这部易占研究的新成果,感到很高兴,遂应刘光本、荣益同志之嘱,简书数语如上,聊以为序。

1993年11月11日

于山大运乾书斋

## 《大易集要》前言<sup>\*</sup>

“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在台湾易学界同仁的大力协助下,在学术界前辈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圆满成功。

参加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共计 103 人,其中,台湾代表 38 人,香港代表 2 人,韩国代表 1 人,大陆代表 62 人。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即占 55 人,因此,是一次水平较高的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共收到提交的论文 68 篇,专著 10 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教授雷洁琼女士,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中国周易研究会顾问、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峻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肖箴父先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才先生,江西大学校长、教授陈正夫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朱德生先生,黄山文化书院院长钱耕深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陈来先生,台湾老一辈学者、辅仁大学名誉教授严灵峰先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陈启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华夏书院,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分别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电与祝贺电话。尤其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以古稀高龄,冒酷暑亲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翟永淳先生与张明山先生代表省市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第二天,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教授亦赶至大会发表了精彩的讲演。

在此,借大会论文集出版之际,我代表首届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向给予本次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各单位,各位来宾,以及学术界的同行先生们,

---

<sup>\*</sup> 齐鲁书社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女士们,向积极协助我们共同开好本次大会的代表们,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次大会在“《周易》与哲学文化”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学术问题:《周易》的经与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易学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及经济建设,易学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关系,以及易学研究的方法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加本次大会的各位代表,无论是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还是在其他形式的交谈、争论中,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相互启发,显示出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极为活跃和热烈。尤其是,因为我们两岸易学界的同仁,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大家能坐在一起,利用比较长的时间,相互讨论问题,尚属首次,所以,我们心心相印的同胞之情,充溢于会议的始终,使友情与学问十分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会议的情调和热烈气氛。在这种学问加友情的氛围下,本次大会的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升华。而且,参加本次大会的,大都是两岸学有专长,功底深厚的专家、教授,这就使得本次大会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本次大会,会两岸不同单位,不同研究方向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于一堂,一方面顾及到了易学研究中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为多学科交互渗透,进一步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两岸易学研究后继有人的大好势头。

本次大会,在易学研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易卦起源与《周易》成书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指出,天文学是古代发展最早的科学,《周易》的形成,即与天文学存有密切关系,在后世易学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密切关系一直保持了下来。因此,深入开展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生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是打开《周易》形成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学者们认为,从考古发掘来看,数字卦未必早于通行易卦,因在数字卦之前,已有较为完整的通行八卦卦符出现。有的学者还再次提出并进一步论证说,透过对于《周易》成书过程的深入考察,人们将会发现,卜筮未必就是《周易》原书的特色、功能或本质。有的学者又认为,商属于东方文化,周属于西方文化,而夏则很可能属于东北方文化,在中华“积聚式”的文化发展模式下,在夏代产生易卦及《易》,是很有可能。(2)对于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及帛书《系辞》的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对帛书《易经》的有关异文进行了校释。有的学者指出:通过对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的比较,可以看出,通行本《系辞》很可能是一种残本,或者说是一种残本的凑集。有的学者认为,帛书《系辞》在战国后期之前已经产生,或者说至少是战国中期的作品。(3)对

“十翼”的进一步探讨,有的学者提出,《文言》原来很可能有多种。《乾》卦的《文言》,应当说是由四种抄本结合在一起的,《乾》《坤》而外的另六十二卦的《文言》,原来也是存在的,只是在后来又被人们删除掉了。针对《系辞》,有的学者认为,综观《系辞》全文,其作者可能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但仍出于儒家,因《易》主刚健中正、自强不息,而老子则重濡弱谦下、无为自然。有的学者则从道论和太极、太恒说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通行本《系辞》和帛书《系辞》的道家性质,认为《系辞》对于道的论述明显从老子发展出来,但由于体例的限制,其系统性反而不如老子。有的学者指出:《杂卦》,严格说来,不应视之为一种卦序。有的学者则认定,《说卦》与《杂卦》,将是揭开卦序及三《易》形成之谜的重要线索。(4)对易学发展史的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以汉易系统中的荀爽易学、虞翻易学、纳甲说、爻辰说,对魏王弼易学、唐侯果易学、宋周敦颐易学、程颐易学、明清之际孙奇逢易学及现代熊十力易学等,分别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探讨,充分显示出易学研究功力的大大加深。(5)对易学与传统哲学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从总体上进一步认定,《周易》的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有的学者指出,《周易》及易学,对传统的形上学,对于人们的心性修养,皆有精彩的论述。有的学者认为,《易》对类比逻辑及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亦有重大影响。(6)对易学与自然科学及经济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周易》及易学,特别是其象数思想,对传统中国科技,影响至深至巨。像《易》与传统天文学、数学,《易》与中医养生,《易》与古代的都城制度,等等,皆存有密切的关系。在今天,有的学者认为,《易》与电脑、《易》与数学中的矩阵、《易》与环保、《易》与经济计量等,亦皆有其相通之处,并可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7)对易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多数学者认为,象数,义理合一,是《周易》及易学独特的理论模式,因此,对于象数与义理应当兼顾。象数不等于占筮或术数,占筮或术数只是象数的一个分支或末流。当然,象数学派侧重于象数而与自然科学、智有关系,义理学派则侧重于义理而与哲理、德有关系。学者们呼吁,当今易学研究,要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在继承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就需要我们严肃而又积极地去探讨现代知识体系背景下的新的易学研究方法,并且根据易学发展的实际,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以保障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次大会,两岸易学界同仁经过共同协商,特别经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

长邵崇龄先生倡导,决定以本次大会为起点,确立起双向交流的关系。邵理事长并提议明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可能在台北举行,此举赢得代表的满堂掌声。这就为两岸易学界同仁的深入交往,为弘扬中华易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重振中华的德、业,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张瑞凤副省长于四日下午到会与全体代表见面并讲话。八月五日,台湾“中华老庄学会、德行教化学会 1993 年秋季大陆文化访问团”一行 18 人,光临大会,亦使大会增色不少。代表他们的团长杨汝舟教授向大会表达了衷心的祝贺。济南市市长谢玉堂先生,一向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他本人对易学也极有研究,会议期间,谢市长于五日下午在舜耕山庄举行盛大宴会,宴请与会全体代表,并接见了“中华老庄学会、德行教化学会 1993 年秋季大陆文化访问团”全体代表,对访问团表示热烈欢迎,提出了在济南兴建占地 8.8 平方公里的“中华周易园”的雄伟计划,并请全体代表参观了中华周易园园址五峰仙庄。至此将大会气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两岸贤哲同登易学堂奥,辨驳乾坤知造化。

一代飞龙共入象数门庭,瞻识天地任作为。

这是我为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所撰写的一幅拙联,我愿以该联作为此文 ends,更愿以该联表达参会学人对台北“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的殷切企盼。

刘大钧

1994 年 1 月于运乾书斋

##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序言<sup>\*</sup>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当时的易学家与易学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春秋至两汉时期象数易学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初步揭示了象数易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对易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所产生的影响,概略地阐明了象数易学的源流派别、师承关系和主要范畴、思想的内涵,并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现代知识提供的研究方法对每一时代的易学家及其象数思想作出了辩证的和较为客观的评价。可贵的是,忠军同志在书中就象数易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了考辨,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汉人象数易学之可考见者,主要是郑玄、荀爽、虞翻三家,而三家之中又以虞《易》最详,故研究汉易者,必须认真探索虞氏之《易》。虽然虞翻为人偏激,其不满各家之注,多出门户之见,不可全取,但虞氏之《易》,确有所本,赖其“卦变”“纳甲”“之正”“取象”“消息”“旁通”诸说,方可考见汉人易学之一斑。

汉儒以为《彖》中“上”“下”“往”“来”等辞皆指卦变,而欲寻卦变之义,绝大部分出自虞氏《易》,其大旨为,以卦中阴阳分类,除乾坤外,分一阴一阳之卦,二阴二阳之卦及三阴三阳之卦三类。凡言卦变各依其类而归其本,此其卦变之本旨,然依其旨而言卦变,亦不规范严格,如虞氏注《丰》卦曰:“此卦三阴三阳之例,当从《泰》二之四。”注《无妄》却曰:“此所谓四阳二阴,非《大壮》则《遁》来也。”注《谦》曰:“《乾》上九来之《坤》与《履》旁通。彭城蔡景君说,《剥》上来之三。”可见其所归,虽基本本于十二辟卦之消息,但无严格的规范,且又用反卦。所谓反卦本之《序卦》“《剥》,穷上反下”及《杂卦》“《否》《泰》反其类”。如虞氏注《复》卦云:“《剥》反交动。”注《观》卦云:“《观》反《临》也。”注《否》卦云:“阴息乾,又反《泰》也。”此一阴一阳、二阴二阳及三阴三阳用反卦之例。值得注意

<sup>\*</sup> 齐鲁书社1994年7月第1版。

的是,其注《颐》卦曰“反复不衰,与《乾》《坤》《坎》《离》《大过》《小过》《中孚》同义。”故其义不从《临》《观》之四阴二阳之例,可见虞氏卦变说,虽本之于消息,而反复不衰之卦则不在其例。同时,有个别卦不循一阴一阳,二阴二阳及三阴三阳卦之常例。而虞氏又不注明为何不循此例,如有名的虞氏《屯》《蒙》之注,其注《屯》卦曰:“《坎》二之初。”注《蒙》曰:“《艮》三之二。”虞翻此说与荀爽同,可见虞氏斯注本之古说,而以十二辟卦讲卦变方为孟氏独有。若从《坎》《艮》来,则二阳二阴之卦本于六子矣。故虞翻虽五世家传孟氏易学,实亦兼采各家之说。而令人费解的是,其所采之说与虞氏卦变常例有所矛盾,而令后人生疑。如上面所讲《屯》《蒙》之注,张惠言说:“《屯》《坎》二之初,《鼎》《大壮》上之初,实《离》二之初。《蒙》《艮》二之三,实《颐》初之二。《革》《遁》上之初,实《大过》初之二。”张惠言先生在此谈了他对虞氏卦变中不合常例的理解。钱大昕先生又说:“《临》二之五为《屯》,《观》上之初亦为《屯》。《临》初之上为《蒙》,《观》五之二亦为《蒙》,故不从自《临》《观》来之例,于《屯》曰‘《坎》二之初’,于《蒙》曰‘《艮》三之二’也,《遁》二之五为《鼎》,《大壮》上之初亦为《鼎》,《遁》初之上为《革》,《大壮》五之二亦为《革》,于例不当从《遁》《大壮》来,而仲翔于《鼎》曰‘《大壮》上之初’,于《革》曰‘《遁》上之初’,失其义矣!惠愚谓《鼎》盖《离》二之初,《革》盖《兑》三之二也。”钱氏此说乃以《屯》《蒙》注义而推断其他应从六子来。于是他认为虞氏卦变说有“失其义”处。其实,因虞注于卦变之说未全,故后人未能观一斑而知全豹,很难尽考其说,故后儒所研者,仅以可见之常例为本,本人虽多年思之,至今未见其明,故凡个别变例似不必以常例推演以断之,或以变例离析以求之。

虞翻以天干配于诸卦的天体“纳甲”说,愚疑古已有之,今存最早者,见于《京氏易传》,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亦言之。其实质为以月亮之盈亏而明卦象消息。若将其纳甲中的月亮盈亏以图展示之,则显然是一幅宋人先天图,可见先天之图,绝非宋人自造,此又一证也!

忠军同志对虞氏“之正”说进行了详尽阐发,并指出“之正”说得之于荀氏。愚以为“之正”说乃西汉古易正宗,而不仅仅只与荀氏易有联系,如虞注《系辞》之“何思何虑”曰:“易无思也,既济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虑。”注《说卦》之“既成万物”曰:“谓乾变而坤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成既济定,故既成万物矣!”此例甚多,所谓“之正”成既济,反映了汉人认为卦中一百九十二个位之爻皆宜“之正”成既济得位,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以虞氏注《咸》卦之语说,那就是“初四

易位成既济……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以上所举,仅《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书中之一斑。我认为,象数易学是一个应该下大功夫研究的课题,因为其中至今未解的千古之谜甚多,非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决心,是难以写出一部确有见地的著作来的。

忠军同志与我共事多年,其为人不尚虚华,不慕虚名,孜孜求学,积数年之功,终有此书稿问世,我看了这部书稿很高兴,然不可能就其全书所涉猎内容一一作出评价。借制序之机,仅就虞氏易说略述一二管见于此,以示爱之深则望之切也。

1994年5月26日

于运乾书斋



## 《周易古筮考通解》序言\*

尚氏秉和先生为近代著名易学大家,其平生力作乃《焦氏易詁》一书,此书显示出先生对两汉象数易学的深厚研究功底。按照传统路数,举凡易学大家,亦皆精于筮法,《周易古筮考》就是尚先生通过对古代及其本人筮例的辑录整理,阐述了他对筮法筮例的深刻研究与独到见解。

当然,《周易古筮考》中尚氏所作按语,皆为先生高见,而见仁见智,我们未必与之相同。举很有名的“魏管辂为诸葛原射覆”一节为例:“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

尚先生定蜂窠之卦为《震》卦,此解可谓至确,而定燕卵之卦为《噬嗑》卦,本人以为此解恐有智者一失之处。案此卦恐为《小过》卦。盖“含气须变”当为外卦震无疑,而内卦为艮为门庭,故能“依乎宇堂”。此卦外卦为震为长男,内卦为艮为少男,而二、三、四爻互巽为长女,三、四、五爻互兑为少女,故“雌雄以形”也。《小过》卦辞曰:“飞鸟遗之音。”且前人多以《小过》卦之卦形象鸟。因三、四两爻象鸟之身,初、二两爻及五爻上爻四阴多象鸟之翼,故“羽翼舒张”也。

而第三物“蜘蛛”之卦,应是《噬嗑》卦。盖“觳觫长足”,内卦为震为足,震动,故“觳觫长足”。外卦为离为网罗,离为外卦而震居内卦,故“吐丝成罗”。《噬嗑》卦外卦为离为罗网,而二、三、四爻互卦为艮为门庭为宇堂,三、四、五爻互卦为坎为沟渎为隐伏,于门庭宇堂沟渎之处隐伏之,艮又为止而坎为险陷为食,以离之网罗与此相连,故曰“寻网求食”。三、四、五爻互坎为夜为盗为伏,故“利在昏夜”也。所以,“蜘蛛”之卦应为《噬嗑》卦。尚先生以《归妹》卦定“蜘蛛”,盖因忽视“吐丝成罗”之“吐”字,既云“吐”,显然“丝”“罗”在外卦无疑!

\*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若以《归妹》卦定之,则是“纳丝成罗”矣!此恐先生书中智者一失之笔,但绝不妨先生之大家风范。

行笔至此,回想起与《周易古筮考》有关的一件旧事。六十年代,余因敬爱先人射覆之妙,常研究汉人射覆之要,遂致入迷。至七十年代中期,偶与内人谈及此,内人遂以小手帕覆一物请余射之,以验其精,卦得《小过》。余欣然曰:《小过》上卦为震为足,下卦为艮为止,卦象既为足下而止,必袜子无疑!内人笑而开帕示之,令余瞠然:乃半截塑料鞋底也。盖当时生活艰难,穿坏之塑料鞋人们弃前掌取其鞋底粘补于新鞋之上,以耐久也。视其物而思其卦:此物亦为足下而止,但三、四、五爻互兑为毁折,二、三、四爻互巽为进退不果,上之鞋底既遭毁折,则不能再穿,自然“进退不果”,与象奇验!然余仅见内外之卦便妄下断语,盖因术之不精,亦由天资愚钝而无悟也。正如刘光本同志所云:“射覆本身需超人的想象力和全面的《周易》象数知识,以及扎实的卦术根基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因而射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一般人是很难射准的。”

《周易古筮考》乃尚先生对《周易》象数易学穷理尽性后的观象玩辞与观变玩占之作,是娴于《易》数之后对《易》术的阐发。光本同志曾认真研读过两汉象数易学,对《周易尚氏学》与《焦氏易詁》亦下功夫作了深入研究,因而可以清楚地把握《周易古筮考》的本旨。因此,《周易古筮考通解》的问世,一方面为人们阅读《周易古筮考》提供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今人对《周易古筮考》的一部研究专著。我看完这部书稿,又回想起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旧事,遂欣然志之,一则应制序之嘱,二则亦是对逝事烟云的一点寻觅。

1994年6月21日

于山大运乾书斋

## 《周易图释大典》序言\*

宋人治《易》，著作丰富，尤注意“图”“书”的发挥和运用。

所谓“图”“书”，主要指“河图”与“洛书”，是宋人附会并发挥前人注《易》之图而来。这些《易》图又被后人互相附会发明，愈演愈繁，自宋至清，绵延七八百年之久，《易》图据说达到数千种之多，形成宋、元、明、清四代人讲《易》的一支新学派，被称之为“图”“书”之学。

先秦确有“河图”之说，如《尚书·顾命篇》：“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孔子在《论语》中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但这“河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时却无人谈及。《系辞》虽说圣人作《易》则之“河图”“洛书”，《管子》一书亦有提及，但历来讲《易》者，由西汉的施、孟、梁丘、京房、费直，到东汉的马融、荀爽、郑玄、虞翻、陆绩，及至魏晋时的王肃、王弼、姚信、王虞、张璠、干宝等，皆无人讲解“河图”“洛书”是何种形状，唐人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等，在注《周易》时对“河图”“洛书”也没有具体言及。

汉人如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虽曾谈及，亦是一言带过，且说法往往各有不同。另外，《礼记》《淮南子》《易纬·乾凿度》《论衡》《白虎通义》等书中提到“河图”“洛书”，亦是泛泛之言。只有郑玄注《系辞》，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九”与“六”相加为十五，倒合于“洛书”之特点），若依郑注，则“河图”“洛书”的内容，当有文字撰述，恐非仅为《易》图，何况郑玄此说，恐本于纬书，纬书晚出，不可为据。

于是，自宋至今，学人多持两种观点：

一、以为宋人之前，未见其图，《易》图之兴，盖肇始于北宋初年的华山道士陈抟，他通过对《易》理的归纳推衍，制成“河图”“洛书”“先天图”“无极图”等《易》图，以发挥《周易》的象数之学，这些《易》图以《周易》之“卦爻反复研求，无

\*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不符合”，且其阴阳奇偶也“一一与《易》相应”（《四库全书总目》），其图后经刘牧、邵雍、周敦颐、朱震、朱熹等人的推衍、传播和肯定，元明清三代学者的共同推衍发挥，终于形成了易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图”“书”之学。

二、以为宋人之图，虽始于陈抟，但其图乃宋人发挥《系辞》及扬雄《太玄》中的《玄图》和《大戴礼记》的《明堂》及《易纬·乾凿度》之郑玄注文等等而来，这些《易》图虽于《易》有补，但绝非宋人发明。

今人李申先生在作了扎实的考证之后，更指出：“陈抟刻无极图于华山石壁事，令人疑问千重”，基本否定了此说，他认为是“道士们一步一步地把太极图改成了丹图和无极图”（《太极图渊源辨》，载《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

笔者以为，《易》图的兴起，特别是“河图”“洛书”等图，绝不是宋人自造，除了上面考证的资料外，还有至今尚未引起学人重视的两点：

（一）隋唐之前，早已有以《易》图解《易》之著。考《隋书·经籍志》之《易》类书目中，有“《周易系辞义疏》二卷”下注“萧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图》各一卷，又《周易玄普图》八卷，薛景和撰”。

可证以易图解《易》，梁已有之。

在纬书类中，亦载有“《河图》二十卷”，下注“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另有“《河图龙文》一卷”。

《乾凿度》曰：“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于此有一段很长的注文，对九宫作了详细注释。清人胡渭按八卦方位，参照郑玄注文，在其《易图明辨》卷二中列图揭示了宋人“洛书”之“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乃袭《乾凿度》这段文字中，郑玄注《九宫》而得。故先儒以此作为一条很重要的证据，证明了“洛书”乃宋人袭《乾凿度》郑玄之注而造出。

然而，《隋书·经籍志》的“五行术数类”中，已载有“九宫图一卷”“九宫变图一卷”“九宫八卦式蟠龙图一卷”，此“九宫图”“九宫变图”及“九宫八卦式蟠龙图”等，是否即表现《乾凿度》郑注八卦下行“九宫”的易图？宋人是否因为看了这些《易》图，而造出“河图”“洛书”？

（二）如果于此仍有疑问，作为铁证的是：考《旧唐书·礼仪志·礼仪》：“天宝三年，有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东面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为中，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

……”此一段文字记载,足以作为宋人“洛书”乃袭前人“九宫”说而出之铁证。亦1977年春,在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在唐时仍有传授的铁证。

因此,据上所考,宋人“图”“书”之说,绝非宋人自造,唐时于九宫已有“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之说,“洛书”乃袭前人“九宫”说而出,此点已无半点疑义,故以易图解《易》,由来久矣!隋唐之前,早已有之。至于这些《易》图是何时因何故被逐出解《易》之书的,恐怕要从研究文人相轻史入手,估计是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当然,其确切原因,还赖于进一步考证。

《易》图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以图谱的形式去说明和探索《周易》的深奥含义,对于推动后世象术、义理、丹道、中医、堪舆、占筮等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施维同志累数年之功,辑成《周易图释大典》,洋洋百万言,收图约千幅,其中有的《易》图,如《周易阐真》,乃由青城山道观中寻至,可谓不易,从而使读者存一书而可见《易》图发生及发展之大概。故此书的付梓,使我倍感欣慰,仅赘语如上以记之。

刘大钧

壬申年辰月

于运乾书斋

## 《纳甲筮法》齐鲁书社版前言\*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彖传》对文化一词所下的定义。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84—1945)在探讨人的本质时提出的：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即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人则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自觉意义的符号，并以这些符号创造文化。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

作为我们民族智慧结晶的《周易》，最好地表达了这点。它正是通过“观天文，察时变”的手段，将无数信号浓缩转化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八卦符号，并以这些符号为中介，引发出勃勃生机的大易文化之流。而其中的术数之学，正是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外显的八卦符号与内隐的五行生克机理，以便寻找出能够确切再现人类活动能力和动态的公式，并依据这些公式，推断未来活动场面的吉凶。

不难看出，从春秋筮法到“纳甲”筮法，从蓍草演算到金钱演算，正是八卦象数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提供了它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因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人不仅改造外部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不断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内容与生活境界，寻求认识世界和揭示世界的方式。《周易》筮法正是中国古代先贤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提示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在中国，古代人的认识完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周易》筮法的完善过程。

故先儒常赞春秋筮法之古奥而斥“纳甲”筮法之浅陋，常敬蓍草演算之庄严而斥金钱玩占之浅薄，最终总不免有厚古薄今之叹，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今已

\* 齐鲁书社1995年3月第1版。

非古矣！

今天,我们只是先介绍“纳甲”筮法的一般运算方式及部分古今卦例,今后,我们将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试着探索“纳甲”筮法,及其在漫漫历史中形成的这套干支纳入卦体的八卦运算系统。我认为,这种力图再现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生存场面的干支卦体符号系统,所以能长期存在并代代相传,其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并不是凝固的、固态的符号公式,而是一种能积极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动态形式。它以“变动不居”的爻位及卦变,充分表达着事物的可变性与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及创造性。在“纳甲”的卦爻符号中,人不只是对其施加影响的主体,而且是这些卦体的创造者,是演卦过程中的创造性本源。它既有象征客观力量的“日”“月”“六神”,也有象征人事的“六亲”,它以“进神”“退神”“元神”“忌神”等方式,显示出卦体与占卦人之间、“日”“月”与“用神”“世爻”之间主客体统一的趋向。以“岁君”“月将”“日辰”及“飞”“伏”诸神的方式,体现出古人的不断求索。而这种求索认为:卦体是事物和人的行为在时间上的连续统一体,是人与神、主观与客观取得时限联系的渠道,是保障人的安全与吉祥的最佳咨询方式。我们不妨将这些卦体看作是折射占卦人个体心理的抽象物,它作为八卦符号信息系统,常常成为人们总结过去、改变现在、瞻视未来的动力。这些卦体的负荷量很大,包括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知识、风俗习惯及自我价值的表现等等。总之,它提示了人类文化内容的诸多层面,并成为这些层面的综合者、总结者。因此,“纳甲”卦体作为“周易”符号文化的体现者,既正面提示了“人文化成”的本质,又对其诸层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作了各自不同的概述——当然,这些概述的见仁见智,要通过解卦人来完成,因而也就为诡辩、迷信与妄说留下了广阔的驰骋余地。这些,我们会在后面古人的卦例中多有发现。

## 《纳甲筮法》齐鲁书社版后记<sup>\*</sup>

最近几年,关心《周易》的人多起来了,但若说真正形成了《周易》的研究热,恐怕还远非如此。譬如,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看,对易学发展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对易学中某些专人、专著、专题的研究,对新出土的易学资料的研究及中外易学研究方法论的比较等等,都还做得不够。有关这些方面真正有分量的书和文章,见到的很少。那么这种“热”又是从何说起呢?

首先,“热”的起点应该说始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1987年十二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周易》研讨会。大会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皆作了详细报道。那次大会的圆满成功,不仅体现在专家学者们充分交流讨论了易学研究的课题及方向,同时,由于对会议的广泛宣传,亦引起了国人对《周易》研究的关注与重视。可以说,那次大会是近年来国内《周易》热的一个起点。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出现了对易学进行严肃认真研究探讨的可喜局面,同时也出现了不太令人满意的现象:会议不久,利用人们注意《周易》研究的心理而自称破译《周易》千古之谜的人便出现了。先是自称“破译八卦千古之谜”者,继而是破译“河图”“洛书”者等等。但不久这些“破译”者随同其“破译理论”很快归于沉寂。

尔后,“热”的真正支点——“预测学”出现了。“预测学”实际上是讲的《周易》筮法,更具体地讲,乃指其“纳甲”筮法(其次还包括“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等等)。在先秦,《周易》确实是一部“卜筮之书”,正因为如此,当其他儒家经典在秦火余烬中找到自己梦床的时候,它却能逃过那场暴政与愚昧合燃的大火,而“传者不绝”。如《左传》《国语》中曾记载了很多条《周易》的筮例,而且每条筮例似乎都得到了事实的验证。但到了西汉,人们把《周易》列入经典,成为“五

<sup>\*</sup> 齐鲁书社1995年3月第1版。



经之首”“大道之源”，甚至它的本名《周易》亦感到叫着不恭了，因而改称《易经》。可就在这一片恭敬抬举声中，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它的经文自身与其占筮功能被人们悄悄地分割开了。其经文的训释讲解之书被放在《汉书·艺文志》的“凡《易》十三家”中，排在五经榜首。而其谈筮法的内容却进了“蓍龟十五家”“杂占十八家”，排在“历谱”“五行”之后，地位大大下降！很显然，这是儒生们或出于文人相轻的恶习，或出于对当时方士的排斥与打击而做的手脚。然而，从西汉到明清，这种分法却一代代被沿袭下来。如清朝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周易》的经文象数之著，放在“经”部《易》类，而其研究占筮之书，则进入“子”部“术数类”。故而直至今日，人们贬抑占筮，恐怕一则是出于对某些江湖术士借此骗人钱财的气愤，二则亦是这条历史长廊的回声，仍在人们的记忆中起着作用。

占筮成为“预测学”之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与兴趣，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有肯定者亦有否定者，有认为应从学术角度予以研究者。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在给八七年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曾说：“我有个建议，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来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认为：“《周易》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它的占卜方式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把国内外有关少数民族或原始民族占卜活动的资料拿来，与《周易》的筮法进行比较，一定会比古人发现更多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周易》筮法的特点，从而对《周易》研究有所突破。”（《周易研究》1992年第1期）

对筮法持否定态度者又分两派，一派干脆认定《周易》乃哲学典籍，其与占筮毫无关系；另一派则感到《汉书·艺文志》中已经讲到“易为卜筮之书”，不承认其与占筮的关系，似有不妥。于是认为占筮为糟粕，经文才是研究之正宗。

若依笔者蠡测之见，《周易》占筮作为一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确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若一味进行贬抑，则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故笔者不揣卑陋，就目前成为人们注意焦点的“纳甲”筮法，试着作一点浅薄的介绍与探讨，并就其运算机制，提出个人的看法。此文聊名之曰“筮法漫话”。不料文章在《周易研究》发表后，反响强烈。广大读者纷纷来信表示：作为一份学术刊物，其内容虽应以理论研究为主，但也要“数”“理”兼顾。这样，笔者只好连续写下去。因文中增加了过去讲授“纳甲”筮法时的一些教材，故改名为“纳甲筮法讲座”，在《周易研究》上连载。付梓前，此稿才正式定名为《纳甲

筮法》。

笔者认为:我们研究筮法,绝对不能仅仅以一个明白占筮之道的术士标准要求自己,而要以一个“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的君子德风去探索其渊蕴,研究其人事之终始,并进而体验“生生之谓易”的伟大境界。我认为易学正是以其卦体的生生不已,而不是以万古不朽阐释了我们的世界,这就是它的眼睛为什么永远是警醒的缘故。如果我们时常想到它那警醒的眼睛,我们就能以老实客观的态度去仔细认真地研究易理,求索其占筮的运算机制,进而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发古人所未发的全新探讨——这是时代对我们的需求,也是学术良心对我们的要求。

由前人筮书看,几乎书中所有卦例都是百分之百地得到了验证。由此观之,自然是能算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现实中我们经常占而不验,显然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

- (1)古人的这套运算机制,其本身就有不严密、不完备与不准确的地方。
- (2)演算者个人技术有问题。
- (3)来占者心存叵测。

据此,笔者以为:占之而时有不验是绝对的,占之而能得验只是相对的。故古今筮书中,凡宣称自己所占之卦皆百分百得验者,基本上可不必置信。

拙文中所依据的资料与卦例,有一些是笔者六十年代研习“纳甲”筮法时所作的笔记。因当时条件所限,笔记中部分资料未录下卦例的出处,致使今天拙文中部分卦例未能指明其出处,望读者见谅。

行笔至此,三十多年前的情景又来到眼前: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小屋,我与大弟在唯一的方桌上读书或做功课,而小弟则在方桌下的小桌上写作业。母亲此时或忙于家务,或坐在床上构思着一幅幅望子成龙的美好图画。逝事如烟波,三十多年后之今日,老屋已被拆除,而慈母亦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孝但行三献礼

余哀何止六章诗

我悼念慈母的这首挽联,确切表达了此时此刻的心情。当此慈母仙逝五周年之际,我愿以本书的付梓,作为对母亲的纪念,亦是对其无私爱心的一点点慰藉。

刘大钧

1994年11月10日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象数易学研究》(第一辑)前言\*

象数易学自两汉至明清,一直是中国传统易学研究的主流,以至今天台湾、韩国、日本及欧美的很多著名周易学者,仍在认真从事象数易学的研究。鄙人曾在《周易研究》第六期“告读者”中宣示我们的研究宗旨说:“我们主张:传统的易学研究方法,当然应该保留,并要在更高层次上展开。”正是抱着这一想法,在倡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对《周易》的研究,不可割断历史的咽喉,更应注意传统易学的研究。所以,《周易研究》学刊创办九年来,我们发表了很多有关象数易学研究的文章,还将另一些研究文章收入《大易集成》《大易集要》两论文集内。同时,我们周易研究中心更聚集和组织人力,对这一传统的研《易》方法作出专门探讨,成果已初步展现;继林忠军同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问世后,刘玉建同志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王新春同志的《周易虞氏学》亦将于近日付梓,王兴业教授完稿的《连山归藏研究》更将象数易学的研究推至夏商时代。我于十年前写成的《虞翻〈周易注〉校释》,亦将修改补充后付梓行世。

两千多年来,象数易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易学研究的主流,其根本原因在于:《周易》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有自己所特有的八卦取象。先儒认为,八经卦及其相荡而成的六十四别卦之卦象,是《周易》研究的核心与本源。故《系辞》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而《周易》古经的全部经文,即六十四卦卦爻之辞,只是在“圣人设卦观象”之后,才“系辞焉”!也就是说,象数易学认为所“系”之“辞”,与所“设”之“卦”及所“观”之“象”是有直接联系的。象数易学正是通过对所“设”之卦与所“观”之象的探讨,来辨析其所“系”之“辞”的。因此,由两汉至明清,象数易学始终是《周易》研究的主脉与根本。例如由《汉书·艺文志》之《易》类中所载“《古五子》十八篇”,下注:“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这显然是西汉人以象数注《易》之作。故由两汉至明清,以至民国年间,象

\* 齐鲁书社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数易学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进入本世纪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仍有很多《易》学家严格按照传统的象数《易》学研究方法治《易》,如尚秉和先生于焦氏易学的研究,徐昂于虞氏易学、京氏易学的研究,皆堪称一代大家。尤其是尚氏的《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徐氏的《周易虞氏学》《京氏易传笺》等,皆能发古人所未发,令人敬服。

随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疑古风起,人们对《周易》作者,成书年代,《周易》十篇传文是否孔子所作,及其成书年代等等,皆提出了疑问。学者们通过大量考证,基本上否定了某些传统的立论。特别是在这个时期,随着现代科学的传入,又形成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相交叉的研究,因而确立了“科学易”的地位。这些,都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尽管《周易》某些传统立论受到人们质疑,同时也出现了以哲学、史学与训诂学等等解易的新方法,但传统的研易方法,此时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占有主要地位。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破坏,形成对传统易学研究的全盘否定,以至于很多青年人,竟然不知道两千多年来代代相传的象数易学,究竟是何面目了!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冲破禁区,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尚秉和先生以象数易学注易之作《周易尚氏学》,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以传统治《易》方法来解《易》的著作。作者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术功底,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使人们看到了《易》学研究的博大精深,故而此书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拙著《周易概论》,鄙人在书中对传统的象数易学研究方法,首次作出介绍与肯定,应该说,这是建国三十七年来,第一部正面出来肯定象数易学研究的著作。之后,学界此类研究文章不断出现,并被发表在《周易研究》及其他学刊上。经过十年的学术倡导与人材聚集,今天,传统的象数易学研究,已成为当今学界很多学人,特别是青年学者的专门研究课题。而有关汉、唐及宋、元、明、清诸易学大家的象数易学著作,又不断被出版部门再版行世,这亦对传统易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顺应此大好形势,并促其健康发展,我周易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人力物力,编辑出版《象数易学研究》专辑,初步确定每年一至二辑,每辑三十万字左右。

作为今人,依衬着现代文化科技的广阔背景与高大天幕,我们对前人象数易学的研究,绝不是要全盘继承过去,因为早在西汉时代,《汉书·儒林传》中已

讲到孟喜之诈及蜀人赵宾之饰《易》文为“非古法”，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象数易学，并不是要回到汉人那里去，更不可堕入个别前人那“饰《易》文”而“非古法”的五里雾中去。

我们今天编辑此书的宗旨是：恢复象数易学研究，将其纳入现代人的研究视野。从整理易学经学史的角度入手，对象数易学中的一些专人、专著、专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以求述其条贯、明其通例、释其凝滞而伸其亡阙。在探赜索隐，掇拾丛残而振其堕绪的基础上，先力求显微阐幽，还其本貌。然后经过认真探索，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研究评价。我们要继承的，是象数《易》学中的精华部分，我们绝不主张今后研究《周易》经文时，要恢复前人那种一字一句，一事一例，内在微末，外及小芥，一切皆求之以象的做法。前人对易象折析求证，侧测穷极地繁琐研究方法，我们今天可以研究，但并不倡导。

我们的举措与主张，得到学界前辈的坚决支持与热情鼓励，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台湾学者孔德成先生、严灵峰先生等，闻知此举，立即寄来亲笔题辞，热烈祝贺《象数易学研究》专辑的创办发行。他们认为：只有认真继往，才能更好地开来。因此，这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史上的又一盛举。

面对学界前辈及同仁们的支持、扶正，鄙人又一次想起了朱熹的“泛舟”诗，当年，我曾以此诗祝贺 1988 年《周易研究》学刊的创刊发行，时隔九年，我愿再引此诗祝贺《象数易学研究》专辑的创办发行：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愿借丙子年汪洋潇洒的“子”水，使《象数易学研究》的“艤艫”巨舟，沿着传统易学研究的古老思想河床，“中流自在”地传承过去，衔接霞光满天的未来！

刘大钧

1996 年 2 月 10 日

于山东大学老校运乾书斋

## 《泰山画册》前言

泰山,古称大山,又称太山、天孙、岱山、岱宗、岱岳、东岳及五岳之长等,为我国五岳之尊,雄居济南、泰安之间,总面积426平方公里。主峰天柱峰位于泰安城北,海拔1545米,因而被汉武帝赞作“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李白更有“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间”的诗句,至于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更成为妇孺皆知的赞誉泰山名句。

东方为万物生长、初春发生之地,因泰山地处东部,故称东岳。《易》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同时,依汉人“卦气”说,震又主春,因而泰山成为化育万物的吉祥神圣之山。泰山在五岳中,高度仅占第三位,但古人为何将泰山定为“五岳之长”呢?近人虽多有论述,但鄙人以为皆未说中其要。泰山雄踞东方,以《周易》之“后天八卦”方位排之,如前所述,为震卦方位,而《周易》之《说卦》篇云:“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因泰山在五岳中居长子之位,故为“五岳之长”也,因此而为“众山所仰”,享有“五岳独尊”的殊荣。

因其位于万物所出的春来生发之地,兼之山势磅礴,通天拔地,故自古以来,历代帝王皆升封泰山。《论衡·书虚篇》:“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因此,起源于夷人、殷人的封禅之典,成为泰山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仅秦汉以来,就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汉章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清康熙、乾隆更是多次到过泰山。正是历代帝王的登封告祭活动,确定了泰山的崇高历史地位,使泰山的圣名更加昭著于世。历代著名文人学士也都慕名而来,留下数以千计的著述、诗篇和题字。因而使泰山以其悠久的封禅活动和文人的咏赞,而构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泰山文化区。而泰山的宗教文化,更给这一文化区增添了异彩,因为从历史上看,儒、道、释三教皆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泰山经历了三教兴起、繁荣与衰落的全过程,为泰山留下了丰富的宗教文物景观。特别是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泰山老母”,即“泰山老奶奶”更使泰山道教圣

地碧霞祠的名字，远播到齐、鲁、秦、晋、冀及京城诸地，每年都有大量善男信女前来朝拜。而“泰山石敢当”也是在民间流行甚广的神话，此神并无具体形态，只以石条刻“泰山石敢当”五字，立于民宅房舍之基，驱邪镇妖。这些泰山神对民间文化与民俗的形成，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上所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故郭沫若先生说：“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

泰山的自然景观在“五岳”中以“雄”著称，其山势雄浑峻拔于齐鲁丘陵之上，主峰巍峨，层峦叠嶂，有“一览众山小”“群峰拱岱”之势。苍松翠柏、溪泉云雾使得泰山既有秀丽的麓区、静谧的幽区、开阔的旷区，又有虚幻的妙区、深邃的奥区。有“旭日东升、黄河金带、云海玉盘、晚霞夕照、隆冬雾凇、天门云梯、碧霞宝光、石坞松涛、云龙三现、盛夏冰洞”十大奇观，恰似一幅天然山水画卷。故国务院于1982年命名泰山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把泰山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泰山是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山，她的形成历经了太古代至新生代各个地质时代的演变过程。泰山岩石主要有片麻岩、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统称泰山杂岩。这些杂岩大约生成于24-25亿年前地壳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地质时代——太古代。而今日泰山的诞生，则是中生代晚期（距今1亿年左右）燕山运动和新生代（距今6-7千万年）喜马拉雅山运动的结果。泰山植被茂密、河溪纵横、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又是一座天然宝藏。

千百年来，泰山与黄河、万里长城一样，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人们崇拜它，因为它雄浑、壮丽、深邃、高大。它以自己独尊的方式，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而轶北恒。然而，它更以自己的保合太和、中正祥瑞之气，化育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因而，才在人们心灵的深处，留下如此久久的、久久的回音……

丙子春  
于运乾书斋

## 《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序言<sup>\*</sup>

刘玉建同志花费大量心血,在对两汉象数易学资料作了认真爬梳剔抉、钩玄索微的基础上,述其条贯,释其凝滞,明其通例,并提出自己的新见,写成《两汉象数易学研究》。我看了这一当代象数易学研究的新成果,倍感欣慰,遂略述个人之见如下。

我们知道,历来学界对《子夏易传》的真伪,一直多有歧见与争论。刘玉建同志对此问题作了认真查证与辨析,并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同时,就其辑本及传授、《子夏易传》对后世易学家的影响等,亦作了翔实的考察。因为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象数易学中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如“当位说”“相应说”“十二消息卦”“六日七分”及“七十二候”以及“互体”“逸象”等,究其源,皆出于《子夏易传》,故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子夏易传》不仅影响了西汉的孟喜与京房,而且汉魏时期的马融、郑玄、荀爽、虞翻、陆绩、《九家易》以至唐代的崔憬、李鼎祚等人的许多易学思想,亦出自《子夏易传》。”我认为此说极是。鄙人在多年前曾指出:《子夏易传》乃西汉古易正宗。作者正是本着这一认识,对《子夏易传》作了很多显微阐幽的工作。故我认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一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子夏易传》为纲,纲举目张地介绍与发掘两汉象数易学的各家各派之说,使两汉乃至后世象数易学的千流百川汇于《子夏易传》之主源头。然后又沿着这一易学思想的河床,上溯《彖》《象》《系辞》《文言》中的“当位说”“相应说”“十二消息卦”……以证其说确实早已有之。而后再下述西汉孟、京及东汉马、郑、荀、虞诸家,阐明其说确乎乃上有所本而下有所传焉。这样,两汉纷繁的象数之学即可干枝分明地呈于人们面前了。

作者能在前人基础上,对两汉象数易学的各家之言又做出进一步搜集,将其说一字一句、一事一例地收集起来,内在微末,外及小芥,折析论证,侧测穷

<sup>\*</sup>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极。这些考定工作自然是很宝贵与很重要的,但亦不免有时失之于“琐”。尽管有此小失,但《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的付梓,填补了建国之后有关象数易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是当代人对象数易学研究,特别是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故余制序以褒之。

1996年2月6日

于济南东郊

《周易经传白话解》台湾版前言<sup>\*</sup>

112

为《周易》古经作注释的想法,萌发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尚在所谓“文革”时期,环境恶劣,资料缺乏,研究《周易》是绝对禁止的。搜集资料只能在地下状态中进行,所以直至1973年才动笔,中间写写停停,到1976年冬总算完成了初稿,这就是古经译本之第一稿。作为一件毛胚式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满意,就这样放了起来。来到山东大学之后,因开设《周易》选修课之需,遂将旧稿翻出,修改增补,先油印出《乾》至《否》共十二卦的古经注释本,作为教学讲义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六月完成了其余各卦注译的补充与修改,此为第二稿。就在准备订正抄清之际,1984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易》的文章。作为迄今人们所见到的最古《易》本——帛本的问世,在学术界确实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它使人们震惊:帛本不仅有着与今本很不相同的六十四卦卦序,且其卦名、卦辞、爻辞与今本亦颇多不同之处。而对这样一部西汉初年的古本,是视而不见,将原稿抄清交付出版,还是重新补入帛本所提供的一些重要内容?答案自然是后者。于是,放下原稿,开始了对帛书《易经》的认真学习与探索。当时尚无任何今人注本可供参考借鉴,故而难度较大。不久,中间插入了一项为虞翻《周易注》作校释的工作,这工作费时近两年才完成。所以直至1987年底,才大部分完成参考帛书《易经》作出的又一次修改与补充,此为第三稿。随后,在林忠军教授的全力合作下,完成了最后一稿的修订与补充。某些部分,忠军教授又重新作了补写,经忠军教授完成的,是谓完整的第四稿。

所以,拙稿是在尽量吸收与参考马王堆帛书《易经》内容的基础上写成,而不是仅仅摘采前人对今本《周易》的现成注解。

\* 大孚书局1997年6月第1版。

拙稿《周易古经白话解》写出之后,我们总感到很不满意。特别是译文部分,基本上没有概括出《周易》古经卦爻辞蕴涵的深意与韵味,深感有负于读者的冀盼。于是想借《周易传文白话解》的完成来弥补一下。当时先做《文言》的《乾》卦,试了几次,发现难度又很大。不但《文言》如此,《彖》《象》《系辞》皆然,其中有些文字所含的意义,虽反复思之,却总感无可名状,难以言喻,只可凭读者本人去意会,难以由笔者来言传,似乎妙就妙在不言之中!所以,对于《易传》来说,如同《周易》古经一样,还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易传》的注译完成后,虽又经两次修改,然因笔者能力所限,仍是一部“言不尽意”之作,切盼广大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指正意见,以便再版之际订正,此为我们首先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易传》对六十四卦的解释,有个别部分与《周易》古经原义不符,因为此书乃为《易传》作注释,故仍依《易传》文义释之。一些前人有争议、且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等等,我们都试着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亦将先儒的一些主要观点详列于上,以便读者自己辨析。至于《易传》十篇的成文先后,近代人虽已定为非孔子所作,亦有人大体上作了简单的考辨,但尚无一个较为完整详细的排列顺序。既非孔子所作,那么,后学在进行整理时,《易传》十篇就必然有个完成先后问题。由于时间距今较久,而汉至宋以前,众口一词定为孔子所作,从先秦典籍中又很难找出结实的佐证,以确定每篇的先后,故我们只好从《易传》各篇的行文用语中,考证其先后,以质高明。但注译时仍按前人传统的先后顺序排列,未敢以个人管见,更动先儒之次序。

第三,在《周易古经白话解》中,笔者曾据《颐》卦之“观颐,自求口实”,“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虎视眈眈,其欲(帛本作‘容’)逐逐”及“由颐,厉吉。利涉大川”等辞,考定这些卦爻辞乃是中国最早相面记录,而在《易传》中,这方面的内容有进一步补证。如以卦象对人的貌相进行总结:《说卦》释巽卦:“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释离卦:“其于人也为大腹。”而《系辞》更通过言辞以判断归纳各种类型的人:“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由此而观之,《周易》经传中,可能确有中国古代相面术的记载,这一看法没有写入注文及总论中,补于此,但愿能引起学者的注意。

最后,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由于拙稿是针对初学者难于读通经传原文而发

的,故译文尽量本着“信”“达”“雅”的原则,力争准确信实地用现代汉语译出《周易》经传原义,尽量体现原著风格与学术韵味。为此,有的经文凡是读者能看懂的,笔者就尽量不译或少译。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最古的一部典籍来说,深入考证探索《周易》经传原义,当然是一件不易的事,但若将这些深奥经文化为浅出的现代汉语,那就往往更难!鉴于这种体会,那时我曾写过这样一幅联语:

经辞难于以言传

神韵自知当心流

故译文虽数易其稿,但直至今日,我们仍不满意,深感有负于读者的期望。然而,令我们感动的是:由于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扶持,今年二月,拙稿之英文版在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并随之售罄。七月,其法文版又在法国巴黎东方出版社出版。而时近岁尾,敝人又接大孚书局傅宝泰先生函,云欲在台湾出拙稿之繁体字版,吾与忠军教授闻之欣然,遂借“前言”略述拙稿之始末如上,并向大孚书局诸同仁顺致谢忱。

1995年12月30日

志于山东大学老校运乾书斋

## 《周易折中》前言\*

《御纂周易折中》(以下简称《折中》)是一本既集宋《易》之大成,又对清儒研究汉人象数易学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易》学巨著。

入宋以来,“图”“书”及“先天图”等出,《易》学复盛,说《易》者至多。然文人相轻,门户交争。特别是明初,永乐帝修《五经大全》,于是有《周易大全》问世。是书庞杂割裂,无所取裁,是一部应付公事之作。书成,风行全国。自此更是群言淆乱。入清,《周易大全》仍是学子习《易》的权威著作,人们奉为经典,不敢有半点变动。笔者曾见一本徐九一先生辑、康熙三十五年“新刊本”的《周易大全》,下署“本衙藏板”,可见其书在康熙时的影响。为了便于思想统治,作为一代明君、“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折中》序语)的康熙皇帝,当然要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能容忍“诸书大全之驳杂”(同上),于是“特修《周易折中》”。可见《折中》的行世,一方面旨在融汇象数义理两大学派于一书,另一方面也是清人对《周易大全》的批判与否定。

《折中》凡二十二卷,由清康熙皇帝御纂,李光地总裁。由书前开列的“诸臣名单”与“职名”看,参与此书校对、分修、缮写、监造的共有四十九人之多,这样连同总裁李光地共五十人,此数大概取“大衍之数五十”之旨。

李光地,字晋卿,又字厚菴,福建安溪人,生于1642年,卒于1718年6月,享年七十七岁。其年幼颖异,力学慕古,据《清史稿·李光地传》介绍,李光地“顺治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案《清史稿》此处实误。考顺治九年为1652年壬辰年,是年李光地年仅十一岁,不可能“成进士”。而《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在介绍李光地《周易通论》一书时,云其为“康熙庚戌进士”。案康熙庚戌年为1670年,即康熙九年,此年李光地二十九岁,中进士是可信的。可知《清史稿》撰修者误将“康熙九年”写成了“顺治九年”。

\* 巴蜀书社1998年4月第1版。

由《清史稿·李光地传》记载看,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李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李光地一生沉浮宦海,多遇凶险,但凭其稳重机智,善以《易》义指导人生,故皆能逢凶化吉。尤为可贵者,乃他曾运用自己的地位,以巧妙的方式,冒险从文字狱中救护过一些饱学之士,如“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清史稿·李光地传》)李光地在当时大搞文字狱的政治环境下,能如是不失时机的扶植、爱护人才,由此可见其人品之一斑!

《折中》一书,由康熙所制序文介绍,乃“越二寒暑而告成”于康熙五十四年春。可知此书之作,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当时李光地已是年逾古稀之人,离去世只有五年,其身体已处于一再“以病乞休”的状况,恐很难如康熙序文中所说的“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我认为,《折中》的主要内容,当是康熙四十四年之后,李光地为侍奉皇帝“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时所已写成。随后皇帝传旨李光地总裁其事,而由专人校对、分修、缮写、监造经两年最终完成此书。

由书前之“引用姓氏”考之,《折中》一书所引用先儒者,计汉有一十八家,晋三家,齐一家,北魏一家,隋一家,唐十一家,宋九十八家,金二家,元二十家,明六十一家,共计达二百一十八家之多。书中尤以所引宋明易学家最多。其中又取汉及宋、明以来诸儒言卦变、互体之说者,可见《折中》一书,虽以阐述宋易为主,从而集宋《易》之大成,但其互体卦变诸说又对清儒研究汉易,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介绍此书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折中》释《易》,虽奉旨“以《本义》为主,次及《程传》”,再辅以“集说”“总论”“案语”等。但李光地在“集说”“总论”中尤能博采众家之说以“折中”商榷程朱之言,这点正是“力学慕古”的李光地总裁《折中》一书最为可取之处。且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即与程朱之说有分歧,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在介绍李光地之《周易观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不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传》《本义》脱误之说。”并赞其:“盖遵信古经,不敢窜乱,犹有汉儒笃守之遗。”《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赞语,明赞李光地,实亦暗示程朱以上诸说有“窜乱”之嫌,可见乾隆

年间复古风兴起之后,学人们对程朱《易》学的批判态度。

《折中》一书确能兼容并蓄众家之说,时时以“集说”“案语”及“总论”的方式,提出与程朱不同的学见,有时甚至称程朱之说为“世儒”之说,而批评反驳之,因而使《折中》的确起到了“融分朋立异之见”的作用。现按该书之内容次序,试将此书简介如下:

《折中》首载康熙帝所制“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一篇,“凡例”简述了皇帝对该书命名、编纂体例及学术倾向所“钦定”的基调:“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原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又云:“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康熙对汉代象数易学持批判贬斥之态度。他说:“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但自焦贛、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最为可贵的是,康熙能以帝王的身份,借“凡例”道出程朱《易》义的本质区别:“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旨趣已自不同矣。”

书名称为“折中”,实因“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传义之外,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足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又参合而研核之,并为折中”。

《折中》于解《周易》经传之外,又附以朱熹之《易学启蒙》,并作“启蒙附论”,“凡例”称此乃“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至于《折中》在解完《序卦》《杂卦》之后,又于《启蒙附论》后面附以“《序卦》《杂卦》明义”,亦“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旨,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

“凡例”后为“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卷首”有“纲领”凡三篇,首论“作《易》传《易》源流”;二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三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持论多引先儒之说,可谓有理有据,平允可靠。最为可贵、也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作《易》传《易》源流”中,《折中》恢复了《本义》原貌,将经与传分编,一从古本。我们知道,经与传的分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史料看,先秦时期,《周易》的经与传是分开的。至汉代,应该说基本上仍未混

杂。至王弼始将经传相杂而成为今本《周易》之编次。此后又有很多学者对《易传》作了进一步分割。然而,历史上很多有见识的学者,已反对分传附经,力图恢复《汉书·艺文志》所称“《易经》十二篇,上下经及十翼”之原貌。朱熹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据吕祖谦本的经传编次而作《本义》,将经与传分开,恢复了“《易经》十二篇”之原貌。

我们今天透过历史的帷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之《本义》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著作。从内容上,他敢将“河图”“洛书”“先天图”“卦变图”等象数内容放入书中,“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康熙《折中》序语)。从撰写体例上,又恢复汉人十二篇古《易》之旧,故此书一出,依据中国文人相轻时,打不倒对方就捧,捧起来是为了更好地摔伤而后打倒的一贯战法,于是即有人以朱子之学出自程子为理由,在捧的同时,董楷接着便作《周易传义附录》,离析《本义》编次,而从程氏《易传》编次。程氏《易传》乃王弼本编次,由此可见,当时分传附经派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其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恶劣!至明初《周易大全》又取董氏本等为底本,故仍沿其误,并因了“钦定”而广为流传。以朱熹的地位、声望与影响,其书之编次原貌,竟然会在整整有明一代被人离析曲改,而李光地本人撰写的《周易观象》十二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乃仍用注疏本”,就是说,也只得仍用王弼本。他并不敢将经传分开,只是“光地尝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请复用朱子古本”。可知李光地也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巧妙地运用政治力量,借康熙皇帝的威势,假编《折中》之机,才总算从体例编次上忠实地恢复了《本义》原貌,而后乾隆《御纂周易述义》,又遵《折中》之体例编次,这是对分传附经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对此,我们作为今人,应该在这件事上给予李光地以积极的评价与肯定。《折中》认为:“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后汉诸儒作注,始合经传为一耳。”《折中》编者言此的根据仅是《三国志·魏志》中魏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的那段话,淳于俊虽说“郑玄合《象》《象》于经者”,但并未明确言其以何种形式去“合”,及“合”到什么程度,而由其上下文之语气看,淳于俊只是作为一种见解,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且费氏《易》兴起之后,东汉熹平石经之《周易》即“经传分列,不相杂厕”(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故《折中》虽主东汉人“始合经传为一耳”之说,但我们以为还是以定反对象数的王弼本为今本之始较为稳妥。

在“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中,编者偏信初上无位之论,以至有失之偏颇之处:“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



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

然而笔者以为:《文言》所云“贵而无位”,是与“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并说,此处乃阐理而非指其爻位,同样《象》释《需》卦上六云“虽不当位,未大失也”真意亦在释“不速之客三人来”为“不当位”,只因能“敬之终吉”故而“未大失也”,此亦非指爻位而言。且《系辞》已说得很清楚:“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大小者,存乎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如上下无位,何来“上下无常”“周流六虚”之论耶?

对先儒《易》义,编纂者认为:“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在此,《折中》编纂者一再强调朱熹的观点:“《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本义》的终始,贯穿于《文公易说》的终始,亦贯穿于《折中》的终始,直至今天,不是还有这种“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的今人吗?可见历史总是在重复。只是岁月流逝,时代的大河中不时泛起新的“今人”:当然,昨日之“今人”,已不同于今日之“今人”,而今日之“今人”,又不同于明日之“今人”——尽管“今人”的面孔不断变换,然而像这样的老调子,却总是唱不够,也唱不完的。

在“纲领三”之“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中,编纂者引用朱熹之言道:“《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所论读易心得,亦可谓精审。在论及“先天图”时,编纂者又引朱熹之说指出:此图非朱熹、康节、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

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传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其论亦可谓中肯可信。

“卷首”所列《易》之“义例”，分为“时”“位”“德”“应”“比”及“卦主”数端，亦可谓得卦义之本。“时”“位”“比”“应”“卦主”皆须以“德”统之。然编者或许为了讨好皇帝，过于渲染正爻之尊，以致“位”重于“时”。论及“卦主”，虽然“卦主”之说始于王弼，而由《彖》释无妄卦“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思之，先儒或有此说，而《折中》编纂者进而将其分为“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并对六十四卦之“卦主”进行了全面分析。《折中》编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卦主”，恐怕主要是为了给皇上看，故所言之主，绝大多数为五爻。而有的卦，“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各不相同。如于兑卦：“兑之二阴亦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则三五也。”这样，兑卦成卦之主有二爻，主卦之主亦有二爻，一卦即有四个卦主了。若一卦四主二从，其于理于义皆不妥。故有的卦，数爻并主，益增其繁，不合“易简之善配至德”之旨。

《折中》于《周易》经文的解释，首录《本义》，次列《程传》。然后是“集说”与“附录”（“附录”较少）。再后是“案语”，此为编修者所加，多有精彩之笔。最后是“总论”，但并非每卦之后皆有“总论”。

《本义》《程传》此处我们无需介绍了。“集说”广采各家之说，其引《朱子语类》自不必说，引汉晋诸儒，以王弼之说为多。而作为汉《易》代表的虞翻，相比之下引用较少。且即或引用亦不取其“月体纳甲”之说。如注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等，绝不取虞氏“月体纳甲”说，只偶取其卦变说。案“集说”多取有新义者，如释《井》卦九三爻之“为我心恻”，取蔡清之说：“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应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在《折中》中最为推崇朱熹，故在“凡例”中定调说：“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李光地虽“奉旨”纂修《折中》，但其学术观点，却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他将与朱熹观点不同的《易》解，多收入“集说”之中。如释《彖上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时，“集说”引王宗传曰：“或曰，《易》家以随自否来，蛊自泰来，其义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为泰否，故随蛊无泰否而来之理。世儒惑于卦变，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来之义，已备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后，又乌有所谓内外上下往来之义乎！”此说亦表达了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因此，他在“案语”中说：“王氏说最足以破卦变之支离，得易象之本旨。”

我们知道，朱熹主“卦变”之说，故在《本义》中列有“卦变图”，图中三阴三

阳之随蛊二卦，自泰否而来。李光地在此借引他人之文称朱熹为“世儒”，并敢批评朱熹“卦变”之说为“支离”，这在当时实为难得。当然，这种批评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纂修者认为“先天图”早已有之，故在释《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时，“集说”引吴澄曰：“羲皇卦图左起震而次以离，‘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润之以风雨’也，风而雨，故通言‘润’。离为日，坎为月，艮山在西北严凝之方为寒，兑泽在东南温热之方为暑。左离次以兑者，日之运行而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运行而为寒也。”

在释《说卦》“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时，“集说”引项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雷以动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项氏此说，极有创见。观乎马王堆帛本八卦之序，正合“逆象”之序也。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集说”在释这段文字时，又引胡炳文之说，以为《说卦》中“天地定位……是故《易》逆数也”及“雷以动之……坤以藏之”此两段文字是言“先天”八卦，而“帝出乎震，齐乎巽……故曰成言乎艮”是言“后天”八卦，而此处一段文字则是由“后天”而推“先天”，他说：“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言‘神’则乾坤在其中矣！”所论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考察“先天”方位，的确大有助益。

纂修者在释《序卦》、《杂卦》时，全引“集说”以释之，不是按照先列《本义》次及《程传》的固定格式，原因是“集说”引《朱子语类》：“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朱熹以为，“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非圣人之精则可”。“集说”释《杂卦》于篇首，引《朱子语类》曰：“三画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画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谓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与六十四同。”

释“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集说”引钱志立曰：“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他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泰、否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除乾、坤外，《杂卦》自比、师至损、益十卦，自咸、恒至泰、

否十卦。”释“井通而困相遇也”一句时，“集说”又引项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而下经亦以咸、恒为始，以此见卦虽以‘杂’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经之首，则未尝杂也。”

钱氏、项氏之说，皆可谓独具慧见。

释“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集说”引胡炳文曰：“《本义》谓自大过以下，或疑错简。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愚窃以为‘杂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备’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先天图’之左，互复、颐、既济、家人、归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过、未济、解、渐、蹇、剥、坤八卦，此则于右取姤、大过、未济、渐四卦，于左取颐、既济、归妹、夬四卦，各举其半，可兼其余矣！始于乾，终于夬，夬之一阴，决尽则为乾也。”

《折中》纂修者在此不仅引胡炳文之说与朱熹错简说商榷，更以“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以互体说“先天图”之左右各互八卦，而“各举其半，可兼其余”以此来论证大过、姤、渐、颐、既济、归妹、未济、夬八卦之所本。纂修者在此公然敢引互体之说以解经，显然与“凡例”之“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的康熙“圣裁”相悖。

释《彖下传》：“渐之进也，女归吉也。”《本义》曰：“‘之’字疑衍，或是渐字。”纂修者于“集说”引毛璞曰：“《易》中未有一义明两卦者，晋，进也。渐亦进何也？渐非进，以渐而进耳！”纂修者在“案语”中进一步解释说：“曰渐之进也，以别于晋之进，升之进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皇帝虽已在“凡例”中为《折中》一书的学术观点定下基调，但纂修者还是以“集说”的形式，在书中反映出与之不同的学术观点。（当然，这里面自然包含着纂修者的学术倾向）此点，康熙帝恐怕亦会见到，然而并不计较，由此亦可想见其作为一代明君的学术胸怀与宽宏气度！

“集说”之后是“附录”，“附录”亦引先儒之说或辅助程朱之说，或商榷程朱之义，然“附录”为数较少，并非每卦皆有。如“附录”释“大衍之数五十……故再扚而后卦”一段曰：“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挂之一也，扚者，左右两揲之余也……自唐初以来，以奇为扚，故揲法多误，至横渠先生而后，奇扚复分。”“《系辞》言‘归奇于扚’，则‘奇’与‘扚’为二事也。又言‘再扚而后挂’则扚与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义》误以奇为扚，又误以左右手揲为‘再扚’。”“《系辞》以两扚

一挂为三变而成一爻，是有三岁一闰之象，《正义》以每一揲左右两手之余即为‘再扚’，是一变之中，再扚一挂皆具，则一岁一闰之象也。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惟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揲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故圣人必再扚后挂者以此。”

纂修者在此段“附录”后的“案语”中补充说：“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说以为蓍说，引张子之言为据，朱子与之往复辩论，今附录于后，以备参考。”

就有关揲法的不同观点，“附录”引“朱子与之往复辩论”的郭氏说，并在“案语”中说：“张郭之意，是以挂象闰也，今折其中，则挂扚皆当并以象闰。”因为“以天道论之，气盈朔虚，必并为一法。以筮仪论之，挂与扚必并在一处，以经文考之，曰‘归奇于扚’，又曰‘再扚后挂’则象闰者当并挂与扚明矣！”

纂修者这种以不同学术观点折中、商榷朱熹之说的做法是极为可贵的。是故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非一人所专有也。那种因别人学见与己不同而必欲借势以整人压人者，今读《折中》，岂不愧乎？故“附录”在《折中》中虽不多见，然确能辅翼程朱之说，其义不可忽视。

今天，我们在介绍与评价《折中》一书时，尤应引起注意与重视的，当推纂修者在每段经传文之后所加的“案语”。今天看来，此“案语”估计大部分为李光地所加，或至少代表着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案语”中多有极富创见的精彩之笔，亦有沉浮宦海多年后的抒其胸臆之语。我们知道，李光地早年仕途并不顺利，故于《屯》之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下“案”曰：“卦者，时也，爻者，位也。此圣经之明文，而历代诸儒所据以为说者，不可易也。然沿袭之久，每局于见之拘，遂流为说之误，何则？其所目为时者，一时也。其所指为位者，一时之位也……盖《易》卦之所谓时者，人人有之，如屯则士有士之屯，穷居未达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至庶民商贾之贱，其不逢年而钝于市者，皆屯也。”

据《清史稿·李光地传》介绍：“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估计李光地有感于此，于《同人》卦九五爻“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下“案”之曰：“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获上，其中必多忌害间隔之者。故此爻之‘号咷’，鼎九二之‘我仇有疾’，亦论其理如此尔！”于坤卦卦辞后“案”曰：“己无私焉，又何朋类之足云，故必‘丧朋’而后‘得主’也，为人臣者，而知此义，则引类相先，不为阿党，睽孤特立，不为崖异，故《易》卦之爻有曰‘朋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汇’‘以其邻’者，皆‘得朋’之义也。有曰‘朋

亡’者，有曰‘涣群’者，有曰‘绝类上’者，皆‘丧朋’之义也。斯义也，质之文王卦图，孔子《彖传》而皆合。”

再如释困卦卦辞“有言不信”曰：“困者，君子道屈之时也，屈则不伸矣！‘有言不信’，‘信’字疑当作伸字解。盖有言而动见沮抑。乃是困厄之极，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闻言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聪不明’解之，以‘信’字对‘聪’字，则‘信’字当为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行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穷’解之，以‘信’字对‘穷’字，则‘信’字当为屈伸之伸。”

“案语”于《周易》经义多有创见。如于坤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案语”能以几何学之点、线、面、体理论释之，说：“乾为圆则坤为方，方者坤之德，与圆为对者也。故曰‘至静而德方’。若直，则乾德也，故曰‘夫乾其动也直’。大亦乾德也，故曰‘大哉乾元’。今六二得坤德之纯，方固其质也，而始曰‘直’、终曰‘大’者，盖凡方之物，其始必以‘直’为根，其终乃以‘大’为极，故数学有所谓线面体者。非线之直，不能成面之方；因面之方而积之，则能成体之大矣。坤惟以乾之德为德，故因直以成方，因方以成大，顺天理之自然，而无所增加造设于其间，故曰‘不习无不利’。”再如释井卦卦辞“改邑不改井”曰：“‘改邑不改井’句，解说多有错，文意盖言所在之邑，其井皆无异制。”将“不改井”解作“其井皆无异制”。释井九三爻辞“王明并受其福”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乃恻者，祈祷之辞，言王若明，则吾齐并受其福矣！”于鼎卦上九爻“鼎玉铉，大吉，无不利”“案”曰：“此卦与大有，只争初六一爻耳，余爻皆同也。大有之彖辞直曰‘元亨’，它卦所无也，惟鼎是爻亦曰‘元亨’。大有上爻曰‘吉无不利’，它爻所无也，惟鼎上爻亦曰‘大吉无不利’，以其皆为尚贤之卦故也……又《易》中《大象》言‘天命’者，亦惟此两卦，一曰‘顺天休命’，一曰‘正位凝命’。”所论皆可谓妙语连珠。最为重要的是，于艮卦六二爻“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后曰：“此爻‘随’字与咸三同，咸三谓随四，此爻为随三也。”由此段文字，可知李光地精于互体连互之说。盖咸卦九三爻之“执其随”的“随”字，与此艮卦六二爻“不拯其随”的“随”字相同。李光地认为，是因咸卦九三爻便是随卦九四爻（因随卦六二爻至上六爻五画连互而成咸卦），故随卦九四爻才有“随有获”之辞。而此艮卦六二爻，即是随卦的六三爻（因随卦六二爻至上六爻五画连互成咸卦时，其内卦亦为艮也，此艮卦六二爻，正其五画连互而成咸卦的内卦艮六二爻之位，即是随卦六三爻之位）。由此可知，“好学慕古”的李光地，不仅精于汉人的互体连互之说，更以此说注《易》！更知，李光地虽“奉旨”纂修《折中》，然与康熙之

《易》学观并不相同,且更不轻易苟同!他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发表自己的学见,真乃可敬可佩!正因为李光地能以互体连互注《易》于先,《御纂周易述义》才紧随其后,全取互体之说以解《易》矣!既然“御纂”之书皆以汉人“互体”说释《易》,则《折中》在清代《易》学研究上,除能集宋《易》之大成外,其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复萌,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光地不但有扎实的象数易学功底,更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渐》卦上九爻“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李光地“案”之曰:“‘陆’字与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韵,然‘逵’‘仪’古韵实非叶也。意者‘陆’乃‘阿’字之误,阿,大陵也。进于陵则阿矣。‘仪’,古读俄,正与阿叶。《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今人于丰卦,多能认识到它是古人对日全食的一次完整记录,但前人明确完整地提出此说的,应是李光地。他在丰卦九三爻“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后“案”曰:“以实象求之,则如太阳食时是也。食限多,则大星见,食限甚,则小星亦见矣。”

李光地读《易》多出灼见,如于兑卦九四爻“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下“案”曰:“《易》中‘疾’字皆与‘喜’字对,故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则‘疾’者谓疾病也,‘喜’者谓病去也。”于中孚卦六四爻“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下“案”曰:“《易》中六四应初九,而又有取焉者,皆上不遇九五者也。”于《彖上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下“案”曰:“卦有曰‘尚贤’‘养贤’者皆是六五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颐、鼎是也。此卦颐为养义,而六五爻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故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也。”于《象上传》“伏戎于莽,敌刚也”“案”曰:“敌者,应也。若艮言‘敌应’,中孚言‘得敌’,皆谓应爻也。”于《象下传》“其行次且,行未牵也”“案”曰:“《易》中言牵者,自小畜至此,皆当为牵制之义。”于《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先于“集说”引崔憬曰:“言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设卦’谓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并“案”曰:“‘立象’朱子谓指奇偶二画,崔氏、吴氏则谓是八卦之象,似为得之。崔氏说又较明也。”

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使我们明白了:《周易》今本,并不是唯一的传本,我们估计,春秋乃至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可能有多种不同系统的《周易》本子在社会上流传,这些本子从八卦的排列到六十四卦的顺序,都有所不同,其占筮的方法,亦不尽相同,今本只是其中之一。《序卦》的写成,正是当时传授今本



的人,为宣扬今本,鼓吹今本排列的合理性,以与社会上别种编次的《周易》传本相区别。帛书《易经》的出土,说明直至汉初仍有他本流传。李光地虽未见到这些可贵的出土资料,但其《序卦》篇头“案”语,却凭自己深厚的学养,以穿透历史尘埃的慧眼,看到:“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孔子盖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知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

每见俗儒注《序卦》,总是迂曲解说其卦序排列如何高妙有理而不可变动。其实,今本《周易》只是当时社会上的众多传本之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今本凭借孔子作“十翼”的成说,才变成唯一的正统传本,而使其他本子逐渐失传。而李光地在近三百年前已看到:“卦之为序”,有其自身之规律,今本卦序只是孔子以自己对其义的理解来排列的。即“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故孔子所序之今本卦序,只是“所谓举其一隅焉尔”。吁!李光地此见,真不愧一代鸿儒之笔也!

《折中》于有的卦辞传文之尾,又往往附以“总论”。附有“总论”的卦有:乾、蒙、需、讼、履、泰、同人、谦、随、观、噬嗑、贲、复、无妄、大畜、大过、坎、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解、益、夬、困、井、革、鼎、艮、丰、旅、巽、兑、节、小过、未济共四十卦。附有“总论”的传文,有《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及《序卦传》。

“总论”有的仅罗列相关之说而并无所论,有的则于易理有极精到的创解。如蒙卦总论引项安世之说曰:“六爻之义,初常对上,二常对五,三常对四,观之则其义易明。初用‘刑’以‘发’之,上必至于用兵以‘击’之。二为‘包’而接五,则五为‘童’而巽二。三为见二而失身,则四为远二而‘失实’。大约诸卦多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备于中爻也。”革卦总论引龚焕之说曰:“初言‘巩用黄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已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谨审以为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改命’,则事革矣!五言‘大人虎变’,则为圣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则天下为之丕变而革道大成矣!”

应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通读“总论”,发现它与“案语”非一人写成,如前所述,我们已知“案语”作者对朱熹载入《本义》的“卦变”说,持批评态度,称其为



“支离”。而“总论”则以“卦变”说释《易》。如益卦“总论”曰：“熊氏良曰：损益二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来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故泰居上经十一卦，而损居下经十一卦。泰、否、损、益为上下经之对，后天序《易》，其微意盖可识矣！”

于既济卦，“总论”又曰：“万氏善曰：泰之变为既济，否之变为未济，盖既济自泰而趋否者也，未济自否而趋泰者也。故既济爻辞无吉者，以其趋于否也。未济爻辞多吉，以其趋于泰也。否泰者，治乱对待之理；既未济者，否泰变更之渐也。”

依“卦变图”，凡三阴三阳之卦皆自否泰来，“案语”非之而“总论”是之。同出《折中》一书，而“案”与“总论”持论各异，故而恐非出自一人之手也！

《序卦》之尾有一段极长的“总论”，详述今本卦序排列的一些特点，多能发前儒所未发，因篇幅太多，在此即不详作介绍了。

至于《折中》所附之“易学启蒙”“启蒙附论”，此处亦不详作介绍。如“启蒙附论”作图以示“勾三其积九，股四其积十六，弦五其积二十五，合之五十，是大衍之数函勾股弦三面积”。“因而开方，则不尽一数，而止于四十九，此大衍之用也。”亦发汉魏诸儒所未发。

至于“序卦杂卦明义”，于“杂卦”究互卦之源及环互等，此说于李光地《周易通论》中亦有所论述，此亦可作“案语”为李光地所加之补证，所论宏深简括，皆能发古人所未发，卓然成一代大家之言。

另外，《折中》附有大量易图，以见弥纶天地之道。故《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折中》时，将其评价为：“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至于经传分编，一从古本，尤足以正费直以来，割裂缀附之失焉。”

以上介绍，难免挂一漏万，且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对《折中》的评价，从整体看来，我以为《四库全书总目》的以上评语，基本上还是公允的，故拙文如上以述之。

1998年2月19日节交雨水  
于运乾书斋

## 旧学邃密 新知深沉

###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序言\*

128

最近,林忠军同志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又在齐鲁书社付梓了!该书由魏晋隋唐述及宋元,所论述介绍的历代易学大家将近三十人,这些人都是在他们所处时代造成极大影响的人。我高兴地看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生平著作之相关资料,在书中作了积微而著的整理与研究,对一些易学大家及一些易学名著的评价,绝不盲从古人、名人,而是提出自己细缊交感、默识心通的独到见解与研究。

举荀氏《九家易》为例,此书之集者及九家究竟为准,这是历来争论不一的问题。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指出,《九家易》以荀爽为主,九人为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玄共九家。宋代则有人认为“九家”系指汉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氏为之集解。沿着这一思路,今人尚秉和考之更详,并列五条理由以证“九家确为西汉《易》师”,另有清儒如惠栋以为《九家易》为魏晋以后人所撰,其说以荀爽为宗,张惠言遵从其说。近人更有将《九家易》定为六朝人所集者,台湾学者徐芹庭先生考定《九家易》作者“非翟元之子侄晚辈,即其弟子或再传弟子也”。

忠军同志在引了以上诸家之说后,以扎实的考据,“证明陆氏读过此书,故陆氏之言,不可轻易推翻”。并以四条理由,考定《九家易》为荀氏本人及其后人所为。作者引荀注《坤·文言》云:“实本坤卦,故曰未离其类也,血以喻阴顺阳也。”而《九家易》注《坤卦》上六云:“实本坤体,未离其类,故称血焉,血以喻阴也。”两条注文,从行文到内容何其一致,故知当出于一人之学也。书中所列四条理由平允可靠,一扫《九家易》为西汉九师说之谬,对《九家易》这一历来引起争论的著作,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 齐鲁书社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按《经典释文·序录》：“子玄不详何人，为《易义》。注内文，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忠军同志据此考定张氏、朱氏为翟玄后学，《九家易》恐为张氏、朱氏所集。我认为虞翻曾对荀氏《易》有所批评，故九家之内有虞翻，则不可能为荀氏所集，当为后人所集，故定张氏、朱氏是很有道理的。

再举干宝《易》为例，我们都知道，清儒张惠言出于对虞氏《易》的偏爱，其对干宝《易》的评价，有失公正：“故其注《易》尽用京氏占候之法以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运一一比附之，易道猥杂，自此始也。”“其所以为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此皆无与卦者也。”甚至批评干宝之《易》：“奸邪，颠倒，乖舛，说卦之义尽谬矣。”作者针对此书中偏颇之见，在介绍干宝时，指出：“汉儒也有以五行、干支、六亲等说《易》之习，荀爽《九家易》易注就是例证，故说干氏以术数混同象数欠妥。”至于张氏将“易道猥杂”归于干氏，作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干氏取京氏易为象，从功用看，当无异于郑、荀、虞取象，况且郑、荀、虞也并非完全以《说卦》为象，《九家易》与虞氏皆有‘逸象’，这些‘逸象’说到底是根据注经之需要，从《周易》经文、《易传》之文（尤指《说卦》）中衍伸出来的，因此，从象数易角度言之，干氏取京氏易注《易》，当与郑、荀、虞取‘逸象’一样，皆可视作对《说卦》的丰富与发展”。汉儒以象数注《易》，到东汉后期，已走向烦琐与猥杂，尤其是虞氏《易》某种程度上“已从自己内部否定了象数易学，也就是说，虞氏易已经远离了易道”。

忠军同志此见亦可谓中肯公允，确实，当惠言先生讥讽干氏以五行、干支、六亲等说《易》时，何以会忘记虞氏亦有以干支说《易》者！

又如关于周敦颐“太极图”渊源问题在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今人亦有质疑，如有人认为《道藏》中的“太极先天图”根本不是周敦颐之前的作品，并根据“避讳”说推断其序乃后人之作，从而否定了周敦颐“太极图”源于道家“太极先天图”。对此，作者认为：后人在整理前人作品时，常将当时避讳的字改正过来，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例，李鼎祚生活在唐朝中后期，而对唐朝前期的皇帝名字本当避讳，但观现存的《周易集解》却不同。太祖讳“虎”而《集解》有“虎”字，世祖讳“丙”而《集解》有“丙”字，高祖讳“渊”而《集解》有“渊”字，中宗讳“显”而《集解》有“显”字，玄宗讳“隆基”而《集解》有“隆”“基”字。据清人刘毓崧考证，《集解》为李鼎祚在代宗时献于朝。“他没有胆量不避讳皇帝名字，今本不避，是后人所为。”“另一个证据是《道藏》中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按《新唐

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董氏藏书志》及易州碑皆有著录,证明该书为唐玄宗的作品,但该书亦不避“渊”字……这不是玄宗不避“渊”,而是后人所改。”“据史志、读书志所载,此书二卷,而《道藏》本却为四卷,这正是该书为后人所整理改正之铁证!”“以此推之,也不能因‘太极先天之图’唐明皇所制之‘序’中出现‘世民’而否定其图的真实性。”此考可谓扎实有据。忠军同志书中多有此邃密深沉之考,如本书第一卷第二章“焦延寿易学”中之《易林》真伪考,他考定《易林》中之“昭君”与“昭公”实为一人,即春秋时代鲁国之鲁昭公,而非后人所误认为的王昭君,此考解开了焦氏《易林》中的一大千古之谜。鄙人至今读此考据之文,仍如盛暑而入冰室,何其快哉!尚秉和先生穷毕生精力著《焦氏易詁》,然而却未能解开此疑,若先生地下有知,得闻此见,自当雀跃叹息矣!

其实,周敦颐的“太极图”,绝非陈抟、种放之说,其源古矣!考之天体“纳甲”之说,可知先天八卦方位早已有之,正如朱熹所云:“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吾以为朱熹此论可谓平实。《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成列”即是图示,当时如无易图,何以示其“成列”?何以显其“象在其中”?故以图解《易》恐先儒早已有之,《隋书·经籍志》中,除作者指出之“九宫图”云云,以图解《易》之书外,《经籍志》中还记有:“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图。”并云此书已亡。但由此书之名思之,或可对我们今天探知“先天图”等易图的来源,有所启迪。

由今天尚存的资料考之,西汉人主要以气言《易》,东汉人兼以象言《易》。气者,卦气消息之说也,惜乎西汉之《易》至晋已亡,唯存孟喜数语,然由此数语思之,则施、孟、梁丘之《易》盖可想见其大略矣!东汉唯荀氏《九家易》曾示先天卦位,但《九家易》虽知先天卦位,而未作详解,只略有指示而已!或当时此种卦位时人皆知之,因而不必细述耶?

按荀氏注《易》,讲阴阳升降、爻象、卦变、卦气消息,并以互体、世伏、六亲等等说《易》。马融、郑众、郑玄、荀爽等当时皆传费氏《易》,据《经典释文·序录》介绍,费氏《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据此我们可知费氏“解说”《彖》《象》《系辞》《文言》时肯定有阴阳升降及爻象、卦变、卦气消息、互体、世伏诸说,因为称“解说”,必定既有所解,又有其“说”,绝不可能有直抄《彖》《象》《系辞》《文言》于后而称“解说”者。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

佚书》中辑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其内容即以八卦与星宿、干支互相配合以说《易》。而郑玄以“爻辰”解《易》，其以“爻辰”与天上星宿相值，此说不会是郑玄自造，显然传自费氏，而由马融注《彖》《系辞》等，亦可见费氏如何解说《彖》《系辞》之一斑。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注《彖》之“天命不佑”一句曰：“天命不右行。”注《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由此可知，郑玄、马融、荀爽讲《易》应得之于费氏对《彖》《象》《系辞》《文言》的“解说”，因费《易》失传，故其《彖》《象》《系辞》《文言》中的阴阳升降、爻象、卦变、卦气消息及爻辰、互体、世伏诸说，后人不得其系统“解说”而难以知其详矣。呜呼！施、孟、梁丘之《易》亡，两汉《易》之经文“训诂举大谊”已茫然无考矣，费氏之《易》亡，而西汉《易》之传文《彖》《象》《系辞》《文言》之“解说”失矣！自此，易学研究两千余年来，如入漆室之中，吾辈仅因《集解》所存之断文碎义而苦苦探求诸家之说，其于《易》之象数亦只粗得崖略而已！

忠军同志以风华正茂之年，能十余年如一日，埋头治《易》，不受时尚之诱惑而去凑一时之热闹，甘心寂寞，每日于文献之中琐琐辨疑，孜孜求证，积数年之功，终有此《象数易学发展史》一、二卷问世，我读之欣然而望之弥切，故赘文如上以寄其冀。

1998年7月15日  
挥汗记于运乾书斋

## 《大易集述》前言\*

132

继 1993 年 7 月在济南召开“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后,1995 年 5 月又在台北召开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本人率大陆易学代表团一行十人参加了那次在台湾大学成功举行的大会,现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在各方大力协助、支持下,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于 1997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又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召开。

参加本届研讨会的正式代表共计 106 人,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即占 76 人,因此是一次水平相当高的学术会议。本届大会共收到论文 67 篇,专著 30 部,收入本论文集的论文有 39 篇。其余论文将节选后在《周易研究》学刊陆续发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先生给大会写来贺信并光临大会,亲切会见大会代表,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罗国杰先生、方克立先生及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等参加了大会;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先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全国政协常委孔德懋先生,海协会秘书长张金成先生,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先生等出席了开幕式。台湾著名学者陈立夫先生以 98 岁高龄为大会写来两张巨幅题辞,一幅直书“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一幅是“敬祝研讨有新得”。著名学者严灵峰先生、胡自逢先生、成中英先生、程石泉先生、陈启云先生、高怀民先生等也向大会发来贺信、贺电,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先生为大会写来贺辞与贺信。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大会书写了巨幅题辞,李巍、李燕教授等向大会赠画,台湾学者邵崇龄先生向大会赠送了很有意义的礼品,中国河洛数

---

\* 巴蜀书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理学会名誉会长吴明修先生也向大会主办人赠送了“功在周易”的礼盘。日本学者组成以高岛成龙为团长的25人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日本观光助兴团”专程由日本前来参加大会开幕式。

中央电视台一、二、四台及山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皆在要闻节目中为大会作了报导,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大众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报纸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周易研究》《国际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刊物也为大会作了重要报导。

在此,我代表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向给予本届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各单位、各位来宾,以及学术界的同仁先生们、女士们,向积极协助我们共同开好本届大会的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经过与会代表四天的共同努力,本届大会在“大易文化”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学术问题:即“《周易》经传”“象数易与义理易”“易学发展的独特路数与易学研究的方法论”“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易学与现代及后现代”以及“易学与自然科学”。本届大会,在易学研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周易》经传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周易的体系是一种“极数定象、见象明理”的体系,其中包含有天人合一、忧患意识、仁智之道、诚敬之教、时中之用、进修之效一类的精粹思想观念,凸显出人文精神的光辉。有的学者认为《周易》有两种,一为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一为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前者略相当于今本《易》之《大象》,后者略相当于今本《易》之卦爻辞。有的学者指出,卦气说非汉人所创,《易传》中即有明确的卦气思想。有的学者主张,《易》的三才之道具有不可轻估的现代价值,调整、理顺、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心与人身的生态、世态与心态的三态平衡,乃三才之道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之所在。有的学者主张,《易传》的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易传成书于孔子之前,《易传》中的子曰确为孔子语。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55。有的学者还对周易卦爻的变化特点、易经的符号系统、周易的观象系辞等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在象数易与义理易问题上,部分学者对象数学的源流作了考辨,认为《周易》之前象为兆象,数为筮数;在《周易》古经那里,象为卦象,数为爻数;在《易传》那里,象为卦象、取象,数为易数、运数;而在《周易》经传之后,象数之学则经历了复杂的发展与演变。象数是易学的本体和原点,历代解易者,不论是象数

学派还是义理学派,都无法绕开象数。有的学者探讨了易学的源流迁变,认为三坟易不伪;部分学者则对汉末郑玄、宋衷,宋代周敦颐、张载、朱熹,明末孙奇逢,清代焦循,现代熊十力、牟宗三等多位易学家、思想家的易学思想,分别进行了深入独到的探讨,充分显示出易学研究功力的加深。

在易学发展的独特路数与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部分学者主张象数义理合一是易学独特的理论模式,以述为作、融旧铸新是易学发展的独特进路,易学研究应基于此一模式与进路,依衬着中国文化的高大天幕,从易学发展长河的宏大视野下,以哲学史家、思想史家的眼光进行。有的学者认为,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易学研究中要认清以下事实:易学哲学中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哲学建构之别异,并不是两种哲学观点主张之争,而是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向。其中,图书派、数学派、象数派,主要是宇宙论的问题意识,而理本论与气本论主要是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进程,而心本论则是功夫境界论的问题进程。读《易》旨在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在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易学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文化精神品格的塑造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人文化成理念是易的核心观念之一,这一理念对于中华礼仪之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至巨。两岸同仁皆应确立文化中国之共识,开创中国文化的美好未来,以达天地淳和,大道归一。

在易学与现代及后现代问题上,与会学者多数主张,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我们皆应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天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力发掘和弘扬易的和合文化精神。

在易学与自然科学问题上,部分学者探讨了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易与中医、气功,易与天文、历法,易与算术的关系,部分学者则探讨了易对现代自然科学所能发挥的影响,成绩亦相当可观。

为此,我们将这些学见中的一部分,收入此次大会之论文集《大易集述》,以呼应1987年“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之论文集《大易集成》及1993年之“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易集要》,以尽成要述义,推动当代易学发展之旨。

易道生生,理阐天地宇宙万物

气理淳淳,义达自然社会人生



我相信,“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必定会结出更丰硕的学术成果,取得更大的成功!

刘大钧

1997. 12. 10

## 融旧铸新的诠释与研究 ——《周易虞氏学》序言\*

136

虞翻生活的年代值东汉末、三国初,自称五世家传孟喜易学,所撰《易注》上奏汉献帝,并受到当时名士孔融的推崇。虞翻在其奏献帝之书中,及在其《易注》内,点名批评了马融、荀爽、郑玄、宋忠(衷)等人的《易》解,这就为《易注》成书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按郑玄《易注》写成于建安五年(200),而孔融遇害死于建安十三年(208),故虞翻《易注》之写成,自当在建安五年之后、建安十三年之前,我们可约略地估算为郑注写成后二至三年或孔融被杀前二至三年。这样,将此书的完成时间界定在建安七年至建安十一年(即202—206)之间,或当于此相去不远。

孟喜易学讲卦气、讲历法、讲阴阳灾异,代表了当时西汉后半叶易学界的新思潮,故虽遭众人排挤,但在学界声望甚高,于时“博士缺,众人荐喜”,即其证。受此潮流之冲击,即连当时的费氏古文《易》,也不是“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之)言,解说上下经”,还需以八卦与星宿、干支相杂以说《易》。

虞翻易学,虽为继承孟氏《易》,实则对其他各家之《易》亦皆有所吸纳与发展。由于西汉施、孟、梁丘三家之《易》至晋永嘉之乱时均已散失,因此,虞氏易学即成为后人研究汉易的极为重要的资料。三国、西晋时,姚氏、翟氏、蜀才氏之《易注》中,皆能反映出所受虞翻易学的影响,惜乎皆未大显。特别是蜀才之《易》,其所受虞氏卦变说的影响甚深,可见当时虞氏之《易》已远播蜀地。有趣的是,中唐时,又是蜀人李鼎祚,辑录汉唐三十余家《易》著而成《周易集解》一书,其中以所采之虞氏《易注》最为详备可观,故今日虞氏《易》义之得以考见者,惟赖此书之存耳!呜呼!虞氏生于江东,其学却传于西南,此亦数乎?

由于受到王弼义理易学的冲击,魏晋以降,虞氏易学的影响日趋衰微,唐用王弼本,而虞义不见。直至两宋时期,才有学者称引虞氏易说。朱震撰《汉上易

\* 台湾鼎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2月第1版。

传》称引过虞氏之《易》；朱熹弟子林至作《易裨传》，于虞氏易说亦间有采用。然而，只是到了清代，在乾嘉朴学的学术氛围下，虞氏之学才得以大显于世。于时，惠栋著《易汉学》，其中对虞氏易学就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而其所撰《周易述》亦宗虞《易》及荀（爽）《易》。继惠栋之后，张惠言恢而张之，约而精之，阐疑滞、补亡阙，纠其讹舛而成《周易虞氏义》九卷，使虞氏《易》得到了更为系统的整理与发挥。随后，曾钊撰《周易虞氏义笺》，方申撰《虞氏易象汇编》、纪磊撰《虞氏易义补注》，李道平著《周易集解纂疏》，俞樾撰《周易互体微》，皆对虞氏《易》作了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临川人李翊灼，又把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和曾钊的《周易虞氏义笺》汇为一书，并加以勘订，成《周易虞氏义笺订》二十卷，其书功力扎实，对虞氏易学作了进一步整理。南通人徐昂，则撰有《周易虞氏学》及《周易对象通释》，其书补张惠言之不足，且校正其非，诚如台湾学者徐芹庭博士所评：“诚虞氏之大功臣也。”其书所载之六十四卦爻象变化统计表，使人对虞氏随机取象之情形一目了然。徐芹庭博士于台湾五洲出版社所出版的《虞氏易述解》对虞氏之《易》作了更进一步的考索、研究，其中，对虞氏易学之特色及价值所作的十八点总结，尤为精审。

自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陆的易学研究，虽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大致处于低潮。尤其是对于象数易学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鄙人始在拙著《周易概论》中，第一个出来正面肯定象数《易》，尔后，在前人的基础上，于1984年，又开始动笔撰写《虞翻周易注校释》，至八六年尾大体完成此稿。然而，完稿后一压就是十年，原因是，深感自己这部研究虞氏《易》的著作，未能在贯通古今各家虞氏《易》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虞翻卦变说的详尽剖析，使人们洞悉其整体的内在有序的联系。我们知道，卦气说与月体纳甲说是虞氏易学的核心与灵魂之所在，其卦变说的中心，即系以卦气说中的十二消息卦统摄另五十二卦，由前者变出后者。至于其具体卦变方法，则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系辞下》在疏解“上下无常，刚柔相易”虞氏注文时所云：“谓易爻相易，法日月之昼夜，乾三画法天，坤三画法地，爻变常三五、初四、三上上下下相易，如日月之昼夜互在天。”举一阴一阳卦之例，如谦卦注：“乾上九来之坤，彭城蔡景君说，剥上来之三。”此为上三互易之例。再如豫卦注：“复初之四。”此为初四互易之例。依此，二阴二阳卦例中，即有数卦，注或明言来自于临卦，或明言来自于观卦，或明言来自于遯卦，或明言来自于大壮卦。在三阴三阳卦例中，又有数卦，注或明言来自于泰卦，或明言来自于否卦。这些注，显示了虞氏此种卦变

的基本法则。但,另外尚有数卦,或因注文不全,或因与以上卦变法则不符,引起后人之疑,张惠言虽迁曲解说,仍未免陷于穿凿。如虞氏注小畜卦:“需上变为巽。”注履卦:“变讼初为兑。”此种不依其正常卦变法则的卦变方式,究竟当如何作出解释?我们作为后人研究其卦变法则,理应对此提出一种能够超越张惠言等人的新解释,并进而将其合理纳入虞氏整体有序的卦变机制之中。这是我针对虞氏易学所一直在苦苦思考的问题之一。另外,今本卦序、新出土的帛本卦序、卦气卦序以及京房八宫卦序,皆反映了前人对于六十四卦间所蕴示的阴阳消长规律的不同认识,我们可否通过对虞氏卦变思想的再探讨,借以发现并揭开这些不同卦序间所存在的阴阳消长的内在有序联系呢?因为《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而虞氏《易》之最可贵之处,即在于其阴阳消长互变旁通说,此类学说,正与《庄子·天下篇》所代表的先人之易学观相契合。正当我在反复求索这些问题时,新春将他的新著《周易虞氏学》送到了我的案头。在此著之上篇“虞氏易学发微”中,新春好像就我的上述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应“视虞氏为创造性的诠释学家,认识到其对《易》已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并由此形成了一别具一格的‘周易虞氏学’,则他的诠释是否与原典《易》之‘原意’相符的问题,即成为无关大局的‘枝节问题’了,不宜过于纠缠。”接着,他又说:“因此,对于虞氏的诠释,吾人更应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从易学发展长河的宏大视界上,以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眼光,来审视、评判之,既要看到它的缺失与不足,更宜看到它在易学思想、易学哲学的建构(重建)与发展方面所做出的独到贡献。这也是吾人对待一切创造性的易学诠释学家所应持的基本态度。”新春之论是也。虞翻自称师承孟氏,但按新春的看法,虞氏的诠释已属自己的“全新诠释”,这点先儒已有所认识。以故张惠言在《易义别录·周易孟氏》中也不得不承认:“然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盖古人之学,传业世精,非苟为称述而已。”我们若通读虞氏《易注》即不难发现,其说与孟氏岂止“不必尽同”,实则很多地方,都是虞氏自己“全新的诠释”!既然如此,则上面提到的其有关卦变的不合于通常惯例的数卦之问题,特别是其中个别卦例之变不合于虞氏自定卦变法则的问题,似应“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不宜过于纠缠”了!

新春此著,对两汉易学传承、发展与演变之大要作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可贵见解。尤其是他对虞氏易学的主要渊源、具体特色,下功夫作出了自己的可贵探索。而于此著之下篇“虞氏周易注今诠”中,亦多深具功力的精彩之笔。如卷十六他在诠释、疏理《系辞下传》“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

备”之文暨虞注时,有云:“按,末句虞氏断之为:‘则非其中,爻不备。’撰,聚集、編集之謂。《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吴质传注引《魏略》曹丕与吴质书有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此一撰字,即系聚集、編集之謂。中爻,谓除初、上两爻而外的中间四爻。言如果要杂陈各种不同物象,集中显示各种不同品格,辨别是与非,那么缺少了中间四爻是做不到的。中间四爻蕴示着不同物象,昭示着不同品格也。”新春此引《魏略》而解“撰”为聚集、編集,的确更为恰当,发前人之所未发。接着,他又在“新诠”中论说虞注道:“撰德指的是乾,辨即辨别,是指的是阳,非指的是阴。中即正,乾卦六爻,二爻、四爻、上爻不正,坤卦六爻,初爻、三爻、五爻不正,所以(称)‘杂物’,因(三爻之卦)而重叠(成六爻之卦),爻即在其中,所以‘非其得正(之爻的爻辞)’那么爻辞就不完备;道有变动(此变动由爻来蕴示),所以称爻。”此解亦可谓精审。

因此,我一气读完新春的这部诠释、阐发虞氏之《易》的新作,感到十分高兴。当然,书中亦有可商之处。如在下篇卷一疏理乾卦九三爻虞注时,新春有云:“按,西汉后半叶,象数易学异军突起,一些易学家,将天文、历法、节候冶为一炉,建构起一种被称之为‘卦气说’的新易学体系……”读之易使人产生似乎“卦气说”始于西汉后半叶之感觉,其实,“卦气说”不仅如传统所云起于孟喜,用于京房,恐先秦早已有之。此点,我在拙著《周易概论》之“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上)”中,已有详述,兹不赘言。

尽管有此小疵,但瑕不掩瑜,新春这部虞氏《易》之新作,以其扎实的功力和深刻的见解,填补了大陆四十多年来尚无一部虞氏易学研究专著空白。

由于深受极“左”思潮及十年“文革”的影响与毒害,也由于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诸多研究条件的限制,大陆学界的研《易》者,多在《周易》经传及为数不多的几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易》著那里兜圈子(此亦多是为了研究、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需要而附带及之),真正能从事于易学这门专门之学的研究者,真正能精通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之学者,可谓鲜矣!新春以而立之年完成了这样一部可贵的《易》著,对作为象数易学重镇的虞氏易学“在深入契会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诠释,给予尽可能‘客观公允’的评判”,因此,他依衬着当代文化与科技的高大天幕,对虞氏易学所作的这一融旧铸新的诠释与研究,功不可没。故而,欣闻此一专著即将在宝岛台湾出版之际,特予制序以彰之。

1996年5月20日晨于山大老校运乾书斋

《〈三坟易〉探微》序言<sup>\*</sup>

夏商有《连山》《归藏》之书,但后人多认定其卦象、卦义早已亡佚。今所见者,仅残存于各种史料典籍上的片言只语而已。至于宋人所见古《三坟》,人们怀疑此书汉时已失传,至宋忽出,显系后人伪造。多数人既以伪书论之,以致前人对古《三坟》系统完整的研究与整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

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经》出土,引起了学人的极大重视。王兴业先生在探索帛书卦序的过程中,发现了其卦序与古《三坟》卦序之间的继承关系。且帛书《易经》有两个卦名与《归藏》有关,从而证明了《归藏》不可能伪。我在1985年曾指出:帛书《易经》八卦排列次序及其重卦之法,可能由《归藏》系统演化而来(《文史哲》1985年第4期)。王兴业先生以其周密的研究与翔实的资料,不仅证明了这个观点,更认定《连山》《归藏》主要残存资料之不伪。他以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及战国时代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八风图为据,证明占盘上的“君”“将”“相”“民”不仅与伏羲“爻卦大象”相通,更与古《三坟》的《皇策辞》相通,也是《连山》的“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四卦的象与序,从而考证古《易》之不伪。

作者依据帛书《系辞》“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及朱震《汉上易传丛说》所引《归藏·初经》,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的结论:“《连山》八卦组配的原生六十四卦为伏羲的《连山易》,次生六十四卦为帛书六十四卦和‘先天’六十四卦的卦序。”

我认为:《归藏·初经》之“初乾”“初舆(坤)”“初狼(艮)”“初兑”“初萃(坎)”“初离”“初鼈(震)”“初巽”次序,亦是组成帛书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次序,亦是组成帛书《易经》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帛本下卦之排列次序。我们由此可得出两个确凿无疑的重要结论:一、由《归藏·初经》

\* 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之八卦次序与出土的帛书《易经》六十四卦之下卦排列次序相同看,可证之《归藏·初经》绝非伪书。二、反之,《归藏·初经》既非伪书,则帛本《易》与商《易》相通,可证其六十四卦卦序,乃是一种承于上古而早于今本的古老卦序。此亦是对鄙人考定帛本卦序早于今本卦序的又一重要补充。

作者发古人所未发,认为《连山》中的“潜山阴”“连山阳”“物象春”“阴象冬”“阳象夏”“兵象秋”等已经表现出“卦气说”的思想。而《归藏》八卦之“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等,以农作物“归”“藏”“生”“动”“长”“育”“止”“杀”八个阶段表示之,亦与汉人“卦气”说相通。

最早表达“卦气”思想的确凿资料应是《说卦》。《说卦》已明确指出:“兑,正秋也。”又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依“京房八宫卦气”说,震卦“春分”正是《说卦》万物之“出”的时节。巽卦“立夏”是万物出“齐”的时节。离卦“夏至”是万物成长而“相见”(此“见”为现),坤卦“立秋”是万物长大而“致役”,兑卦“秋分”是万物丰收而“悦”,乾卦“立冬”是阴阳二气相薄而“战”,坎卦“冬至”是万物之归藏,艮卦“立春”是旧的一年“成终”和新的一年“成始”。故《说卦》此章,实际记录了古人“卦气”之说,可见“卦气”说由来久矣!按前人怀疑古《三坟》书的主要原因是其文字语言及思想有的不像古人,但正如贾公彦所说,三皇书乃“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既是“仰录”,且《三坟》书在汉时已鲜为人见,仅在民间辗转传录,又未能荣登经典尊位,作者认为在此情况下,传抄中混入抄人的语言、思想是难免的,但不可仅仅据此而将全书论为伪书。我基本同意此种看法。如《气坟·归藏易》中之“木气生”“火气长”“金气杀”及“乾形天”“坤形地”“阳形日”“阴形月”等等,就令人生疑,这其中是否有混入抄人语言、思想之处?尽管马融说过:“《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但此为一家之言,况且即便是按照此说,则“木气生”“火气长”“金气杀”等,亦当属《五典》之内容。因此,若定卦象与五行结合,夏商时代早已有之,似于证据方面,尚稍感欠缺。而“天气归”“地气藏”及“乾形天”“坤形地”等等语言,使我想起《易纬·乾凿度》上的一段话:“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这里的“气变”与“形变”以及“上为天”“下为地”等,与“天气归”“地气藏”“乾形天”“坤形地”相对照,究竟是前者抄后者,还是后者抄前者?确宜深辨。而《乾坤·传》之“天

气垂氤，地气腾氤”亦使人怀疑其与《系辞》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有关系。

尽管有此存疑之处，但马王堆帛书《易经》卦序卦名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确定古《三坟》易的真实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王兴业先生由此入手，对《连山·传》《气坟·归藏易》《归藏·传》《形坟·乾坤易》《乾坤·传》等古易资料进行详细完整的研究与整理，并提出了很多创见。此书付梓，无疑是今人利用最新出土资料，对《周易》之前古易作出系统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古易研究上的一项空白，因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在对某些问题（像对先后天方位等）的理解上，今人多有歧见，作者则仍认同传统易学的观点，此见仁见智之不同，尚可进一步探讨。

读完《〈三坟易〉探微》，已是深夜，手抚此稿，感荷良深：兴业先生与我共事多年，其一生多艰难坎坷。然其刻苦治学，孜孜求解的精神始终不渝。晚年退休，身居大海之滨，本可尽得风帆沙鸟、烟云竹树之趣，却不以渔钓琴书、异鸟奇花自娱，乃抱有病之躯，苦思古易，冥想卦序，每日荷此重负而不得片刻休息，积数年之功，终有此书问世。稿成，再三令余为之制序。余恐却之不恭，遂行笔如上以志之。

1998年5月10日

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三坟易〉探微》补记<sup>\*</sup>

见到此书样稿后,兴业先生即含笑而逝。因此,本书清样由林忠军、王新春同志代为校对,我作最后选校,书前先生之简介,由颜炳罡同志补写。

作为好友,当本书正式付梓面世之日,我将与诸弟子持样书一本至墓前焚之,以告慰先生:书稿之飞灰,当是先生之妙句,其余烬,正可化作先生长眠的梦床。

1999年5月20日  
追记于运乾书斋

---

<sup>\*</sup> 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 《周易概论》巴蜀版前言<sup>\*</sup>

随着本世纪 20、30 年代疑古风起,人们对《周易》古经作者、成书年代及《周易》十篇传文是否为孔子所作等问题,皆提出了疑问。在此影响下,40 年代又有人完全将易象推开,纯以训诂解释《周易》古经。此后,随着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形成《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相交叉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从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视角切入而研究《周易》的论著,因而极大地拓展了《周易》研究的视野。但总起来看,本世纪初至 40 年代,《周易》经传的研究,还是以传统易学的研究方法,即象数义理合一的方法为主,如徐昂于虞氏易学、京氏易学的研究等,尚秉和先生于焦氏易学的研究,皆堪称一代大家。进入 50 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后来 10 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形成对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全盘否定。故由 4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30 年的时间,国内竟未出版一本以象解易的著作,而仅有一两本纯以训诂讲《周易》的书行世,以至于当代青年人竟不知《周易》古经由两汉至明清,代代相传的传统研究方法究竟是何面目了。

1979 年底,鄙人调至山东大学哲学系,为开设《周易》之需,作为讲义,1982 年撰写了这本《周易概论》。在向学生讲授《周易》古经时,我们总不能割断历史的咽喉,于是对历代易学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评介,并在“谈易象”中论证了《周易》古经乃“观象系辞”而来,因而历代通过象数阐释《周易》经文的研究方法绝不可弃。随后,《周易概论》于 1986 年初在齐鲁书社正式出版,本书遂成为建国后第一部正面肯定并简要介绍象数易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尔后,于 1988 年鄙人创办并主编了《周易研究》学刊,该刊作为大陆唯一的易学专刊,海内外发行量达到两万余份,因此,该刊对中断达 30 余年的传统易学研究的接续、恢复与弘扬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过 10 余年的学术倡导与人才培养,今

\* 巴蜀书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天,对传统易学原典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有关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各个方面的研究,皆已步入正轨并全面展开。然而,在十六七年前,当人们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身上尚有10年“文化大革命”的余寒时,当时的研《易》者,多在《周易》经传思想剖析及为数不多的几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易著理论探讨上贴标签、兜圈子,真正有关易学这门专门之学的研究,真正对于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易学作出探索与介绍的文字,可谓鲜矣!鄙人的这部拙著,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对传统易学的恢复与弘扬,算是尽到了一点绵薄之力。故当本书于1986年5月在齐鲁书社初版发行后,承蒙广大读者爱护,1988年元月,该社又出了拙著之再版本。旋于1988年6月本书第三次印刷,但至今仍有很多读者购买不到本书。

巴蜀书社施维同志遂专程来济南,与我联系希望出本书之巴蜀版,以应《易》中“西南得朋”之旨。我闻之欣然:因巴蜀地区自古即有传《易》之美誉!今借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之机,在京对原书文字作了个别的补充与订正,并依巴蜀书社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将六十四卦卦爻辞及其译文附上,同时,对某些疑难卦爻辞依《经典释文》与《四书五经音韵》作了注音,以方便读者,于是,遂有巴蜀版《周易概论》行世焉!

刘大钧

1998年3月15日于北京

## 《孟津龙马负图寺碑文》前言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先儒有龙马负图之说，而龙马负图寺即据此而建。该寺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后几经重修，始有现今之规模。其址位于今会盟镇雷河村，占地四十余亩，该寺北临黄河之烟波风涛，南依邙山之暖云晴雨，寺前图河故道春光留芳，浪抛柳絮，可谓尽得地理之灵秀！夫地灵者必有人杰，孟津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于1993年投资，将原伏羲殿予以整体抬高修复，并在原址上新建山门，后于1999年初，县委县政府又经反复论证，先后四次修订方案，前后投资六百余万元，该寺之重建修复工程于1999年底竣工，至此，一代之宏举伟业始告成矣！

龙马负图寺重修竣工后，孟津易界诸友人更谋划将《周易》经传全文嘱鄙人标点后刻石立于寺中，并命余制前言以记其事。余闻之无限感慨！吁！昔者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求，以天地阴阳之易挹人心之易，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其阴阳消长唯其时而教喻人事进退存亡之理，极大影响了我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并使我中华民族以强劲的凝聚力和巨大的包容进取精神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时至今日，更以“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生生之道，迎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此易道之所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仍前民用教万世！亦其极天地渊蕴究人事终始之故也！

呜呼！有盛世方有龙马负图寺重修扩建之盛举！吾辈躬逢斯盛，何其幸也！

2000年3月10日

恭笔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

## 《易传全译》前言\*

最初为《周易》古经作传解的文字,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由《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解卦曰:“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此段解卦之语,与《易传》中《文言》篇几乎完全相同,且由其口气看,显然在引述成说;另外,《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之“屯固,比入”等卦义亦与《杂卦》及《彖》义基本相同;《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卦例中“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云云,其说亦与《说卦》完全相同。由此可知,专门解释《周易》古经及其卦义的文字,在春秋时代或此之前早已形成。

据史料记载,汉代系统以《易传》解释《周易》经文的,为西汉人费直。据《汉书·儒林传》介绍,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按汉时,经学有今文学与古文学之分,费氏所传,为古文《易》,此古文本成于何时,今已难考,但由其“长于卦筮,亡章句”思之,当尚存古风,起码保存了秦时“易为卜筮之书”的风貌。

因费氏《易》已经失传,故其传本如何以《彖》《象》《系辞》等“解说上下经”,我们已难窥其貌,但既称“解说”,必定对“上下经”既有其“解”,又有其“说”,绝不会直抄《彖》《象》《系辞》等于“上下经”之后,而能称之谓“解说”。费《易》虽已失传,但汉人马融、郑众、郑玄、荀爽等当时皆传费《易》,据此,我们考察马、郑、荀诸《易》的内容,当可考见费《易》之大略。故卦气消息、阴阳升降、爻象、卦变、互体、世伏等象数内容,恐皆为费氏本当时“解说”的内容。举“卦气”为例,我们认为《彖》《象》《系辞》《文言》等作者肯定精通“卦气”学说。也就是说,“卦气”说在《易传》成书年代或这之前,早已有之。不然的话,《象》释《复》卦何以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说卦》何以曰:“兑,正秋也。”依“卦气”说,复主冬至,而兑正值秋。此“卦气”说在《易传》成书时代早

\* 巴蜀书社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已有之的确证。《彖》释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亦因解卦在“卦气”中,其卦与“雷乃发声”“始电”“桐始华”“萍始生”云云相近,故有“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之说。这样的例子在《易传》各篇中甚多,此不一一述之。故今人研究《易传》,除了对先儒已存的注释进行整理外,更要对那些已经失传的“解说”进行显微阐幽的发掘与考证,以求有新的突破。

笔者对以上两个方面虽作了研究,但有关“卦气”等象数方面的内容无法在译文中表达,故此译文本只本着“信、达、雅”的精神,尽量将《易传》原文本意信实可靠地译为现代汉语介绍给读者。人们凭借此书,或可由浅入深,先窥其门户,然后登其堂奥矣!

刘大钧

1998年6月28日于运乾书斋

#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 ——《大易集义》序言<sup>\*</sup>

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千年。这即将过去的最后百年,与新千年的第一个百年,对于我们而言,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跨千年、跨世纪的重大历史时刻,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自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给本次大会的论文集取名为《大易集义》。

本次学术研讨会,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20世纪易学研究的特征;(2)20世纪易学著作和人物的研究;(3)20世纪易学的诠释方法;(4)20世纪易学与哲学文化;(5)20世纪易学与当代科技;(6)20世纪易学与现代化;(7)新世纪易学方法的重建;(8)新世纪易学文化体系的构想;(9)国外易学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发展趋势;(10)其他易学问题研究。

回顾过去,是为了接续过去,开辟未来;而唯有理性、严肃地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就易学研究而言,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关键时刻,理性而严肃地回顾百年易学研究的得与失,成就与缺憾,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易学研究以《周易》经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属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将过去的百年易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其一,转型期。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

众所周知,易学研究并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研究从未中断过,只是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改变,其

<sup>\*</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研究的识见在不断翻新而已。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易学研究却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重大变化:《周易》经传神圣而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动摇了,它不再被视为“大道之源”,不再被看作时下一切学科和学术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易学研究的识见也随之大异于传统的易学研究。

就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而言,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冲撞、交流的深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而不是以“读《易》见天心”的仰视态度,将《周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尽可能客观的研究,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地审视和剖析《周易》与易学,逐步确立起易学学术研究的客观、公允,而非情意性的研究品格与方向。

在研究视野和方法发生如此的重大改变之后,最值一提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的樊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该派以大胆怀疑并否定传统的识见而著称于世,他们对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旧说加以抨击,其贡献在于,对于人们冲破传统学术识见与传统治《易》路数的束缚,对于人们超越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汉学派与宋学派的狭隘门户之见,冷静而理性地重新审视和研究《周易》经传及历代易学,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他们在《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上的某些观点,至今仍是颇具合理性的;他们以史学的视野,考辨出的《周易》经传所反映的当时及其以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史实,仍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当然,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最为突出的,就是因其疑古过勇的重大失误,诱发出人们轻率怀疑传统学说、好立新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的不良研究风气,以致此一负面影响迄今仍未完全消除。

在新旧交替的这一转型期内,易学史研究的新成就也颇值一提。此一时期,真正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尚秉和的《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汉易研究之后的最为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

此外,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的传入,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也成为新



的时尚。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其二,短暂辉煌期。

1949年至6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短暂辉煌期。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景春、高亨、李镜池等人的相关著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不朽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的某些观点虽可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人所公认的。

其三,徘徊期。

60年代中叶至1977年,由于发生了十年“文革”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易学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乃至倒退状态。

其四,恢复期。

1978年至8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恢复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学术研究禁区的打破,正常的易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此一时期,高亨修订再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与《周易通义》、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得以出版。尤其是,这一时期,在考古学领域有了重大发现,此即张政烺根据出土的商周之际青铜器铭文及占卜甲骨上的奇特数字符号的研究,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五,空前繁荣发展期。

80年代中叶至今,易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考古学领域又有新的奉献。《文物》杂志继1978年发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内有《周易》的卦画和卦爻辞)之后,又于1984年发表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释文,揭开了新一轮易卦起源、三《易》问题、《周易》作者及成书年代以及卦序问题深入探讨的序幕。其后,帛书《周易》的传文,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繆和》与《昭力》,陆续发表;近来,郭店楚墓竹简整理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元写本《六十四卦图》重光于世,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简》的即将出版,这就为易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可贵的资料。

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国内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1987

年岁末,首届国内主办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从而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进到空前繁荣发展的阶段。济南会后,1988年,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同年,国内首份唯一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学刊创刊。由本中心主办的这份刊物,立足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培植易学研究的后继人才,把握易学研究的导向,因而赢得办刊严肃、学术严谨的“二严”声誉,对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略尽了绵薄之力。今天参会的代表,有很多人就是本刊的长期作者。

80年代中叶,国内兴起“传统文化热”,“周易热”也随之兴起。但是同时,伴随着又产生了“科学易热”及民间的“算卦热”。“科学易热”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牵强比附的误区,“算卦热”则将《易》视为纯然的算卦之书。其后,“周易热”的偏差,慢慢得到矫正,但至今仍未完全矫正过来。

在“周易热”中,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各级易学学会也相继成立,有力推动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是,198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经民政部批准于1996年成立了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在我们于1993年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上,由原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热情倡议,经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积极促成,自1993年始,每两年一届,在海峡两岸交互举行易学学术讨论会。可以说,两岸之间像这样持续开展的双向交流活动在国内学术界是仅有的,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有力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和两岸学人的相互友情,对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此一时期,逐步突破了建国后易学研究基本局限于《周易》经传及哲学史上少数几位有影响人物的易学思想的局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史研究。先后有多部著作问世。在《周易》经传、易学哲学与文化以及科学易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我们欣慰地看到,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地综合交叉研究易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激活易学研究,赋予易学以全新的学术生命,使其真正融入现代学术和现代生活,找到各种合宜的学术生长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大陆此一时期的易学著作及论文数量颇丰,限于篇幅,兹不介绍。

另外,1949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引人瞩目的。高明、屈万里、李汉三、胡自逢、程石泉、黄庆萱、高怀民、戴璉璋、南怀瑾、徐芹庭、魏元珪、黄沛荣等以《易》名家者的著述,以及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学大师的相关著述,最具代表性。陈立夫、黎凯旋等所创办的易经学会及《中华易学》杂志,张廷荣所创办的中华易学研究会及《易学研究》杂志,包括他们的讲学,对易学的普及与弘扬,做出了特殊贡献。

至于海外的易学研究,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周易学会组织,并有一系列期刊杂志和书籍出版问世。例如,在美国有成中英教授的国际易经学会、史密斯教授创办的《周易网络》杂志,比利时胡扬、李长铎先生主编的《世界太极科学》杂志,法国有夏汉生先生主持的“周易中心”,韩国也有自己的易经学会,德国的易经研究也相当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有影响的《周易》译本有20多部,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本世纪研究的成果。本世纪出版的有影响的论著,美国有成中英先生的《〈周易〉与现代管理学》、钟启禄先生的《周易十六讲》、唐力权先生的《周易与怀德海之间——一场有哲学序论》、卡罗尔·安森的《〈易经〉的哲学》,德国有卫德明的《易经八讲》、《易经中的天地人》,朝鲜有李建昌的《读易随记》,前苏联有休茨基的《周易研究》。日本学者的著作最为丰富,研究的面也相当广泛,如有铃木由次郎的《汉易研究》《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研究》《易与人生》,户田丰三郎的《易经注释史纲》,今井宇三郎的《宋代易学的研究》,鹿岛秀峰的《易经精义》,武市雄图马的《易与自然科学》。日本的帛《易》研究也很成气候,如池田知久的帛易研究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当影响。而中村璋八等的《易纬》研究则取得了很高的成就。20世纪海外易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远不止这些,以上所述,难免挂一漏万。

易学研究当代先进的互联网络结合也是当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目前,有关易学的互联网站大约有3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易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大陆的易学网络,其学术水准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内外的易学研究人员和易学爱好者有必要共同努力,推动易学与互联网络的进一步结合,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简要回顾了百年以来的易学研究之后,我们感慨万千。对于业已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应当感到欣慰,但是,在欣慰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理性地看到所存在的不足,更应当有登高望远的前瞻性视野,由此不足而激发起健康而有成效

地推进易学研究的强烈责任感和神圣使命感。

我们看到,百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易学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基础研究方面,课题陈旧的问题特别突出,出版了不少介绍性、普及性的著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精品力作的缺乏。其二,由于十年“文革”的延误与破坏,老一辈学者相继去世,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部分《周易》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对原典把握不够,理论、方法准备不足,对易学的独特发展路数,对易学中象、数、理、占的内蕴缺乏真切的了解,没能在传统易学的根基上形成一种对易学象数与义理,尤其是象数的正确认识,没能确立起一种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高度哲学性、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相适应的宏大学术视野与学术胸怀,小视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忘记了进入一种专门之学的领域首先必须付出相当的艰辛劳动这一起码的学术常识,违反了厚积而薄发、有所研究方有资格发言这一基本学术规范,在没有真正研究心得的情况下,轻下结论,率出“高见”,致使各种对易学的误解、乃至一些常识性误见堂而皇之地在学界流行。因此,80年代中叶,我在拙作《周易概论》中特别呼吁,要着眼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以象数之学为突破口,深入开展易学的研究。其三,学风浮躁,专人专题的深入研究颇显薄弱,隔靴搔痒式的“急就章”频频问世。例如,对帛《易》的研究,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如若对包括卦气说、卦变说、互体连互说等在内的易学象数之学没有足够的了解,仅从文字层面上探索,那么,对帛《易》的研究特别是对帛《易》中象数内容的研究就必然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度,必然难有真正的突破。其四,易学与江湖术士的占筮之术,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存有种种模糊性的认识,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负面效果,学术界有责任予以澄清。

看到以上的成绩与不足,尤其是看到以上的不足,我们就有了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新千年里,同仁们至少应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坚实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成绩:

其一,易学是一专门之学,而且是一难度颇大的专门之学。我们必须力戒浮躁之风,笃实为学,正确而深入地理解这一专门之学,澄清各种不必要的误见——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误见,建立新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的具有公认学术水准的全新易学体系,使易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使易学这一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奇葩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周易》是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传统哲学文化反过来又滋养升华了易学。当今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症结之一,就是缺乏对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深入了解。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易学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间互动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以期有力带动各相关学科的合理建设与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世界化及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步伐。

其三,确立易学这一专门之学与实际相吻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其四,加强专人专题的研究,注意由点及面,由面及点。

我们深信,在以上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诸位同仁的切实努力,21 世纪的易学研究,必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周易》及易学必将再显其耀人的异彩。

## 可喜的收获 宝贵的启示

### ——《大易集说》序言<sup>\*</sup>

156

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青年学人在“易学与哲学文化”的主题下,着重围绕“易学的困境与出路”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各位讲评老师满怀对于青年学人的殷切期望,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他们的发言一一作了精彩纷呈的讲评。老师们所作的讲评,不仅涉及到对论文观点优劣之评判,而且更进一步向青年学人们指明了布局谋篇等写作技巧与何以治学之基本方法,使他们普遍深受教益。本次论文发表会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土简帛资料的研究。有的同学认为,帛书《易传》相关篇目中,蕴涵着明显的卦气思想,这一卦气思想是与其前的卦气思想一脉相承的,汉代的卦气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善起来的。有的同学指出,帛书《易之义》中,既引入了阴阳、刚柔两对关乎自然哲学的范畴,又引入了文武这对关乎人生哲学的范畴,这就使得《易》不仅有“穷神知化”的天道精微,更有“文武并用”的现实层面的关切。如此,由天道而人道,亦可见其对《周易》解释的多面性,以及《周易》文本所可具有的被解释之活力。

(2)《周易》经传的研究。有的同学借助数理统计中的定量分析法,详细探讨了《周易》古经中断占之辞“悔亡”“无悔”“有悔”的所以然,指出,古经论占富有的人文精神,强调中正之善之美,开示中正、比应是致吉之关键。有的同学坚持考据、义理有机结合的治学理路,在详细占有大量原典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易学史上的正统筮法“大衍筮法”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大衍之数具有内在深层的学理意涵,它之重要即在于以数目的方式表示演化的最初根源状况,也就是它指涉了“太极”或更高的根源,所以理清大衍之数的意涵,有助于我们

---

\* 巴蜀书社2003年6月第1版。

掌握根源。有的同学则专就《彖传》的卦变思想作了剖析,指出,卦变乃是《彖传》内在结构的主体部分,其实质就是依据卦中爻象的变化关系,推明一卦之异于另一卦,是因为其爻与位有变易。有的同学以哲学的视野,论述了《系辞传》的人性论思想,认为这一人性论思想应出现于诸子之后,为杂糅融合、全面整合诸家之论而成。在诸家之论中,老庄只见到人性禀受于天道与物性相同的一面,从而断言人性无善恶;孟子也只看到“继之者善也”的一面,从而断言人无有不善;荀子则只见到人有所不继的一面,从而断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些皆属片面性的各有所见,不能全面揭示人的本性。而《系辞传》的人性观则是由普遍存有的“道”出发,借着顺道而生的善,而体现性本然的面貌,因此它括及这些片面不全的看法,加之整合为另一套完满的天道人道关系,谓之集先秦人性论之大成,亦不为过。有的同学从哲学形上学的角度切入,分析了《易传》中所展示的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指出《易传》为孔子的作品,它为道德的存在提供了形上学依据。在《易传》的学理脉络下,道德的动力来源于天地之大德,即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易传》透过其“尽性至命”之论,实现了对道德功利论的超越,这一超越表现在,它所肯定的人生价值乃在于通过仁义道德的实践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善,从而体现“命”所具有的易道本质。这一过程是不考虑吉凶结果的、非功利性的。有的同学还就《易传》“时”的思想作了掘发,认为《易传》中的“时”有自然之天时与社会之人时两层含义。《易传》的时观念反映了《易传》如下三个方面的思维特点,即象数与义理相即相成,直观整体的时间思维模式,以及借助象数表达的积极能动精神。

(3)易学史的研究。易学史的探讨是本次论文发表会的热点之一。敢于或探究易学史上的难点或开拓易学史中的新领域,是会议的突出特点,充分显示了青年学子学养的提高和难能可贵的学术拓新勇气。具体言之,有的同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汉代易学的核心内容卦气说,揭示了汉易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天人关系基本理念下所彰显出的汉人的独特人文关怀。有的同学从易学哲学的视角切入,探讨了唐代李鼎祚的易学思想,指出李氏《周易集解》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易学思想,反映了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他之重象数而兼顾义理理念下独特的社会人生关怀。有的同学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唐代易学家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指出孔氏是一位颇富原创力的易学哲学家,他在疏不破注的规范下,最大限度地以重义理而兼顾象数的开放性视野,推出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独特易学体

系。有的同学探讨了清代胡煦的易学思想,揭示了其丰富的哲学性内涵。有的同学对清代焦循的易学思想作了剖析,揭示了焦氏旁通、相错、时行义例下的独特易学构架,及其所包蕴的独到人文精蕴。有的同学则对近代象数易学大家尚秉和的易学体系作了相当系统深入的探讨,使尚氏的象数义例、所创易学体系的主要价值得以较为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该同学又相当公允地指出了尚氏易学之不足。有的同学还对汉扬雄、宋程颢、郭雍、徐总干,现代刘百闵的易学作了相当精彩的剖析。

(4)道教、佛家易学的研究。在此领域,青年学人也有较为深入的探究。有的同学剖析了道教重要著述《度人经注》的易学内涵,宋元道教名家李道纯的易学思想,揭示了道教视野下的易学内蕴及易学对道教的影响力。有的同学对明末佛教禅学名家智旭《周易禅解》中的易禅思想作了分析,揭示了禅学视野下的易学内涵及易、佛互动下的学术成果。

(5)易学与逻辑、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的学人探讨了易学的逻辑学内涵,有的同学探讨了易学与古代天文学、医学的关联,有的同学则以现代科学的视野探讨了易学的科学内涵。其间皆不乏精到之见。

总之,本次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成果颇丰,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尤其是会议以青年学人发表论文、专家教授进行讲评的方式进行,使青年学人及专家教授相互促进,皆普遍受益,是一种极好的会议方式,这为开辟一条切实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培养一流学术带头人和高级专门人才、使青年易学研究者能够脱颖而出、尽快成为易学界的骨干的精神,提供了保障。

故当此大会论文集《大易集说》即将出版之际,我以“可喜的收获,宝贵的启示”为名,特制此序以彰之。

刘大钧

2001. 11. 24



## 《易学要籍丛书》总序\*

巴蜀书社施维先生倡议,将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专职与兼职研究人员近年所出较受读者欢迎的易学著作及新著,按时间顺序辑在一起,名之曰《易学要籍丛书》,此丛书首辑有六种,计有:(一)过去在齐鲁书社和巴蜀书社出版之《象数易学研究》各辑中精选出的《象数精解》。此书辑有近人有关象数易学研究的精见,其中如顾伯叙老先生著,中国佛教学会会长吴立民先生以蝇头小楷恭录的《〈序卦〉研究》,乃是自明朝来知德后,对《序卦》研究最有个人创见、最见功底的一篇力作,本人对原作重新作了校点整理,以示钦敬之情。此书孔德成、严灵峰、张岱年、任继愈、季羨林、饶宗颐、欧阳中石诸名家皆为之题辞。(二)本人拙著《周易概论》(附《易经全译》)。《周易概论》一书自1986年首次在齐鲁书社出版后,曾连续再版三次,于1999年又在巴蜀书社出了巴蜀版,现又再版收入丛书,今借序文于此向巴蜀书社诸同仁顺致谢意。(三)张文智等同志校点整理的《周易集解》,其价值非常重要。《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评价《周易集解》一书曰:“今人得以考见画卦之本旨者,唯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贵之宝笈也。”可知此书为学易者所必备。(四)李尚信、施维同志所辑《周易图释精典》一书,为今人研究前人的“图”“书”之学及各种图籍,提供了极大方便,当是一本受到读者欢迎的书。学人常将易学分为汉、宋两大家,可见宋易的影响。宋易除对“图”“书”研究外,多数人视宋易为义理派,这是一个误解。不错,宋代的理学家皆为易学家,但这些易学家亦皆为象数派,此点今人邱汉生老先生早有发现,鄙人于此亦有所述,循此认识而研究宋人易学,进而研究《周易图释精典》一书,必定会有新的识见。(五)牛占衍先生的《周易与古代经济》为今人研究易学开启了新的视角。儒家尽管历来吹捧《周易》,但《周易》卦爻辞称“富家大吉”,《系辞》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

\* 巴蜀书社2004年5月第1版。

非曰义”等等,其思想与重义轻利轻商的儒家还是有距离的。牛占衍先生由此入手,对《周易》中的经济思想及《周易》与古代名著中有关经济问题的资料作了详尽地研究,为今人研究《周易》与企业管理、《周易》与金融调控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因此,该书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六)袁庭栋先生的《周易初阶》功力扎实,是一本下了很大功夫的专著,亦应在此予以称道。

由于成都市天塑文化传播策划工作室诸同仁的努力,本丛书首辑终于得以顺利出版。当此之际,鄙人与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诸同仁都非常高兴,遂应施维先生之嘱,特制短序如上以贺之。

刘大钧

2004年2月18日于山大运乾书斋

## 《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前言<sup>\*</sup>

过去,我曾称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而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今文本《周易》经传出土并陆续被整理出版后不久,战国楚竹书古文本《周易》于本世纪初又面世了!这再次成为《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此两种传本的古文异字,再与阜阳汉简《周易》等其他新出土的《易》学资料所存文字相互补充,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

我们知道,先秦古籍皆由篆文写成,至秦时,文字由旧的古篆文统一为小篆,并出现了新的隶书。至汉代,普遍行用隶书,汉人把古经传上的文字改变成当时通用的隶书进行讲解,这就是经学上的“今文本”,如田何所传之施、孟、梁丘《易》即是。

西汉时,孔安国以伏生所训释今文《尚书》义,考定其壁中所发现的古文《尚书》文字与文义,并将其以隶书抄出,先儒将这一工作名之曰“隶古定”。所谓“隶古定”者,乃“就古文体而隶定之,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

汉代经学研究上的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大事。今、古文学于西汉哀帝之后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他们为争官学的地位,各守门户,互相排斥争斗,对后世经学、史学的研究都造成深远的影响。

“古文”,乃是指当时的古籍,即所谓“古文经”。与之相应,则“今文”是经过经师讲解,使用当时的通行语言和文字,对古籍中的字词及章句作了重新解读的本子,亦即“今文经”。故《仪礼》郑注中之所谓“古文”者,与《周礼》郑注中之所谓“故书”者义同也。其“今文”亦即当时以今文所传之书也。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古文”一词虽指当时古籍,然而当时所传的古文本有一部分已不是原六国文字抄写的古文本,而是经过“就古文体而隶定之”的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古文本,已是“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的“虽隶而犹古”的本子。因为这种文字为“隶古定”文字,经“隶古定”后已与原古文不同,有的仅将原篆书改为隶书。正如我们今天以楷书摹写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上的文字,对竹书所作的摹写整理一样,古文本上的很多文字已经是“就古文体而隶定之”的古文字。因而,《仪礼》郑注中的“古文某作×”,亦并非仅指古文本此字作“×”,亦指此字乃“隶古定”之字,与今文本所用之字不同也,故其“古文某作×”之“古文”实亦多专指其文字者也。今以竹书考之,此例甚多,皆可证郑注之“古文某作×”之“×”字皆同竹书之古字也。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那样:“《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亦郑玄《周礼注自序》所云“二郑存古字,发疑正读之”之义。

汉初尚无今、古文经学之争,且《周易》又为田何一人传之。然而正如《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所云:“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焉。”问题并不仅仅是“同言异字,同字异言”的一师之说有多种异文传本,当时更因各地之语音不同而造成对经文的误解、误读,如《汉书·儒林传》记晁错往受《尚书》,颜师古注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这种因各地语音不同而记录师说时发生的错讹,他经亦当有之。因帛本时代并无今、古文经学之争,人们以隶字凭乡音随意记录师传,致使各种典籍因文本不同而多异字。至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焉”,此后“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遂成为后人研究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之一,成为界定今、古文的权威本。尝读金德建先生《经今古文字考》,感觉金先生与一些先儒一样,考察秦汉人某典籍之文本,往往仅依据熹平石经、郑玄《仪礼》注等所确定其典籍中一二字为今文或古文,从而确定此书之文本为今文本或古文本,此种研究方式总是让本人生疑,然苦于当时手中资料不多,也只好存疑而已。但当此汉初帛书本面世之后,以先儒确定经今、古文的资料和考察方式,考察此一汉初今文本,看看其文字之使用,是否符合先儒对今、古文的界定标准,遂成为我研究的视野。今以起码早于熹平石经约三百八十年的帛本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此等区分今、古文的标准,故若以石经本标准考之,则帛书今文本中既有今文,亦有古文,竹书古文本中则既有古文,亦有今文。由于未经后人任何改动的帛本今文经与竹书古文经的出土,使

我们看到了汉初今文经与战国古文经的宝贵原貌,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东汉熹平石经之立,五经文字标准之定,无非是“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而已,后之学者因为当时已经见不到汉初典籍原貌,故而以熹平石经文字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误矣!

今天,我们凭借帛本、阜阳简本及竹书等先儒从未能窥见之资料,将《说文》《仪礼》郑注、《汉书》颜注及《文选》、《经典释文》等等典籍资料中有关今、古文的阐述、引说,一一摘录而出,比照帛本、阜阳简及竹书《周易》卦爻辞中与之相应的文字,重新给予考索、辨析与审视,这对汉代今、古文经学研究来说,是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工作,并会因此而发现一些先儒典籍资料的偏颇与失误。今以《说文》为例,许慎《说文解字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文》收录小篆古籀及与篆文相异的仓颉古文,可以说,该书是为了保存古文字而作,先儒们曾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不赘述。今人亦有人评论此书博大精深,实是一部空前的古文字书,更有人说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云云。今以竹书考之,我们发现,战国竹书本中有很多古文字,《说文》皆未收入。这就说明,至许慎时,由于很多古籍原本已被改写成“隶古定”抄本,而仍保留原来的“古篆”文字的先秦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许慎时已所见不全,致使许多古文字已不可见,因而未能收入《说文》。同时,我们看到竹书中相同一字往往有多种写法,如古文“来”“往”“比”“恒”等字,其字皆有几种写法,而《说文》于此多仅取其一。汉唐人仅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此本恐亦为“隶古定”抄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偏,甚至有误!尤其在《仪礼》郑注中多有此等失误文字,下面辨析文字中此例甚多,兹不一一列举之。

由于帛本与竹书皆在楚地出土,故其很可能皆为楚人之抄本,由今本与竹书本多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而帛本与今本相较,异文甚多,其八经卦卦名完全不同,估计费直古文《易》在汉人用隶字作“隶古定”摹写时,仍然保留了古文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字,如今本八经卦的卦名即与帛本不同,每个卦爻辞的上九、上六之“上”也仍依古文作“上”等,皆是。其六十四别卦之卦名文字,今本与帛本有三十四卦不同,只有三十卦相同。而其卦爻辞中今本与帛本相比较,异文甚多。帛本传文中凡孔子讲解经文大道者皆以今本卦序,以此考之,更可证明我们的推断:帛本此完全不同于今本的六十四卦排列,如同京氏八宫卦序一样,可能是一种专讲占筮用的卦序,这种以大阳之卦乾统其少、

中、长三子，而以大阴之卦坤统其少、中、长三女的卦序排列，体现了庄子的“《易》以道阴阳”及魏相所“表采”《易阴阳》中内涵的精神。

宣帝、元帝年间，田何所传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此时又出了费直与高相“两家之说”。后至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及高氏《易》均亡，《隋书·经籍志》：“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独孟氏《易》虽传至唐，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宋，孟氏《易》亦全部亡佚，故今文《易》之全本至此不复得见，而所存费氏《易》，至东汉时已非常兴盛。东汉光武建武时，曾有立费氏《易》为博士之议，但终因其“无有本师”而未得立。至东汉后期，今、古文学合流，在选拔博士时，强调学贯古今，兼通数经，费氏《易》经马融传至王弼，王弼《易》在唐代成为官学本，因而，我们今天所见之《周易》经传本，乃传自费直古文本。然而，未遭秦禁且有本师正传，并于两汉时期皆居官学地位的今文《易》，至今却已无完本可见，呜呼！此其数乎？

故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今文《易》义，只是从《周易集解》及其他古籍中辑出来的部分经文片断。因为丁宽“训诂举大谊”的解经之作，及较为完整的施、孟、梁丘经文皆已亡佚失传，故有本师传授的今文经义已经失传，而“无有本师”传授的费直古文本却能传至今日，故虽无本师传授，“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的费氏《易》，经后代古文派《易》学大师们的不断努力，到东汉光武帝时，已可与今文《易》争立博士，可见此时的费直《易》其对经文的训释与讲解，经数代人的补充，已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种原本没有老师系统传授，仅凭对经文文字的诂释作为理解经义基础的古文经，其解是否符合《易》之本旨？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先儒之所以将《易》称之为“绝学”，盖因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已经失传，今日对《易》之阐释，多得之无本师传授的古文派经师，故云其学“绝”矣！盖因古时字少，字多互假通用，如无本师传授其字在经文中的本来之义，如果仅就其字而释之，就会对经文作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如今人高亨先生释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之“亢”，不从前人依据爻位居上位而释“亢”为“穷高”，而自释“亢”字为“沆”，谓池中之龙有悔云云，因而受到当时学界的批评。殊不知“亢”不仅可与“沆”通假，亦可与“炕”“抗”“忼”“闷”“肮”“阨”“伉”“吭”“頔”“迕”等字通假。如帛本经传之文中此爻既有作“抗龙”者，又有作“炕龙”者，若解“抗”为御龙有悔，解“炕”谓龙燥热而有悔云云，似皆可言之成理，然失其本旨远矣！

《易》中有些卦爻辞虽然已失去今文经师系统传授，然因《周易集解》保存

了汉魏等三十余家《易》注的某些片断，兼之东汉末学者们已经打破了今、古文学的界限，如郑玄即以今古文遍注群经，且今以竹书与帛本考之，郑玄《易》中确实是今古文学杂而用之，故马融《易》乃至王弼《易》中，恐亦兼有今古文《易》旨。总之，东汉末人们注经“兼用今古”，故我们今日所见某些汉魏人的《易》解片断，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今文义，哪些是古文义。譬如《周易集解》辑之最多的虞氏《易》，虞翻自称五世家传孟喜《易》学，孟喜既通古义，又通今义，《集解》所辑者，是依今本卦序训释经义的内容，其学自然当为今文《易》。然考其说《易》之旨，与帛本《二三子》《衷》《要》诸篇虽有某些相近相合之处，然亦多有不同。如虞翻解“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著名“月体纳甲”说，即与帛本传文诸篇中所讲“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旨不同，如《衷》篇释《易》曰“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吉”，子曰“非吉石也”云云，其说与虞翻并无任何相同之处。而《衷》篇云“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至“动阳者亡，故火不吉也……重阴者沈，故水不吉也”，由这段讲刚柔阴阳互变的文字而知《周易集解》引荀爽注《乾》卦“大明终始”曰“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者，其源乃得之帛本此段文字也，乃今文《易》也。再如今本涣卦九五爻“涣汗其大号”，《集解》引《九家易》曰：“故宣布号令，百姓被泽，若汗之出身，不还反也。”而帛本此爻之“汗”字作“肝”。其卦名于帛本六十四卦经文作“涣”，而《二三子》作“奘”，此爻作“奘其肝，大号”。《二三子》引孔子解此爻曰：“奘，大美也，肝，言汙内，汙内大美，其外必有大声问。”可证帛本无论其“汗”字之读，还是其爻文之义，皆与《九家易》不同也。再如今本蹇卦六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帛本作“王臣蹇蹇，非今之故”。《二三子》引孔子曰：“王臣蹇蹇者，言汙难也，夫唯智汙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汙人，不言吉凶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其解说此爻之旨，于今本所引虞翻注文中已全然不见。然而只有依《二三子》所引孔子对“王臣蹇蹇”的如上解说，才可以解释《象》释“王臣蹇蹇”为什么曰“终无尤也”。再，《二三子》其解坤卦六四爻“括囊，无咎无誉”引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之，汙猷聒囊也，莫出莫入，故曰彲咎彲誉。”此正合《象》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之意。《集解》引卢氏曰：“慎言，则无咎也。”可证卢氏当时尚知今文本此爻之旨也。其解中孚卦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引孔子曰：“汙子随之，通也；昌而和之，和也，曰和同至矣，‘好爵’者，言膏酒也，

弗有一爵与众。”其解“其子和之”为“通也”，为“昌而和之”“曰和同至矣”，此解正合《象》文“其子和之，中心愿也”之旨。

此等例子于帛书传文中甚多，兹不一一列举之，而所引孔子对各卦爻辞的解释，皆能“训诂举大谊”，其旨趣又多与《象》义合。故读帛《易》至此，不由心生大疑：今本《易》中诸卦爻辞之解是否可靠？我们比照今、帛、竹书三种主要文本，在对其疑难卦爻辞做出解释时，因竹书只有三十四卦，且只有文字，并无训释。帛本卦爻辞虽基本完整，但亦无训释，仅凭帛书各篇传文所存之解，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情况下，今本当初虽无本师传之，但经过历代先儒之诂释，大谊已定，在未见出土秦汉人或更早文本之确解的情况下，还不宜随便更动今本之释。故笔者在依今、帛、竹书三种文本对疑难卦爻辞作考证时，尤其对一些帛本异文的诂释与辨析，还依今本为主，只有一些极为明显的今、帛本读之不同的卦爻辞，如今本蒙卦初六爻之“发蒙”帛本作“废蒙”，今本履卦之“素履”帛本作“错礼”，旅卦之初六爻今本作“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帛本作“旅琐琐，此其所取火”等，皆依据经文或《象》文，对其重新作了辨析，以证明帛本所读为是。

总之，随着帛本《易》的出土，一部较为完整的今文《易》本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人面前。作为今人，我们能重见田何今文《易》传本，何其幸也！此本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于是，鄙人对今、帛本经文中的一些相异之字作了初步的考证，并对今、帛本经文中的某些今、古文，依据传统资料认真地作了辨析。然而当我完成这一工作刚刚交稿后，由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竹书”）于2003年年底出版，并承张晓敏先生赠我该书第三册，其上有濮茅左先生用了极大功力整理校释之竹书《周易》三十四卦经文。此书因为是战国时的竹书古文本，而这一文本为我前期有关《周易》六十四卦今本与帛本之今、古文的考证工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文字资料。因而，见到此资料之后，我立即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罗颢先生将原稿寄回，重新对这些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一一比照竹书古文本作了仔细的对比与考证，尤其对那些今本、帛本、竹书中出现的异文，作了考索。于是，方有如下之浅见也，今述之如上。疏漏、谬误、违失之处肯定不少，还望诸方家批评裁海，以便今后补正。

竹书本及帛本卦爻辞及传文，其与今本卦爻辞在文字上的不同，究竟是字殊义同，还是字殊义异，因为尚未完成对帛本《系辞》及帛本《易传》其他各篇全



文的考证和辨析,因而对一些疑难卦爻辞尚不敢妄作结论,待再用几年时间完成对帛本《易传》诸篇及竹书全文的考辨后,或许对于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新的认识。

在对帛书所用文字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帛《易》之源流、帛书《易传》各篇中所表现的象数易思想及汉初《周易》之“今义”与“古义”的异同等,都有了一些浅陋管窥之见,今一并整理成册,以向海内外方家请教。

## 《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版前言<sup>\*</sup>

168

赖于读者爱护,拙著得以再版。

《周易》本是“先王以神道设教”的卜筮之书,后经孔子改造,才变成了阐发“人文化成”的人文之《易》。这种由卜筮《易》向人文《易》的转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最终基本完成于汉代,因为据《汉书·艺文志》介绍,当秦始皇焚书时,《周易》尚因被定位为“卜筮之书”从而逃过了暴秦的焚劫。

进入西汉以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此政治氛围所形成的学术环境下,《周易》方由卜筮之书真正渐变为“洁静精微”之书。当时,人们纷纷引《周易》经传之文以陈述自己的学见或政见,而它的占筮功能则被悄悄降低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当时的易学博士亦并不是仅仅为给皇帝讲述《周易》经文大道而设,若遇到大事,皇帝还是要让他们给自己占筮吉凶,如田何的四传弟子梁丘贺,就是因为“筮有应”而得皇帝宠信的,京房则以占验先得到皇帝信任而后又因此丧命。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入汉后,《周易》的占筮功能还是被大大矮化了。这是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将这种变化归之于秦汉间方士与儒生斗争的结果。幸赖近年帛书经传的出土,人们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们看帛书《易传》中如下几段文字记载:

《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开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开祝卜矣,我观开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开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开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开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开后乎?’”

<sup>\*</sup>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由帛书《易传》中的如上记载,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孔子确实爱《易》喜《易》,且与《易》有着很深的感情。第二,孔子既然爱《易》,当然要研究《周易》的筮法,且不断进行有关占验的总结。“吾百占而七十当”即其证,但仍感不如“周梁山之占”。第三,最重要的是,人们占卦时为趋吉避凶,而孔子则认为通过“德性”与“仁义”的修养亦可达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此《易》旨即经孔子改造之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孔子虽然对《易》做了由卜筮《易》变为“观乎德义”的人文《易》的改造,但对这种改造心中甚是不安,恐遭后人非议,故“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种心态的写照。

故与孔子思想相呼应的《文言》传释坤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正是受到孔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后人对卜筮的运用才有了“善为《易》者不占”,“《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等一些将《易》占与德性修养结合的言论。当然,孔子的这些思想,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了体现以德行修养释卦的筮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释随卦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此段文字有关“元亨利贞”之解,与《文言》传基本相同。可证孔子以德义解卦辞,确有所源。而“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这段纯以德义释卦的文字,与帛书《要》篇所记孔子论《易》之旨,可谓完全相同。再者,《周易》经文自身亦有体现这种人文化成精神的文字。如《既济》卦辞即讲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历代注家多说“西邻”暗指文王,东邻指纣王。

若依《周易》卦爻辞形成之年代考之,此说当是可信的,且孔子在帛书《要》篇亦说:“文王仁,不得彳志,以成彳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故孔子虽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但前人已有以德性解《易》之先例,况《周易》经文卦爻辞亦时有透露此等精神者,故脱离神道设教而以人事伦理释《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也。

但由保存至今的《左传》《国语》所载大多数筮例考之,春秋时代,《周易》作为一部筮书是无疑的,而由最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资料考之,孔子在将《周易》由卜筮之书向人文化成之书的转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朱熹所云,易学之研究,“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如果伏羲画卦、文王系辞是可信的话,则文王于羑里忧患所系之辞,虽基本上为卜筮而设,但亦多有谈人事者,除如上所举之例外,再如《乾》卦九三爻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损》卦“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云云。依传统说法,“十翼”为孔子所作,我们认为,虽非孔子亲作,亦其弟子整理。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系辞》《文言》等说《易》,已基本上脱离卜筮,更以人事说之了。此例于今本与帛书《易传》中甚多,兹不一一举之。但孔子仍于《系辞》讲“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于帛书《要》篇仍讲“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者,此乃义理生发于象数之铁证也。故孔子于《易》,亦研究卜筮,且“吾百占而七十当”,他只是“后斥祝卜”而已。因此,自汉儒始,人们为了尊奉孔子而开始疏远《易》与占筮的关系,实则是对孔子易学思想的片面理解,这种情况直至宋代才受到了朱熹的纠正,清代大儒李光地奉康熙皇帝之命编纂易学巨著《周易折中》时,其于书中特别强调朱熹的观点:“《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道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李光地指出,《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周易本义》的始终,亦贯穿于《周易折中》的始终,故宋元明清诸朝代的易学家皆明于筮法,受此传统影响,直至近现代,著名易学家如杭辛斋、尚秉和、钱穆等人亦皆精于筮法,他们以“火珠林”筮事,以“射覆”筮物,人们又将这些卦例或集辑成书,或发表于报章,亦成学人一趣也。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易学研究处于低潮,除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有几篇关于《周易》成书及哲学思想探讨的文章外,当时不可能有关于筮法研究的文字出现,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时人们思想上仍有十年“文革”的余寒,故研究《周易》的文章仍沿着五六十年代的路数走,多在《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上做文章,这就是为什么港台的研《易》者多为中文系学者,而大陆的研《易》者几乎皆在哲学系的原因。

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指出的,当1987年鄙人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届《周易》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冯友兰先生在给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来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冯友兰还指出:“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限于书本上的材料,这是一个途径;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术士们的传授。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北京街头碰见一个摆摊卖卦的人,自称能用《周易》筮法占卦,我请他给我占一卦,他说,有大衍,有小衍,在街头只能用小衍,要用大衍,需要到他家里去。我当时有事没有去,看起来他对筮法似乎是有所传授的。”

冯先生此处所云之“大衍”,当是指蓍草演卦法,此法在今本《系辞》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中有记载,鄙人在拙著《周易概论》中对此段文字作了详细的阐释,此不赘述。而冯先生所说之“小衍”,由卖卦人云“在街头只能用小衍”来看,就是本书所介绍的金钱演卦法,这位卖卦人解卦的方法,也极有可能就是我们本书所介绍的“纳甲”筮法,此亦江湖上多数术士所用的方法。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方法,正如冯先生在信中所说:“这不是提倡筮法,不过是要搞清历史中的一件事实。”亦即张岱年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的:只有全面通晓《周易》的象、数、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研究者。故我当时撰写此书,无非是想让一些研《易》者对“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因为当今国内的易学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数者少,言占者更少,故得知此一拙著在齐鲁书社出版行世十年后,又将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付梓,鄙人至感欣慰,遂行文如上,聊为本书之再版前言。

刘大钧

2006年元月22日

时值古历小年吉日写于汇科新居

## 《〈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序言<sup>\*</sup>

《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白虎通·辟雍》释“明堂”之职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而《汉书·艺文志》所记“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中即有“《周易明堂》二十六卷”，由《周易明堂》列入“蓍龟十五家”考之，方知《汉书·艺文志》何以将“明堂”与“羲和、史、卜”并列。而由“明堂”的“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考之，可知汉人的数术学除如上供皇帝占卜的内容外，还是一种“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淮南子·泰族训》）的莅政施教的学问。数术学的这些内容与功能，恐承继先秦而来。

《管子·形势解》曰：“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变化日进，至于大功。”“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数术。”《鹖冠子·天训》：“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此皆其证。

汉代的数术与方术有时很难区分，其内容已很丰富：

考《后汉书·方术列传》：“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这些在《后汉书》中被列入“方术”中的内容，实多可在《史记》或《汉书·艺文志》之“数术”类中找到。如文中“师旷之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师旷》八篇”，归阴阳家。而所谓“日者”即《史记·日者列传》司马贞索隐之“卜筮占候时日，通名日者”；所谓“孤虚之术”，在《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归五行家；所谓“望云省气”，有“《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归阴阳家。像

<sup>\*</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河》《洛》之文，龟龙之图”，有“《“图”“书”秘记》十七篇”，归天文家。总之，这些在《后汉书》中称之为“方术”的资料，大都可在《汉书·艺文志》之“数术百九十家”中找到，可证在秦汉时代，“数术”与“方术”恐怕并无严格的区分。

当时的数术之士与方术之士，亦皆精于经学的研究。如：

《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传》：“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

《汉书》未专为数术或方术之人立传，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同时又为经学家之故。如：《汉书·夏侯始昌传》说夏侯始昌“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但其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汉书·京房传》记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此即《后汉书·方术列传》所列方术之“六日七分”）。《汉书·翼奉传》介绍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但又“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李寻传》说李寻“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李寻有言曰：“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此说对今人解读战国楚简“大一生水”及荀爽注文“乾起于坎而终于离”有极大启迪意义。

《后汉书·方术列传·谢夷吾传》说谢夷吾“学风角占候”，但又“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微，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后汉书·方术列传·杨由传》说杨由“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

《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亦说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等等，皆其证。

故《四库全书总目》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此说还是极有见地的。笔者以为：术数与方术之学中附《易》的内容，以及孟、京《易》与《易纬》的内容，恐怕多属汉初田何所授予周王孙的《周易》古义的内容（尤其是《易纬》中的《稽览图》与《通卦验》，多讲“卦气”，足证其与孟、京之学的关系）。汉初田何传《易》，有今义与古义之分（详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周易〉古义考》）。所谓“今义”，林忠军教授在《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总序》中作了很好的介绍，他指出：“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生活在春秋时的孔

子及儒家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象,以儒家独特的语言与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和时间、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容、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的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这一对《周易》本义的改造,孔子当时亦觉甚为不安,因而在帛书《要》篇中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齐人田何除传“今义”外,又传《周易》“古义”。所谓“古义”,鄙人在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古义考》中认为,其更多地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的卜筮之旨。

因此,《易》之“古义”,多有“数术”与“方术”的内容。正如前面所引《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举诸“方术”中有“六日七分”者,即其证。当时的一些著名数术家与方术家皆精于《易》者,亦以此。

正如宋会群先生在《中国术数文化史》一书之“绪论”中所说:“术数在起源期,可以说是与‘六艺’相并列的一种知识体系,偏重于实用,主要通过吉凶占卜来达到‘务行正理’‘为政’的经邦治国的目的,可谓‘治国之术’。”

只是后来,“数术”之学“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汉书·艺文志》语)。《汉书·艺文志》于“五行”家中进一步阐述了“数术”之学被“浸(渐)以相乱”的过程:“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故自汉人始,“数术”的本义已经“渐以相乱”,从而导致“道术破碎”。如《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论不决。”可证武帝时,“数术”中的“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乙”诸派的术士们已在宫廷中为争名利而破碎道术相乱如斯矣!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到了清代,“数术”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类,但人们已多以“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相视了。以至今人一闻“数术”,便定位为算卦、相面、看风水,皆此风之延续也。

因为数术学在汉代是与《五经》互拟互补互生的大学问,尤其对当时的科技



发展,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故《后汉书·张衡传》引崔瑗撰其碑文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本人在学习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史和帛《易》出土资料的过程中,对此时有一些浅陋的想法。欣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又承罗颢先生嘱余制序,今借短序略述管见,还请诸方家教正之。

## 《大易集释》序言<sup>\*</sup>

176

乘着上个世纪的生旺之气,当今世界更加呈现出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并存发展的态势,古老而又伟大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几大文明之一,成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人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企盼变得越来越迫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中凸现出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并重新焕发出它灿烂的光芒,毋庸置疑地成了我们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易学和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大道之源”,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令其他传统学术难以匹敌,一个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坚,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以学术之正统的身份和地位活跃于历代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央,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了易学和儒学,也就没有了精髓和主体。因此,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弘扬易学,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弘扬儒学。故今天如此多的海内外学者之所以能应邀齐聚于齐鲁大地的海滨宝地青岛而成此嘉会,当然是为了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弘扬易学和儒学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也正是我们组织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诸位到山东来开易学与儒学的会议,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孔子。而孔子和《易传》的关系更是易学家和儒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过去由于可靠文献的缺乏,孔子和《易传》的关系一直蒙着一层朦胧的面纱,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公布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易传》,记载了孔子和其弟子论易之事。如《要》篇中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以及“百占而七十当”的记述,证明了孔子学易、习易、体易的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班固所谓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绝非虚言,直接有

<sup>\*</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力地驳斥了历史上的那些怀疑性论断。帛书《易传》为我们弄清《周易》何以纳入儒家系统,成为贯通天人的宝笈开启了新的学术视野,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兼容并蓄、创造转化的学术精神。儒学从一开始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汉代,《周易》以其独特的天人之学的学术品格和丰赡的学术意蕴被儒家确定为“五经之首”,成为历代儒者的必读经典,从而使易学和儒学在思想和价值诉求上更进一步地贯通和融合起来。至宋明更是如此,特别是其《易传》,为宋明理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任何一个杰出的宋明理学家都是一个出色的易学家。这种学术传统一直传承下来,直至近现代,如章太炎、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冯友兰先生等皆既通易学又通儒学。今天,在我们所研究的学科越分越细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不少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往往不涉及易学,而从事易学研究的亦不涉及儒学,这显然不符合易儒之间的历史本貌,不是儒易之间正常的学术关系,更不利于深入开展儒学和易学的研究。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决心与独得风水宝地且又拥有以汉代大儒郑康成命名的康成书院的崂山风景区管委会再次联合召开一次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为万里而来的海内外从事易学和儒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并为今后的综合研究打下初步的基础。正是有感于斯,我撰写了“集长风乎万里,浮祥云于巨峰”的联语,以示卑人对此次大会的殷殷期盼之情。

然而,近代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陷入了困境。泱泱中华何去何从,成了近200年来苦苦困扰着国人的问题。于是有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一系列观点引发的社会思潮及政治运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之中,儒家文化怎么样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以便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毫无疑问,我们要因应时代要求而对儒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做出新的诠释,实现其现代化,这既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对儒学固有的内容做现代的解释,从而创造出新的儒学理论形态,实现儒学与现代的融合,现在学人们提出的儒学现代化,应是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文化的内在性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化,是儒学本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单纯地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去解构传统,从而导致儒学固有之精神丧失的现

代化。同样重要的是,并不仅仅是儒学研究要现代化,易学的研究亦要现代化,儒学和易学研究的现代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自20世纪下半叶迄今,学术界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先秦、秦汉之间一大批久已失传的易学与儒学佚籍的出土,其中,以70年代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90年代出土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为代表,其内容涉及儒家的心性论、天命观和天道观等各个方面,以及《诗》《书》《礼》《乐》及《易》的很多宝贵内容。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世界,使得学界对礼乐文明,对原始儒家的思想、流派、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种种经学问题加以新的审视并希冀得出新的或较以往更为确切的结论来。学者们提出:“重新估计六经和早期儒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以简帛文献的出土为契机,对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对易之本旨、易的古义与今义、古文与今文的传承与演化,同样也要作出新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原典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增进和拓展我们对整个中国思想史、儒学史和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以求在学术视野、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新的历史性转变,化生出现时代独特的学术品格,从而凸现出时代之精神,从而更好地昭示和发挥儒学和易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促进儒学和易学研究的现代化,为儒学、易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重塑金身”。

儒学和易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个时代性课题,它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了。”这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环境污染、文明冲突、贫富分化、道德缺失、精神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据说这一切从根本上都导源于西方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导源于工具理性主义。西方文明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东方儒家文化与之不同,它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带有整体性特征,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生命境界的提升,追求天与人之间的贯通融合,寻求人与人之间的通泰和谐,此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这种情怀,成了今天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宝贵思想资源。“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的易学精神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胸怀,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并存提供了祥和的环境。“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人类处理文明冲突、民族矛盾提供了对话、沟通的平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信条为全球伦理的建设创造了理论指针,“安身立命”的终极人文关怀为化解人类的精神危机给予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事实上,近年来儒学和易学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正发挥着它一定的作用,受到世人瞩目。清人龚自珍诗云:“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对儒学和易学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检讨、提炼及现代整合,使其转活于现代,不仅可以为挽救当今世界出现的种种危机、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各位与会代表秉持“修辞立其诚”的学术精神,就易学与儒学的各种问题发己之所欲言、言己之所欲言,使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当本次大会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略记如上以誌。

2005年8月15日

## 《周易概论》巴蜀版增补本前言<sup>\*</sup>

《周易概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正面肯定并简要介绍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原为山东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的《周易》选修课而写,初稿完成于1982年,修改补充后正式定稿于1983年,由李苦禅大师题写书名、张岱年先生为之制序,经辛冠洁先生推荐于1986年5月在齐鲁书社初版发行,1988年元月再版。当年6月第三次印刷,印数为50500本。而后在《光明日报》组织的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评选活动中,本书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时该书责任编辑白萍生先生与编辑室主任张继臻先生亲自将获奖证书送至鄙人家中,喜称“一部学术著作,能获读者一万七千票,以如此高票当选‘金钥匙’奖,实属罕见”,当时我亦深感荣幸。

十年之后,巴蜀书社施维先生专程来济,与我联系出版本书之巴蜀版。巴蜀版《周易概论》于1999年12月第一版付梓。2003年,又予再版。售罄,于是去年施维先生建议我出《周易概论》增补本,继《周易概论》中有关帛书《易经》研究之《帛易初探》后,补入近年有关帛《易》及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易》等出土《易》学研究的新见解。他认为这一补充非常重要,可以为读者提供易学研究的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新启发。因为施维先生既是颇具眼光的文献出版策划编辑,又是专门研究《周易》“图”“书”之学的学者,作为学术研究上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易学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有着多年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具有里程碑文化及学术价值的《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的编辑。因此,我非常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我也认为今后可能还会有新的《易》学资料出土,因而此后很长时间内,在《易》学研究中,出土《易》学资料的研究,将是海内外《易》学研究领域中新的学术亮点和新的学术制高点。故而在制定我们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有关今后十年研究规划时,我们对出土《易》学资料,特别是马王堆

<sup>\*</sup> 巴蜀书社2008年1月第1版。

帛书今文《易》资料及上海博物馆竹书古文《易》资料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极大关注。因此,我依照施维先生这一宝贵建议,将暑假刚刚完成的《读帛书〈繆和〉篇》一文和近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部分帛《易》及“卦气”研究文章收入本书。在先儒无法占有的有关《易》学新材料的基础上,对一些古人始终未得确解的经义本旨,试着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研究见解,作为一名今人,有此机遇,又何其幸也!当然,亦正如我在本书《今、古文易学流变述略》中所说:“虽然这些竹帛《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探求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提供了丰富的《周易》经传资料,但是我们若仅仅依靠帛书经传的这部分内容,与已残缺不全的楚竹书部分卦爻辞内容,作为研究两汉今文《易》与先秦古文《易》的依据,其内容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在至今出土的所有先秦至汉人的《周易》经传资料中,皆是只有经传之文而从无一本释经注传之作,此类著作的缺乏,对我们系统而完整地研究曾支配两汉《易》研究的今文《易》义,造成了极大困难。”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对经传之文的解释,目前基本上还依传统典籍的训释,故本书《疑难卦爻辞辨析》及附录之《〈周易〉六十四卦原文全译》,基本还依传统经传之解,在读竹书及帛《易》中个人发现及思索的一些问题,则增补入本书之竹帛书研究的文字中,仅供读者参考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做出自己全新的辨析与研究。

行文至此,我怀着深情想到了谢灵运的诗句,并将其中两句集为联语:

异世可同调,  
得性非外求。

斯联或可稍示我此时此刻的感念。遵巴蜀书社诸同仁之命,今聊以此联语作为我给本书增补本的题辞。

最后,再次感谢巴蜀书社诸同仁对本书连续不断的关注与关怀。

刘大钧

2007年9月10日

于运乾书斋

《卦序与解卦理路》序言<sup>\*</sup>

《周易》古经有两个难解之谜：一个是《周易》古经的卦序（今本卦序）是怎么排列出来的，它要表达什么思想？另一个是《周易》古经卦爻辞是如何编纂出来的，六十四卦卦爻辞究竟在讲些什么？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最少困扰了人们两千余年，因为至少从汉代起人们对这两个问题就已不甚了了。汉代易学家尽管坚持了以象解《易》的思路，但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仍然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尽管各种解读多如牛毛，其中亦不乏很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卦序的本来构造与卦爻辞本义解读而言，确实皆未能很好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李尚信同志这本关于卦序与卦爻辞解读的著作，尤其是有关卦序问题的研究，在掌握大量易学史料及总结早期易学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背景的基础上，通过长期思考与辨析，我以为，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取得了突破。如果说，我们两千年来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考索都是在漆黑一片中摸索的话，那么，尚信同志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卦序问题的研究上，则为我们照亮了一条研究的坦途，使我们看到了打开这漆室之门的全新方法。

正如尚信同志所云：“对于卦序而言，如果古人对于卦画之间的象数规律没有一定的认识，那么，他们人为地构造出来的卦序，就一定是杂乱无章的。有简单的认识，只能构造出简单的卦序，有深刻的认识，则可以构造出复杂的卦序。”正是有鉴于此种认识，鄙人亦曾就卦序问题作过一些探讨，通过这些探讨，我完全同意尚信同志这样的认识：“当我们从卦序本身之中发现了深刻的象数规律以后，特别是发现了其环环相扣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排列规律后，我们坚信，这样的卦序确实是按照某种象数的规则排列出来的。”

李尚信同志的卦序研究不仅仅是解决了今本卦序的排列与蕴涵的思想问题，而且对各种卦序，如帛书《周易》卦序、楚竹书《周易》卦序、《杂卦》卦序、孟

\* 巴蜀书社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喜卦气卦序等,都提出了非常系统的看法。他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看到任何卦序都是象数与义理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看到,重要的卦序往往高度凝练地表现着某种宇宙论的思想,体现着一个学派的易学思想体系,因而在易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信同志对今本卦序的研究表明,《易传》中的许多重要思想,早已以象数的形式蕴涵在今本卦序之中。这就说明《易传》的思想是渊源有自的。譬如,今本卦序排列所体现的阴阳平衡与阴阳互补原则缺一不可,作者指出:“只有平衡,没有互补,整个宇宙就会是一片寂静,一潭死水,不会有生生不息的宇宙演化与宇宙生命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反过来,只有互补,没有平衡,就不会有个体事物的存在,这样的宇宙也不会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宇宙。”这样的观念,在今本《易传》中被提升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和阴阳往来思想;而在帛书《易传》的《衷》篇里,则有:“子曰: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亡,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动则沈,此柔之失也。”再譬如,今本卦序的“变通配四时”思想、乾象坤法(“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思想、“参伍”“错综”思想(其中包含“三才”“五行”观念)、乾坤阖辟思想等,在《易传》中均有直接的体现。过去有人认为今本《易传》并未谈到“五行”,而帛书《要》篇则直接说:“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由此而观之,尚信同志的这本易学新著,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周易》经、传各自的价值,以及认识易学史由经到传的发展、演变的真实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他在卦爻辞的解读中,提出要根据卜筮的特点及整个中国文化象思维的传统来研究卦爻辞的编纂。首先,他从卜筮的象思维特点出发,提出《周易》古经确实贯穿了象思维,卦爻辞编纂是“观象系辞”的结果。其次,他根据卜筮的论域性特点,指出卦爻辞的编纂都是有其中心主题的。卦象、卦名共同决定了一卦的卦义。卦象、卦名共同决定的卦义,就是一卦的论域或中心主题,卦爻辞就围绕这样的论域或中心主题而展开。第三,他还通过研究《诗经》与象思维的特点,提出了象思维或取象比类思维的双重结构说,即取象是表层结构,比类是深层意义。又从《诗经》与《周易》古经的差异出发,指出:不能从《周易》古经表面取象的杂乱,认为其深层意义也是杂乱的。他同时也指出了古经解读中存在五花八门解释的根源,这就是,这些解读都没有很好地处理取象与比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没有考虑取象比类的论域问题,这就必然导致大量互不相同的解释。

他并通过具体的卦爻辞解读实践了他的这一解读方法。在具体的卦爻辞解读中,作者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解卦体例,也是对《周易》古经研究的新发展;他对于我们常常感到困惑的中爻得中应吉但不知为何有时却凶的问题,虽然还没有总结,但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在卦爻辞解读的细节如词义辨析等方面,作者也有所收获。如,他解渐卦六二爻之“鸿渐于磐”,作者依帛本及竹书解作“坂”“墜”,并经详细考辨后,指出:今本作“磐”并非本字也,应依帛书及竹书,作“阪”字“才是正确的解释”;并在“余论”中引《诗·鸿雁》郑笺以证此段卦爻之辞何以依鸿雁而喻阴阳情势之变化。再如,其解小畜卦上九爻之“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取帛本之说曰:“‘德’者,得也;‘载’,负载也。”我们若考之帛书《易传》诸篇,尤以《衷》篇为显,知今本《系辞》中三陈九卦诸“德”字,其本字实作“得”,作者能明察于此,故正其“德”为“得”也。再如其辨大畜卦九三爻之“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之“曰”,有人解作“日”,作者依竹书与帛书解作“曰”,并指出,之所以此字作“曰”,“是对‘良马逐,利艰贞’的解释说明用语”。凡此种种,皆能发古人所未发,其解可谓精到。当然,所解卦爻诸辞中,其个别辞句亦或尚有可商之处。如作者解坤卦卦辞“元亨”之“元”曰:“始也,大也。”解“元”为“始”,当无疑义,此质诸《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可证,而解“元”为大,此义恐乃后人发明,其于经无征。虽《彖》曰“大哉乾元”,然此“大哉”之“大”,乃指帛书《衷》篇所谓“六刚无柔,是谓大阳”的“乾”卦为“大”,非“元”为“大”也。此由《彖》之接下来的文字“万物资始乃统天”可证,知其仍解“元”为“始”也。其解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贞”之“章”为“文章”,恐亦后人之说,而帛书《衷》篇释此爻之“小事时说,大[事]顺成,知勿过数而务柔和”,此说与《象》释此爻“‘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暗合,故其说应予重视。当然,自古卦爻辞的解读,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以上商榷之见,仅供尚信同志参考。

“易乃五经之首,大道之源。”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将《周易》古经看作是一部占筮之书,再多一点,也只是承认其中有零星的哲理警句,而没有看到——由于对《周易》古经卦序与卦爻辞本义缺乏真正了解,也不可能看到——其中有较系统的宇宙论哲学思想,认为是《易传》将纯粹的、不含多少哲学思想的占筮之书一下子转变成了哲理之书,只有《易传》才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之“大道”。李尚信关于《周易》古经卦序与卦爻辞解读的研究,虽然未辟专章探讨卦序与卦爻辞中的哲理或哲学思想,但从字里行间已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

《周易》古经尽管从表现形式来说,的确是一部占筮之书,但正是这部占筮之书却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譬如,今本卦序排列所运用的非覆即变、主卦统领从卦、阴阳平衡互补、变通配四时、“参伍”“错综”、互卦用中等原则,这些象数原则所体现的易学观念,就已经具备了比较系统的宇宙论的哲学意义,即尚信同志所说,“是从宇宙论的哲学的高度来阐发对自然、人事人生的看法”。正是《周易》古经所蕴涵的这种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以及形成这种思想的思维方式,使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因而,本书关于这两个疑难问题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今本卦序排列奥秘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易学研究本身的突破,更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行笔至此,我无限感慨:当此学风浮躁,人们纷纷以各种巧妙方法包装抬高自己之际,尚信同志却能板凳宁坐十年冷——整整以十年时间对今本卦序的排列规律及其内涵问题、卦爻辞本义问题等作出反复的辨析与研究。这些枯燥的研究,往往是画沙终日难成字,刻竹三年不见痕,但他就是固执地坚持下来了,十年来,他经常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非常痴迷地与我探讨他的发现与见解。现在,终于到了他认为可以将自己多年苦苦思索,并总算基本找到答案,可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起来的时候,遂有本书之付梓。应尚信同志之约,我欣然为本书制序。此序原本较长,但我发现序言越长,越不能介绍此书之精要,遂删削剪裁成此短文。最后,我引马一浮先生之《漫与》诗句以述吾感,并作此序之结:

蜀道难行不自今,  
久依殊俗变乡音。  
纵饶云路千重隔,  
未减冰壶一片心。

刘大钧

2008年6月10日

## 《天不变道亦不变——老子纵横谈》序言\*

186

长允幼承庭训,在中学时代即尝试译注《诗经》《楚辞》等部分篇章,且熟悉《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药典籍。长允接触《周易》较早,向我问《易》也已逾廿载。长允提出的“《易经》是一部古老的辞书”,和他从多义词视角对卦爻辞之间有机联系的探索,都称得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所著《步入神秘殿堂》一书,也不失为初学《易》者较好的参考书。

长允好学敏求,公务繁忙,也从未辍其所学。虽知他近年一直在研学老子,但当这部十几万字的书稿送到面前时,还是不能不使我为之惊喜:我认为长允这部书是下了功夫的,也是很有特点的。此书从十几个方面阐发老子思想,基本涵盖了《道德经》的主要意蕴。该书虽然没有作繁琐考据,但对先贤和时彦的研究成果都注意到了。此书从九个方面对“道”的旨趣深入揭示,从十二个方面就老子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影响作出深刻论证,其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和相反相成思想的多维度探讨,都彰显了作者的研究深度和厚度。这部书最独到之处,是其每剖析老子的一个命题时,都将其放在人类与这一命题相互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比如,当您读了“如何守住真善美”和“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两章后,不仅会理解老子返朴归真和小国寡民的思想,同时对古今中外关于真善美和乌托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会有一个大致的掌握。我认为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把老子智慧和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们从老子那里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和教诲,以安顿好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和生活。《天不变道亦不变——老子纵横谈》是一部内容通俗易懂、文字简洁明快的释老之作,相信大家会喜欢它。

欣闻此书即将付梓,高兴之余遂简文如上以介之,是为序。

刘大钧

2008年8月8日于运乾书斋

\* 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1版。

## 《大易碑林三本石经》前言

《周易》乃先秦古籍，至汉时武帝独尊儒术，其独具魅力的学术品格和渊深溥博的文化意蕴使之卓立于群经之上，被推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后，历代学人无论何家何派，均对该书推崇备至，前后相续，研习不辍，形成了一条“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易学文化长河。此易学文化长河，浸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各个层面，影响深广而巨大。仅易类著作目前留传于世的据说就达三千多种，远非其他类论著可比。《周易》是中国古代智慧之结晶，亦是中国古代智慧最为杰出之代表。质而言之，如欲深切洞窥中华文化之蕴奥、体认中华文化之精髓，《周易》一书实为必由之门径。

我们今日所见的通行本《周易》乃汉魏之际所定，究其源则属西汉费直所传之古文本，而非立于学官之今文本。换言之，通行本《周易》虽是最权威的版本，但也只是诸种《周易》文本之一，并不能够代表先秦以及汉初《周易》文本之全貌。由《经典释文》观之，汉魏学人所用《周易》诸本文字多有不同，有字异义同者，亦有字异义亦异者。这些皆说明，历史上《周易》文本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学界苦于史料之匮乏，无法就《周易》文本之本来面貌及其多样性展开深入的研究。可值庆幸者，近四十年来一批简帛易学文献先后出土，并被陆续整理出版，弥补了早期易学研究史料不足的缺憾，其中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为最有价值。马王堆帛书《周易》，乃是汉初抄本，沉埋地下两千多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汉初隶写今文《易》之原貌。今文《易》本在亡佚千余年后，终于重现于世人面前。而战国楚竹书《周易》，系战国晚期之竹书古文本，乃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之《周易》文本，为我们研究先秦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简、帛本与通行本，不惟时代有异、书写字体不同，其内容亦多有相异之处。此二本的发现，解决了诸多学界长期争论不绝的问题，同时也拓展出易学研究的新领域。早期《周易》文本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易学的丰富意蕴，它们对弄清疑难卦爻辞之本旨，揭示早期易学发展之面貌，

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今日之通行本(简称今本)、马王堆帛书本、战国楚竹书本,已是当前和今后易学研究所必备之资料,不重视简帛文献的易学研究是绝对不足取的。

在我国历史上,为表示对经学的重视及便于长期留存,许多王朝都热衷于将儒家经籍镌刻于石,称之为“石经”,以昭示天下,因而我国古代刻写石经的历史源远流而流长。最初西汉立五经于学官,设立十四博士,但各家经文皆凭所见,没有供传习的官定文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到东汉之时,诸经文本之争愈演愈烈,议郎蔡邕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遂协同诸大臣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熹平四年汉灵帝下诏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镌刻《易》《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典籍于石碑之上,历时九年方始刻成,共计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太学讲堂前。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史称“熹平石经”,因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熹平石经的镌刻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壮举,它以国家的名义,校正儒家经典,平定诸经文本之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和政治文化影响。东汉末年,古文经开始立于学官,而熹平石经所刻为今文,因此到魏正始年间又补刻《尚书》《春秋》的古文经,书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字,史称“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汉熹平石经和魏正始石经后来都被毁坏了。到唐代初期,经籍文本又变得混乱错谬,于是朝廷重新校订刊刻《易》《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经籍,所用字体为楷书,史称“开成石经”。唐代以后,由于版刻印刷术的兴起,书籍流通越来越方便,各王朝皆颁布监本经书,作为国家的法定本,天下儒生不必再到太学抄写石经了。但是,唐以后的各个王朝,为表示对经学之尊崇,推行其政治文化主张,仍然大量地刻写石经,诸如五代的孟蜀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高宗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等。我国历史上的这些石经不仅有保存文献资料之功,而且有较高的版本学和校勘学价值,为我国古代经学之发展和政治文化之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此次我们将今、帛、竹书三本《周易》合刻于石碑之上,不但可以如古石经那样对现时流行之《周易》版本加以校订保存,更为可贵者,能将两千年来古人无缘得见之珍贵简帛文本与通行本以楷书刊刻于一体,让世人可同时观见三种不同之《周易》文本,其意义和价值自有古代诸多石经所绝不能及者。故今、帛、竹书《周易》在八卦城之刊刻,既是对我国历代既有的刊刻石经之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当代简帛文献整理研究与保存的重视。

特克斯是以八卦城闻名遐迩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卦城的建设与发展,将博大精妙之易学具体应用于城市建设之中,鲜活地体现出易学开物成务、辉光日新之宗旨,让人真切地领会到易学文化之神奇和伟大。2005年,鄙人初至特克斯时,就被特克斯透显出的易学文化底蕴所折服,亦被特克斯人对易学文化的无比热爱深深感染。在祖国西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能兴起如此一座承载浓厚传统文化的城第,本身就具有非凡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新时代的特克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大力弘扬城市易学文化,积极彰显其人文价值,在完成一系列的文化建设项目之后,又开刻载有今、帛、竹书《周易》三种文本的大易碑林,此举具有极为重要的经学价值与史学价值,并创全国三本《易经》碑刻之首。我坚信,今、帛、竹书三本《周易》碑林的建造必将使特克斯的历史文化底蕴愈加丰厚,从而于祖国西北边陲乾位之地焕发出了一道彰往察来、品物咸亨的人文之光。

大易碑林由特克斯县政协专职常委靳文涛先生统筹规划安排,特克斯县周易研究学会会长杜殿卿先生协助策划。此次所刊刻之今、帛、竹书三本《周易》,今本用阮元校勘之《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本;帛书本取《文物》1984年第四期刊载之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本及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本;竹书本采濮茅左楚竹书《周易》释文,该释文载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三本《周易》经文样稿由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负责校点订正与审核,中国政法大学刘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韩慧英博士、山东大学张克宾博士协助进行了版本的设计与文字校对工作。

刘大钧

志于2009年2月4日节交立春之际

## 《〈易经〉与现代生活》序言<sup>\*</sup>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周易》有一个由卜筮之书到天人之学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周易》本身蕴涵的无限意义并不是随着卜筮同时呈现出来的,它有一个逐步开显的过程。《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已言明《周易》非一时一人之作,乃是在较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周易》实现了由卜筮之书到天人之学的转变。而对这一转变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三圣”之一的孔子。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乃学术史上一大公案,虽然《论语》《史记》与《汉书》等古籍中俱有孔子学易之记载,但千百年来,学人们因《周易》为卜筮之书不合于儒学精神而强为辩解,甚至认为孔子与易无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澄清这一历史谜案提供了新的证据。帛书《要》等篇中不仅清楚地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论易之事,而且突出地记载了孔子关于《周易》“术”与“学”问题之看法。孔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孔子指出他习易的目的并不仅是学习卜筮之术,而是体察其中涵具之“德义”。《周易》在孔子那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并实现了一种诠释视域的转变,由卜筮之用下的向外探求、诉诸神灵的人生向度,转变为“观亓德义”下的向内探求、诉诸自我德行的人生向度。《左传》《国语》中虽已有以德解易之记载,但逮及孔子方真正达到了一种德性之自觉,为《周易》由术到学的学术品格提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藉此,《周易》也被纳入儒学思想系统。帛书《易传》的出土更进一步证实先秦时期多种解易文字的存在。正是这些佚名的解易之作,一步步地将《周易》的无限意蕴呈现出来,传世之《易传》“十翼”是其最为杰出之代表。在《易传》那里,不仅建构起《周易》古经卦爻画与卦爻辞之间互诠互显的解释义例,从理论上将象辞间的关系清楚地昭示出来,而且将《周易》古经内蕴之意义阐释为天地人三才之道,赋予其生生不已、随时变易的理论特色和人文化成的

<sup>\*</sup>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价值理想,最终将《周易》诠释成了一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天人整体之学,完成了《周易》学术品格之迁跃。后世治易,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均在《易传》之基础上展开,无有能超越者,此为《易传》之伟大意义。

自《易传》之后,历代学人治易总不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馆臣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有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易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此“两派六宗”之说颇合史实。象数派形成于西汉之时,以探析易之象数为治易第一要务,重在梳理易之象数性内涵,造其极则孜孜于昭示经传字字句句之象数学根由,致使巧说弥甚,旁搜曲引,天人大道遮蔽于象数网幕之中;义理派则以王弼易学为其诞生之标志,以揭示易之义理为治易第一要务,重在阐明易之义理性内涵,造其极则汲汲于发挥经传字辞间之义理内涵,致使空言泛说,游而无根,天人大道湮没于语言游戏之内。在我们看来,象数与义理实为易学之一体两面,可以说象数是体,义理是用。离开了象数,易学就失去了其为学之根基,不足以称为易;离开了义理,易学就失去了其为学之指归,不足以称为学。《易》学史上象数、义理两派之分亦是举各自之特色与侧重而言,非是判然不相容者。就其作为派别而言,两家各有长短,在易学发展史上交相辉映,各放光彩。以今日之眼光观之,易学宗派之纷繁,正可见易道之广大。宋儒胡瑗称《易》“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始终”,不仅道出了易学之宏大学术视域和学术宗旨,也可以视作易学发展史之整体特质。古人创造了光芒灿烂的易学,将精微之易道层层诠释,上及形上天地无穷之域,下及形下人生日用之间,将对宇宙、社会和生命的真切体悟贯注其中,既有总体宇宙之关怀,又有终极人文之关切,其流传于今天者皆非无病呻吟、空泛之论,实乃其当下宇宙生命之真切显发。

易学在过去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与其能范导、影响中国过去时代之进步分不开的。易学在现代及未来,如欲仍然保持其生命力,就必须对现代及未来所发生之一切,作出很好的回应,并持续不断地从现实中汲取营养。与现时代多元化发展相适应,现代易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之姿态,人们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管理、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视野下对《周易》经传进行新的诠释,试图从古老的易学中发掘与现代相合的思想内容,将古老的易学思想转活于现代,并以此来指导当代的社会人生,推动人类文明

之进步。而刘君祖先生此部大作正是现代易学在此等信念指导下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君祖先生治易廿余年,用力甚勤,以其对易的体察感悟人生的方方面面,故其所涉有现代之商务经营、组织管理、商业决策等与当今社会关系最为密切之事,其大著之文字能紧扣时代脉搏去体察易道,昭示《易经》进德修业、随时变易、开物成务之道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内涵。此部大作虽不全依传统注疏之格式,然而又循传统象数、义理派治易之理路,从卦爻辞与错综之卦序的分析入手,对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说,大至历史潮流、国际局势,中至企业决策、经营管理,小至家庭关系、为人处世,皆能以易学之思想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圆融畅通。其文风之清奇,其目光之敏锐,其体易之深切,皆使吾敬服。君祖先生以为“研究学问不要光看理论,必须以当代发生的事情,崭新的经验去验证它”,又以为“整部《易经》就像一部高度压缩的资料库,精炼的卦爻辞中含藏着丰富的讯息”,此皆为多年研易后的心得之论。我与君祖先生交往多年,敬重其人品学问,今喜见新作《易经与现代生活》即将付梓行世,欣慰之余,略赘短文如上,一述读后之感,二应制序之命。

刘大钧

2006年5月于运乾书斋

##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

### ——《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sup>\*</sup>

20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时至今日,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也不过是这一百多年来中西古今问题的延续。哲学、宗教等原本就是属于西方文化的概念,在这些问题上的中西争论自然不可避免,而中国传统独有的学问,诸如经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也在新的时代变革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柢在儒家,儒家思想文化的命脉是经学,而在儒家五经四书的经典系统中,《周易》雄居诸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影响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品格。冯友兰先生曾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现象学<sup>①</sup>。三千多年的易学文化发展史,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缩影。20 世纪的易学处于中西古今之争的巨大漩涡中,在中华文化发生整体性变革的时代,它自身也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对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作一番回顾与总结,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学者们打破两千多年的传统易学研究模式,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也解决了易学史上许多长期悬疑的问题。

第一,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带来了历史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人们打破了古代易学“象数”“义理”“汉学”“宋学”以及《易》的“经”与“纬”的研

<sup>\*</sup>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sup>①</sup>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第 1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 页。

究范式,开辟出“《周易》经传研究”“《周易》哲学研究”“《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易学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尤以在“《周易》经传研究”方面,以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他们除去蒙在《周易》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视为古籍文献之一,从性质、年代、作者、起源等问题上进行客观的研究。新的历史观念下的《周易》经传研究,成了20世纪前半叶易学研究的核心。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钱穆、屈万里、李镜池等对《周易》经传作者及成书年代、性质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与讨论。其中杰出者如顾颉刚利用殷墟甲骨卜辞等出土资料,证明了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基本上是在西周初叶,其后的诸多研究也多是为这一观点作补充或发展,终不能超过或推翻它。“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学者开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周易》,其中如郭沫若,虽然和古史辨派一样都将《周易》古经视作历史史料(就时间来说,郭氏关于《周易》中殷周史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要早于顾氏),但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了殷周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精神生产状况。这些关于《周易》古史的研究,虽然有些论述不够严谨,推断过当,但是却为易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域,既大大推进了早期易学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而与《周易》古史研究同时,以于省吾、江绍原、闻一多、高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展开了对《周易》经文本身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再如古人那样把《周易》古经当作圣经宝典,而是认为其中既没有精微渊深的玄理,也没有进德修业的道德说教,卦爻辞都是卜筮的记录,因此重点就在于揭示卦爻辞作为卜辞的真实含义,古代易学的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研究路数都被否定掉了。这些研究虽然在今天看来从基本观念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在当时都是颇具革命性的,冲破了传统易学经文研究的樊篱,创立了《周易》古经研究的新范式。以上所述既是20世纪前半叶易学研究的最为突出之处,也是整个20世纪《周易》古经研究的最大亮点。这些前辈们的研《易》文字,就我们所能见到的皆已收入本论文集中,此不细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探索中,由于当时所见资料的限制,对《易传》十篇的成书年代多数学者基本界定在战国时期。正如吴怀祺先生在《周易研究八十年》中总结近八十年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说:“《易传》写成时间,各家说法更多,《十翼》中各部分写作先后的顺序及写作年代,同样众说纷纭,一般说,《易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sup>①</sup>这是现代

① 吴怀祺:《周易研究八十年》,载《周易研究》1989年第2期。

多数学者的见解。我原先也认为《易传》主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期,但是随着近年来马王堆帛书《易传》研究的深入,这一说法恐怕将成为问题,对此下文将有探讨,兹不赘述。

《周易》一书最不同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它的象数系统。“象数”一词,最早恐见之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杜预注云:“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左传正义》释此曰:“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蓍以阴阳蓍策之数而告人也。”因“《易》为筮卜之书”(《汉书·儒林传》语),故“象数”之本义应出自卜筮。《系辞》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周易》“义理”的出现,正是伴随着“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而产生的。清人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说:“《易》之义理本自象数出,未有系辞以前为无文字之《易》,则义理为体也,象数为用也;既有系辞以后,象数反为体,义理因辞而著,又为用矣。”此段文字是对《系辞》之“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的最好解释。《周易》古经由“象数”而产生“义理”,“义理”又经传说中孔子所作的《易传》而大大扩展了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此根源,历代学者治《易》均不出象数与义理两种路数。

上面我们提到20世纪《周易》经传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象数与义理的分派,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的研究就被否弃掉了。任何一门学术的研究都必须在历史传统中滋长,传统易学的象数与义理研究在新时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就20世纪的象数易学研究来说,既有新的研究领域的创造,也有继承传统的精深研究。20世纪的前期,真正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象数学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人,尚秉和的《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都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之后最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另外,还有一位易学大家,那就是能将易学、道学、佛学与儒学圆融一体,主张象数义理并重的马一浮先生,其主要著作有《易教》上下与《观象卮言》,二文皆收在《马一浮集》第一册中。因为这些都属于专著或书中的某一章节,故不在本论文集的收录范围之内。但这些大家对20世纪易学研究的贡献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20世纪50年

代前,沈颺民对卦变说、互体说等象数学的义例源流有详细辨析。屈万里先生发表的《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对区分晚周与汉易体例有着重要价值。建国后,易学研究一直处于低潮,中国内地的象数易学研究一度中断。直到80年代中期,我在拙作《周易概论》一书中才开始正面肯定传统的象数易学。1984年,萧箴父先生筹划召开了首届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本人筹划召开了大陆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有7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此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可谓盛况空前,正是这次大会因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向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1988年,我们又组建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致力于传统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的研究工作,同年,创办了易学研究核心期刊《周易研究》,从而五经四书中有了唯一正式的研究专刊。二十余年来,正是凭借此一阵地,学者们奇文共赏、异义相析,纷纷著文以阐学见,大大推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山大周易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三辑《象数易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象数易学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多部象数易学研究专著。经过本中心和学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终于又得以恢复,并不断推向深入。与此同时,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成为了20世纪易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用现代科学理论和观念,去解读阐发易学象数学的内容,如莱布尼兹二进制与先天图的关系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乃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新的象数易学形式,或者说是传统象数易学在现代的变种。这其中既涉及到《周易》象数模式和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也涉及到用现代科技理论来解读《周易》象数模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在《易》与自然科学领域已经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周易》热的兴起,科学易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流于牵强附会,因而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到了90年代,陆续有学者对此加以反思,《周易》对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天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而象数易学与现代科学的挂钩则尚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传统易学义理的研究,在20世纪因为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兴起,也相应的转变为“易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自20世纪初零星开始,到60年代开始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解读《周易》经传的思想,在《易经》反映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也涉及到了《周易》研究方法的问题。

题,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王明、方蠡、李镜池、沈颢民等学者都参加了这场关于易学研究的大讨论。但是这些研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大多脱离了易学的历史脉络,以贴标签的方式,用唯物唯心的框框硬去圈定材料,可以说并没有解读出易哲学的要妙所在。但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虽然某些观点颇值得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人所公认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过去那种陷于唯物唯心之图囿的研究状况逐步得以改善,易哲学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主要表现为两大问题的探索。其一,是对《易经》起源——卜筮功能的哲学反思。其二,是对《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价值选择及宇宙意识进行探讨。就第一个问题,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共时性原理”来解释卜筮为何有某种预见性的原因,成中英则提出《易》卜筮的合理性,在于作《易》之初所凝聚的“易的经验”。而第二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苏渊雷、熊十力相继阐发了《周易》“生生之德”的问题。其后,一代诗哲方东美也建构了以大易“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90年代以来,生态学、生命伦理学等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于是学界关于易学生命哲学、易学生态哲学的研究也变得多了起来。可以说这些易哲学的研究完全超出了古代义理学的问题视域,乃是现代意识下的易哲学的新进展,当然这些研究很多不够深入,有些涉及中西比较的问题还停留在表面。尤为重要的是,今本《系辞》之“生生之谓易”,马王堆帛书本作“生之谓马(易)”,而两者在哲学内涵上有着极大不同,故《周易》以“生”为妙谛的宇宙人生哲学系统,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与易哲学研究相关的是易学史研究。上文谈到的象数学研究和义理学研究的很多内容也都是易学史研究的领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代学科划分的问题,大陆进行易学研究的学者主要都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员,而台湾地区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多在各大学的中文系,这使得大陆易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易学的研究笼罩在哲学的视野之下,这一方面深入了我们对传统易学思想及其演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易学作为经学的许多值得研究的领域。我们认为从两汉至明清《周易》一直是五经之首,因而易学史的研究必须是经学视野下的易学史的研究,必须将易学置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品格和发展脉络之中,才能充分发掘易学的精神文化内涵,照见易学在传统文化演进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限制于对易学概念内涵及其嬗变的分析。正如朱熹所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



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sup>①</sup>我相信作为经学的易学史,必将能够推进和深化经学研究的整体进步。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本文开头所说的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20世纪初至40年代,易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和课题,形成易学西学化的研究范式,然而在经历一个多甲子之后,随着最近综合国力的强盛,人们在文化上又出现了向传统复归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西方式的思维模式和学科建构也开始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一种障碍了,这不正是《周易》之剥复、否泰运程机制的生动体现吗!

第二,20世纪易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一大批考古易学文献的出土。这一百年来出土的易学文献目前已基本整理完成的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和《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繆和》《昭力》六篇传文;二是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三是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竹简“卜筮记录”;四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五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周易》。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数字卦的研究,成为《周易》研究之热点。数字卦的研究源于甲骨、金文、陶文中由数字组成的奇字。1956年,李学勤第一次把这种奇字与《周易》的筮数联系在一起。1978年张政烺在长春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具体地运用《系辞》中的揲蓍法来解释周原新出土甲骨上的记数符号,确认它们是筮数。这为数字卦的研究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其后许多学者参与了数字卦的研究与讨论,一直到今天,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不可否认,数字卦已经成为易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在1984年公布以后,帛书《周易》研究开始成为易学研究的新热点,张政烺、饶宗颐、于豪亮、韩仲民、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等学者先后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而帛书《易传》的释文直到90年代中期才先后发表,一经公布,便在学界引起一股研究热潮,随即涌现一大批研究成果,涉及到帛书《易传》的成书年代、学派归属、章句训释、象数理论及其所反映的早期易学发展面貌等诸多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帛书《易传》作为出土易学资料,不仅能够解决许多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早期易学的研究走向深入,展示早期易学的丰富样貌和广阔的哲学文化内涵。这些都无可

<sup>①</sup> 朱熹:《晦庵集·易象说》卷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辩驳地说明了帛书《易传》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以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面世,最大价值在于:它为研究失传已一千多年的西汉今文经学提供了一份未经后人改动的宝贵文献资料。该资料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所提供的战国古文《易》互相印证,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汉代今文《易》和先秦古文《易》的原貌,大大拓展了人们经学研究的视野。故而我将这些考古发现称之为易学研究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譬如,帛书《易传》在探索孔子与易学的关系问题及《易传》的完备成书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与《易》的关系,是经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往往引《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依据,来论证孔子曾经学《易》。但也有不少人举出《经典释文》记载的《鲁论》中“易”作“亦”的说法,又将句读稍作变动,于是孔子的这句话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先儒如欧阳修、赵汝楳、姚际恒、崔述等对孔子是否作《易传》或者《易传》中某些篇章是否为孔子所作,早就抱有怀疑态度,近代以来疑古风潮涌起,一些疑古过勇者纷纷以此为据,否定《易》与孔子的关系。可见,孔子是否作《易传》乃是古今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上世纪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其《要》篇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论《易》的内容,人们由此看到孔子确与《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已不容置疑。尤为重要的是,帛书《要》篇记录了孔子对《周易》占筮的态度和他研《易》的内容,虽然《要》篇后来失传了,但是孔子在这篇文字中为易学奠定了研究基调,这对后人治《易》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要》篇云:

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①

在这段文字里,孔子提出了“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显然他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并提出了“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的研《易》方法。“幽赞而达乎数”,即是《说卦》之“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明数而达乎德”,即是《说卦》之“观

①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综观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研《易》新宗旨,也就是《说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于是孔子担心:“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其“或以《易》乎”之疑,疑在何处?孔子之研《易》,尤其是在“筮”上,其态度与方法都与“史巫之筮”不同,“吾求其德而已”,孔子研《易》把德放在首位。他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与《论语》中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是一致的。《说卦》中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文言》中两处强调的“进德修业”,以及《彖传》《象传》《系辞》中以“求德”为宗旨的文字,也正是孔子对《易》的核心价值由“史巫之筮”向“观彖德义”转移与改造的具体展现。对这种研《易》新旨,孔子也感到有所不安,亦恐遭到后世的非议。“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但这种将“筮”与“德”结合在一起的解《易》方法,绝非孔子的发明,在他以前就有这样的先例了。《左传》襄公九年穆姜释随卦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这段以德论占的文字,与帛书《要》中所记孔子论《易》之旨相合。且穆姜所言“元亨利贞”四德的内容,与《文言》对此四字的解释基本相同,可证孔子对穆姜此释的高度重视。这种德性优先的精神,在《周易》卦爻辞中亦有阐发,如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既济卦九五爻辞“东临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等,都是这种尚德思想的反映。

而真正系统地体现阐发“观彖德义”的文字,应当是传说为孔子所撰的《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文字。这些文字传至汉代,凭借孔子之名,成为了《周易》古经的权威性解释,称为“十翼”。至此,《易》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卜筮,而多以“吾求其德”的人事说之了。

孔子虽曰“吾求其德”,但仍主张“幽赞而达乎数”,而且因为“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故于“史巫之筮”的研究,虽然“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但还是“与史巫同涂而殊归”。正是由于其“归”虽殊,其“涂(途)”却

同,故在今本“十翼”与帛书《易传》诸篇文字中都保存了对“筮”的肯定,其中最为清楚明白的文字,则是帛书《要》中的如下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亦信兀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兀多者而已矣。”这就是《系辞》为什么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的原因。《系辞》《说卦》及《象》文中多有议论“筮”进而肯定“筮”的文字,其源盖本于此也。

但后世儒生还是担心人们会因“筮”而“疑丘”,于是将“筮”与《周易》经义悄悄地分离开了。如《汉书·艺文志》将《周易》经文的训解放在五经榜首的“凡《易》十三家”中,而其谈“筮”的内容则进了“蓍龟十五家”“杂占十八家”中,被排在“历谱”“五行”之后,地位大大下降了。重要的是,从两汉至明清这种分法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只有宋代的朱熹独具慧眼在其《周易本义》中,通过解《易》而大大提升“筮”的地位,还《周易》卜筮之书以本来面目。但因人们已相沿成习,故虽然朱熹作了努力,但亦未能使《易》回到“幽赞而达乎数”的“象数”本义上来。

因此我们今天治《易》所说的“象数”与“义理”,其“象数”已非前文所述“龟,象也;筮,数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象数”,而“义理”如前所述,跟随着孔子地位的升高,《彖》《象》《系辞》《文言》等十篇解释《周易》经文的文字,也成为《周易》的重要内容。据今日所见的经典资料考之,至少东汉末年人们已经以卦象来解释此十篇文字,于是《易传》十篇的文字也统统皆由“观象系辞”而来,这实在不能不使人生疑。

对比今、帛本《周易》经传,今本《系辞》“易有太极”,帛书《系辞》作“易有大恒”,今本师卦上六爻“开国承家”,帛本作“启国承家”,竹书作“启邦丞”,由此可知今本改“大恒”为“太极”、改“启国”为“开国”,乃是避文、景二帝的名讳,帛本改“启邦”为“启国”是避高祖名讳,故帛《易》当抄于汉高祖之时或之后,汉文帝之前。由今、帛本《系辞》两相对比,许多证据表明今本乃是在帛本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据此,我曾指出,《系辞》《彖》《象》《文言》等《易传》内容可能起源较古,但今本诸篇的文字应基本修正完备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稍后。起码今本《系辞》的完备定形,应在这个时间段内。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这一推断,《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文中提到要“正

《易传》”,无论此“正”字读“整”还是读“正”,总之是说当时的《易传》还不够圆满完备,尚需司马迁来完成“正”或“整”的工作。司马迁同时又讲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证司马迁当时所见《易传》中当有“五行”,这正与帛本《易传》相同,而今本《易传》诸篇中已无“五行”矣!司马迁随后又说:“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文中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并不见于今本《易传》诸篇,而“臣弑君,子弑父”一段文字,今本《文言》中有之,但文字亦有不同。另外,如《说苑·敬慎》:“《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又说:“《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直至东汉,由《说文》中所引“《易》曰”之文看,仍有未收入“十翼”者。可证当时有许多释《易》传本,并不统一,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易》成为官学,人们可以由此而求取功名,为了统一取舍标准,于是这些不同的传本都被统一成了一个完备的官方定本,此恐即司马迁“正《易传》”说法之由来也。如此之晚才定型的今本《易传》诸篇(起码是今本《系辞》传),在当时尊经崇道的政治气氛下,被汉人视之为“三圣”之一的孔子的手笔,因而其字字句句亦必与经文之卦爻辞相等同,亦为“观象系辞”而来。可见,到东汉时对《易》的注释,至少是以象解释《易传》的工作,就已走向歧途。

以上是笔者以出土易学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来研究孔子与易学的关系及《易传》具体修订成书的时间。20世纪20年代时王国维先生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sup>①</sup>由此也可见,出土文献的研究其意义不能说不重大。随着研究的深入,简帛易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易学研究的制高点和热点,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恐怕今后的经学史也将因此而改写。

如上文所言,在《易》的核心价值由“史巫之筮”向“观乎德义”的转移中,后世儒生担心人们因“筮”而“疑丘”,于是将“筮”与经义悄悄分离了。在唐人李

<sup>①</sup>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鼎祚《周易集解》一书中保存下来许多汉代易学资料,其主要为东汉诸易学家所谈之象数《易》文字,其中尤以马融、荀爽、虞翻注《周易》的文字较为完备,由其注经注传的文字以及后人的研究文字所形成的汉人象数《易》,其“象数”的涵意已经与最初的象数绝不相同矣!但因人们已相沿成习,故我们仍依汉魏以来直至明清所形成的汉人象数《易》研究内容来界定今日的象数《易》,而将占筮研究内容仍归入“术数”集中,以从先儒之分类。而早期的“术数”与“象数”及至汉代的“方术”,其研究内容基本上相同,如前文我们引《左传》僖公十五年中所云之“象数”,即有《汉书·艺文志》中所云“史、卜”之职的内容。考之《后汉书·方术列传》:“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铃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这些“方术”的内容,大多可在《史记》或《汉书·艺文志》之“术数”类中找到。而汉时的“术数”或“方术”之士,亦皆精于经学的研究。《汉书·夏侯始昌传》云夏侯始昌“通五经,以《齐诗》《尚书》传授”,然而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汉书·京房传》记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翼奉传》云翼奉“治《齐诗》”,但又“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李寻传》云李寻“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李寻有言:“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此说对今人解读战国楚简之“大一生水”及荀爽注《易》之文“乾起于坎而终于离”,有极大启迪。而《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介绍诸方术之时,亦多有“韬含六籍”“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者。汉初田何传《易》,有“今义”与“古义”之分,所谓“今义”即“观斤德义”者,它“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在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sup>①</sup>。而田何所传与周王孙的“古义”,恐即所谓“史巫之筮”,亦即孔子所云“吾百占而七十当”者,故“术数”与“方术”附《易》的内容,孟、京《易》中言灾异的内容及《易纬》中的一些内容,恐皆属汉初田何所授予周王孙的《周易》“古义”的内容。《易纬》中的《稽览图》《通卦验》多讲“卦气”,足证其与孟、京之学的关系,故当时的一些著名“术数”与“方术”家皆精于《易》,盖源本于此也。

<sup>①</sup> 林忠军:《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总序》,齐鲁书社2002年版。

后来“术数”之学,“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破碎而难知也”(《汉书·艺文志》语)。《汉书·艺文志》又于“五行家”中进一步阐述“术数”之学如何进一步“渐以相乱”：“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于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以相乱。”故自汉人始，“术数之学”已“渐以相乱”，从而导致“道术破碎”矣！至清代，“术数”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六类，今人于“术数”的内容，大致分三类：第一是长生类，有养生术、医药类、气功类、炼丹术、房中术、服食术、辟谷术等；第二是预测类，有卜筮类、易占类、杂占术、择吉术、三式术、占梦术、测字术、堪舆术、占星术、占候术、相人术、算命术等；第三是杂类，有幻术、招魂术、禁咒术、巫蛊术等。但狭义的术数，主要指以上的第二类。

如果将古人对《周易》的研究分为“术数《周易》”和“经学《周易》”的话，那么，“术数《周易》”，在文化的演变上，既是术数的源头，又是“经学《周易》”的源头。所以，“经学《周易》”在今日虽主要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术数”虽主要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但二者都无法忽视对早期“术数《周易》”的研究。有趣的是，20世纪以来，《周易》研究依旧如两千年来的历史选择，“经学《周易》”“哲学《周易》”为学者研究之正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而“术数《周易》”的研究，虽逐步得以恢复，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筮法、风水、相法、奇门、六壬、八字命理等方面的著作付梓面世的越来越多，但统观这类著作，仍多有“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者，真正能对“术数”学涉流探源、采华取实者有，但为数不多。

在综论20世纪易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之后，还需特别说明的是，1949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引人瞩目的。高明、屈万里、李汉三、胡自逢、程石泉、黄庆萱、高怀民、戴琬璋、徐芹庭等以《易》名家者的著述，以及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师的有关易学论述，皆极最具代表性。陈立夫、黎凯旋等所创办的《中华易学》杂志，张廷荣所创办的《易学研究》杂志，包括他们的讲学，对台湾易学的普及与弘扬，都做出了特殊贡献。

20世纪，已成历史。研究历史，便涉及“文献”的问题。但是有了“文献”还不够，还需有健康的“文献学意识”。特别是历经“文革”思想真空后，人们对“文献学意识”甚为淡漠，几不知为何物。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文章受“文

革”影响而多和“左”的思想有关,基本无文献参考习惯,大都是独自抒发一己之见,且言之凿凿。殊不知,早在清末民初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已远远超过了其学术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整个社会透发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在科研领域,许多研究人员难以沉下心来进行研究,尤其是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评定职称挂钩后,大量论文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些“高产”之作,多是将前几年同类研究文章机械整合拼凑,形成不痛不痒之论。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无文献学意识”,还有情可原。90年代,“二手文献”泛滥,并蔓延至今天,此种“伪文献学意识”更加令人忧虑。有鉴于此,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纂《百年易学菁华集成》,一是对百余年的易学研究作一个回顾与总结,为下一步撰写20世纪易学研究史作好文献资料上的充分准备,二是对后人有关20世纪的易学研究提供文献借鉴之便利,集中展示各专题已有之优秀成果和研究高度,消除不良的“伪文献学意识”,以使今后易学研究在已有优良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前发展,而不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尽管我们努力使《集成》的编选尽量精粹,但卷帙浩繁,仍难保无“伪文献者”入选,还请读者谅解。

史料文献的编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依时间先后顺序加以编排,一是依问题分门别类地编排。据此,我们整体的编选思路是:首先,有一个宏观的文献目录,尽量收集文章,以反映各个时期的研究风貌。然后,以专题为类别,集中同一专题中较好的文章。最后将各专题文章按照问题意识尽量依时间顺序编排,以显百年来该专题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脉络。因为现实操作上,存在论文编辑难易的不同,所以整体上我们试图以“初编”、“续编”的方式加以完善。目前出版的是“初编”,依专题类别而分为八大分集,即(1)《〈周易〉经传研究》;(2)《出土易学文献研究》;(3)《象数易学研究》;(4)《〈周易〉哲学研究》;(5)《易学史研究》;(6)《〈周易〉与中国文化》;(7)《〈周易〉与自然科学》;(8)《〈周易〉与术数》。这样的选稿和编辑过程为编辑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却也大大提升了《集成》的学术含量、编选价值并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世纪易学论文的收集,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易学研究实现了由古典研究范式向现代研究范式的转变,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进入21世纪已近十年,业已到了对之加以总结和反思的时候。而这一总结与反思,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易学文献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必须要对这一百年的易学研究的嬗变、特征和成果有一个深入而准确



的把握。希望我们这套《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的出版,能够为学界总结和反思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史提供一点帮助,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批有关 20 世纪易学的高水准研究著作,同时,亦为我们今后的易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和启迪。

最后,我们对本《集成》的编纂过程在此作一个简单回顾:上个世纪末,与及本中心有着多年文字交谊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汉学家倪策教授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一生收集的易学论文复印稿及报刊剪辑稿赠送给本中心,这些稿件年代自 1900 年至 1988 年止,时间跨度近 90 年,尤其是上个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一些报刊文章,其报刊自身发行量不大,发行时间较短,因而这些资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加之其作为反映上个世纪易学风貌的文献原典资料,弥足珍贵。值本《集成》即将付梓之际谨记之以示纪念。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唯一的易学研究基地,理应对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作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于是本中心于 2004 年底决定组织人力物力,对 1900 年至今的海内外的全部中文易学论文资料作一次系统全面的收集、爬梳与整理。由本人担任总主编,由中心研究人员黎馨平同志具体负责,组织人力,先编选《周易研究》学刊及“中心”所藏易学论文。2005 年 1 月正式启动向海内外收集、甄选稿件,台湾学者赖贵三先生负责收集海外资料,先后参与此项工作的学者及中心研究生 20 余人,主要参与者有李秋丽、韩慧英、高源贵、郭永振、张克宾、高原、陈彦杰、朱瑞、马倩倩、谷继明、胡士颖、王天宗、杨学祥、吕相国等。该项目至 2009 年底结束,历时五年整。为了保证研究内容的连续与完整,收集文章的时间为 1900 年到 2009 年。此间,我们共收集易学论文目录约 13100 条,辑集到手的文章约 9700 多篇,已经审阅 6500 篇,从中甄选审定约 1500 篇。作为初编的内容,在选编 20 世纪至今这一百余年的易学成果时,我们编辑者绝不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文章的取舍标准,而是以反映 20 世纪时代巨变特点的创新性研究或继承传统而又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成果作为我们选稿的重要标准。由于意在留下这个时代的易学研究风貌和研究视野,对于有些早期文章或独具特色的文章我们则是求博在先,求精次之。故这本两千多万字的大型论文集成,在反映上个世纪至今的易学研究风貌时,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不一不异,殊途同归;

有梳有疏,歧虑共守。



此乃本人为《百年易学菁华集成》付梓出版所书贺联，一并作为呈献给本书的题辞。行笔至此，我回忆起20年前的一段往事：1989年冬，施维先生欲以宏大的规模与范围收集汉魏以来的先儒易学名著，请我负责辑成一套大型文献——《易学集成》，此后数年来不断与我通信，以完善《选目》，此书虽因故最后未能完成，但我仍复函曰：“自古凡举大事业者，不可无成算于胸中，亦不可太有成算于胸中。太无成算者，难以图终；太有成算者，难以虑始……况世上哪有‘太有成算’之事？故有‘乾元’，万物即可‘资始’，唯‘资始’之，方可行‘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之伟业也。”故今日之事，正是历史的因缘际遇，让我们完成《百年易学菁华集成》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文化工程，此其数乎？冥冥之中我们正是应数而以“不可无成算”但亦绝不可“太有成算”之态度，组织人力物力投入此项工作，亦应数而特邀施维先生担任此书之总策划，负责全面筹划编辑出版事宜，以圆20年前之宏愿也。更为巧合的是，明年正是我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而本《集成》所收之论文由1900至2009年其时间跨度亦为110年，故而正可将本《集成》作为奉献给隆重校庆的贺礼，此亦数也！

诚挚感谢连战、饶宗颐、汤一介、李学勤先生为本《集成》的付梓题辞。

凌云一笑见桃花，  
三十年来始到家，  
从此春风春雨后，  
乱随流水到天涯。

经历五个春秋而完成此《集成》的2009年，正值鄙人来到山大三十周年，先儒黄山谷的这首诗，活画出我此时的心情，故录之以作此文之结。

2010年1月于运乾书斋

## 显晦宁殊奥 卓识发覆艰

## ——《墨经正读》序言\*

208

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墨家学说迥异于其他诸家的特点是墨子及其后学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具体体现在《墨子》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六篇亦即《墨经》之中。其内容涉及几何学、数学、认识论、宇宙论、物理学、力学、光学、经济学、逻辑学等方面。其文字既简约古奥,又错讹多出,加之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墨学式微几两千年。直至清末民初,借助“西学东渐”之风,孙诒让、梁启超、胡适、栾调甫、章太炎等学者经一番对《墨子》钩沉发覆的功夫,方知《墨经》中载有大量论列科学技术的内容,但董理极为困难,读之不啻“天书”。近百年来,不少通学大儒投入精力时间,已有若干种《墨经》释本面世,但因均系作者“孤军奋战”,受专业领域的限制,“斩获”未能尽如人意。

有鉴于此,十多年前,台湾师范大学王讚源教授约同我校姜宝昌及外校孙中原、王冬珍、齐瑞端、周才珠、杨武金诸位教授,组成墨经研究团队,拟集海峡两岸《墨经》研究精英之力,撰写《墨经正读》一书。我与姜宝昌教授原本熟悉,早就赞赏他的人品学问。经乔幼梅校长介绍,我又认识了王讚源教授,王教授为人坦荡豁达,与之论学,“劈箭奔雷到海穷,偃溪从此入圆通”,使我受益匪浅,深感是一位功力扎实的学者。借此因缘,我向他们表示了我们研究中心非常重视此课题的意向。于是,在2005年3月,我邀请团队全体成员做客山东大学一周,审查《墨经正读》初稿。风风雨雨,五年过去了,现在大作已成。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觉得有不少话想同诸位墨学专家以及广大墨学爱好者沟通一下:

其一,山东大学在《墨子》研究尤其是《墨经》研究方面,历来是有传统的。上世纪之初,有栾调甫先生,他与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切磋,推动了当时《墨经》研

---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究的蓬勃发展,有《墨辩讨论》和《墨子研究论文集》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有高亨先生,他从先秦诸子的角度研究墨学,有《墨经校诂》和《墨子新笺》之作;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有张知寒先生,他先发表论文,考定墨子里籍为春秋小邾国濫邑,即今山东滕州木石,后又著《读墨馀论》,编《墨子与当代世界丛书》(10种)和《墨子研究论丛》(4辑),把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在此期间,王学典教授协助张知寒先生与滕州市政府联系以推动墨学研究的发展。受此大潮影响,姜宝昌先后著《墨经训释》《墨子大取小取训释》《墨学与现代科技》,郑杰文先生先后著《中国墨学通史》和《20世纪墨学研究史》。此外,曾振宇、曹峰等,也正在蓄势崛起。

因为山东大学是中国墨子学会和中国周易学会的理事长单位,故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我与张知寒先生过从甚密,曾撰联以赠之:

知寒与民同忧,

研墨示我躬行。

张知寒先生仙逝后,我又以此作为悼念先生之挽联以示永远怀念之情。今天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然应当以弘扬包括墨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为己任,自始至终地支持团队的工作,直到《墨经正读》出版。

其二,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之中,与当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密接度最高者莫过于墨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故《墨经》精义的探赜索隐,更显得尤为必要。质而言之,《墨经正读》的出版,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可谓正当其时。

其三,我认为,《墨经正读》团队的研究实力强大,专业结构合理。据我了解,王讚源先生长于训诂,姜宝昌先生则先学物理,后专攻训诂,孙中原先生长于逻辑,其他几位先生抑或专于训诂,或专于逻辑。此前,诸先生都有自己的《墨子》或《墨经》研究专著,他们在墨学界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

其四,我认为,《墨经正读》堪称是一部富蕴学术研究成果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该书在总结前贤和时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精覃思,谨校慎注,多有团队成员自己的创获。例如,《经上》62“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条,自张惠言谓“无序,谓无与为序”,诸家皆从之。殊不知,“最前”与“无序”语意相乖。于是又有改“序”为“厚”者。而“无厚”于“端(点)”本为义在言内之事,无需辞费。此事争论数十年而未得正解。《墨经正读》指出,“无序”之“序”不作“次序”解,而应如《仪礼》注“序,犹代也”,“无序”意即无可取代。必如此解,“无序”与“最

前者”方无扞格,《经说》所言“是无同也”亦顺畅无碍。再如《经下》29“堆之必柱,说在废材”条,《墨经正读》以力之平衡原理予以解析,释其义为“堆石砌墙,石材受上方之正压力,同时亦受下方之支撑力。其原因在于石材上下叠置”,《经说》进而列举石材受力之三种情况,《经》与《经说》若合符契。又如《经下》1“止,类以行人,说在同”条,自孙诒让改“人”为“之”,诸家影从,几无例外。其实,不必改字,解为“以类之本质特性考察人之言行谬误,原因在于本质相同之事物原可归为一类”,故《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即言此也,亦正与《经说》“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密合无间。总之,《墨经正读》编者既“述”又“作”,体现了墨子“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的基本理念,“述”主乎因,“作”主乎创,必得在扬弃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是学术发展之正道。在这方面,《墨经正读》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墨经正读》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墨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向人们证明了:正是上个世纪十年浩劫的严重流毒,才会产生当前这样学术文化相当浮躁、弄假成风的气候,当今严肃的、正派的、立志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说大有人在,但还是有人在的。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世人看到了何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他们从来不扎花架子,秉承中华文化进德修业的根本,以“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品质,甘于寂寞,不事声张,默默地耕耘着,既默默耕耘着现在,更默默耕耘着未来,从而使 we 依然能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并占据中心位置的希望。

2010 年节交立夏

于运乾书斋

## 《汉代易学通论》序言<sup>\*</sup>

《周易》未遭秦焚，入汉后由淄川人田何传之，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至宣帝、元帝年间，田何所传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此时又出了费直与高相“两家之说”。费直《易》为古文，无师承，其学“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田何所传之今文《易经》，终两汉皆居官学地位。但任何事物都是盛极必衰，一门学问亦如此。据《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据桓谭《新论》说，当时的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尧典”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解说“曰若稽古”四字用三万言。此时对《尚书》的研究已达如此繁琐的程度。

受此风气影响，研《易》也有如此情况。据《史记·儒林传》记，《易》自孔子经六传至汉代田何，又经两传至杨何，杨何被汉武帝立为《易经》博士。而到了宣帝、元帝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像鲁人周霸、莒人衡胡等都以治《易》而做了官。于是人们把治《易》当作晋身之阶，在传习中不断加入自己的标新立异之见，如《汉书·儒林传》中已讲到蜀人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故《汉书·儒林传》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但总的来看，汉初之人还是重视经义的，《易经》卦爻辞的本义皆有师承而未失传，像丁宽作《易说》只有三万言，仅“训诂举大谊”而已，尚保持着“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的淳

\* 齐鲁书社 2012 年 1 月出版。

淳之风。但到了东汉末,五世家传孟喜《易》学,被清人誉为西汉古《易》正宗的虞翻,由《周易集解》所引其注《易》之文看,于互体之外又出四爻、五爻连互之法,已极为繁琐。他的注《易》之文我们今天虽已难窥其全貌,但绝非“三万言”矣!

被《汉书·艺文志》排在首位,对两汉治《易》者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施、孟、梁丘三家所传之《易》,据《经典释文·序录》记,施仇与梁丘贺所传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喜《易》由于当时影响较大,散播较广,东汉末年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亦全部亡佚。故《易》虽未遭秦火之焚,且入汉后居于官学地位,并有师承相传,但其传本及其经义今日已不可得见。我们今日所见之传本乃是王弼本,是得之于并无师承传授的费直古文本。故先儒称《易经》为“绝学”,其旨即本于斯。而“扫象不谈”的王弼《易》之所以能兴起,与今文《易》发展至后来以象数说《易》的繁琐有极大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人今文《易》义,只是从《说文》《周易集解》《经典释文》及其他典籍中辑出来的部分经文片断,完整的田何今文《易》义,已不可见矣!然而马王堆帛书经传与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使我们有幸得以见到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原貌。虽然这些竹帛《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探求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提供了丰富的《周易》经传资料内容,但是我们若仅依帛书经传的这部分内容,与已残缺不全的楚竹书部分卦爻辞内容,作为研究两汉今文《易》与先秦古文《易》的依据,其内容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在至今出土的所有先秦至汉人的《周易》经传资料中,皆是只有经传之文而从无一本释经注传之作,因为缺乏此类著作的出土,因而对我们系统而完整地研究曾支配两汉《易》研究的今文《易》义,造成了极大困难。

“亡章句”而无师承的费氏古文《易》,在后代古文派大师们为争立学官的不懈努力下,到东汉光武帝时,势力已达到可与今文《易》争立古文博士之职,可见此时的费直古文《易》,恐怕在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王肃以至王弼等数代人的钻研下,已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解说体系。但古时文字一字多义,这些并无老师系统传授,仅凭个人对经文字义的理解而训解诂释的经义,其解是否符合《易》之本旨呢?兼之当时为争名利,今、古文两派势同水火,难免有古文派对今文派的解说,出于派系门户偏见,往往另出新说,因而无论对《易》学知识

的介绍,还是对经传文字的训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仅据今日所见之古代典籍与出土简帛《易》资料所示西汉今文经义,与今本所传经义作一简略对比,于是,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看八卦何人所造,及何人重为六十四卦的问题。这是《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周易正义·卷首》其“第二论重卦之人”云:“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案“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者,见之《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及《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此所谓“先人”者,当为传今文《易》之前代经学大师也。因为依《史记·儒林传》载,自鲁人商瞿受《易》于孔子而六传至齐人田何,八传至淄川人杨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故司马迁父子此说必得之杨何而为今文之说无疑也。此说在汉人中影响甚大。案扬雄《法言·问神》:“《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而《法言·问明》中亦说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衡》中有关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的记载。《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其引文之“《易》言‘伏羲作八卦’”,显然是王充在引用当时传《易》的成说,故特予说明:“伏羲造之,故曰‘作’也。”下文说文王自演为六十四卦,又特予说明:“故曰‘衍’。”也同上文之引也。王充所引应是当时人们援今文《易》说经之明证。而《汉书·艺文志》:“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可证当时不仅西汉末年好古文的扬雄仍用此今文义释《易》,东汉初人王充、班固等人亦袭此今文《易》之说也。

至魏晋,王弼扫象,今文《易》衰落。入唐,据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当时有关“重卦之人”已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今文《易》有关重卦之人,已仅为其四说之一了。且此说亦并非因有著名今文经学家说《易》而得立,乃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此说,方得以排在四说之尾也。

我以为《周易正义·卷首》除“论重卦之人”外,其“论《易》之三名”“论三代《易》名”“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分上下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等,皆是今文《易》义至唐衰落后,孔颖达针对当时解《易》出现

的各种混乱说法,依仗自己“奉敕撰定”的特殊身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判断与辨析。

古文《易》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的解释往往皆依据个人的理解而各自说之,如上面孔颖达所引重卦四说中郑玄以为是神农重卦,而王弼则以为是伏羲重卦。有关何人重卦,二人之说已自不同,而有关卦爻辞的诂释,差异就更在所难免。古文与古文的传人之问尚有如此不同,古文与今文的解释,差异就更大了。

对后人影响最大,也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较早的完整《易经》传本,乃是王弼本。史料皆称王弼所传源之于费直古文本,然而今由出土之马王堆帛书本考之,余疑其说未必可信。

我们知道,马王堆汉初帛书本尊崇孔子并由隶书写成,是属汉初今文《易》传本,其八卦卦名皆与今本不同,其六十四卦卦名及其卦爻之辞亦多有不同者。如今本“乾”卦,帛本作“健”,今本“坤”卦,帛本作“川”。而由《说卦》称“乾,健也,坤,顺也”,知帛书“乾”作“健”,实即《说卦》之“健”,古“健”“健”互假也。帛书“坤”字作“川”,实即“顺”字。帛书《繆和》篇曰“川者,顺也”是其证。《衷》篇亦曰:“子曰‘《易》又名曰川,雌道也’。故曰‘牝马之贞’,童兽也,川之类也。”其“川”字显然读作“顺”也。依此我们可知,若依古文,《象》释《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作“天行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证《象》文经今文经师讲解时,已改“乾”字为今文经之“健”字。同样,《象》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地势坤”之“坤”字是用的古文,若依今文,此文应是“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过去笔者读《象》文至此,每每不解:以古人行文之严密,何以会以“天行健”之“健”字对应“地势坤”之名词“坤”字?由于帛书《易》的出土,我们终于得知:此段《象》文,若依今文,应为“天行健”对“地势顺”,若依古文,则是“天行乾”对“地势坤”,后人抄书时,已不知此《乾》《坤》二《象》今古文之渊蕴,遂释《象》文《乾》卦书以今文,而释《坤》卦则书以古文,致使后人读之总感《象》文语句不工。今读《周易正义》,知王弼注此句时所据者,疑亦是今文本,非古文也!案《周易正义》释《象》“地势坤”引王弼注曰:“地形不顺,其势顺。”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应是此爻作“地势顺”,故而王弼才以“地形不顺”而“势顺”释之。由此而考之,王弼当年所见本,起码《象》中此段文字非古文本也。王弼未对《象》释《乾》卦的文字作注释,但对《象》释《乾》卦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作了注释,其曰:“天地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



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

我们统读此段《彖》文，由“大哉乾元”始，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止，《彖》文中绝无一字言及“健”者，而王弼之注，却一开始即言明：“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又云：“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之此段文字，亦是今文，应是“大哉健元，万物资始”。王弼乃是据此本而注其文如上也。

以此而考之，魏晋时，今文《易》本仍有传授，王弼并在注《易》时作了重要参考。后人盲从先儒之说，以为王弼之《易》乃依古文本，今以帛书汉初今文本与王弼注文考对之，我们发现此千古之说恐亦不确矣。故今后要转变传统观念，对王弼《易》注下大功夫作一番探流涉源的探究工作，相信此一工作对挖掘汉人今文《易》遗义，将有极大帮助。

汉人今文《易》义赖汉唐人《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的流传，至今保留了一些遗义。今举后人多指其书为伪书、争论较大的《子夏易传》一书为例，先列举其训诂举大义的注经文风与保留下来的经文字义，并考证一下此书是否为伪书。

《子夏易传》一书，刘向《七略》中已载其对《易》义的解释，如解《屯》卦六二之“乘马班如”曰：“乘，音绳，班如，相牵不进貌。”释《比》卦卦义：“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释《小畜》卦之“攮”作“戀”并释其义曰“思也”。释《小畜》卦上九爻辞“月几望”之“几望”作“近望”。释《履》卦九四爻辞“履虎尾，愬愬，终吉”之“愬愬”曰“恐惧貌”。其说与孟喜《易》“愬愬”作“齟齬”亦解为“恐惧”同。释《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之“翩翩”曰“轻举貌”。《谦》卦之“谦”，《子夏易传》作“赚”，并释之曰：“赚，谦也。”释《豫》卦九四爻之“朋盍簪”之“盍簪”曰：“同疾也。”《贲》卦六五爻之“束帛戔戔”，其今本“戔”字，《子夏易传》作“残”，并释“束帛”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释《复》卦上六爻之“迷复，凶，有灾眚”曰：“伤害曰灾，妖祥曰眚。”释《颐》卦六二爻“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其“拂经”之“拂”作“弗”，并云：“辅弼也。”《离》卦六五爻“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其“戚”，《子夏易传》作“喊”，并释之曰：“咨惭也。”释《遯》卦上九爻之“肥遯”曰：“肥，饶裕。”释《明夷》卦六二爻之“夷于左股”之“夷”，《子夏易传》作“睇”，并云：“旁视曰睇。”释《睽》卦六三爻之“见舆曳，其牛掣”之“掣”曰：“一角仰也。”释《困》卦九四爻之“来徐徐”

曰：“内不定之意。”释《井》卦九二爻之“井谷射鲋”之“鲋”曰：“谓虾蟆。”释六四爻之“井甃，无咎”之“甃”曰：“修治也。”释《丰》卦九三爻之“丰其沛”之“沛”曰：“小也。”释“日中见沫”之“沫”曰：“昧（沫），星之小者”，等等。其解皆简略明白，确有汉初解《易》者“训诂举大谊”之风，唐时两汉魏晋抄本还在，且《经典释文》所引三十余家《易》著，当时应皆知是真本无疑，故以陆德明之人品学问及识见，是绝不可能引伪书的，此其一；其二，若以今本与近年出土之上博楚竹书《周易》及马王堆帛书《易经》及其他古籍对比而考察《子夏易传》之文字，更可知其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无疑也。

案《小畜》卦九五爻“有孚攣如，富以其邻”，帛本此爻作“有复縶如，富以仟邻”。其“有孚攣如”之“攣”，《子夏易传》作“戀”。案帛本作“縶”当为“攣”字之省，汉隶此类字多互通。考《隶释·仙人唐公房碑》洪适注曰：“攣字即戀字。”其《夏丞碑》洪适曰：“戀即轡字。”《李翊碑》洪适曰：“攣即轡字。”等，皆其证也。故《子夏易传》中今本“攣”字作“戀”，正如同帛本作“縶”一样，皆汉隶此类文字相互通假之证也。

《泰》卦上六爻：“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今本之“隍”，《释文》：“音皇，城堑也，子夏作‘埵’，姚作‘湟’。”帛本此爻作“湟”，正与姚说同，亦皆汉人此类隶字互通之证。

今本《谦》卦之“谦”，帛本作“𦏧”，《子夏易传》亦作“𦏧”，与帛本正同，故此书若是伪书，则后人作伪，何以能预知汉初帛本亦作“𦏧”字耶？且今本《谦》卦六四爻：“无不利，撝谦。”帛本作“无不利，𦏧𦏧”。竹书作“亡不利”。案《汉上易传》释此爻曰：“子夏曰‘撝谦，化谦也，言上下化其谦也。’《汉上易传》此爻引子夏曰‘撝谦’者，实为‘撝𦏧’，因‘谦’字子夏作‘𦏧’也。‘撝’字竹书作‘𦏧’，正合子夏作‘化’，因‘货’之古文作‘𦏧’，故子夏作‘化’，竹书作‘𦏧’，今本作‘撝’，帛本作‘𦏧’，义皆相同，此竹书战国古本与《子夏易传》相同之又一重要证据也！”

《颐》卦六四爻：“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今本之“其欲逐逐”，帛本作“𦏧容笛笛”，竹书作“𦏧猷攸攸”。今本之“逐逐”，帛本作“笛笛”，竹书作“攸攸”。而《子夏易传》此字亦作“攸攸”，正与竹书同。案“笛”字古文作“簃”，故“笛”“逐”实以音义相同而互假。《释名·释乐器》：“簃，滌也。其声滌滌然也。”故《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滌滌。”颜师古注：“眈眈，威视之貌也。滌滌，欲利之貌也。‘滌’音滌。今《易》‘滌’字作‘逐’。”由颜注可知，今

本“逐”字，古本作“激”，今由竹书作“攸攸”，可证《汉书·叙传》所引及颜师古之注极是。而由《子夏易传》亦作“攸攸”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是先秦时代真古本也，后世卑陋之儒因其所见之偏，总以疑古过勇自诩，悲夫！

《坎》卦上六爻：“系于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今本“寘于丛棘”之“寘”，《子夏易传》作“湜”。案《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本人在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中辨此文曰：“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考《广雅·释言》：“真，是此也。”王念孙曰：“诸书无训‘真’为此者。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直’为是正之是，‘此’为如是之是。《说文》：‘是，直也。’是其证矣。或曰，当作‘直是正也’。”《说文》释“直”：“直，正见也。正，是也。”案王氏断“真”乃“直”字之讹，非是。由帛本此处卦辞作“不真人”及六三爻辞作“真人凶”考之，则“真”与“直”古可互用。“不真人”实读作“不直人”，“直”与“咥”以音同、音近而相假耳，故《广雅·释言》作“真”，并“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可见“真”非“直”字之讹。考坎卦上六爻之“寘于丛棘”，《释文》释“真”字曰：“刘作示，言众议于九棘之下也，《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张作置。”此处“《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正《说文》“是，直也”之证；而其曰“张作置”，乃“真”“置”互通之证。

由以上所考，知汉隶“真”字与“示”“是”“直”“置”诸字皆可互假。故《子夏易传》在此作“湜”，如同“姚作寔”一样，乃是与“是”互假，此其抄本乃真古本之又一证也。

《明夷》卦六二爻：“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今本“用拯马壮”帛本作“用澄马床”。今本“拯”字帛本作“澄”，《子夏易传》作“拊”。案《子夏易传》之“拊”即帛本之“澄”。古“登”“升”二字互通（详见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升》卦解）。《隶释·博陵太守孔彪碑》洪适注：“拊即拯字。”亦其证也。

《夬》卦九四爻：“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牵羊”之“牵”字，《子夏易传》作“掣”。“掣”字在此疑假为“遣”。案《庄子·徐无鬼》：“君将黜者，掣好恶，则耳目病矣！”《释文》：“掣，崔云‘引去也’。”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庄子拾遗·徐无鬼》：“崔释‘引去’者是也。‘掣’盖假为‘遣’。”此字竹书本作“𠂔”，有“亡”“丧”之义，与“引去”义近。以此知子夏《易》确得古义之传也。

《困》卦九四爻：“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今本“来徐徐”，帛本作“来

徐”，《子夏易传》之“徐徐”作“荼荼”，《释文》并云：“荼，音图，内不定之意。”王肃本作“余余”。

案《周礼·考工记·弓人》：“宽缓以荼。”郑注：“荼，古文舒。”郑玄以“荼”字为古文，以“舒”字为今文。考《左传·哀公十四年》：“齐陈恒执其君真于舒州。”而《史记·齐世家》作“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贾逵曰：陈氏邑也。”《索隐》：“徐音舒，其字从人，左氏作舒，舒，陈氏邑。《说文》作郚。”由《史记》，“舒”引作“徐”，知“徐”“荼”亦可互假。故此字今本作“徐”，《子夏易传》作“荼”，王肃作“余”，《说文》作“郚”，诸字古皆以从“余”而可互假也。

《丰》卦九三爻：“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今本“丰其沛”，帛书作“丰其茱”，竹书作“丰汭茱”，而《子夏易传》亦作“茱”，此竹书古《易》与《子夏易传》相同又一例也。由《子夏易传》与战国时代古文本用字多有相同而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为先秦古本无疑也。《既济》卦六四爻：“有衣袽，终日戒。”“濡有衣袽”之“濡”，《释文》：“子夏作襦，王虞同，薛云‘古文作濡’。”由“薛云‘古文作濡’”知今本作“濡”，确为古文本。而由“子夏作襦”，亦可知此字古文本作“濡”，而传至秦汉，经由隶书抄写的子夏今文本作“襦”也。“衣袽”之“袽”，《子夏易传》作“茹”，而帛本此字亦作“茹”。由《子夏易传》与汉初帛书今文《易》所用之字多相同考之，再次可证《子夏易传》确为真本无疑也。

那么，后人为何总是怀疑《子夏易传》的真伪呢？主要有两条原因：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三家中无《子夏易传》，刘向《七略》中虽有《子夏易传》，但人们多以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儒已疑非子夏之作矣。之所以定为“或云丁宽所作”者，恐亦因《艺文志》未录也。

二、《子夏易传》之编次乃遵费直、郑玄、王弼所合《彖》《象》《文言》于爻下而传之，显然非《周易》古经之编次。

案《子夏易传》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只两卷，而《释文·序录》所记亦止三卷。至宋《中兴书目》则益为十卷，后又增至十一卷，显系后世抄书者擅自增加内容、变乱编次所至。而后人总是怀疑何以此书《汉书·艺文志》未录，我认为此疑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之所在：由于帛书经传的出土，我们方知，帛书《繆和》等篇中记录了当时很多的研《易》之人，如《繆和》篇中的繆和、吴孟、吕昌、庄旦、张射等及《昭力》篇中的昭力及《要》篇中孔子特别言及自己所不及的周

梁山等。但所有这些人在《史记》所记自孔子至田何的传《易》者名单中皆不见之,所列各家《易》中亦不见其著作。更像子贡这样的孔子重量级大弟子,在帛本《要》篇有大量文字记录了他与孔子讨论《易》的重要问题。但《汉书·艺文志》所录“凡《易》十三家”中竟无子贡的一席之地,仅于地位大大下降的“杂占十八家”中记有“《子贡杂子候岁》二十六卷”。但在排于首位的“凡《易》十三家”中,却列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为什么《古杂》、《杂灾异》可以入于“凡《易》十三家”中,位于《艺文志》之首,而作为孔子极重要弟子的子贡,其著作《子贡杂子候岁》却仅录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杂占”类呢?笔者以为:依据中国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显然是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是故《子夏易传》之未能录入《汉书·艺文志》,亦以此也!

同时,我们凭借帛《易》资料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明白了何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之传《易》名单,从孔子到田何只有六传,而时间跨度却长达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见传《易》名单中所记之人物,凡杨何或杨何一派所不感兴趣者,皆已被删除之!因为对比《史记·儒林传》与《汉书·儒林传》,就可以找到此说的依据:《汉书·儒林传》言及田何传《易》:“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而《史记·儒林传》则仅言“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

很清楚,《汉书·儒林传》不仅言田何传《易》于杨何之师王同,更言还传及杨何之师叔师伯,如周王孙、丁宽、服生等,且也未专事宣扬杨何因何征官,征官时间亦仅言及“元光中”,而《史记·儒林传》中有关汉初传《易》人物的记录,仅仅言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除杨何的直接老师与师祖之外,其余的传《易》人物,已皆被其删去,并特别言明杨何是以《易》而征官,其当官的时间亦记录得极为清楚精确。故考之《史记》与《汉书》的这两段短短文字,我们可以看清:虽是为记载汉兴田何传《易》之事,但《史记》中特别突出炫耀杨何的用意是极为清楚明显的。而更为明显的是:《汉书·儒林传》言及西汉《易》学所本时,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记·儒林传》竟称:“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于此竟将杨何置于其师祖田何之上,捧为西汉《易》学之本!此足证《史记》所言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所提供也。杨何或杨何一派以征官而取得语言霸权之后,以西汉人言西汉传《易》之事,尚且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其他传《易》者删去,更何况春秋时代之传《易》人物,如子夏、子贡乎!故《史

记》中所载由孔子六传至田何的这张传《易》名单,当是一份经当时学官删削后的名单,正因如此,才造成了由孔子六传而至田何这种使后人生疑的传承名单!因《子夏易传》之不录入《汉书·艺文志》,是后人疑其书伪的重要证据,故我们今天在考证此一先秦古本时,凭借帛本提供的最新资料,稍费笔墨辨析如上也。

限于字数,对孟喜之遗文及京氏《易传》等西汉人遗传至今的文字兹不一一引述之。

正如前文所述,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保留下很多对经文大义的诂释与阐释,这为我们研究汉人今文《易》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帛书《易》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初今文本的原貌,而最可贵者,乃是帛书《易传》各篇中多有对经文的解释,虽不系统完整,但亦可使我们窥见不少汉初今文《易》义。今试举《繆和》篇中数条较为完整可观的卦例,并将其与《经典释文》《周易集解》所引汉魏诸家之解作一对比,以期为我们重新认识汉《易》,特别是今文《易》与古文《易》,提供一些重要启发。帛书《繆和》:“繆和问于先生曰:请问《易》涣之九二曰‘涣贲汭阶,每亡’此辞吾甚疑焉,请问此之所谓(谓)?”今本此爻作:“涣奔其机,悔亡。”孔子在对繆和所提问题的回答中,就涣卦卦义及其爻辞皆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涣者,散也。贲阶,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散走汭时,唯恐失之。故当汭时而弗能用也,至于汭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每(悔)之又?受者昌,贲福而弗能蔽者穷,逆福者死。故汭在《诗》也曰:‘女弄,不敝衣常;士弄,不敝车轮。’无千岁之国,无百岁之家,无十岁之能。夫福之于人也,既焉,不可得而贲也。故曰:贲福又央。圣人知福之难得而贲也,是以又矣。故《易》曰‘涣贲汭阶,每(悔)亡’,则口言于能贲汭时,悔之亡也。”

我们看,在此段有关涣卦及其爻辞之义的解说中,“涣者,散也”,与《序卦》之说相同。案《序卦》:“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故《释文》释涣卦曰:“散也。”可证《释文》依《序卦》而尚知涣卦之古义。而其解辞“贲阶,几也,时也”之旨,已于《释文》《集解》诸书中皆不可见,其就此旨而展开的高论:“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散走汭时,唯恐失之。故当汭时而弗能用也,至于汭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每(悔)之又?”等等,则更不见其义之传矣。所谓“贲阶,几也,时也”之“几”,今本《系辞》中有解:“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以此而知“贲阶”之旨在“成天下

之务”。今本《文言》又曰：“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故惟能“知至”而“至之”，才会“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帛书此“至也”之“至”旨如此，而此“时也”之“时”亦与今本《象》释损卦“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释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其旨相合。故帛书释此爻“进取”与“以让”，皆须“与时偕行”。而由“至于元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每（悔）之又”可知，爻辞之所以曰“悔亡”者，其要在未失其“几也，时也”。如若“失之”，则“将何无每（悔）之又？”正是鉴于对“几也，时也”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故而才会说出深具哲理的“无千岁之国，无百岁自家，无十岁之能”的名言。而所有这些《易》文奥旨，若非帛本出土，今人何以知之？《象》释涣卦：“涣奔其机，得愿也。”由帛书之解得知此爻之所以“悔亡”者，其要在于未失“几也，时也”，从而达到了“时福至则进取”的目的，故《象》文以“得愿”释之。因今文《易》义的失传，后人已多不解《象》文何以于此曰“得愿”。而虞翻以“动而得位”释“得愿”，恐已失汉初今文古《易》之旨矣！

帛书《繆和》篇又曰：“繆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是故汤[囚于桀]王，文王纣于条里，[秦繆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柏王之君未尝困而能□□[者，未之有]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猷……”因下文缺字太多，兹不引之。

困卦卦辞今本作：“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今本“有言不信”，帛本作“又言不信”。《集解》引荀爽曰：“阴从二升上六，成兑，兑为‘有言’。”显然荀氏解“有”为有无之“有”。而帛书引“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由“重言”疑帛书解“又言”之“又”，当为重又之“又”。由《象》释“有言不信”作“尚口乃穷也”思之，似乎此二解皆通，但依笔者陋见，以作重又之“又”似更妥。帛书接着由处困卦而能“亨，贞大人吉，无咎”而思及“天道”，云：“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人道九之”之“九”疑为“究”字之假借）由此段文字，知《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乃专指天道也。所谓“壹短壹长，壹晦壹明”者，皆指天道冬之夜长昼短，夏之昼长夜短，及月之盈亏，日之昼夜也。考《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节第五十一》：“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



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天之道，由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又说：“天无常于物而有一于时，时之所宜，而一为之，故开一塞一，起一废一，至毕时而止，终有复始于一。”“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灭。”其《暖燠常多节第五十二》又说：“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等等，此皆帛书所云今文天道大义在西汉仍有所传之明证。而下文孔子举“汤囚于桀王”“文王拘于羑里”等历史人物如何先处困境而后又“困之为达”的故事，以释困卦困何而有“亨，贞大人吉，无咎”之辞，疑此段今文之义汉初人皆知。案《春秋繁露义证·暖燠常多节第五十二》：“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故汤有旱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尤其此文结尾曰：“勿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长，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此论与帛书所举例旨之义正同。而《集解》释困卦卦辞“困，亨”，引郑玄曰：“坎为月，互体离，离为日，兑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犹君子处乱代，为小人所不容，故谓之困也，君子虽困，居险能脱，是以通而无咎也。”郑氏此解，恐其注困卦此辞亦取今文《易》旨，故其注与帛书之释义正同也，后因今文《易》失传，后人已不知郑玄此注之所本矣。

《繆和》又记繆和问丰卦：“今《易》丰之九四曰‘丰汙剖，日中见斗，遇汙夷主，吉’，何胃（谓）也？子曰：丰者，大也。剖者，小也。此言小大之不惑也。盖君之为爵立赏庆也，若礼执然。大能[馭]细，故上能使下，君能令臣。是以动则又功，静则又名。列执必奠，赏禄甚厚。能弄傅君而国不损敝者，盖无又矣。日中见斗，夫日者，君也。斗者，臣也。日中而斗见，君将失汙光矣。□□□□几失君之德矣。遇者，见也。见夷主者，汙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汙次秦穆、荆庄、晋文、齐桓是也。故《易》曰‘丰汙剖，日中见斗；遇汙夷主，吉’，此之胃（谓）也。”

此爻今本作“丰汙剖，日中见斗，遇汙夷主，吉”。帛书引孔子曰“丰者，大也。剖者，小也，此言小大之不惑也”。案《释文》释“丰”字曰：“《彖》及《序卦》皆云‘大’也。案丰是腴厚光大之义。郑云：丰之言腴，充满意也。”以此知唐人据《彖》《序卦》而尚知“丰”字之确义。而“腴厚光大”及郑玄所云“丰之言腴，充满意也”，恐皆郑玄注丰卦时，所取今文《易》义也。而《子夏易传》丰卦九三爻“丰其沛”之“沛”字作“芾”，亦曰“小”也。《释文》释“芾”字曰：“马云‘芾，小也’。”以此知马融虽号称传古文《易》，但亦时取今文义注经。由“丰汙剖，日中见斗”而生发出“此言小大之不惑也”“上能使下，君能令臣。是以动则又功，静则又名”的大道理，而帛书言孔子释“日中见斗”曰：“夫日者，君也；斗者，臣也。



日中而斗见，君将失亢光矣。”帛书所云“日中而斗见，君将失亢光矣”，此解正合《象》文“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帛书释“遇亢夷主，吉”曰：“遇者，见也。见夷主者，开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由“梦兆”而“亟见”，得真遇“夷主”，此行当然为吉，故《象》释此曰“遇其夷主，吉行也”。此段爻文之义，由于西汉今文《易》的失传，后人已不知其确义，故《集解》引虞翻曰：“震为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则三体震为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可知至东汉末，虞翻已不知此段爻辞“开始梦兆而亟见”之确义。而王弼注及《释文》对此段爻辞及《象》文皆无注释，疑此辞之义，至唐已失传。

帛书《繆和》篇又载：“吕昌问先生曰：《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将何胃（谓）也？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又亢利而名与天地俱。今《易》曰‘屯其膏’，此言自润者也。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自血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且夫君国又人而厚金，致正以自封也，而不顾亢人，此余也。夫能见亢将□□□□，未失君人之道也。亢小之吉，不亦宜乎？物未梦而先知之者，圣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亢国也。故《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此之胃（谓）也。”

此段文字记录孔子借释屯卦九五爻而阐发的一段深具哲理的言论：“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又亢利而名与天地俱。”“夫《易》，上圣之治也”，正是孔子对《易》的这种定位，才使《易》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秦时的“卜筮之书”而跻身于“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接着他于此爻又阐发了古之君子如何以“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的四“处”四“思”，从而使自己得到“长又亢利”且其名可“与天地俱”的处世保盛之术。因此，“屯其膏”之要旨在于“此言自润者也”。孔子借注此爻而提出了极具人生哲理的“自润”之说，惜乎此说随着西汉今文《易》义的失没而后人不得其传矣！若得传之，此言定将成为后人代代传颂的处世名言。“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自血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此等对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知恤下的批评，在《象》文中亦得到体现：“屯其膏，施未光也。”在王弼对此爻的注文中亦有所存：“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对比帛书此爻之解与王弼注文，王弼此注恐亦得西汉今文之传也。

应引起我们注意与重视的是,前文孔子解丰卦九四爻“遇其夷主”曰:“遇者,见也。见夷主者,开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而释屯卦此爻“屯元膏,小贞吉,大贞凶”,又曰:“物未梦频而先知之者,圣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元国也。故《易》曰:‘屯元膏,小贞吉,大贞凶。’此之胃(谓)也。”丰卦所谓“遇其夷主”者,乃“开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而屯卦“屯元膏,小贞吉,大贞凶”者,乃“物未梦频而先知之者”。可证孔子在解《易》时,是很重视梦兆的。由丰、屯二卦所言看,一种是凭梦兆而应验吉凶,即“开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如丰卦九四之例,这当然很好,故爻辞曰“吉”,《象》文称为“吉行”。还有一种是未经梦兆启示而已先知事物吉凶的,这是一种更高的《易》学修养境界,惟得“圣人之志”者方能进入斯境。

孔子以此精神境界解《易》,充分体现了帛书《要》篇所谓:“《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元情者也。”“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于辞令,不可求以至善。”古人把梦兆看作是启示事物吉凶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疑此亦属“古法”之一。《礼记·文王世子》记有周武王梦见天帝为其增寿的记载:“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故孔子非常重视梦兆。《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礼记·檀弓上》记孔子将死,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此皆其证。

帛书《易传》诸篇中有关谈占筮梦兆、阴阳五行及风雨灾变的内容,当属周王孙所得《周易》古义的内容,这些汉初尚传的内容于今本《十翼》之文中皆已不可见矣!疑杨何在武帝时代,利用其博士的身份,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易传》版本,按今义的内容进行统一删削与整理,然而由《淮南子》及《史记》等书中所引《易》文多有不见于今本《十翼》之文者思之,《十翼》内容的最后确定,似应在西汉宣帝、元帝年间。

今本蒙卦卦辞之“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繆和》篇则引作:“‘初筮吉’者,闻开始而知元终,见元本而知元[末,故]曰‘初筮吉’。‘再参读,读即不吉’者,反复问之而‘读’,‘读’弗敬,故曰‘不吉’。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才(哉)?日夜不休,终身不卷,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故《易》曰:‘蒙,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参读,读即不吉,利贞。’此之胃(谓)也。”

今本“初筮告”之“告”字,帛本作“吉”,且《繆和》篇通篇皆以“吉”字释之。《释文》《集解》皆未言“告”字先儒有作“吉”字者。且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

施、孟、梁丘经文,亦仅发现时有脱去“无咎”“悔亡”者,未发现蒙卦此“告”字作“吉”字者。故今本此“告”字,帛本作“吉”字是否是帛本抄书者的失误呢?如是抄书失误,何以此段文字前后共有六处“告”字皆误抄作“吉”字呢?且由文字的内容观之,“闻开始而知开终,见开本而知开[末]”,既已闻始知终,见本知末,此处不应再用“告”字,而理应作“吉”字,此其一;其二,考《彖》释“初筮告”曰“以刚中也”,又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彖》释师卦之“刚中”曰:“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彖》释颐卦之“养正”曰:“养正则吉也。”可知《彖》皆以“吉”释“刚中”,释“养正”,故此辞作“初筮吉”正合《彖》文“以刚中也”“蒙以养正,圣功也”之旨。

由于今文《易》义的失传,帛本释蒙卦卦辞“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才(哉)?日夜不休,终身不卷,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后人已不知此辞所含对“仁义之道”的阐发与追求,而《彖》《象》作者正因为深通帛本此旨,《彖》文才会讲“蒙以养正,圣功也”,《象》文才会云“君子以果行育德”。今见后人于此辞之注,皆是望文生义、附会发挥之辞。若非帛本出土,我们何以能知蒙卦此辞之真旨也。

限于文字篇幅,仅举帛书《繆和》篇如上数条以证之,故清儒曾叹,《易》学之研究,两千余年来如在漆室之中,由于有师承传授的今文《易》失传,故《易》已成为“绝学”,后人之研究多是在漆室中摸索其门径而已。近年来随着帛书与竹书《易》的出土面世,人们终于见到了一条通向漆室之门的途径,为照亮漆室引来一线光明。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我们仅凭目前的出土资料,绝不足以完成对汉人今文《易》的解读与研究,我们对汉人《易》学及《易》学史的研究,还须以传统资料为主。今见到刘玉建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汉代易学研究”课题组诸同仁对易学研究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两汉易学,进行了深入探究,该课题对揭示汉代易学的演变与发展,对深刻认识汉代易学在易学史、哲学史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鄙人见到此一丰硕研究成果,非常高兴,遂将近年读帛易的一点感想述之如上,聊为本书之序。

刘大钧

2006.12 于运乾书斋

## 《周易纳甲筮法》学林版前言<sup>\*</sup>

226

赖于读者偏爱,此一介绍纳甲筮法的文字,在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十年后,又于2006年初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付梓,最近经邱承辉先生建议,在原著的基础上,又加入二十余条各类纳甲筮例,并增加“《周易》古占法”“《左传》《国语》筮例”和有关“变占”的讨论文字,同时附上《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的注释,从而使这部介绍探讨纳甲筮法的文字与《周易》经文合为一体,以彰显《易》之本义。在拙作重编出版之际,我们不能不再次论及孔子与《周易》及《易》占:因为设若没有孔子的喜《易》传《易》,《周易》恐与《连山》《归藏》及龟卜一样,早就湮没失传了,故今人得以考见《周易》画卦之本旨者,唯赖孔子及其弟子之传耳!

依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孔子与《周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到了晚年,孔子特别喜欢《周易》。《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因而在汉唐经学史中,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无人怀疑。除了汉人史料外,人们往往引用《论语·述而》中孔子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依据来论证孔子对《周易》的重视,且依传统的说法,解释《周易》经文的《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文字皆为孔子所作,被先儒尊称为“十翼”。孔子作“十翼”的说法,宋以前基本无人怀疑,但宋代以降,人们从“十翼”的文字中看出些问题,先儒如欧阳修、赵汝楨、姚际恒、崔述等,皆对“十翼”中的某些篇章是否为孔子所写,已产生了怀疑。近代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在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下,由于历史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学人们除去《周易》这部“天书”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视为古代的经

<sup>\*</sup> 学林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典文献之一,并从性质、年代、作者以至于起源上对《周易》经文及《易传》十篇进行了客观的研究与分析,经多方面考辨,学人们基本上形成如下共识:“十翼”之文虽然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并非“述而不作”的孔子亲手写成,其文字基本应成篇于战国时代,当为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撰。但20世纪20至40年代,随着疑古风潮的涌起,人们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又进一步提出了疑问。有人指出:《经典释文》记载了《鲁论》中“易”字作“亦”,于是将《论语》中的这段文字句读稍作变动,孔子在《论语》中的这句话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此见一出,这条孔子与《周易》有关的直接证据也很难存在了。很多疑古过勇者纷纷跟进,认为孔子作《易传》十篇的说法,因出自汉人,亦不足为凭。于是,孔子是否与《易》有关,竟也成了经学史上的一个悬疑。

幸赖近年来一大批考古易学文献资料的出土,这些文献目前基本整理完成的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和《二三子》《系辞》《衷》《要》《繆和》《昭力》六篇传文;二是1977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汉简《周易》;三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四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周易》。这些资料中,尤以马王堆帛书《周易》资料最为完备可观,马王堆帛书资料以隶书写成,有经文亦有传文,其经文六十四卦之排列顺序与今本六十四卦顺序全然不同,其卦名及卦爻辞的文字亦多有与今本不同者。帛书的六篇传文,其《系辞》篇与今本《系辞》文字虽多有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其余五篇皆是两千年来古人未曾得见的文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些简帛易学文献极大地推动了先秦两汉易学研究走向深入,展示出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与深邃的哲学文化内涵,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解决了许多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在前文所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上,帛书传文《要》篇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惠行亡者,神需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缙行之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臬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汙要者,不趋汙福。尚书多令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汙用也,予乐[汙辞也,予何]尤于此乎?”[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汙用而乐汙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

赐！吾告女，《易》之道，良□□□□此百生之道□□《易》也。夫《易》，罔者使知瞿，柔者使知罔，愚人为而不忘，慚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忝志，以成忝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忝知之。□□□之自□□。予何□忝事纣乎？

《要》篇所记“夫子老而好《易》”正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之“孔子晚而喜《易》”说相符，可证《史记》所记是可信的。以此亦可知，司马迁所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亦是有据之言，《易传》十篇即便不是孔子亲笔所写，亦应如《要》篇所记，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如子贡者论《易》时的言论，由其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故这些文字绝不可能与“老而好《易》”“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毫无关系。

当然，在马王堆帛书资料出土之前，学界许多人亦不同意所谓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之《论语》谬解，因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孔子绝不可能说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这样的话来，且夫“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正与《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相合。故由《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之言考之，知《论语》所记，显然应是“五十以学《易》”也。

由帛书《要》篇知，孔子晚年不仅喜《易》，更在读《易》研《易》上下了极大功夫，“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即其明证。且此篇文字揭示出许多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研《易》史事：如孔子与弟子子贡就研《易》问题进行了辩论，指出因“《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故孔子于《周易》“予非安忝用也，予乐[忝辞也，予何]尤于此乎？”正是孔子晚年持如此研《易》态度，故得意门生如子贡者，都对此提出了疑问，并与老师发生了辩论，但孔子仍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治《易》路数，甘冒“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要》）的风险，从而为后人开辟了一条以“德行”“仁义”而求福求吉的儒学《周易》研究新途。这条新途在同意其说的弟子拥戴下，得到了传授。朱彝尊《经义考》云：“盖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由此资料可知，马王堆帛书《要》篇虽明确言及子贡曾从孔子学《易》，但依《经义考》所考孔门之传《易》名单中并无子贡，而是子木，“兼通六艺”之名单中只有子夏，亦无子贡。子夏“兼通六艺”是可信的，因为笔者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经文资料，已考证《子夏易传》绝非伪书也（参见拙作《今、古易学流

变述略——兼论〈子夏易传〉真伪》，《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估计子贡在治《易》路数上始终不同意其师孔子晚年“予非安亅用也，予乐亅辞也”的研《易》新途径，因而孔门弟子只承认子贡“问《乐》”而不承认其受《易》。由《史记》《汉书》所记自孔子至汉代田何的传《易》名单中，亦只有子木而无子贡。但子贡从孔子受《易》是无可质疑的，此质诸《要》篇可知也。

幸赖帛书《易传》出土，我们方知，从孔子受《易》者，除子贡外，帛书《繆和》《昭力》诸篇中还记有多人向孔子问《易》，如《繆和》篇中的繆和、吴孟（又称吴子，可知当时也是有影响的人）、吕昌、庄旦、张射，以及《昭力》篇的昭力等。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在《史记》《汉书》所列的传《易》名单中皆不见之，可知这些人是孔子传《易》系统中不被当时正统承认的另一派，恐他们的名字连同著作、事迹先秦汉初尚有传，估计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得势一派儒生利用官学的身份、博士的地位所取得的话语权，压制不得势的一派，从而使他们不见于正史而只能在民间流传，从而渐渐湮没。故《汉书·艺文志》所载“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并无子贡的一席之地。幸赖于“杂占十八家”中，尚记有“《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但因其书失传，故其内容已无从详察。然而《汉书·艺文志》之“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却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今由《要》之所言知，此《古杂》《杂灾异》《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及子贡之《子赣杂子候岁》等，恐皆体现出孔子当年所传《易》占之旨也。

案《汉书·艺文志》释“杂占”曰：“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徵。”“杂占”类的“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徵”于帛书《易传》中亦多有记载。所谓“纪百事之象”者，如帛书《系辞》言：“是故天生神物，亅（圣）人则之；天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而（圣）人法之；河出图，雒出书，而（圣）人则之。”所谓“候善恶之徵”者，如《二三子》中孔子曰：“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龠飗，民[人]不伤，甘露时雨聚降，剋风苦雨不至，民恩相觴以寿，故曰‘番庶’。”等等。重要的是“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这不正是纳甲筮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运算机制吗？

《要》篇又曰：“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细读《要》篇此段文字，我们方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确为有传之教。



“水火金土木”配之于干支是纳甲筮法运算的重要依据,“父子君臣夫妇先后”疑即“纳甲”六亲之“父母”“子孙”“官鬼”“妻财”“兄弟”也。如非言说“兄弟”,何以曰“先后”也。正是“《易》著阴阳四时五行”方有“纳甲”演算中后人发掘出的“生”“旺”“墓”“绝”及“旺”“相”“休”“囚”“死”等内容。考之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其《天文训》云:“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此五行之“生”“壮”“死”正与纳甲筮法中的“生”“旺”“墓”相合,又与纳甲筮法中的“三合”相应:“申子辰相合成水局,亥卯未相合成木局,寅午戌相合成火局,巳酉丑相合成金局。”又《淮南子·地形训》云:“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此五行之“壮”“老”“生”“囚”“死”正与纳甲筮法中的“旺”“休”“相”“囚”“死”相对应。我们知道,淮南王刘安聘明《易》者九人,撰成《淮南道训》一书,据此《淮南子》一书肯定亦有此九人的参与或受此九人易学观的影响。由上可见,纳甲筮法确为渊源有自的《周易》古占法。

案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从武帝时的易学博士杨何学《易》,故“《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之说必得之杨何也。由此而观之,从田何而传至杨何的西汉今文《易》旨,确由孔子传来也。我们虽然不能仅据这些简约粗略的文字而定孔子所传之占筮方法中有纳甲筮法,然而细考这些文字确与纳甲筮法相合。且《要》篇在如上文字之后紧接着说:“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此即孔子讲《损》《益》二卦之:“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要》)其由《损》《益》二卦之风雷山泽亦即䷱䷩䷫䷭四个卦象,而解释由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而生成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此即“卦气”说也。而《衷》篇所谓“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此亦是孔子在《要》篇中以“卦气”讲《损》《益》二卦之大要也。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明白了:孔子于《易》“吾求其德而已”实其多年精研《易》占及梦兆、占候、候星占术后的心得之语,故曰“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要》),这是孔子对自己从学《易》到精于《易》占所走心路历程所作的最简洁的文字归纳。在孔子看来,由“吾求其德”而臻至“顺于天地之心”,这才是一



个真正精通《易》及《易》占者的境界。

行住永依水

离棹即迷源

2010年冬,我赴瑞士“荣格国际分析心理学院”讲学,应荣格先生嫡孙之邀参访荣格故居,并书此联语以作留言,今若以斯联移作本书“前言”之结束语,亦宜也。

刘大钧

2011年7月28日于运乾书斋

## 《大易集读》前言<sup>\*</sup>

甘肃天水市人民政府、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周易学会,原定于2008年6月份联合举办“2008海峡两岸易学文化研讨会”,但是由于当时5·12大地震余波不断、抗震救灾工作万分紧迫,考虑到与会代表的安全问题,大会组委会接上级通知将原会议取消,最后终于在2008年9月20—24日在天水市成功召开。来自海内外的9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著作两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以及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的专家、学者达50多名,故本次大会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中国周易学会所在地和大陆唯一的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的主办单位,为增进海内外易学界的交流,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早在1993年我们就克服重重困难,自筹经费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在那次大会上,时任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的邵崇龄先生倡议应以首届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为契机,坚持将两岸的易学研讨会每两年一次地交互举办下去。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岸易学界遂达成了每两年举行一次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的约定。于是1995年、1997年、1999年,我们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师范大学及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等先后在两岸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2000至2003年,又先后在两岸举办了四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2002年,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又与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召开了“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两岸近二百名著名学者齐集青岛。历届海峡两岸易学会议的召开,得到了各界领导、友人和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sup>\*</sup>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长雷洁琼、环境科学家曲格平、著名学者张岱年、石峻、金景芳、任继愈，台湾政要连战、马英九、萧万长、焦仁和，台湾著名学者陈立夫、严灵峰、陈启云、程石泉等，都先后为大会致以贺词、贺电，或亲自与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体也对历届大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历次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成功举办，反映了两岸学界相互了解、彼此交流的强烈愿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讨论的议题几乎涉及到易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8 海峡两岸易学文化研讨会”，既是此前数届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的延续，又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天水是传说中三皇之首伏羲的故里，而伏羲则是《易传》中所说的创作八卦的上古圣王。如果将博大精深的易学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当初伏羲画卦就是播下了这颗大树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来到了画卦伏羲的故乡，也就是来到了易学的发源地。今天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们于伏羲画卦数千年后，共聚于羲皇故里一同研讨伏羲与大易文化，追溯那个人文初启的时代，探索广大易道之源流，这也称得上当代易学研究的一大盛事和佳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古老的《周易》则是引发这一伟大文明的源头活水。这部经典上自伏羲画卦而来，扎根于远古人类初始文明，堪称中华文明最为古老而又系统的文化载体，同时它又是中华文明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思想文化资源，其影响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遍及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政治、伦理、史学、文学、艺术以及医学与各种自然科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宋儒胡瑗称《易》“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不仅道出了易学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宗旨，也揭示了易学发展史的整体特质。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学术视野的开启，学者们逐步突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开始以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解读《周易》经传，重新审视和评价易学发展史，易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大量先秦、秦汉易学文献的出土，使我们有幸见到了两千多年来古人所未见的宝贵资料。这其中既有片断式的易学材料，如刻于甲骨或器物上面的筮数、包山楚简中的易卦、新蔡葛陵楚简中的易卦等；还发现了三易中的《归藏》；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国和汉初《周易》经传的本子的问世，包括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安徽阜阳汉简《周易》。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些新的易学文献，极大地拓展了今天《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

自1978年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的说法以来,学术界开始运用新的出土材料对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起源及演化、卦爻画形状、筮法及其演变、龟卜与筮占的关系、《周易》的成书、三《易》的关系等问题加以新的审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可靠文献的缺乏,在很多方面还处于一种猜想阶段,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证明。而简、帛本《周易》经传的发现,则可称得上是易学研究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战国楚竹书《周易》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周易》文本,马王堆帛书本则保留了汉初今文易的原貌,我们在传世的《周易》文本之外,开始看到先秦易学和汉初易学所呈现的多种面貌,借助于此,学界在疑难卦爻辞解读、不同的卦序及其意义、《易》与儒道的关系、《周易》的版本及其流传情况、今帛本《易传》的关系、今古文易学的流变及考释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果,但是同时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尚未充分开发的领域,真正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现。以简帛易学为核心的早期易学研究,是当前易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需要考古学界、文字学界、史学界、哲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地长期做下去,我们才可以期望获得更多的既信实可靠又兼具广度和深度的研究成果。

当然,我们在积极肯定出土易学文献研究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传世文献,吸纳出土文献,在更大的学术视野和更多的学术向度中推进易学研究的整体性进步,以求化生出易学在现时代的独特的学术品格,回应时代问题,更好地昭示和发挥易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我想这既是我们召开此次易学研讨会的学术期盼,也是两岸易学界同仁共同的文化追求。

本次大会在“伏羲画卦与中华易文化传统”这一主题下,着重讨论了“伏羲文化与易学起源”“出土易学文献”“《周易》经传解读”“易学哲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历代易学的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出海内外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为方便海内外同仁查阅参考,今将大会论文精选集予以出版。在此,也向参加和支持本次会议的学者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 《郑学丛论》前言<sup>\*</sup>

高密是大经学家郑玄的故乡。为纪念这位先贤,推动中国经学研究的发展,2010年7月20—23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国周易学会、潍坊报业集团、中共高密市委、高密市人民政府在山东高密联合召开了“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台湾国际易经大会、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海内外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切磋问辨,围绕郑玄与经学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值大会论文选集出版之际,就中国经学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生当东汉末年的郑玄,面对西汉以来经学今古文对峙、各家经说日趋繁杂的局面,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职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打破今古文经学的门户,叠用今古而遍注群经,实现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注解方法到注解内容都为后世所效法,成为中国经学的典范,影响深远。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郑玄经学依然以其不可替代的学术魅力,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思考它所蕴含的丰富学术意蕴和精神价值。

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经学则是儒学的根本。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删《诗》《书》,修《礼》《乐》,赞《易》,作《春秋》,接续起上古以来的礼乐文化,并将深沉的人文价值理性贯注其中,以仁为指导理念,塑造出一个融旧铸新的儒家哲学文化和王道政治系统。虽然后世儒家经书数量不断扩充,由六经而七经、九经,最终确立为十三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儒家经典进德修业的精神主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经学从诸子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学,其后两千多年经学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学

<sup>\*</sup>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术研究的主流。经典不仅仅属于过去,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使儒家经学以多面向的理论内涵,紧扣历史的脉搏,鲜活地呈现于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历久而弥新的哲学——文化意蕴。各个时代的人们借着经典而走进历史,成就自我,走向未来。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经学发展史。冯友兰先生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两汉的学术固然是经学的天下,魏晋的玄义风流在老庄的浓妆重彩下,其底色何尝不是儒家经学的意趣。宋学则更是汉学以后从方法到义理都发生了极大转换的经学新样态,出现了以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钱穆先生甚至提出宋学较之汉学更为接近先秦儒学。清代以降,经学由精微玄妙的哲思转入求真务实的朴学研究,崇汉学而贬宋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标的,在经典本来面貌的考据训释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难看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潮的形成与转进基本上都是围绕经学问题而展开的。

儒家经学就其表象来说是对六经、十三经文本的解读,是在研究这些经典,但其实质则是对宇宙人生、历史文化、典章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涵盖当今众多学科的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以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物郑玄来说,首先他是一个杰出的经学家,再具体而言,他又是训诂学家、文字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天文学家、术数学家,等等,所有这些名号都不过是就郑玄经学成就的某一方面而言,在郑玄那里它们都是一体相通的。清代中后期以来,经学自身内部日益与时代问题脱节,外部则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到“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经学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打倒孔家店”的声讨中,很快走向没落。以西方学术体系为蓝本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学科,将经学四分五裂,曾经作为中国人价值来源和学术中心的经学,彻底成了无处安身的游魂。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提出,“五四”以后经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经学史的研究。暂且不论这种看法的偏激和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所谓我们需要做的经学史的研究也并不令人满意,片面而乏味。一直以来经学史的研究论著,包括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和现当代的些许经学史作品,都不过是在描述经学的形成过程和经学史上的历史事件,并不关心经学的义理和其核心价值之所在。这也无怪乎今天许多经学史论著都出自古籍文献研究机构。反过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则是抛开经学而另起炉灶。于是,经学史中无思想,思想史中无经学,前者没有灵

魂,后者没有根基。真正能够在深入考察辨析的基础上统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经学史尚未出现。正因如此,我们此次郑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海峡两岸文、史、哲领域的众多学者,希望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能够对郑玄经学、汉代经学乃至经学之整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

近二十年来,经学研究逐步走出“五四”的低谷,开始摆脱某些错误观念的束缚,正视自身的学术特色和思想资源,学术界也一直在寻求恰如其分地研究经学的方式与方法。经学史的研究在一定层面上也是经学的研究,关键在于能够直面经典,把握住经学和经学史中的问题,我们既要弄清古人在经典及其注疏中说了些什么,更要思考古人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不能明白经典之用意,那么对经典本义的理解就不够充分,甚至产生误解。通过对经典之用意、经典之问题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经学,把握其伟大的意蕴。不断地向经典回归,是中外思想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当走进经典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绝不仅仅是过去,经典所开启的宇宙人生之思,为我们思考和处理现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指导。儒家经学所诠释的礼乐文化,向世人所揭示的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序与和谐,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自我成就的永恒的主题。因此说,今天经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纯粹整理故纸堆,而是透过经典走进历史、审视当下、走向未来的人文学术研究,是我们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接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探索。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话语范式转变的困境,也只有重新回到经学,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初土壤中去,才能发掘出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才能在现代问题的考量中开显出新时期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世纪之交,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清华简中的古文《尚书》以及郭店战国楚简等等,都是经学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为我们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李学勤先生甚至提出:“世纪之交出土的简帛,已经涉及到中国学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关系到整个学术史以及有关问题。”简帛文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但传世文献的研究还应是学术研究的重心,两者并无抵触之处,完全是彼此相应的。所以我们在简帛文献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在郑玄的故里举办这次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一则是希望以郑玄经学研究为向导,推动两汉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史的研究,二则希望传统经学研究能够与简帛学术研究相呼应,从而

使中国经学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交互研究中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清儒王夫之云“六经责我开生面”,做好传统经学研究,做好经学与现代的对接,正是我们现在无可推卸的责任。



## 《大易集思》前言<sup>\*</sup>

2011年10月13日至10月16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研究院、韩国周易学会协办的“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成功召开。

早期易学研究,自古至今都是易学研究的重心所在。本次大会所说的“早期易学”在时间上界定在先秦至汉初,在内容上则包括从八卦创制到《周易》经传文本最终定型之间的所有问题。我们在去年出版的《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前言”中曾指出:二十世纪易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学者们打破两千多年的传统研究模式,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周易》经传展开了全新的研究;二是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易学考古资料的发现,使我们见到了两千多年来古人所不曾得见的珍贵资料,为今人考见先秦至汉初易学的原初面貌、解决易学史上的诸多难题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这两件“大事”都属于早期易学的范畴,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经典价值”到试图“重建经典价值”的过程。

以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为例,他们除去《周易》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视为古籍文献之一,利用殷墟甲骨卜辞资料,揭示了卦爻辞中的商周史实,证明了《周易》古经的著作年代基本上是西周初叶,其后的诸多研究多是为这一观点作补充或发展,终不能超过或推翻它。其贡献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研究纯粹视《周易》古经为占筮记录,其中既没有精微渊深的玄理,也没有进德修业的说教,卦爻辞就是卜筮的记录,研究《周易》不过是为了揭示卦爻辞作为占辞的真实含义,自《易传》以来治《易》者所遵循的象数、义理之说通通都被否定掉了。这也就犯了所谓“疑古过勇”的错误。

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周易》古经的成书、其中所

<sup>\*</sup>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包含的意义,以及《周易》经传间的诠释关系,远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者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和片面。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为代表的简帛易学文献,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证明早期易学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它们和传世本《周易》卦名不同、卦画不同、卦序不同、卦爻辞也多有不同。对于卦名的不同,除了从音韵训诂上为之疏通解释外,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简帛本《周易》卦名有些与《归藏》有关,这就为我们研究三《易》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卦画的不同,所反映的不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筮法有关,更进一步也可能牵涉到八卦的创制问题;卦序的不同,反映出了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理念,牵涉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非常复杂;卦爻辞的不同,则为我们弄清卦爻辞的本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为我们探索西汉今文《易》和古文《易》问题创造了条件。还有不同《易传》的问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在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以前,人们对此一直怀有疑虑,因为传世本《周易》经传中从未论及“五行”,而帛书《易传》使人们看到当时确实已经以“五行”来论《易》,这就涉及到五行思想与易学的结合问题,也涉及到不同的《易传》作品的写作和流传问题。

一言以蔽之,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三《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易学在不同地域之间有什么异同,是如何流传的,易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与融合是如何进行的,易学的思想内涵前后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或新或旧的问题,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在今天都有了被进一步解答的可能。

有鉴于此,本次大会以“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为主题,围绕“《连山》《归藏》研究”“《周易》经传的成书”“卦爻辞的训释”“‘数字卦’诠释”“卜筮研究”“简帛易学文献解读”“孔子与易学的关系”“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形成”“先秦易学的流变”“汉初易学的基本面貌”“今古文易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与欧洲特别是中世纪在数术学上的比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与研究。

大会收到论文 66 篇,收到著作两部,内容涉及到早期易学的诸多方面,现择其大要,对本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做一简要总结。

在《归藏》研究上,有的学者对已有《归藏》研究成果进行了翔实的回顾与评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王家台秦简《归藏》及传世本《归藏》理清了脉络。与之相关,有的学者特别从商、周之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变的角度,对《归藏》与《周易》的关系问题做了考察,为我们研究《周易》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思路。学者们

还专门考辨了《左传》中的韩宣子所见“易象”的问题,提出了新说。

在象数问题上,有的学者通过对数字卦的考察分析,论证了象数的起源问题,提出数源于筮,象起于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观象系辞”的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周易》文本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的学者则辨析了今、帛本《易传》上“易逆数”与“易达数”的问题。有的学者对爻辞与爻位卦时的关系作了研究,并探讨了爻辞的编纂原则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

在《周易》经文的注解问题上,多位学者运用简帛易学资料,专门对一些卦爻辞做了训释,并且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特别是坤卦卦名的问题,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有的学者则就楚竹书《周易》异文问题,探讨了其中可能蕴含的价值,为了解今本《周易》形成的变化,提供了一条合理的路径。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卦爻辞的表达方式问题,论证了卦爻辞的类比属性和例说功能。有的学者则提出了在出土易学材料的影响下《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问题,特别提出了传统的训诂与哲学意义的断裂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索。有的学者则论述了《周易》语言研究中的原则与方法,指出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误区和应该遵循的路径。

在简帛易学研究上,学者们对马王堆帛书《衷》《要》篇的一些章节进行了训释,疏通了其中的难解文句,探讨了帛书《易传》中政治哲学和哲学解释问题,深化了当前学界对帛书《易传》思想的认识。有的学者对天水放马滩秦简所见的音律占卦资料进行了辨析,并就其与《周易》的关系作了探讨。

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在充分占有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谨慎的分析,认为孔子与易学的密切关系不能否定,但要想证明今本《易传》为孔子所作则文献不足。有的学者对《孔子家语》中的孔子易教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证。有的学者对《易传》中圣人的作用或意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我们研究《易传》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汉代及以后易学史研究上,有的学者通过对史籍的考辨,研究了汉代《周易》的今古文问题。有的对《易纬》与孟喜、京房易学的关系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并针对学界的误解,指出了它们的哲学价值。有的学者对汉代大经学家郑玄以礼以史解《易》方法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对东晋时期的干宝易学卦气说、八宫说的宇宙哲学进行了论证。学者们还对朱熹易学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朱熹易学的整体特质和理论意义予以了深刻的解读,对其“《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另外,学者们还对近现代学者梁启超、熊十力的易学见解和

思想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他们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

在《周易》哲学研究上,有的学者专门对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形成问题作了深刻的考察,分析了从《易经》到《易传》的哲学演变,指出了易学作为整体生命之学的特质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周易》与宇宙的多维度性问题,很有启发性,值得深思。学者们还讨论了《易传》的天人之学的问题、“生生”观念与中国哲学的本质直观问题、《易经》中的时间性言说问题,提出了由天人关系到天、象、辞的演变问题,等等,对今天的易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建设性和启发性。

在《周易》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上,有的学者在先秦诸子学派演变进化的背景下,对“周易管理学”的形成机制、内容特质、思想资源作了深入的论述,分析了《周易》对中国古典管理的塑造与培育。有的学者则从心理学的视野分析了《周易》占筮的预测心理过程,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向。

在术数学研究上,有的学者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传统相术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探讨了“科学”“迷信”等观念在中国命学中的作用和内涵。有的学者对《葬书》中的《周易》因素作了分析和比对,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研究了易学在风水学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更为别具一格的是,有海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的巫师和术士形象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对欧洲的骨卜和沙卜进行了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术数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系。

在海外易学研究上,学者们对阴阳哲理的起源及其对越南人性格的影响作了分析,对越南信仰、风俗中的阴阳五行说作了研究,显示出中国易学文化对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

综合来看,本次“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简帛易学及其相关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可以想见,简帛易学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是问题意识鲜明。可以看出大家在对于易学的探本溯源中试图寻求一个新的也更为合理的治《易》之道。这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也是今天学术界的历史责任。

三是国际化特色突出。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不仅研讨中国易学,而且研讨了欧洲的术数学,越南的阴阳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总而言之,“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项研讨都非常成

功,与会学者的学术热情都非常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非常感谢各位学者、各位朋友对这次会议和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关怀。今天特将大会论文精选集出版,以供海内外学界同仁参考。



# 青岛巨峰开发区整体设计规划

## 一、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周易》这样,引起人们如此长期的普遍的关注,被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传习。

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周易》这样,派生出如此众多的研究专著,成为永恒的研究母体与永恒的研究主题。

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周易》这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如此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周易》强大而又永恒的文化魅力何在?我们如何把这一文化魅力以人文景观的方式表现出来?

《周易》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何在?我们如何以观赏游览的形式,将其影响转化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

## 二、总 则

“巨峰游览区”正是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将“大道之源”“众经之首”的《周易》,以物化的形式,借助八卦八门及其景区内的一组组建筑群体的外表与内涵,展示其阴阳哲学的独特思维模式,表现它如何以卦爻象数符号为形式,

在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处处贯通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处处展示其阴阳互补的原理。通过模式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称作“逻辑”,杜林称作“世界模式”。《周易》在这方面可谓开中外哲学史的先河。而“巨峰游览区”的设计,则尝试以崭新的思维方式,把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活水”,把《周易》种种古奥神秘的内容,把它生生不已阴阳互补的思想,总之,把这“大道之源”“众经之首”的内涵,借助秀美的崂山巨峰景观及一组组附属建筑及其内藏的展品,用娱乐观赏及参与的方式,找到一种新的表达媒介——也就是说,我们设计规划“巨峰游览区”,将以这些自然景观与建筑群体为依托,使人们在赏玩中亲身体认道家经典——大易文化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的轨迹,其中特别突出其由巫文化向人文文化发展转变的轨迹,并重点介绍其“人文化成”思想,让游人以非常愉快的方式,受到一次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道德的教育。

### 三、景观

“巨峰游览区”以主体自然景观“八卦”之八门为主题。另外配合多个景点组成。其参观游览项目大致分为四种类型:(1)游览型(2)赏玩型(3)参与教育型(4)学术智力型。景区因离市区较远,因此所具备的设施与功能应为“听”“看”“玩”“购”“食”“宿”全备,游人不仅可短游,而且可长住。为使这块仙山翠柏环抱的风水宝地能托载起这一宏大文化主题,其负责人需有远大的战略眼光。规划设计人员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争取让这一主题与周围环境在规划设计上臻于最完美的统一,从而形成青岛乃至全国的一大著名景观。

“巨峰游览区”之主门,乃一雄伟的石牌坊。初步设想安放于离门之前约一百米处,游人由一条商业街稍加过渡而入门,牌坊上横刻“天地淳和”四个大字。主门之联曰:

鳌崂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  
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

门旁立碑,刻“巨峰景观开发记”,由名家书写。

凡购票入园者,皆可获“巨峰神游”纪念牌一枚(类似开会时做的较精美的出席证)挂于上衣口袋上,既有纪念意义,又有识别是否购票之效。



入门便是一个极为宽阔的院落,院中由黑白两色大理石砌成一个巨大的“太极阴阳鱼”图案,四周依“先天八卦”方位排列八卦(具体依太极阴阳鱼之大小定八卦之大小)。此“太极八卦图”(以下简称“太极图”)一定要从高山之上可以看的非常清楚醒目。具体设想是:(A)太极阴阳鱼图案直径二十公尺,连同四周之八卦为直径三十公尺。此取《系辞》“参天两地而倚数”之义而定。(B)如果院子大,太极阴阳鱼图案可做成直径二十四公尺,连同四周八卦为直径三十六公尺(此取老阴老阳之策数定之)。这样依(A)方案院子直径可为三十六公尺(老阳策数)或四十公尺。依(B)方案为四十九公尺(取“其用四十有九”之义)或四十四公尺(取一变之策数)。

“太极图”除具有供游人赏玩、游览两项内容外,更重要的是,游人还可直接参与而受到教育:譬如游人可到巨大的“太极图”园心感受太极所带来的良性气场,反思自己,祈祷好运。亦可分坐于四周先天八卦的巨型条石上化解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与不顺利,情人可以从相对的不同位置由“太极图”边缘部分,闭上眼睛,向黑白阴阳鱼之鱼眼睛走去,走入眼中者最好,走入太极鱼头部分位置者,亦好(一般皆可走入)。新人还可在此举行婚礼,男女新人先各站于太极阴阳鱼之眼上,然后由此走向园心,再站在一起向天地父母鞠躬如仪,以示阴阳互补、今后生活美好。凡此种种,皆为参与教育型。还可不时请专家、学者前来“太极园”作学术演讲或讲座,起到推动学术之作用,以提高我园的品质与档次。

“太极园”设“学聚”“问辨”“宽居”“仁行”四个厅,展放《大哉孔子》与《中华周易大展》两大型影展的全部作品(由山东摄影学会存展),另有“乾坤厅”作接待贵宾之用,“化成”厅存放游园名人题辞墨迹。“乾坤厅”之联语为:

综三百八十四爻 爻爻刚柔立根本

观四千九十六卦 卦卦吉凶生大业

“化成厅”其联语为:

仰观俯察 天地大太极 万物小太极

近取远拟 人身小阴阳 世界大阴阳

其后院内以石条砌成后天八卦图,游人可坐于其上,以祈好运到来。后院主楼门联为:

仙山涵德水

易园育仁风

后院部分房屋还可作中国周易学会或国家易学基地研究机构之用。

“太极园”因依“太极图”而设园,此图学术界基本公认为宋人所出,故全部建筑皆可依宋式建筑为基调。

八卦阁为我们所设计巨峰游览景区的第二大景点。“八卦阁”坐落于我们景点的第二块较大的空地上。依古代风水之书,形成由北向南或由东向西、依左“青龙”而右“白虎”之势,建阁之处一定要地势形胜,极远之处便可见到此一胜景。能与将来规划入山之路在同一中轴线上最好,可展宽视野而容纳旺水。“八卦阁”为八角八层,如不便太高亦可八角三层,不必受到佛塔格式影响而仿效之(因佛塔晚入中国,不可为据)。此雄伟而又壮观之八卦阁大门(或牌坊)上书联曰:

赖卦中风韵,赐此难寻求之机遇,举置大易万千世界;

是爻里情趣,开斯未曾有之景观,领略八卦古今奥义。

假若基座直径二十五米,则阁高四十九米。基座取十八米,阁高则取三十六米。若基座十二米,则阁高取二十四米。

八卦阁入阁第一层为“观象厅”,“观象厅”之大门联语为:

松海婆娑,三山仰观三山月

天风鼓荡,八卦俯察八卦阁

其八面墙壁上布置八幅壁画:(1)河图(2)洛书(3)伏羲八卦次序(4)伏羲八卦方位(5)伏羲六十四卦次序(6)伏羲六十四卦方位(7)文王八卦次序(8)文王八卦方位,地面以水磨大理石按方位做成“后天八卦图”。一层大厅中间不用墙隔开,使之与雄伟气派之外表有机地联系起来。该层不设具体内容,游人入此可坐于连椅上稍歇,观看雄壮的大厅,立于“后天八卦”上感受八卦气场。

“八卦阁”二层为“八卦厅”,其门口联语为:

妙境入眼前,满壁图书讲阴阳。

好风来座右,遍山松涛颂古经。

由声光电及模型图片介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卦象一定要做的生动别致,将象数与易理结合在一起,以增加游人的游兴,使游人在游览中感受到《周易》所谓“立象以尽意”的乐趣,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层可为录像厅,放映有关崂山巨峰景观录像,供游人小憩之用(一般每场二十分钟左右)。游人看专场者一小时左右,可另付费,并出售有关录像带。当然,更可供游人登高远眺,并配以望远镜等,遍览周围美景,以壮胸怀。

“八卦阁”下另建有取名为“三品堂”的大小餐厅,可以由所聘名厨师设计一套八卦菜系。如“太极大菜”“两仪套菜”“乾坤合欢汤”等。另外还可设计八卦菜谱,如“乾元”“坤亨”“震来”“巽利”“离贞”“兑吉”“艮获”等等名目的菜单供游人用餐。

因“八卦阁”之后天八卦方位乃《系辞》所定,今本《周易》所存最古资料是汉人资料,赖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及陆德明《经典释文》辑录之资料,始可见其汉《易》面貌。如无唐人此等贡献,今人将无法考见汉《易》之貌,故“八卦阁”我们将以唐建筑为基调,以资纪念。景点沿线以不同方向分布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共八卦八门。此八卦八门每门皆有联语说其内涵。八卦八门联语:

离门联语:

乾坤知造化 登易学堂奥 瞻识无碍  
天地任作为 入数术门庭 悟法有方

乾门联语:

门射祥辉领八卦  
道涌吉光证三才

坎门联语:

草木凝卦聚神气  
海天呈爻演道源

震门联语:

海涛拍岸疑雷至  
雾气拂面是云飞

兑门联语:

宽居仁行君子自强  
学聚问辨朋友讲习

巽门联语:

八卦八门千古灵秀  
四象四德万物更新

坤门联语：  
身过斯门直方大  
人居坤位自含章

艮门联语：  
叹艮门山重 望似无路  
听林中松涛 顿开九天

通向每一门的路皆以其卦义取名。如通乾门之路曰“自强”，通往坤门之路曰“厚德”，离门之路曰“丽正”，坎门之路曰“习教”，巽门之路曰“志行”，兑门曰“讲习”，艮门曰“光明”，震门曰“致福”。八卦八门之外，可于合适之处修几处小景点，以尽虚虚实实之妙。为结合崂山多雾之特点，可修小亭，上书“停云”以名之，并书小联一幅：

云吞白虎虎吞云  
雾吐青龙龙吐雾

以尽其妙等。

## 结 语

人类分布于世界各地，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这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整合，融通的格局，已渐次形成，正如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也随着改革、开放与民间旅游交往而走向世界，接受那异质的欧美风雨的挑战，并逐渐确立起它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才兴建此景区。其目的在于：

（一）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以人文景观方式，阐述传统文化对我们伟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二）在目前人文环境普遍受到污染的情况下，以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对人们进行教育。这也是我们兴建斯园的重要目的与任务。我们要使人们在观赏、娱

乐、旅游、览胜中处处感受并参与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教育与熏陶,以达到提高人们德性修养,净化自己意识的作用,引导游人以德求福,以仁求吉。其具体内容很多,但主要还是针对“德”与“仁”二字下功夫。如(1)培养勤奋(2)自强不息(特别是这方面的民族意识)(3)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4)祥和(5)谦让(6)礼貌(7)互助互爱……当然这种教育,绝不能使人们感到入园又办起了学习班,这种教育应当是非常生动有趣的,不但不能冲淡人们的游兴,而是要人们在参与娱乐中感到拉高了自己的形象,增加了游兴与自尊。

总之,以《周易》古经中天、地、人“三才合一”思想,保护自然景观,保护原先遗迹,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是指导我们规划的最大宗旨。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将景区的人文景观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阔视野之内,以规划处理各种景点与游览项目,我们希望奉献给游人的是:入园得山水清气以增德,出园极天地大观而添仁。只有这样,我们的规划才不会很快被时间的枯叶所掩埋。

只有这样,巨峰景区的设计才能在历史的长廊中留下自己的回声……

刘大钧 2002 年 4 月 3 日

于运乾书斋

备用联(附联)见后:

巨峰游览景点若有后门,后门之楹联为:

客若来游,总宜放开胸襟,常容纳些晴烟晓雨,古柏寒松,始解得八卦象告。

事即了悟,何必阻碍精神,多感知点河图洛书,阴阳剥复,方通晓爻象情言。

天乙泉之联为:

山灵聚旺气

水秀得人杰

览车入口大门之联:

观化循大道

登高望九州

## 在巨峰游览区开放仪式上的致辞

252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今天，又一次置身于神奇秀美的崂山巨峰游览区，满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参加巨峰游览区的开放仪式。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一年前，我有幸受崂山风景区管委会的邀请，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巨峰游览区实地考察、为其进行文化内涵设计工作的一幕幕。那时我被崂山巨峰这巧夺天工、神奇变幻的天然之美所折服和陶醉，从此，我便与崂山这一千古仙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崂山绵亘数百里，自先秦以来，道教名山和海上仙山的声名远播四海，但以其极顶——巨峰为中心的巨峰游览区，千百年来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世人所至、所知甚少，崂山旅游区因此也囿于“擦边游”的游览格局。那时全国游人到崂山，只能到上清宫一游，可谓：集长风乎万里，浮祥云于上清。游人如欲登崂顶而一观海天，则只能望之兴叹。两年前，根据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的指示要求，崂山风景区管委会按照高起点、出精品的原则，实施了崂山巨峰的开发建设，时至今日，我们揭开了巨峰游览区的神秘面纱，使游人终于可以一识崂山真面目。

在巨峰游览区的建设过程中，我有幸受托为其进行了文化内涵的设计。巨峰游览区文化内涵的总体设计思想，就是将大道之源、众经之首的易经，融入景区神奇的自然环境中，展示其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体现阴阳哲学的独特魅力。其重点，一是山门的设计。山门的联语，既体现了崂山山海相依的特色，又记录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主体因素，没有“海抱神山山抱海”这样的地域交错，就没有眼前这雄伟的山海奇观，没有历代先贤们“贤传大道道传贤”的辛勤传承，就没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两种因素有机结合在崂山，显示出先人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的努力，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赞美与期望。山门前的“嘉会”巨石，象征先人在崂山留下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象征着

各位嘉宾在崂山的相聚。二是巨峰八卦门的设计。巨峰是崂山的主峰,沿不同方向延伸出五大支脉,每一支脉又分成多个小支,自然形成了与主峰相呼应的八个山口,所在方位正好与易经的八卦方位相通,显示出大自然的点化与中国古代先贤哲思的巧妙吻合。因此,我与景区管委会的负责同志经过多次现场勘察和反复商酌,确定了八卦门的方位,并根据八卦卦义为八卦门撰写了联语,以聚景区旺气。

古人云:“人杰地灵。”一个地区的建设如果仅仅靠地灵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人杰的作用。因此,巨峰游览区的建成,如果没有青岛市委、市政府的高瞻远瞩、英识果毅的创意和决断是断然不会成功的。

崂山这一千古仙山所蕴含的奇景妙趣和无穷魅力,是无法完全用言语来形容的,它需要我们在游览中去细心地体味。

最后,请允许我用这样一首七言四绝结束我的发言:

如此祥瑞际会辰,  
丈夫谁肯负经纶?  
吾知创意斯盛者,  
是与神山有缘人。

谢谢各位参会贵宾!

2003年9月9日

## 谈《易》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sup>\*</sup>

《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也是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因为它最古,自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因为它地位显要,所以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它的影响而与之交融汇通。可以说,在《周易》思想的启迪促发下,形成了一股大易文化之流,这股文化之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的阴阳之道与生生之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象数模式,作为一种在《否》《泰》《剥》《复》中不断追求开放平衡与发展的高层次动态智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展示了传统文化迁衍变化的过程。它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学、道学、佛学……全部程度不同地打上了《易》的印记,什么“魏晋风度”,什么“宋人气象”,皆得泽于《易》,故《周易》自汉代始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大道之源”。由此看来,开展《易》学研究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可谓不言而喻。至于开展《易》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讲:

1. 现代文化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体现了该民族的本体精神,体察这一本体精神,乃是关系到该民族继往开来吐故纳新的根本性前提。大易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如上所述,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本体精神,因此,当今研究《周易》,对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剖析传统与现实的应力,以重建民族新文化,重塑民族新精神,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周易》既然在历史上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科技等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样,它的一系列“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精深思想,对于包括现代哲学、文化、科

<sup>\*</sup> 本文原载《中外交流》二十期。



技在内的整个现代化知识体系,肯定亦富有重大启迪作用。自十七世纪《周易》被译成多国文字走向世界以来,曾启迪莱布尼兹创立了二进制。近来,学者又探得它对现代遗传学、光电学、模糊数学、现代管理学、现代预测学、天文学、地震学等等,皆有重大启发意义。但据我所知,目前《周易》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基本上还停留于自然科学层面和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范围(即指其占筮功能),对于《周易》精神的深层发掘,成果尚少。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既然有交融、有对话、有接触,则不同文化本体精神的火花撞击必然带来新的光电,到那时,《周易》将不但在中国,在东方,更将在全世界大放异彩。

3. 值得欣喜的是,上面所云新光电的势力已经在指导如何使人类与自然保持和谐中显现出来:1989年10月,在日本高山市召开的“第二届阳光文明国际会议”上,围绕“人和自然”这一专题,与会代表看到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因人类无节制地索取而遭到破坏,学者们纷纷寻求解决的办法,争论是激烈的。中国学者根据《周易》“天”“地”“人”互应的“三才”思想,指出:过去人们使用“环境”一词,总是把它看成人类周围赖以生存的条件与背景,把人看成舞台的主人,似乎环境只是周围的布景。其实,人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只有用《周易》“三才”思想重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宏观决策规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学者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并被写进了这次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大会总结报告中,在会内会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目前所谓的“《周易》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算卦热,很多人误以为研究《周易》就是搞算卦,认为《周易》这本书是“算卦的书”。——这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于《周易》深层的理论价值,则“百姓日用而不知”,鲜为一般人所认识。《周易》古经确实是古代占筮活动中产生的一部占筮之书,但到战国时代,随着“十翼”的问世,《周易》已不再仅是一部筮书,而是成了一部“极天地之渊蕴,究人事之终始”的哲学典籍。至汉代,《易》被尊为“五经之首”成为“大道之源”。此时《周易》的占筮功能虽未被抛弃,但已不再是《周易》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了,随着“十翼”(即传统说法孔子所作之“传”)成为《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成了《周易》“学”与“术”的划分。孔子是使《周易》从一部筮书转向一部哲学典籍的第一人。自汉朝起,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皆将释经释象之“学”归在“经”部,而将占筮的内容归入“术”(即“术数”)。近如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中,《周易》之“学”归“经部·易类”,而其“术”则在“子部

·术数类”。因此,历代封建王朝早已将《周易》的“学”与“术”作出了严格区别,二者不能混同,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当然,《周易》的占筮内容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也应研究,且过去举凡《易》学大家,亦皆精于筮法。但这种研究应以“学”为主,“学”“术”兼顾。那种只研究“学”而不准研究“术”的态度固然不足取,但目前出现这种以“术”取代“学”的倾向,则更是错误的,确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 本刊主编答香港中通社社长 郭招金先生问<sup>\*</sup>

不久前,刘大钧教授到香港访问,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兼总编辑郭招金先生就有关大陆《周易》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专访了本刊主编刘大钧教授,现据采访记录,整理发表如下。

问:人们经常谈论,中国近十年来出现一股《周易》热,您是否认为中国存在《周易》热?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近十年来,中国关心《周易》的人越来越多,确实形成了一股《周易》热。但这种《周易》热并不是《周易》的研究热。因为由近十年的《周易》研究成果看,对传统易学的研究,对易学发展史与近代史的研究,对易学中某些专人、专题、专著的研究,对新出土易学资料的研究及中外易学研究方法论的比较等等,都还做得不够,有关这方面的书和文章,虽发表了一些,但还达不到“热”的程度。那么,这种“热”又是从何而来呢?人们对《周易》的这种关注与热情,具体说,起始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1987年12月5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建国近四十年来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的召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港台与美、法、德、日、韩诸国报纸纷纷对此次大会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会议从参会学者的人数到提交论文的篇数,都是建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易学盛会。因此,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称此次大会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香港《晶报》还专为此次会议发表了题为“国际易经大会的启迪”的社论。那次大会的圆满成功,不仅体现在专家学者们充分交流讨论了易学研究的课题与方向,同时,由于对会议的广泛宣传,更是引起了国人对《周易》研究的关注与重视。可以说,正是这次国际易经大会,拉开了中国大陆《周易》热的帷幕。会后不久,利用

<sup>\*</sup>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1996年第2期。

国人对《周易》的关注与重视,自称“破译”《周易》的人相继出现,先是自称“破译”八卦者,后是自称“破译”河图与洛书者,接着,热的真正支点——“预测学”又出现了。“预测学”实际上是讲的《周易》筮法,更具体些是讲的西汉人京房的“纳甲”法,其次还有“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等等,严格讲,后两种只是“援《易》以为说”了。故以“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引发的中国《周易》热,后来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筮法热。兼之丰厚的利润,诱引一些出版部门专出筮法及与此有关的书籍,一时书市上此类书籍五花八门,泛滥成灾。江湖术士借此而起,又进而将“筮法热”变为“算命热”。因为算命热与《周易》热混在了一起,以致后来很多人误以为“八字”“梅花易”等算命术就是“研究周易”的了。

在国际大会的带动下,我们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中国第一家《易》学专职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而早在1980年,我们即开设《周易》专题选修课,1985年,承担了国家八五规划社科项目“易学史”的研究。1988年,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易学学刊《周易研究》,此刊由梁漱溟先生亲笔题写刊名,雷洁琼、周谷城、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邱汉生、金景芳及台湾严灵峰、陈立夫、吴大猷、孔德成、蒋纬国诸位先生皆为本刊题辞,刊物发行量很快由九百份增长至九千份,到1991年,首次征订发行量达到三万余册,发行到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

1989年五月,我们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中国周易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此后不久,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省、市、县级的周易研究会,这些组织亦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国际的或国内的《周易》学术讨论会,最多时全国一年有七、八场这样的会。有的地方学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将开会与开发地方旅游资源结合起来,谓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因而年年开会。此亦是形成周易热的原因之一。

问:当代中国人对《周易》的兴趣是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为什么?除了《周易》自身的学术魅力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社会原因?

答:我认为当代中国人对《周易》的兴趣,尚未能超过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譬如说,就很难超过汉代。因为在汉代,《周易》凌驾《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且自此之后,经的崇高地位即基本上被确定,直至清代,历代都无人敢变动这本“天人之学”的学术位置。《周易》之学在西汉突起之后,特别到了宣帝、元帝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

赋,还可以做官。那时的《周易》可以做晋身之阶,自然比今天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因此,世人纷纷传习,持论也自标新立异起来。任何一门学问,如果没有“名”“利”做诱饵,一般情况下,很快会衰败。所以,我认为,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大功劳莫过于:当举子们举起“四书”“五经”作敲门砖时,其学问也就从这些求名求利人的肘腋间传下来了。因此,当代中国人对《周易》的兴趣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经过多年的极“左”禁锢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精英人物都想在经济的大潮中寻找机遇,一展拳脚。他们往往能从“生生之谓易”中,找到自己经营企业“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的思路。从“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及“亢龙有悔”中,寻找到把握企业发展的尺度。从“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中,清醒地看到不断更新企业结构的重要性。而最重要的是,经过极“左”、特别是“文革”的严重破坏后,企业界的一些有志之士,可以从《周易》中汲取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从其高深哲思中,明白不断完善并提高个人的德性修养对经营成功的重要性。这就是《周易》中所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特别是《周易》指出:“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云云,正是从这部古籍的幽廊中,给人们送来一股股新鲜的思维氧气,令他们兴奋不已!也正是从这部《周易》古经中,最早提出了“富家大吉”的概念,而《系辞》篇更指出“理财”要与“禁民为非”结合起来,故国内一家大企业的总裁问我《周易》与经营的关系时,我以这样一幅联语赠他:易经首言富,系辞论理财。

一些普通的中国平民百姓,他们在求发展找出路时,亦可从《周易》对“时”“中”“度”等等阐述的思想中,给自己找到最佳参考。因此,《周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成为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雅俗共赏之书,自然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兴趣。

问:《易》本卜筮之书,许多人学《易》是从卜筮入手的,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发展,已成一大流派,正如您刚才讲的,当前的《周易》热,很多人也热在这一方面,您是如何看待卜筮研究的?

答:依据易学研究的传统路数,举凡过去历代的《易》学研究大家,亦皆精于筮法。无论春秋时代为《周易》古经作传解的孔子,汉代被人们称之为“西汉古易正宗”的虞翻,宋代著名理学家、易学家朱熹,明代大易学家王船山,以至现代著名易学家杭辛斋、尚秉和等,他们除为《周易》经传作注解外,对《周易》筮法亦皆有极为精到的研究。因为《汉书·艺文志》中已讲到“《易》为卜筮之书”,

所以,中国古代《周易》的研究内容为“象”“数”“理”“占”,只是到了现代,一些学者已不再按照传统的路数去研究《周易》,而是只重其“理”,亦即多侧重于探究其哲学思想。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尤为突出,因为大陆从事《周易》研究的人,多是各个大学哲学系搞中国哲学的人。有的学者对《周易》筮法并无研究,因而对此有肯定者,亦有反对者。肯定者如已故学者冯友兰先生,他在1987年给“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说:“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任继愈先生亦持与冯友兰先生相近的观点。而对筮法持否定态度者又分两派,一派干脆认为《周易》乃哲学典籍,其与占筮毫无关系,另一派则感到《汉书·艺文志》中已讲到“易为卜筮之书”,不承认其与占筮的关系,似有不妥,于是指斥占筮为“糟粕”,经文哲理才是精华。

我以为,《周易》的占筮形式与解占方法,作为一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确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若一味进行压制,则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且正如冯先生说的那样,《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从春秋筮法到“纳甲”筮法,从蓍草演算到金钱演算,正是八卦象数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提供了它产生、发展与变化的基础。因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仅改造外部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不断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内容与生活境界,寻求认识世界和揭示世界的方式。《周易》的筮法,正是中国古代先贤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揭示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建议:凡是研究《周易》的人,是否都应看点筮法研究的书,尤其反对筮法研究的人,更应如此。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只有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的人,反戈一击,才显得有力。

问:据我所知,目前搞自然科学的人,对《周易》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推崇的,一种颇多微词,更有许多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易学,有的学者甚至以《周易》的象数为研究工具,试图攻克当代许多科学难题,比如哥德巴赫猜想等,我总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好像是骑战国时代的马车要登上月球一样,您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

答: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周易研究》学刊每年都收到大量研究《周易》与自然科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都是极有价值的。为此,我刊专设“易与自然科学”栏目发表之。但亦有少数文章存在如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无端比

附”，一种是“借题发挥”。如有人依据《泰》卦九三爻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而借题发挥为《周易》作者早已发现地球是圆的。再就是误将《周易》思想对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思维的一些启示比附成“其实”如何如何。也就是说，将“启示”说成“其实”：“现代科技的这一重大发现，其实《周易》早已有之……”您所说的，属于后面这一种。

目前在对《周易》研究的评价上，确如您所说的，国内外有很多搞自然科学的人，对《周易》给以很高的评价，也有人以个人的观点与思维方法，对《周易》“还其本来面貌”——当然只是他个人所认为的“本来面貌”，未必是三千年前西周那个朝代的本来面貌。这使我想起古希腊德尔菲城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的那句警世名言：“认识你自己！”有的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自以为他是用科学理性思维来认识《周易》的，其实未必！我们知道：科学理性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科学无禁区。一时不能认识的，未必就是谬误。诚然，科学理性精神与理性思维，对在一定条件下顺应自然规律地改造客观世界，以促进我们的物质需求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求真并不见的能导致美与善。目前科技的发展所引发的种种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与污染问题，就是从一个方面对此作出的最好回答。真正的科学理性并不否定价值理性，我们应该极其客观而又清醒地看到：《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从未因历代王朝的更换而间断其研究的一门大学问，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意义与价值功能。也就是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体系。它的阴阳之道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本体精神，是我们先民在自己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对其外部思维的一种肯定形式与整合方式，因而才形成这样一种有自己独特价值意义的大易符号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它以八卦的形式沉积出我们祖先对其文化价值意义的定势与构思，由其对天道阴阳的认识，体会到地道的柔刚与人道的仁义，并将三者完善地结合为一体。由对象征天地《乾》《坤》卦体的认识，领悟到一种厚德载物的宽容与自强不息的进取！它的伦理精神始终化育着我们后人的德性修养，对维持社会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忧患意识，始终保持着我们民族的凝聚力量，并支配我们努力奋进！总之，它给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构筑出一种价值精神——而这点，恰恰是对《周易》“颇多微词”者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部分。让我们读读西方人有关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想想从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这些西方文化巨匠们对价值理性的理解吧！

真正的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说卦》篇所说的：“观变

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今天,只是因为先生您在问题中问到了这一点,故而稍作评论。我认为,一个研究易学的人,应该有易学的境界,那就是“洁静精微”。故近十年来,我们从不与任何人争论,而只是自己默默地耕耘着,因为《周易》的价值意义,何需我们置评!当我们从泥土中来,又回到泥土中去的时候,《周易》照样流传着。《周易》哲学将永远像孕育它的中华大地一样,“厚德载物”地承担着“人文化成”的任务,并在后人那青春瞳孔的深处,一代又一代地留下久久的、久久的慧光!

问:《周易》在中华文化圈中具有永久魅力。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都有很多人研究《周易》,请谈谈这些地区的研究情况。

答:《周易》及其八卦之象的一系列精妙思想,作为我们前人研究的一个永恒母体与永恒主题,始终吸引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一阵又一阵浪花。它感受着人间的雾、雨、雷、电,披一身天体的日、月、星、辰,在时光的滚滚流逝中,永远头颅昂起着,高出星空!在约三千年的漫漫岁月里,人们对它的研究不但一直绵延不绝,而且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这在世界文化圈中,都具有永恒的非凡魅力。

据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述先教授在我刊发表过极有见地的论文,香港法住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对推动香港与大陆的易学交流方面贡献颇多,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谢宝笙先生、香港城市大学的邓立光先生等,皆在我刊发表过很好的文章,谢宝笙先生还参加过1993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很有见解的演讲。至于台湾地区,其研究《周易》的学者,大多集中在各个大学的中文系,这是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离传统的研究方法尚近。台湾研究《周易》的学者人才济济,著作丰富,我在此无法一一评说。至于海外学者,据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著名汉学家于连(音译)教授介绍,巴黎第七大学是研究汉学的中心,该校有多名学者专门研究《周易》,其中有人专攻张载易学,亦有人专攻汉代象数易学。重要的是,法国还有个“周易中心”,成员约八百多人,职业有教授、大学生、中学教师、职员等等。他们每两周联欢一次,讨论一些《周易》研究的专题或专人,这些人再与另外的爱好者讨论。中心负责人夏汉生(音译)先生,他们主办的周易刊物叫《卦》,不定期出版。他们作为西方人,对中国《周易》研究的认真执着精神令人感叹,弘扬易学,功不可没!在比利时的鲁汶市,由于该市的形状像中国《周易》



的“太极图”，因而，鲁汶大学的部分学者，鲁汶市的汉学家，法国的部分学者及台湾学者，组成“世界太极科学研究院”，并办有《太极科学》杂志，胡阳主席、李长铎先生主编此刊，在海外颇有影响。德国慕尼黑大学有“东方研究所”，负责人为玻尔（音译）教授，指导着《易》学的博士研究生，亦有人专门研究汉《易》及马王堆帛书《易经》。柏林大学亦有研究《周易》的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周易》研究小组。美国博敦学院办有《周易网络》杂志，创办人为 Smith 教授，此刊很有特色，除发表文章外，还介绍世界各地易学活动的重要动态。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音译）教授，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向海外推广易学事业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亚洲，韩国可以说是研究《周易》的重镇，韩国学者偏重象数学研究，他们有“韩国周易学会”，共有二百多学人参加，学会非常正规，力量很强，会长为金容贞先生。日本筑波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帝大等高校皆有学者专攻《周易》，在推动中日《易》学交流方面，汤浅泰雄教授、高桥进教授、佐藤贡悦教授、池田知久教授及郑光民博士等皆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日本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基本与韩国学者属同一路数。此外，泰国曼谷大学的郑彝元教授、新加坡易经学会郭成发会长、新加坡大学李卓然教授等，皆对推动易学研究，作出了可贵贡献。

问：中国《周易》热是否存在不健康的成分？周易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这十年来中国《周易》学者有何重要研究成果？您对中国《易》学研究前景作何评价？

答：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周易》热，很大程度上与“算命热”混为一谈了。从前，江湖上算命卜卦与《周易》研究根本扯不上边，五六十年代及至七十年代皆如此。进入八十年代，随着 1987 年国际易学大会之后“《周易》热”的兴起，江湖上的算命人为了谋生（因为算命受到禁止）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将自己卜卦算命说成是“研究周易的”，兼之占筮之书充斥市场，久而久之，《周易》与算命竟混在一起。现在一般市民谈起某位江湖算命术士往往是：“我昨天在街头碰到一位研究《周易》的，算的可神啦！”当然，这种“《周易》热”必然会带来一些极不健康的成分：一、粗制滥造的占卜之书大量充斥图书市场，很多人只要见到占筮之书，不问其内容有无价值就买，很多江湖术士借此招摇过市，将其骗财活动说成是“研究《周易》”。二、更有人成立“咨询公司”，假借《周易》之名到工厂企业给主管人员看面相、批八字、看风水、算命，完成此“服务一条龙”后，收取高昂费用，并将此美名曰“《周易》与企业管理”等等。这种人数不多，但给《周易》研

究造成极坏的影响。去年经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的不断曝光,这种人才稍稍有所收敛。

尽管出现如上不健康的现象,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十年来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1)在易学史方面,台湾学者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早,如高怀民先生的《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及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等,大陆由于过去几十年《易》学研究始终处于低潮,当然谈不上有易学史的研究,故近十年才首出萧汉明教授的《船山易学研究》,这是一本下了大功夫的研究之作,之后有廖名春的《周易研究史》,宏观勾画出易学发展的大线索。林忠军同志的《象数易学发展史》、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可谓填补了有关这方面的一项研究空白。另外刘玉建同志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及徐志锐先生的《两宋易学史》不久亦付梓。所以,近十年中国大陆在易学史研究方面,已较过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关于《周易》经传研究方面,近十年最大的成就与变化是解经注经之作皆既重象数,又取训诂,更兼取义理,打破了大陆三十多年只有一本高亨先生不谈象数,纯以训诂解易之书的局面。如徐志锐先生的《周易大传新注》就是一部义理象数兼取之佳作。黄寿祺、张善文先生撰写的《周易译注》表现了扎实的象数易学功底与丰富的资料占有。鄙人与林忠军同志合写的《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虽云“白话”,实以象数、义理与考据三者为工具注《易》,金景芳、吕绍纲先生的《周易全解》取义理阐《易》,亦可谓精到。潘雨廷先生的《周易表解》,以表代注阐发易道,周振甫先生的《周易译注》,表达了笔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宋祚胤先生的《周易译注与考辨》亦是难得之佳作。(3)关于马王堆帛书《周易》。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帛书《周易》,这是中国最古的《周易》本子,包括帛书六十四卦与《易传》两部分。1984年《文物》发表第一批帛《易》资料,这在《易》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正值近十年《周易》研究在中国大陆出现高潮,围绕帛书的卦序、今本与帛本的对照、帛本卦爻辞的考辨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张政烺、于豪亮、黎子耀、冒怀辛、周立升、王辉、周祖谟等及本人都著文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邓球柏、张立文两位教授并对帛本易经作了详尽的注释。廖名春同志对帛本《易传》的整理作了很多可贵的工作。对于帛本《系辞》,于豪亮、楼宇烈、王葆玟、李学勤、韩仲民等亦皆提出了可贵的见解,兹不一一详述。(4)《周易》与自然科学。如前所述,《周易》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法指导各门自然科学,而在过去,它的许多理论直接被用于包括中医、数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等在内的古代自然科学与文化

艺术中。近十年,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探讨并取得很大成果。如杨力教授的《周易与中医学》,此书在海内外影响巨大,并三次再版。杨力教授因此书被授予1993年比利时“世界太极科学金奖”。此外,邹学喜、邹成永的《中国医易学》,黄自元的《中医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以及张其成主编的《易医文化与应用》等书,亦皆很有价值。《周易》与古代科学的探讨,如乌恩溥先生的《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式》,江国樑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即是此类成果。另外,唐明邦、卢央、李申等也著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周易》与现代科技及现代科学的研究,近十年更是取得长足进步,董光璧、欧阳维诚、付熙如、王俊龙、潘雨廷、李树菁、萧景霖、尹焕森、朱灿生、赵定理等皆撰文,分别就《周易》与现代物理学、数学、现代生物工程、化学、天文学、地震学等学科领域内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但是,如同您在前面问题中指出的,目前有关《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出现我前面讲的牵强附会与无端比附的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的成果,是仅就我之所见者而云,难免挂一漏万,将很多极有价值的著作遗漏,因此,以上所云仅供参考。总之,近十年来的《周易》研究,虽不敢称“热”,但其成果却是过去三十多年成果的几十倍。

至于中国易学研究的前景,我认为是光明的,对此,我充满信心。首先,中国周易学会今后将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国《周易》研究工作者展开活动与研究。我们的指导方针是:继续加强与重视对《周易》义理的研究,同时恢复并展开对传统易学亦即象数易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当代的易学研究者,更应顺应时代的变化,对易学展开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全新研究,这是我们过去所一再宣示的方针。我们更应特别重视将《周易》的阴阳平衡及阴阳互补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学与决策学,以应用于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宏观决策管理。早在1989年秋于日本召开的“第二届阳光文明国际会议”上,我在“人与自然”的专题讨论发言中,就提出了以《周易》中保持天、地、人统一和谐的“三才”理论,来规划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这一发言被写进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受到极大重视。1995年夏初,在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召开的“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我又重点提到以《周易》阴阳平衡理论指导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当代易学研究的新方向、新课题。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逢一个王朝开明强盛时,《易》学的研究也必然会兴旺

发达。下个世纪将是我中华民族以统一、团结、富强的新面貌重新崛起的世纪,随着国力的强大,这一中国人所特有的人类文化奇迹,必定会在全世界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 科学理解易学 拓展研究视野<sup>\*</sup>

最近,光明日报评论部与《科技智囊》杂志社联合开展了“科学理解易学”的学术探讨活动,8月1日,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张岱年先生与邢贲思先生对“科学理解易学”的见解,更是受益匪浅。

我们应该客观而又清醒地看到:《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从未因历代王朝的更换而间断其研究的一门大学问,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意义与价值功能。它以八卦的形式沉积出我们祖先对其文化价值意义的定势与构思,由其对天道阴阳的认识,体会到地道的柔刚与人道的仁义,并将三者完美的结合为一体。真正的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说卦》篇所说的:“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早在古代,《周易》的象数模式与义理研究就启迪指导着“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的探讨,进入本世纪后,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又形成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相交叉的研究,因而逐渐确立了“科学易”的地位。建国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更是展开了系统探讨与深入求索,并取得了很大成果,现略举我所知者:如杨力教授的《周易与中医学》,此书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此外,邹学喜、邹成永的《中国医易学》,黄自元的《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以及张其成主编的《易医文化与应用》等书,亦皆很有价值。《周易》与古代科学的探讨,如乌恩溥先生的《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式》,江国樑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即是此类成果。另外,唐明邦、卢央、李申等先生也著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周易》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近十年更是取得长足进步,董光璧、欧阳维诚、付熙如、王俊龙、潘雨廷、李树菁、萧景霖、尹焕森、朱灿生、赵定理等皆撰文,分别就《周易》与现代物理学、数学、现代生物工程、化学、天文学、地震学等学科领域内的问题展

<sup>\*</sup>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96年10月10日。

开讨论,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成立于今年年初的中国周易学会,作为组织开展易学学术活动的全国性一级学会,团结全国易学同仁,不慕虚名,多做实事,资助并组织出版周易研究著作,在科学研究《周易》的过程中也扎扎实实地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教授1994年也向我表达了他对中国古老易经的崇敬,对易经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的高度赞扬。《周易》及其八卦之象的一系列精妙思想,作为我们前人研究的一个永恒母体与永恒主题,始终吸引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一阵又一阵浪花;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实为罕见,确属全人类的一大文化奇迹!因此,它不仅在中国文化圈,更在世界文化中,都具有永恒的非凡魅力。

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社会上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在经济大潮中一些江湖上的算命人纷纷改换门庭,将自己卜卦算命说成是“研究周易的”,一些粗制滥造的占卜之书大量充斥图书市场,更有人假借《周易》之名行骗财之实。这种人数量不多,但破坏力极大,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光明日报》评论部与《科技智囊》编辑部目前展开“科学理解易学”的学术探讨活动是非常及时的。因此,我特别邀请张岱年、汤一介、李燕、陈来等先生参加有关“科学理解易学”的讨论,会上他们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讲,今特撰文表达我的诚挚祝贺。

# 由精而博 以精通博

## ——读书漫笔\*

因时代的变化,现在的治学环境已与古人大不相同。古人一般业余娱乐较少,故便于青灯夜读,现在由于电视、音响等业余娱乐的普及,在治学上极易让人分心,因而往往造成学业上的虚华与浅薄。现在某些学术文章往往不是深入浅出、厚积薄发,而是浅入深出,薄积厚发——本来研究很浅,但写出的文章似乎很深,若仔细推敲,却又言之无物,此即是这种虚华与浅薄的表现。为了因应学习环境的变化,多年来,我认为最好采取“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读书方式。

所谓“由精而博”,是指读书要有明确的方向,对于自己主攻的学问,其有关的典籍我们一定要读精读细。要先求其精而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读书范围而求其博。“由精而博”的读书方法,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

一、背诵式读书法。古人对传统启蒙读物和经典著作都是采用背诵式读书法。这种读书法现在被很多人批评为“死记硬背”,认为此法不足取。其实,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采用背诵式读书法,对于我们熟练精到地掌握原典著作意义很大,亦极有必要。“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即指此。山东大学已故著名史学家童书业教授学识渊博,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成就,据说童先生可将一部《左传》背诵如流,可谓“由精而博”的典范。

二、温故知新读书法。“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博”并不泛指博览群书,更指重温旧书而体悟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多年前读过的书,当我们回头重读时,许多过去未曾发现的问题与奥义,现在发现了;过去认为很平常的文字,现在读来犹如春天的花丛,不断有灵感的彩蝶突然飞出!这种前后慧见的不同,并不仅仅因了知识积累的厚薄不同,它更蕴含着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的因素。正如一个六十岁的人重读《红楼梦》,其心得感受与他十

\*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7日。

六岁初读时相比,书中的故事、场景、人物、题咏等皆相同,但经过四十余年的人生风云变幻与学养积累后,如今以一个进入花甲之年的他重览书中的一切,将有着与少年时代完全不同的见解与感受!读小说如此,治学亦同。故朱熹在谈自己读《易》心得时说:“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故“由精而博,以精通博”之“博”,除读书外,更需要有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积聚而形成的“博”,若无此“博”,有时大段学理上的“虚明宁静”,确实无从“见得”。

先儒王夫之云:“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而鄙人认为,治学似应先有“由精而博”的“学成于聚”,然后方可登入“以精入博”的“思得于永”。

六十年代初,我利用工余空闲时间,将部分重要典籍的文字反复研读,直至能背诵下来,使其贯穿胸中。有了这点点根基,这些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作学术研究,自感受益极大。譬如,我原先读《庄子》《荀子》等诸子之书,其与《易》的关系并无所见,待后来背诵《周易》经传后,再读这些书,发现其文章中有很多文句与《易传》文句相似甚至几乎相同者,特别是《彖》《象》《文言》等篇中的文字,其与《庄子》《荀子》等书互相影响的痕迹甚多。我两相对照,先后写出《周易大传之我见》《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等文字,对《易传》形成的年代,特别是它与思孟之学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浅见。此皆得益于“以精通博”的读书法。

这些年来,我以“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方法读书,久之,也稍有所获。今应贵报理论部之约,写成短文如上,以作引玉之砖。



# 含弘广大 品物咸亨

## ——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研究基地专家论证会上的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我代表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中亲莅中心考察和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现在,我把本中心的基本情况和近期设想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做出汇报,请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给予指教。

### 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建立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骨干,易学哲学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与骨干。中国古代哲学说到底关于形而上的道的学问,易乃“大道之源”是历代学者的共识。易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源头,中国古代哲学是易学的重要归宿。几千年来,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互为源流,相资为用,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

《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书。它是中国先民在走出蒙昧,迈向文明的漫长岁月中,对天地万物仰观俯察,近取远拟,殚精竭虑的结晶。从无文字易,到文字易,从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爻辞,汇归为孔子作《十翼》而

\* 原题:关于建立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的申请论证报告。

\*\*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00年第4期。

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成说,这一传统成说不只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而且表明她是中华民族最根源的智慧。在汉代,她被列为“五经之首”,在魏晋,被视为“三玄”之一,其后又对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乃至近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被古代学者视为“大道之源”。历代诠释、发挥《周易》思想的著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由此形成了汪洋浩博,源远流长的中国易文化传统。我们认为易学就是基于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诠释、发挥《周易》哲学精蕴和其他相关思想的一种专门之学。从《周易》作为儒家经书的角度讲,易学是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易》是周普变化之道的角度讲,她不为经学所囿限,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伦理、艺术、宗教、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皆可援易以为说”,她是先民认识世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中国人的方法论。由这种方法论则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即大易智慧。

大易智慧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大易的方法论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大易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源头。先秦时期,诸子并作,百家争鸣,而奠定中国古代哲学基础者为儒道两家,易学哲学恰恰构成了两家思想的源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晚而喜易”,读易乃至“韦编三绝”。道家亦源于易,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易传》以儒为主,整合儒道两家思想,重铸新易学。儒道两家以易为源,而新易学的出现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源,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相资为用,密不可分。两汉时期,是古易学重新高扬之时期,一方面易学构成两汉经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汉人“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论思考方式又影响了汉易的思维进路。两汉易学最大的贡献乃是重开古人以象数解易的传统。然而,由于过分拘泥于象数而流于烦琐,王弼之易学革命,一扫汉易烦琐、拘泥之风,回归《易传》易学哲学化之传统。以老解易,以易喻老,易老结合,贵无派之玄学应运而生。北宋兴起的宋明理学,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无一不重易学之研究,易学尤其是《易传》是宋明理学哲学本体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反过来说,宋明理学的兴起造就了易学的繁荣,使象数、义理两派易学系统化、体系化、精微化。

近代以降,古老的中华易学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退色,也没有因欧风美雨的东来而丧失其本有的学术生命力,相反,明中叶以后,伴随着传教士来华,易学又通过传教士传播到了西方,对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鸦

片战争后,国人惊醒,《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哲学,成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易学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旋律。五四以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对易学均情有独钟。老树新芽,古老的大易智慧在现代人的解读下再现辉煌!我们相信,她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更加辉煌!

今天,从中国到世界,各地易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正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诸如,中国大陆现有十个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荟萃了大量易学专门研究人才,山东大学和福建师大还成立了易学专门研究机构,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易学热;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尤其是马王堆帛《易》和郭店竹简的出土,进一步激活了易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出发,多角度、多渠道综合交叉研究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力求提出新观点,探求新出路成为这一时期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显著特点。

近几年来,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在基础研究上,大量介绍、宣传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论著不断出现,然而课题陈旧,精品力作并不多见。(二)有的易学研究者史料、理论、方法等准备不足,对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独特发展路数,对易学象、数、理、占的内涵也缺乏真切的了解,没能形成一种对易学象数与义理、尤其是象数的正确认识,没有确立起一种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高度哲学性、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相对应的宏大学术研究视野,由于仓促上阵,难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不能将易学的真实面目呈现给读者。(三)十多年来的易学是“热”了,但许多人不能将易学研究 with 占卜算卦区别开来,不少人认为易学就是算卦,从而误导民众,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

由此,我们认为,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的建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其一,易学是一专门之学,易学基地的建立,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而又深入地

理解这一专门之学,澄清各种不必要的误见,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误见,有助于建立新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的科学的易学,使易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走向健康科学的轨道。

其二,《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哲学是易学的汇归。当今中国古代哲学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症结之一,就是缺乏对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深入了解。因此,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基地建立的基础上,伴随着易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由此而有力地带动起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史学、中国古文献学等诸多学科的合理建设与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必将大大推进疏通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文化、重建适应于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中华新文化的步伐。

其三,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基地的建立,将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学术咨询,为人们树立正确的易学观与人生观,打击封建迷信和歪理邪说,发挥其他机构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基地的建立,还将为政府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各项管理提供合理的管理智慧。

## 二、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为基础 建立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的可行性

山东大学有着悠久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传统和良好的易学研究氛围,学校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并给予了积极支持。山东大学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等单位荟萃着一大批研究者和爱好者。早在 30 年代,闻一多先生在山东大学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易学研究,延至 50 年代,高亨先生在山大的易学研究、先秦诸子学研究都取得了饮誉国内外的研究成就,杨向奎先生、童书业先生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学术界也颇负盛名。改革开放以来,我校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1984 年,我校在哲学系成立以本人为主持的易学研究室,1988 年 3 月,正式成立了直属学校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十多年来,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与支持下,中心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刊物发行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本中心于今年 9 月正式更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回顾中心同仁十多年的奋斗历程,

作为中心主任,我既感到宽慰,又感慨良多。在此,我对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扶持及全校师生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想从易学研究队伍的现状,科研项目、成果,《周易研究》的发行及学术交流,图书资料及设备建设等方面把我们中心的基本情况向领导和专家作一简单汇报。

**学术梯队情况:**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山东大学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已形成一个年龄结构合理,布局协调,研究方向相对齐全,素质较高的易学研究队伍。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博士生导师3人,教授6人,副教授2人,45岁以下教授4人。校内兼职研究人员4人,其中博导2人,教授3人。校外兼职3人,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心根据研究人员的特长,设置研究方向,同时也根据研究方向的需要,配置人员,力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本中心承担的研究课题和近四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本中心是一研究易学的专职机构,承担国家和省部委研究课题是中心主要任务。自1996年以来,我中心承担了各类研究课题共17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10项。

在中心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自1996年以来,中心人员发表易学论文110多篇,出版各类学术专著31部。《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中国古代龟卜文化》《两汉象数易学研究》《象数易学发展史》《周易虞氏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正始玄学与儒道互补》《阮籍评传》《黄老学论纲》《当代新儒学引论》《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学术思想研究》《墨学与新文化建设》《自然视野下的社会观照》等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论著填补了国内外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空白。自1996年以来,中心共获国家各类奖项11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一项。

**创办《周易研究》学刊和举办各类易学学术会议:**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周易学会的所在地,本中心于1988年创办的《周易研究》学刊,是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发行的易学研究专刊,也是国内外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多的学术刊物之一。《周易研究》发行2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万多份,在海内外以“二严”即办刊严肃、学术严谨享誉学术界。1998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1999年被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提名参加当年底全国“百佳”刊物评选。同时,又被北大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分别列为“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

为推动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与海内外学术界的联系,提高本中心乃至中国大陆的易学研究水平,十多年来,本中心大力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先后四次主办、一次协办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987年12月,当时的周易研究室(中心的前身)在济南主办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香港《晶报》为这次会议发表社论,誉之为“近代史上有关易学研究的重大里程碑”。为推动两岸易学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我中心与台湾相关学术团体分别于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先后四次举办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在海峡两岸乃至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来,中心努力扩展国内外学术空间,加大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力度,先后接待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访问学者近百人,同时,中心人员多次前往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新加坡及台湾、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或访问。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心的影响,开阔了学术视野,增进了与海内外广大学术界朋友的友谊,提高了我们的知名度,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图书资料建设与科研条件:**图书资料是人文学科从事研究的基础条件,没有图书资料或图书资料不能反映国内外的新成果、新情况就不会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中心一向注重图书资料建设,在学校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一再追加图书经费,大量购置图书和期刊。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处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向社会开放的资料室,拥有种类相对齐全的易学研究书刊,加上学校图书馆馆藏易学书刊,基本上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

**科研设施及办公用房:**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研究方式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是古老的学科,然而愈古老的学科似乎愈需要研究方式的现代化。为了适应研究方式的这一转变,学校在用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专为中心拨出建筑面积205平方米办公用房,有专门的微机房、研究室、讲学厅、会议室等,配有专用电话3部,传真机1部,计算机15台,各类打印机3部,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互联网络终端,人均有一个终端,并设有中心网站。中心人员大都掌握了计算机一般操作要领,使中心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回顾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感慨万千。在这里,我可以向各位领导、专家说明: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是一所具有一定研究特色的、在国际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第一,中心有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素质较高的研究队伍;第二,山东大学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

所在地,对国内外易学研究动向起到较为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三,中心拥有国内唯一一份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该刊发行地域广、发行量大,因而造成较大影响;第四,中心专兼职人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易学研究专著;第五,中心成功地举办了五次大型的有着国际影响的国际或国内学术研讨会;第六,中心所在学科中国哲学和相关学科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献学均有博士点。

当然,中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我们缺乏一到二名既精通易学,又精通外文的人才,从而使我们的对外交流大受局限;其二,我们没有既精通易学又精于自然科学的人才,故无法开展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其三,虽然中心通过各种渠道广开财源,然而因多年来我们主要依靠自筹经费,故使许多应做、想做的事不能顺利展开。

### 三、建设一流易学研究基地的近期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将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建设成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在国际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声誉、名副其实的国家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重点研究基地、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人才培养基地、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信息情报网络中心、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对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方式、学术研究方式乃至高校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与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与探索。

首先,我们决心将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建成一个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认为,人文学术机构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是封闭问题。封闭表现在用人制度上则为近亲繁殖,缺乏互动;表现在管理上,图书资料互相封锁,秘不示人;表现在学术交流上,则画地为牢,既不能请进来,也不能走出去。我们认为人文科学研究有界限而无秘密,因而我们主张本基地向全社会全方位开放。具体做法是:

第一,开放人才管理系统,实行名副其实的聘任制。我们认为,高校科研管理体制首先是人才管理体制。建设一流基地首先应有一流研究人才,没有一流学者专家的参与,任何一流基地建设都是一句空谈。如何吸引一流专家、学者



进入基地或来本中心工作是我们全部思考的第一步。中心对全校开放,对全国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者开放,乃至对海外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专家开放。凡在易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确有造诣者,我们欢迎他们或长期,或短期,或专任,或兼任,不拘一格,不拘成规,前来基地工作。在中心内部,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一律实行竞争上岗,并且全部带经费、带课题上岗,实行课题负责制。凡有经费的课题负责人在自己的经费内,有权召开相关学术会议,有权聘任自己的助手,有权购置设备和添置资料。课题负责人完成课题离开基地。

第二,开放图书资料系统。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本中心将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保存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图书资料、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信息资料较为完备的学术研究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加大图书资料的投入力度,每年计划投入1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置图书和期刊。并拿出部分经费搜罗旧书,复印已不再版的新旧图书。这些资料和图书属于所有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为海内外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面的学者所共享,而不是某些少数人的垄断物。但为了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收费的方式对外开放资料室。

第三,研究课题开放。本课题研究人员除承担国家、省部委编制的研究课题外,本中心将每年自筹10万元人民币用于自己编制的课题研究。对课题的设定我们将打破单一的上面下课题,下面争课题的现状,实施上下互动的双轨制。中心根据易学研究的需要编制课题,并通过《周易研究》发布给国内外学人竞标,中标名单及工作单位向全社会公布,中标者即可以在原单位进行研究,也可以进入基地研究。

其次,在学术上,本中心将在象数易学研究和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沿着象数义理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兼顾的原则,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本基地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走在全国及国际易学研究的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计划:

第一,利用我校古典文献学、史学方面的优势,1999至2002年间,组织校内外易学专家,利用三年时间分三批,标点、校订、整理出版三十部易学经典,以加强基础研究,并为《中国易学史》的写作作前期准备。此一计划已经启动,第一批易学经典的校点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第二,利用五年时间即2002至2006年,组织全国易学专家,完成多卷本《中国易学史》的写作计划。



第三,组织出版一系列能反映和代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研究丛书,计划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能对当代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作出探讨。

第四,开展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研究和中国古代哲学重大课题研究。易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源头,中国古代哲学是易学的重要汇归。几千年来,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互为源流,相资为用,开展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研究对于揭开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之谜,对于理解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都将大有助益。

第五,易学研究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过去,我们在易学与企业管理,易学与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探索,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走经世致用的学术路子,使易学研究为当代社会服务,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本中心将创造条件使中青年学者尽快成长,使他们在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上成为本领域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学术成就突出,学风扎实的带头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一流的基地必须有一流的人才,本中心既是一流易学人才的汇聚地,也是一流人才的培养基地,为此,我们采取三种方法吸引和培养一流人才。

第一,内部挖潜。本中心的一些青年研究者在国内外已显示出了相当的实力,只要给予适当的扶持,他们会成为本领域的带头人。

第二,外部引进。为消除人才培养近亲繁殖弊端,我们将面向全国乃至海外招聘人才,将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确有培养前途的人引入中心工作,使研究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大力培养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后备队伍。利用山东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培养研究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复合型人才。本中心将以中国哲学硕士点、博士点为依托,与中国古代史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文献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相结合,培养高质量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人才。本中心将改变现行硕士与博士的培养体系,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后备人才培养上采取硕博一贯制的培养模式,使人才尽快成长。我们将培养几位既精通外文、史学、文献学、自然科学,又精通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复合型人才,经过十到二十年的奋斗,使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成为国际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我相信,在教育部和山东大学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和全国

广大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全体专兼职研究人员的共同奋斗,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谢谢!